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語言学概論参考資料

目録

列寧和馬克思主义的語言学……………‘俄語教学’社論……（1）
中國的語言学……………………………………罗　常　培……（9）
斯大林关於語言的社会作用的学說……И·А·加　里　寧……（20）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
語言与思惟的关系……………………А·福斯特利可夫……（27）
論語言在認識中的作用……………………德·高尔斯基……（51）
关於概念形成和發展的問題………………德·高尔斯基……（74）
論概念的灵活性和确定性…………伏·斯捷普科夫斯卡婭……（91）
論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Б·А·謝列布連尼柯夫 М·М·古　赫　曼……（106）
关於單一的民族語言……………………格　拉　馬　尔……（110）
略論語言史和社会史之間的关系…………格　拉　馬　尔……（118）
布拉格学派………………………………謝尔文寧柯……（128）
研究方言的方法………………………С·С·維索特斯基……（135）
就苏联經驗談方言研究方法…………………托　达　叶　娃……（149）
語言学問題講話
第一講……………………………………………（164）
第二講……………………………………………（173）
第三講……………………………………………（180）
第四講……………………………………………（185）
第五講……………………………………………（194）
第六講……………………………………………（198）
第七講……………………………………………（203）
第八講……………………………………………（209）

列寧和馬克思主义的語言学

苏联〖俄語教学〗社論

共産党的首創者和領導者，苏維埃國家的創立者，偉大的列寧逝世已經三十年了。列寧首創的党是強大的，不可战勝的。共産党的力量和不可战勝的地方就是，党在建設共產主义社会的全部实际工作中，是以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辯証唯物主义的理論为指針的。

我們國家在建設新的社会中所獲得的成就，是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和共産党政策的正确性的明証。党一貫遵循着天才的列寧所指示的道路。

列寧教導說，沒有認眞的教育，沒有高深的学識，沒有掌握过去的經驗，就不可能建設共産主义，因为共産主义的建設，需要成百万的以人类所積累的文化珍品來充实自己的、各門学問的熟練專家。

列寧把教育和培养共産主义建設者的巨大任务交托給学校。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議案的第四章，就是履行列寧关於普遍实施中等教育的遺訓。“在五年計划終了以前，在各共和國首都、共和國直轄城市，各省的各州的和最大的工業中心完成由七年教育到普遍的中等教育（十年制）的过渡。准备条件在下一个五年計划中在其他城市和農業地区完全实施普遍的中等教育（十年制）。”

这个規模宏大的方案，就是履行偉大的列寧关於实施普遍中等教育的指示。

俄語的巨大的教育教养意义正在充分地成長着，因为所有科学文化的成就，是憑藉語言起傳授的。

俄語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語言，成为各种語言汲取最高深的術語和最先進的文化的泉源。

俄語的丰富和有力，要求在教学上須有良好的技巧，在研究上須尽極大的努力。

为要瞭解語言發展的規律性，为要明确語言的基本机能，必須具备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的深刻修养。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推廣唯物主义理論到社会現象領域，在他們的光輝的著作中，对語言和思惟的起源，給我們繪示了正确的圖景：語言和思惟是人类社会的發展跟它（發展）的基礎——生產劳动过程所制約的社会現象。

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的事業的天才繼承者，深刻的辯証思想家列寧，在他的哲学和歷史著作中，对語言問題相当重視。列寧給語言所下的經典的定义“語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揭示了这一社会現象真正的实質。

不論在語言的实际使用和运用方面，或者是对於語言学問題的理論見解方面，列寧对这些語言学問題都極感兴趣。

在列寧的哲学歷史著作中可以找到深刻啓示的一般理論問題，对於語言学許多問題的解决，有其最重要的意义。

語言学家和所有我們的学者，应当把列寧下面的这一段話奉为金科玉律：“沒有牢固的哲学基礎，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都不能經受得住反对資產階級思想進攻和資產階級觀念复活底斗爭。为了要經得起这一斗爭並把这一斗爭完全勝利地進行到底，自然科学家就应当是現代的唯物主义者，应当是馬克思所創導的唯物主义即辯証唯物主义底自覺拥护者。”〔一〕

斯大林在其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也認为把馬克思主义灌輸到語言学中去是語言科学的基本任务之一。

在列寧的不朽著作中，語言学家在解决許多語言学問題当中找到了唯物主义的根据和基礎。对於語言科学的順利發展必須解决的一般理論問題之中，应以下列問題为首要：1．語言和思惟的相互关系問題，不僅是一般的方面而且是个別的問題方面：詞和概念，判断和命題。2．如何理解語言中形式和內容的問題。3．語言中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問題。4．关於語言底符号的和反映的性質問題，关於語言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5．关於理性，感情和意志在語言中的相互关系及其統一和差異的問題。

深刻地研究列寧的著作，將幫助我們正確地对待这些問題的解決，並能以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來闡明它們。

1．語言和思惟的統一的問題，是在列寧的反映論的啓示下最主要的決定性的問題。

“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中有生物現象和社会現象底唯物主义的解釋，並給予一切观念論以致命的批判。語言学家研究該書以后，就可以抓住語言和思惟統一的实質。

列寧的“哲学筆記”对於解決这个最重要的問題給以坚固的基礎，並幫助理解詞和概念、判断和命題的相互关系。

列寧的反映論令人信服地論証說，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早於人的意識而存在，沒有物質，思惟就不可能存在。人的思想是特殊構造的物質——腦底產物。沒有腦就沒有思惟。只有腦能思想，能認識环境。思惟能洞察自然界的秘密，認識它的發展規律。因之不可能把思惟同物質割离开來。但也不可能把思惟和物質混为一談，虽然也不可以把它們对立起來。

思惟是一个过程，其結果是客观世界反映到我們的意識之中。因之我們的腦具有反映的特性。反映也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認識。

列寧教導說，認識通过兩种方式進行：感性的認識，藉助与感覺和知覺；邏輯的認識，藉助於表象、概念、判断和推理。

邏輯的認識是藉助於語言來進行的。

列寧这样指出：“感官的知覺顯出对象，理性給对象以名称。理性決沒有任何为感官知覺所沒有的东西，但是，凡感官知覺上实际存在的，在理性上僅僅徒有其名……所謂名称究竟是什么呢？这是用以識別的記号，某种惹人注目的標誌，我把他做为对象的代表，对象的特征，以想象出对象的整体。”〔二〕

列寧在“哲学筆記”里說，感覺指出客体的实在性，思想和詞指出客体的一般性。任何一个詞（話）都是已經概括了的。

根据列寧的見解，可以明瞭下面的問題：感性的認識沒有詞也可以進行，表象和概念却被概括和被表現在詞中。

关於詞、概念和对象的对应和差異，列寧在其論文“再論职工会、

目前形勢及托洛茨基与布哈林的錯誤”中做了很令人信服的說明。列寧举了“玻璃杯”这个詞为例，以辯証邏輯的观点指出說道：“不可爭辨地，玻璃杯是一个玻璃圓筒，也是一个飲器。可是一个玻璃杯不僅具有这兩种屬性或素質或方面，而且具有無数的其他的屬性、素質、方面，与其余的整个世界的相互关系和‘媒介’……”〔三〕列寧还指出玻璃杯的許多屬性及其可能的用途。

从列寧关於“玻璃杯”的議論中，我們可以做出这样的結論：詞和概念相適应，概念和詞是統一的，同时又是不相同的。

2．語言中形式和內容的問題並不是次要的。

列寧在“哲学筆記”里寫道，形式是本質的，而本質轉化为形式（142頁）。語言的本質即它的內容是通过形式來表現的。語言本質的表現，这就是語言內容的顯露。

沒有形式一般說不可能有任何的东西。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反正是定形了的物質。我們应当以这样的观点來对待語言。

根據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的学說，在形式与內容的辯証的統一中，我們应当在產生其固有形式的內容中看見主要的应份獲得的东西。我們分析了語言以后，应当認为形式幫助其內容的成長，但內容可以超过形式，因之开始“內容同形式的斗爭，以及相反的，形式同內容的斗爭。拋去形式，改造內容。〔四〕

斯大林在其著作“無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里，对形式和內容的学說有巨大的貢献。

上述的原理对於語言学家是非常重要的。語言本身的發展，各种詞类的發展，可以而且应当完全运用列寧和斯大林关於形式和內容的学說加以論証的。

在形式和內容脫离的基礎上引起詞义的發展，在形式和內容脫离的基礎上引起詞类的發展，引起由一种詞类到另一种詞类的轉变。

正确理解語言中的形式和內容，就能較深刻地分析作家的語言，就能較明确地理解藝術作品風格的不同，就能明瞭各种藝術作品的風格及其內容所以彼此不同的原因。

內容愈正确深刻，形式就愈完善。內容愈生动，形式愈特出。內容

愈容切合实际，形式就愈明白易懂。因为本質轉化为形式，而形式是本質的。列寧著作的內容之所以能体現於这样完美的形式，是因为各种現象的內容底眞正本質是通过列寧的語言而被揭露的。列寧說过："我們的傳實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不是因为我們已成为甚么高明的宣傳家；我們的宣傳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祇是因为我們所講的是眞理[五]。"

关於列寧的語言，斯大林曾說过下面的話：

> 非常大的說服力量，簡單明瞭的論据，簡單通俗的語句，沒有半点矯揉造作的色彩，不玩半点令人昏眩的手势，不用半句故意刺激听众的辞藻——所有这些，都使得列寧的演說比通常"國会"演說家底演說高出万万。
>
> 可是，当时使我佩服的还不是列寧演說底这一特点，而是列寧演說中那种不可克服的邏輯力量，这演詞虽然是較为乾燥地，但是着实地抓住着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虜得所謂精光光。我記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这样說："列寧演說中的邏輯，簡直是一种万能的触角，好象是用鉗子从各方面把你鉗住，使得你無法逃脫出去：你不得俯首想投降，就要完全失敗。"〔六〕

我們偉大的思想家，世界劳动人民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底語言是不脫离事实的，他們的語言的形式是適应其內容的，而語言同思想脫節，因之也就是語言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則特別明顯地表現在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言辞里。列寧曾屢次地指出他們語言同思想、言辞同事实的脫節。在"論言辞底弊害"一文中，他給小資產階級政党詭辯家底謊言打上烙印，"伪善的口吻"一文論可恨的謊言与"清談"；"激怒的惶惑"一文，揭穿孟什維克的"言不符实"；在"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一書中，他按照布尔什維克方式，清除了語言的伪科学，故弄玄虛的術語，自我炫耀的时髦字眼和一切的"主义"。

3．列寧的著作，特別是"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和"哲学筆記"，对語言中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的相互关系問題，也做了明確的昭示。为要理解作家語言中个人因素和全民因素的关系，为了理解許多語言的范疇如人称、时制、式、語气意义等，这一个問題是必須正确地解决的。

在列寧的著作中，我們也可以找到解决这些問題的根据。列寧对这

些复雜的問題的解釋，是根据其关於人对周圍世界感覺过程底深刻的唯物主义理解而出發的。

世界是客觀的，而且不依賴於我們的意識而存在着。它是由我們的腦所反映的。人在思惟过程中，可能会不恰当不正确地反映客觀世界的現象，因为感覺和知覺是客觀世界底主觀形式。祇有那些經过社会实踐所驗証的才是正确的，客觀的。

思惟的客觀性，这就是概念和事物的一致。既然語言被認为是現实的实际的意識，那么，語言就犹如思惟一样可能兼有客觀的和主觀的因素。

語言中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的概念是未被通曉的未被区分未被闡明的。語言学的某些問題的解決，还缺少唯物主义觀点。

4．关於把詞理解为反映或符号的問題，有着重要的意义。

列寧以認識論的觀点批評了把概念当作表象的見解。列寧極其反对普列漢諾夫底認識中的象形文字論，因为这一理論怀疑我們感官的知覺，帶着不必要的不可知論的因素。

在所謂語言"新学說"統治时期，語言学家曾把列寧的这一批評从認識領域搬用到語言方面，而且开始教導說：詞也"反映"实际現象。但是，如我們所知，現实是由我們的腦所"反映"的，其結果是我們的概念得以構成。概念实际上是模型，是現象近似准确的反映。但詞不可同概念混为一談。詞是外殼，是概念底綜合和表現的形式。作为概念之表現的詞，不是任意的，假定的，也不是故意造作的。詞是对实际事实的概括認識底社会的表現。所以詞在思惟方面不可能祇是符号，但是詞的發音方面可以充当对象，事物或动作的符号且为社会所公認。所以，詞整个地是不可以認为是符号的。另一方面，不可以認为詞"反映"眞实現象恰如腦那样"反映"它們。这一問題的正确解決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依据列寧的著作的。

5．列寧关於認識底感性的和理性兩个階段的統一和差異的学說，給予正确理解語言中理性因素和感情因素的可能。

理性因素和感情因素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它們在人之中是統一的。在語言里，也不可以把它們分割开來，因为語言所表現的不僅是思想，

也有感情、願望和意向。人在表現自己的思想时，同时还感情地將自己的思想加的渲染。人在表現感情时是意識到它的。列寧在关於盧巴金的著作的“書評”一文中，指示作者說：“如果‘沒有人类的感情’則从來不会，現在不会而且將來也不会有人类对眞理的‘探求’”現实的認識总是或多或少地伴隨着感性的知覺和感性的評價。在語言里，不僅在認識的过程，而且在交际的过程里，感动性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正如不可把理性因素和感情因素割裂开來一样，同样也不能不看見它們的差異。不可以在認識中把理性因素归結到感性因素去，甚者在兩或之間划上等号。在語言里同样也有兩者旣不可分割又不可混同的現象。

在語言里，感性事实和理性事实的混淆，一方面造成在分析这些事实时的大錯誤，有如感嘆詞同其他詞类的混淆，各种不同的小品詞的混淆，妨礙語言中語气詞义的正确發揮等；另一方面，言辞中理性事实同感性事实的混同，妨礙对句子的不同类型性的理解，妨礙着表达見解的句子和表現情緒和意向的短語、特殊句子的区别。

列寧在“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里指出，思惟、感情和意志是在一起表現着的。因为語言也是斗爭的武器，因为語言所表現的是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所以語言在社会生活中，在政治斗爭、各种思想斗爭中，獲得了最重要的意义。

作家为人民的理想而斗爭的文藝作品中的語言，其感染人的力量是最偉大的。在巨大的社会运动的年代中，在全民动盪的年头，語言的力量尤其是有效。在为祖國为俄罗斯文化为爱國主义感情和民族自覺的覺醒而激烈战斗的偉大衛國战爭时期，俄語变成为在和法西斯侵略者斗爭中最犀利的武器。作家和詩人，描繪出苏維埃人性格的最好的典型，描繪出他們的大無畏和自我犧牲的精神，他們的勇敢和大胆，同时培养了高度的爱國主义感情，为反对迟鈍、暮气、反对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反对小市民的伤感情緒而斗爭。

語言的力量使人民成为牢不可破的团結一致，語言的力量培养剛毅和坚定，培养对祖國对人民的热爱，对党的忠誠。

作家越接近人民，越珍視人民的利益，越明确全民的目标和任务，那么他的語言也就越是人民的語言。作家的思惟体系越是邏輯的，那么

他的語言就越富於說服力。作家的感情越丰富，他的語言就越特出，越富表現力。作家的意志越坚强，他对义务和必要性的概念的語言表現就越肯定。

在人的性格中理性、感情、意志的和諧一致，也同样和諧一致地表現於語言中。作家性格上思維的正确性、感情和强烈性和意志的堅定性表現在他的語言底鮮明表現力和深情感人中。偉大的作家和政論家的語言之所以是这么有力的影响群众的武器，是因为他們的語言中和諧地統一着高度的理智、坚强的意志和深刻的感情。

列寧自己的語言，就是应当仔細加以研究的这样和諧的語言。列寧的著作和他的唯物主义認識論教導我們这样地理解語言。

列寧曾指出报紙的語言和政論作品的語言应該怎样，指出它对我們优秀作家的語言的关系，他的見解帮助我們解决語言的規范化問題，帮助我們理解適合我們时代任务的風格。

以馬克思列寧主义武裝起來的苏联語言学者，正以新的力量走向苏联唯物主义語言学更新的成就。

（多明譯自一九五四年第一期“俄語教学”）

〔一〕“列寧全集”33卷207頁：“論战斗的唯物主义底意义”。

〔二〕“哲学筆記”，320 頁。

〔三〕“列寧全集”，第32卷，71頁。

〔四〕“哲学筆記”，193 頁。

〔五〕克魯普斯卡婭：“作为宣傳鼓动家的列寧”。

〔六〕斯大林：“論列寧”，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1949，28頁。

中國的語言学

罗 常 培

本篇簡略地叙述中國歷代关於語言的理論和著作，近几十年來的成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語言学的新方向，斯大林同志語言学著作对中國語言学的影响。

中國古人对於語言的看法——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有最丰富的文化遺產。中國古代虽然沒有語言学这个名目，实际上也做了不少語言学方面的工作，在古書中常常可以看到关於語言的理論，虽然是片段的，可是非常精采。現在举几个例子來說。

战國时的大哲学家荀子（約公元前三三五——二五五）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者謂之不宜。’（荀子正名篇）三國时候的嵇康（二二三——二六二）說：‘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号。举一名以为标識耳。’（嵇中散集声無哀乐論）〔一〕用現在的話來說：在起初定名的时候，名称跟事物的关系是偶然的。換言之：語言是人們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字音跟字义只有事实的关系，沒有必然的关系。这是語言学的重要原則，認識这一点，我們才能比較語言，研究語言的親屬关系。

东漢的哲学家王充（生於公元二七卒於九八——一〇四之間）說：‘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語言同趨。……經傳之文，聖賢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論衡自紀篇）他很正确的說明語言文字的关系；古書难懂的理由是古今語言有变迁，又有方言的差別。这是語言学的基本原則，認識語言是演变的，我們才能研究語言的歷史，語言的發展，古書的註解里，常常有古今詞彙不同，語言不同的話。例如：东漢末年鄭玄（一二七——二〇〇）的周禮（春官外史）注說：‘古曰名，今曰字’；毛詩（第一五七篇东山）箋說：‘古者声栗烈同’。跟鄭玄同时的刘熙在他的釋名（釋車）里說：‘車，古者曰車

声如居，……今日東声近舍。’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学者已經認識語言是变的。

訓詁——訓詁就是解釋古代的字义，主要是注解古書。現存經典的註解，可以追溯到漢朝（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二二〇）。漢朝最有名的經学大师鄭玄所作的詩經、周礼、仪礼、礼記的注解，都是很重要的著作。漢朝以來，歷代学者都有很好的成績。陸德明（約五五四——六四二）的經典釋文（五八三），孔穎达（五七四——六四八）的五經正义，都是总結前人意見的著作。哲学家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也註集了好些古書，如詩集傳、論語集註、孟子集註、楚辞集註。陸德明、孔穎达以及其他唐朝（六二〇——九〇七）的学者偏重字义的解釋，朱熹以及其他宋朝（九六〇——一二七九）的学者偏重內容的發揮。清朝（一六四四——一九一一）的学者在訓詁方面成就最大，差不多每一种重要的經典，都做了新的註解。除了注解古書以外，在字义方面，还有許多独立的研究。其中最特出的是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王念孙（一七四四——一八三二）王引之（一七六六——一八三四，王念孙的兒子）。戴震的詩經补注、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王念孙的讀書雜志，廣雅疏証、王引之的經义述聞、經傳釋詞，在古代字义研究上都有卓越的貢献。清朝以前，古書的注解主要是随文解义，訓詁只是为解釋古書用的。清朝学者对字义有精深的研究，無論自己著書，或者替古書作注，都有成系統是独立的見解，訓詁才成为一門学問，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們对古音学有修养，所以对古字义有深刻的認識。〔二〕

字典——中國字典可以按体例分成四种：（一）沒有注解的分类字彙；是識字課本性質，（二）有注解，按意义編排的字典，（三）有注解，按字的偏旁編排的字典，（四）有注解，按字音編排的韻書。这四种体例代表字典發展的四个階段。第（四）項留到下節討論，本節先討論前三項。

（一）沒有注解的分类字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紀的史籀篇，現存最古的是史游（公元前一世紀）的急就章。更早的都不存在了，只能从古書的引証和新發現的漢代木簡上找到一部分。这种字彙編排的次序

一部分根据字的偏旁，一部分根据意义，並且編成韻語，便於記誦。后代有不少这类的識字課本，如周兴嗣（四七一——五二一）的千字文、和各地流行的‘雜字’之类。

（二）按意义编排的字典，最古的是尔雅，相傳是周朝初年周公（公元前十一世紀）所作。这說法不見得可信。根据穩健的估計，大概是公元前三世紀編定的。尔雅共分十九章。前三章占全書的三分之一，是字义的解釋，大部分把义同义近的列为一条。第四章至第十九章是事物名称的分类，如‘天、地、山、水、草、木、鳥、獸’等。后來摹倣尔雅的書很多，最早的是魏（二二〇——二六五），張揖的廣雅，書名的意思是尔雅的擴大或补編。

揚雄（公元前五三——公元一八）的方言是中國第一部記錄方言的書，也是按意义排列的，其中大部分詞彙注明通行的区域，哪些是全國通行的，哪些限於某些地方。他的材料來源有古代的典籍，有直接的調查。二千年前就調查方言，这是非常难能可貴的。其中方言的不同大多数是詞彙的不同，例如：‘舟，自（函谷）关而西謂之船，自关而东或謂之舟，或謂之航。’也有一些可能是同一个詞在不同地区里的不同讀音，例如：‘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曰迎。’逆字迎字古音相近，都是迎接的意思。后代摹倣方言的書也不少。

刘熙（公元二世紀）的釋名是一种分类字彙，共二十七章，包括‘天、地、山、水’等，書中用音同音近的字來解釋字义，想用这种方法來推究事物得名之由，所以叫做‘釋名’。例如：‘冬、終也。’終是末了的意思，冬是一年的末了，所以用‘終’字來解釋‘冬’。这种解釋字义的方法有时候免不了附会，不过利用它音同音近的材料，对於推測当时的音韻，倒也有一些帮助。

（三）按字的偏旁編排的字典始於許愼的說文解字（公元一〇〇，簡称說文）。这是有意識地編成的字典。全書分成五四〇部，共收九，三五三字，其中大部分是形声字。形声字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形，跟意义有关，多半是說文解字的部首，例如：‘江，河’都是水字旁，都在水部。一部分是声，跟讀音有关，例如：‘江’字从‘工’声，‘河’字从‘可’声。說文解字部首次序大部分跟形体有关系。唐宋以

來說文解字是研究中國文字的主要参考書，十七世紀以后研究的人更多，講說文解字的專書和論文合起來有几百种。說文解字以后按部首編排的字典非常多，其中特別著名的是顧野王（五一九——五八一）的玉篇（五四八），共一六，九一七字。原書注解列举書中实例，体例非常完善。可惜現在只存在一部分殘卷。現行的玉篇是陈彭年等在一〇一三年改編的，分部大体根据說文解字，共有五四二部，二二、七〇〇多字。梅膺祚的字彙（一六一五）依据說文解字，归併部首，共二一四部。清代官修的康熙字典成書於一七一六年，共收四七，〇二一字，分部就是根据字彙的，到現在还有許多人用它。近几十年出的字典，通行最廣的是辭源、辭海，單字沒有康熙字典多，分部同康熙字典一样，除單字外，特別着重典故和成語的解釋，並且包括很多新的名詞。

音韻学——公元二〇〇年以前，字典和古書注解的注音，都用音同或者音近的字來比拟，不容易說得明白准确。公元三世紀發明了反切的方法，把每个字的音（一个字是一个音節）分析成三个部分：（一）起头的音（‘声韻’）（二）其於的音（‘韻母’），（三）全音節的音高（‘声調’）。反切用兩个字來表示一个字的音，上字表示被切字的‘声母’，就是跟被切字‘双声’；反切下字表示被切字的‘韻母’‘声調’，就是跟被切字‘疊韻’。比方說‘耐’най，‘奴’Hy‘代’Дай切，耐奴兩字的声母都是aH，耐代兩字的韻母都是ай耐代兩字声調都是去声。从此以后無論甚么字都可以用反切注音。就漢字这种非拼音的文字而論，用反切注音的办法是比較簡單准确的。現代的語言学家認为，分析漢藏語系的語言，每个音節分成这样三部分是最方便的。

有了反切，才有按音編排的字典，就是韻書，最早的是魏（二二〇——二六五）李登的声类，其次是晉呂靜的韻集(公元三〇〇年左右)，現在都不存在了。最重要的韻書是陸法言（=陸詞）的切韻(六〇一)。切韻的序上明白地說，切韻不僅是实用的書，也是審音的書。〔三〕切韻流行全國，有許多增訂本。最晚的增訂本是一〇〇八年的廣韵和一〇三七年的集韻。切韻原本已經不存在，最近發現許多唐人抄寫本，其中有一个王仁昫的增訂本（七〇六）是完整的。〔四〕切韻系韻書在中國語言学上地位非常重要。研究現代漢語，可以拿切韻的系統來說明各方

言的語音变迁和方言之間的关系。研究切韻以前的音韻系統，也得从切韻往上推。

有了韻書才有韻圖。这是一种表格，同一直行表示声母相同，同一横行表示韻母跟声調相同。这种韻圖可以表示整个音韻系統的全貌，声韻配合的关系。現在的語言学家認为，要描寫漢藏系語言的音系，这种表格是不能缺少的。韻圖大概在九世紀就有，不过現存韻圖最早是十二世記的。大歷史家鄭樵（一一〇四——一一六〇）的通志七音略是根据切韻系韻書的，同时代的切韻指掌圖却根据当时語音加以調整。以后出現的韻圖不外这兩部書所代表的考古和審音兩派。

因为語音的变迁，切韻系韻書無論如何改編，都不能表示当时的語音系統，非有新韻書不可。一三二四年出了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一三七五年出版了宋濂（一三一〇——一三八一）等人編的洪武正韻。中原音韻沒有濁塞音声母（如Б，Д，Г，），入声不自成一类，与現代大部分官話相近。洪武正韻有濁塞音声母，入声自成一类，与現代吳語相近。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等人編輯的經籍纂詁（一七九九），把古書的注解分字收罗，按韻編排，是很有用的參考書。近年出的韻書，最主要的有國語辞典，除單字外，多收白話及現代常用的詞。

古人虽然知道古今音異，可是有系統的究古音是从吳棫（約一一〇〇——一一五五）开始的，他著了一部書叫韻补。古音的研究清朝有飛躍的進步，我們举六个人來說。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是生於明朝卒於清朝的，他研究音变歷史，特别着重每一种音韻現象最早出現的时期，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首先指出諧声字同一声符的字在詩經用韻里是可以通押的。換言之，諧声系統跟詩經用韻基本上是符合的，我們拿这兩种材料当作內部一致的材料來研究沒有多少例外。根据这兩种材料，就可以把上古音的韻母分成好些部。上古音的分部工作因此就越來越細密，到王念孙（一七四四——一八三二），江有誥（一八五一年卒）几乎已經到了頂点，可以补充修改之处已經不多。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四）是第一个研究古代声母有成績的，首先証明古音沒有齒音（例如 Ф·В），只有变唇齒音（例如 П·Б·Н）。陈澧（一八一〇——一八八二）著切韻考（一八四二），研究反切的系

統，分析切韻的声韻，他的方法和結論，用今天的語言学的眼光來批評，基本上都是站得住的。

外國語言的研究——公元一世紀，佛教傳入中國，中國人接触到結構跟漢語完全不同的梵文，翻譯了大量的佛經，保存了無数印度已經失傳的典籍。同时梵文的研究对中國音韻学也起了影响。梵文字母按照發音部位發音方法排列，是最科学的。反切已經分出字音的声母和韻母，可是声母的系統排列法是唐朝一个和尚守溫（九世紀）參考梵文定的。印度教兒童審音識字用的悉曇章，对韻圖的產生也是有幫助的。

十九世紀起，中國人研究欧洲語言的漸漸多了。馬建忠（一八四四——一九〇〇）对拉丁文很有研究，他寫出了第一部漢語語法——馬氏文通（一八九八）。在他以前也有討論虛字用法的書，可是有系統的語法这是第一部。

从上一節我們可以看到，歷朝歷代的中國人，有很多敏銳的語言学家。不过因为文字不是拼音的，他們不能不偏重抽象的語音分类跟語音当中的关系，比較忽略語音本身的音值。好些古代学者的著作，要等待現代語言学家作語音学的解釋。中國人接触了分析音素的欧洲文字，掌握了分析音素的工具，語音学大有進步，同时語言学也大有進行。

近几十年來，中國語言学家研究的范圍不限於中國的語言。关於印欧語，也發表了好些論文。亞洲各國的語言，中國人向來很关心，如越南語中的漢語借字，印度尼西亞語的語法，都有著作發表。

近几十年的工作——近几十年來的工作，主要的是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漢語語法的研究，漢語歷史的研究，漢字改革研究，漢藏系語言的調查研究。本節先討論前三項。

中國的語言可以分成三个大区域來說。东南各省的方言最复雜，这一区域包括廣东、福建、台灣、江西、浙江五省的全部，湖南省的大部分，廣西、安徽、江苏三省的一部分。第二区是‘官話’区，包括長城以南不屬於第一区的各省，跟东北的大部分。換句話說，長江以北及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的漢民族，說的全是‘官話’。第三区包括內蒙古、新疆、青海、西康、西藏以及西南各省的边地，說的是不同民族語跟‘官話’。这一区土地差不多占全國的一半，人口却不到全國的十分

之一。漢語的方言可以分成九組，第一区六組，第二区三組。第一区的六組是粤語、贛客家、閩南、閩北、吳語、湘語。第二区的三組是北方‘官話’、西南‘官話’、下江‘官話’。北方官話包括黄河流域和东北，北京話屬於这一組。官話同特点是音系比較簡單。說各組‘官話’的人，他們之間可以隨便談話，各’的共人用自己的方言，用不着太迁就对方。漢語方言的区别，主要是音系不同，其次是詞彙，語法的差異最少。

北京話可以說是全國的共同語，音系語法都有好些專書。全國方言，曾經作比較廣泛調查的有江苏南部、浙江、廣东、廣西、江西、湖南、湖北、雲南、四川、安徽南部、陕西中部等处，已經寫成报告發表的很多。

漢語語法有系統的研究始於馬氏文通，不过这部書講的是古文的語法，以后出版的語法書和單篇論文很多，有講古文的，有講口語的，有比較古今語法的，对漢語句法結構有比較精密的分析。漢語的語法，最主要的是字序和結構的層次。向來大家都知道字序在漢語中的主要性。还有一点同样重要的，就是漢語的句法結構可以一層套一層，任何一种結構当中都可以包含别的結構，不必用好些連接成分。只要認清層次，条理就非常清楚。例如：

他‖不來。

他‖很好。

（他‖不來）‖很好。

‘他不來’是主謂結構当主語用，‘很好’是謂語。

我‖看見他。

我‖看見‖（他來了）。

‘他來了’是主謂結構当賓語用。

我們‖反对｜美帝國主义。

我們‖反对｜（武裝｜日本）

‘武裝日本’是动賓結構当賓語用。

我們‖反对｜（美帝國主义‖武裝｜日本）。

‘美帝國主义武裝日本’是主謂結構当賓語用。

〃前头是主語，〃后头是謂語。丨前头是动詞后头是賓語。括弧里头的成份是句子的一部分，可是本身又可以分析。

漢語歷史的研究除古語法外，有古文字，古音韻的研究。古文字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甲骨文、銅器銘文，（公元前十三世紀至公元三世紀）的研究始於十一世紀，現存最古的書籍是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一四四年刻石）。甲骨文（公元前十三世紀至前十一世紀）开始發現在一九〇〇年。近人对甲骨文跟銅器銘文的考釋与研究，不僅对認識古代的語言文字有帮助，对上古史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貢献。

章炳麟（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和他的学生黄侃（一八八六——一九三五）对清朝人的古音学說有所补充，不过立論方法和清朝人一样。現在的学者用語言学的方法來解釋清朝人的古音学說，發表了好些構拟音値的專書与論文，对詩經音系，切韻音系以及語音变迁史就有了比較具体的認識。

漢字改革——漢語有方言的差別，漢字却是全國統一的。漢字的意义到处一样，讀音却随方言而異。各方言中漢字的讀音虽不相同，各方言的讀音之間却有一定的关系。漢字的优点是通行全國，缺点是形体复雜难認、难寫，学習比較麻煩。明末清初就有些人看到漢字的缺点，十九世紀起，不断有人提議如何改革漢字，以便普及教育。就方法說，主要的有簡化漢字与拼音兩派。簡化漢字派的目的是提高学習漢字的效率。拼音派又可分兩支：一支用各种拼音符号分析听母韻母，給漢字注音，目的也是提高学習的效率；一支用拉丁字母分析音素，目的是拿它來造成拼音字，代替漢字成为新的文字。一九一八年公佈的注音字母，把漢字的讀音分析成声母韻母，分別用字母（利用漢字的古体）表示。这个办法在基本上跟反切相同。事实証明，注音字母对於推行識字运动，功效顯著。一九二八年公佈的國語罗馬字，一九三一年訂定（后來略有修改）的拉丁化新文字，都是分析音素的。在标音方法上，兩者都采用拉丁字母，主要的不同是：國語罗馬字用拼法表示声調，拉丁化新文字在原則上不标声調。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特别关心並且努力設法提高全國人民的文化水平。一方面組織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

研究中國文字拼音化和漢字簡化問題；一方面大力推行識字运动，普及教育。一九四九年开始实驗的'速成識字法'，利用注音字母，約在一百五十小时左右的教学时間內，可使一般文盲和識字不多的人离开注音字母初步会認、会講一千五百到兩千个漢字。这种教学方法的創造与推行，只有在解放以后才有可能。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的优越性，这里又提供了一个証据。

少数民族語言研究——中國是一个以漢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國家，除漢族外据不完全的調查，少数民族在六十种以上。全國少数民族的人口約計四千万左右，很多分佈在边境，地区遼闊，所占面積約占全國面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全國少数民族的語言可以作如下的分类：

（一）漢藏語系　1．洞台語（洞水語、台語）
　　　　　　　　2．苗瑤語（苗語、瑤語）
　　　　　　　　3．藏緬語（藏語、彝語、荆濮語等）
（二）阿尔泰語系　1．突厥語（維吾尔語等）
　　　　　　　　2．蒙古語
　　　　　　　　3．通古斯語（滿洲、錫伯、索倫、赫哲、鄂倫春等語）
（三）印歐語系（俄罗斯語、塔吉克語）
（四）南島語系（台灣高山語）
（五）南亞語系（雲南緬甸交界的崩龍語、瓦語）

其中漢藏語系人口最多，阿尔泰語系次之，其他三系人口都很少。

在少数民族語言中，調查工作做得最多的是漢藏語系，有好些調查報告發表。其中洞台語的工作做得較多，發表的著作不限於記錄調查，並且有深入的研究。我們知道，漢藏語系都是有字調的，古声母帶音，不帶音決定字調的發展，喉塞音跟送气成份也有它一定的作用，古代的帶音的塞音声母常常变成不帶音的。从这些趨势看來，漢語与洞台、苗瑤、藏緬語的親屬关系是沒有問題的。关於洞台語跟苗瑤語的字調与声母的發展，各方言之間的关系，藏文前綴音对於声音的影响，藏緬語的語法，都曾經有重要的論文發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正确地执行了共同綱領所規定的民族政策，出現了各民族間空前未有的大团結。因此，語言研究工作可以配合政策，結合实际地順利進行。語言学工作者也熱誠地幫助沒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制定文字，或改革其旧有的不合用的文字。西康南昌区域的新彝文已經实驗推行，成績优良。还有許多少数民族語言已經編出教科書，在積極試教中。除了这些現代語以外，还有些古語言，現在已經沒有人說，不过还有記錄存在。关於吐火罗文(古印欧語)、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都有專書及論文發表。

斯大斯同志对中國語言学的影响——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日，斯大林同志在眞理报上發表了‘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接着又發表了几封討論語言学問題的信，对於語言学有極大的貢献。他从根本上駁斥了馬尔派的荒謬理論，不單給苏联的語言学开闢了新路，同时也給中國語言学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他的文章譯成中文以后，立刻引起全中國学術界的注意，並且展开廣泛的討論，联繫到文字改革、翻譯工作、語文教学和語言学家的任务等問題。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九日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召开了一个大規模的座談会，來討論斯大林同志的語言学理論。他的理論对中國語言学的工作也發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 过去中國語言学界偏重語言本身的問題，專題研究和方音調查有好些存在着脫离現实的偏向。解放以后，語言学工作者学習了馬克思列寧主义和毛澤东思想，事实上已經改正这种偏向。現在讀了斯大林同志的文章，更从理論上有了明确的認識。准备着在斯大林同志語言学說的基礎上，結合中國語言研究的具体情况，建立中國語言学的系統的理論。

(二) 过去有好些从事文字改革的人，以为語言文字是有階級性的，因此走了一些弯路，現在已經沒有人再信这种‘理論’，文字改革工作已經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三) 中國共產党中央重視語法的教育，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連載‘語法修辞講話’（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糾正文理不通的現象。引起全國人民学習語法的高潮。

(四) 过去少数民族的語言調查工作虽然有成績，可是不够普遍，

不够深入。調查的結果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沒有多少帮助。三年以來在帮助沒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制定文字，編教科書方面，把語言調查跟語文教育結合起來，已經獲得了若干成績。

在中國語言学的未來發展中，斯大林的語言学理論必然要發生更大的影响。

〔一〕以后也有类似的理論，例如無能子（序題光啓三年，即公元八八七）紀見第八：‘且万物之名，亦豈自然著者？淸而上者曰天，黃而下者曰地；燭晝者曰日，燭夜者曰月；以至風雲雨露，煙霧霜雪；以至山嶽江海，草木鳥獸；以至華夏夷狄，帝王公侯；以至士農工商，皂隸臧獲；以至是非善惡，邪正榮辱；皆妄作者强名之也。人久習之，不思其强名之初，故沿之而不敢移焉。昔妄作者或謂淸者曰地，黃下者曰天，燭晝者曰月，燭夜者曰日，今亦沿之矣。’

〔二〕王念孙廣雅疏証序：‘竊以訓詁之旨，本於声音。故有声同字異。声近义同。虽然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举網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則有字别为音，音別为义。或望文虛造而違古义，或墨守成訓而尟会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發明前訓，斯凌雜之譏，亦所不辭。’

〔三〕切韻序：‘欲廣文路，自可淸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淸濁’‘輕重’大概都指‘介音’的不同。这兩句話是說，作文押韻，可以不管介音，分析音韻就要分得存細。

〔四〕故宮博物院影印唐寫本王仁昫刋謬补缺切韻。

‘科学通报’一九五三年四月号。

斯大林关於語言的社会作用的学說

依·阿·加里寧

斯大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标誌着苏联語言科学發展的新階段。斯大林对於語言学的各个基本問題都作了新的闡明。一方面使这些問題獲得了嶄新的原則性的解答，坚决地駁斥了那些非馬克思主义的公式，例如：語言具有上層建筑的性質；語言有階級性等。这些公式由於馬尔的影响，曾經在苏联語言学中多少占有某种巩固的地位。另一方面，斯大林又提出了嶄新的，甚至是苏联語言学界从未提出过的問題，例如：关於基本詞彙的問題。斯大林全面地發展了唯物辯証法的各个原理，对於他所談到的每一个問題都做了極明确而又中肯的解答。

斯大林在他的著作里提出和解决的問題，無論对於語言科学今后的發展，以及对於这一科学的教学，特別是对於学校中的語文教学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假如学生們不了解或不很清楚語言为甚么而存在，以及語言对於人类社会有多么重要，那么，实际上他們就很难以应有的态度去对待語文学習，从而在掌握語文方面也就难以收到很好的成效。相反地，学生愈清楚地理解到語言为甚么而存在，語言在社会中起着甚么作用，他們就会愈加自覺地对待語文学習和运用語文，他們学習語文發展歷史及其結構的兴趣也就会愈大，在掌握語文方面也將愈有成效。

在回答“語言的特征是甚么？”这一問題时，斯大林首先指出：語言是屬於社会現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語言存在。語言是随着社会的產生而產生，随着社会發展而發展的。語言也將是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無所謂語言。〔註一〕

語言既然是一种社会現象，那么它就“同样地替社会一切階級服务”。〔註二〕“語言的創造不是为了滿足某一个階級的需要，而是为了滿足全社会，滿足社会所有各个階級的需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創

造出來的語言是全民的語言，对於社会是統一的，对於社会全体成員是共同的。”〔註三〕同时，語言从它發生的那时起，以及在其發展的各个階段上，始終都是全民的語言。

“語言是与人的生產行为直接联系着，並且是与人的工作的一切范圍中的一切行为直接联系着。”〔註四〕

因此，“語言活动的范圍是包括人的所有各方面的行为，它比上層建筑活动的范圍要廣泛得多，复雜得多，並且它的活动范圍差不多是無限的。”〔註五〕很明顯，在学校里应該系統地，經常地講解語言所具备的包罗万象的性質。学習語言之所以特別重要而有价値，也正是因为它的活动范圍是無限的。

語言是屬於社会現象之列的，这点可以从其起源來說明：它是隨着社会的發展而發展的；也可以从其功用來說明：它只是为社会而存在的。依照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意見，語言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旁人，另一方面也就因此而是为了我自己。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語言，这是因为他是社会的一个成員。旣然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生存，那么离开社会就沒有，也不可能有語言。

語言只是为了社会而存在於社会上的，它在社会中就要起一定的作用，即做为人們交际的工具。

交际的功用是語言的原始功用。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过这种功用的原始性：“語言僅僅是由於要和旁人交际的要求和需要而產生的。”〔註六〕因此，語言不僅是任何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並且是作为交际工具而產生的。斯大林也强調了这个功用的原始性，指出：“語言的存在与語言的創造也就是为了作为人們交际的工具而替全社会服务。”〔註七〕

交际功用是語言的原始功用，同时又是最重要的功用。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書里，斯大林屢次指出語言的这种功用，並且一直都把它提到第一位。語言的特点就在於“語言之替社会服务，乃是作为人們交际的工具。”〔註八〕列寧也曾指出語言的这种功用，他說：“語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斯大林指出交际功用是語言的基本功用，並且分析了它的內容，以

及它与語言的其他功用的关系。斯大林寫道："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註九〕因此，人們的交际首先就是以"互相了解"为目的的"思想交流。"

人类社会上的思想交流（亦即是說"互相了解"）是"經常極端必要的，因为沒有思想交流，便可能使人們在与自然力斗爭中，在为生產必需的物質財富的斗爭中調协其共同活动，便不可能在社会生產行为中獲得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生產本身的存在。"〔註十〕因此，沒有語言，人們在与自然斗爭中就不能采取共同协調的行动，也就是說，不可能有社会生產。在規定語言的特点时，这个思想表現得更为明顯："語言之替社会服务，乃是作为人們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作为使人們相互了解並使人們在其一切活动范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这一切活动范圍包括生產的領域，也包括經济关系的領域，包括政治的領域，也包括文化的領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註十一〕这样，語言就不僅是交际的工具，从廣义上說來；它又是斗爭的工具：在生產、經济、政治、文化及其它各方面的斗爭工具。

斯大林关於語言是交际工具的意見教導我們：沒有社会生產，便不可能有社会的存在与發展；沒有人类的共同活动，便不可能有社会生產；沒有相互了解，便不可能有人們共同的活动；沒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有相互了解；而沒有語言，便不可能有思想交流。斯大林指出：沒有全社会都会懂得的語言，沒有社会成員共同的語言，社会便会停止生產，便会崩潰，便会無法繼續生存。在这个意义上說，語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就是社会斗爭和發展的工具。"〔註十二〕

所以，語言是交际的工具，同时又是社会斗爭和發展的工具。交际的功用也即是表达思想的功用，因为交际就是交流思想，因而也就是表达思想。要交流思想，就必須使这种思想为旁人的感覺所接受、領会，即是說，应該用声音把它表达出來，而表达思想也就是交际行为。

然而語言不僅表达思想，並且还形成思想。語言之於思想，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它不僅是思想的物質的外殼，而且是思想的工具，这就是語言的第二个功用。只有藉助於語言，思惟才能实現。沒有語言，就

沒有思惟；正如沒有思惟就沒有語言一样。

語言与思惟的关系是直接的。“語言是直接与思惟联系的，它把人的思惟活动的結果，認識活动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巩固起來，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註十三〕語言与文学相比較时，語言与思惟間的直接联系就表現得特別突出。文学虽然也是和思惟联系的，但是要通过語言才能發生联系。

語言和思惟的直接联系是从一產生就存在的。“精神一开始便可憐地为物質所膠葛着，这里所說的物質是被振动着的空气、声音——簡言之，指的是語言。”〔註十四〕思想的產生也就意味着語言的產生。

最后，語言和思惟的联系不僅是一开始就有的，而且是不可分的。在回答克拉舍寧尼科娃同志的第二个問題时，斯大林寫道：“有些人說，思想是在它們用言辭表达出來之前在人的头腦中產生的，是沒有語言材料，沒有語言外衣，可以說是以赤裸裸的形态產生的，这种說法完全不对。不論人底头腦中会產生甚么样的思想，它只有在語言的材料底基礎上，在語言的術語和詞句底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存在。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語言是思想底直接現实。（馬克思）思想的眞实性是表現在語言之中。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談到与語言底‘自然物質’不相联系的思惟，才能談到沒有語言的思惟。〔註十五〕”

因此，应該从語言与思惟有着直接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意义上來理解語言的第二个功用（即思惟的工具）。語言形成思想，並且表达思想。在腦子內部思想，就是用語詞來思想，就是藉助於語言來思想，就是用尙未以声音表示出來的語言來思想。語言可以形成思想，因而它具有思惟工具的作用；因为語言可以表达思想，用声音使它物質化，因而起着交际工具的作用。

顯然，这兩个功用是彼此联系着的。語言在表达思想即实現交际行为的时候，也就是語言形成思想的时候。但是另一方面，語言形成思想首先就是为了旁人，为了表达思想，因而也就是为了交际。以在这个意义上說，語言形成思想的功用总是附屬於語言的交际功用的。

語言首先作为人們交际的工具而和其他各种因素一起，把人們联合

成为某种共同体，作为一种將人們联系成为統一整体的工具，侭管他們的利益，观点和思想有所不同，甚至互相对立，也不管他們所屬的等級、帮会、階級以及其他社会集团如何，語言总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民族問題”一書中給民族所下的經典性的定义說：“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語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經济生活以及有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态的穩定的人們共同体。”〔註十六〕斯大林給民族下了定义之后，接着就提出了下述的意見：“必須着重指出，把上述各种特征中任何一种特征單独拿來，都不能作出一个民族的定义。而且只要这些特征中缺乏一种特征，那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了。”〔註十七〕因此，如果沒有共同的語言，民族就不成其为共同体、統一体了。在列举民族的各种特征时，把語言放在第一位，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各种主要的民族特征中，語言是最本質的特征。“馬克思主义說語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識之一。同时他当然知道，在民族內部存在有階級矛盾。”〔註十八〕

語言作为一种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样也为民族文化服务。这种文化按其內容說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按其形式、亦即按其語言來說則是民族的。

馬尔的信徒們援引列寧斯大林的話：承認在資本主义时代存在着兩种文化——資產階級文化和無產階級文化，因而作出了結論說，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同样也有兩种階級的語言存在，但是列寧斯大林所談的兩种文化，乃是指文化的內容，这的确是有階級性的。文化的內容虽然是各种各样的，但基本上都是表明思想，而思想的表現形式就是語言。因此文化按其內容說是有階級性的，同时按其形式說，亦即按其語言說，是全民族的。

把文化內容与其民族形式的語言嚴格而澈底地区別开來，这对於苏联这样多民族的國家的文化建設有着極重要的意义。文化斗爭就是为爭取文化的社会主义內容的斗爭，因而也是培养共產主义意識，使各民族的廣大人民群众認識馬列主义思想財富的斗爭。但“思想是不能够脫离語言而存在的。”〔註十九〕因此文化斗爭与民族語言的發展相結合就成为苏联民族政策的一部分。这个政策一方面保証各民族的語言都能趁

無阻碍的發展，通过各民族自己的語言來教育居民，創造民族語言的文字，鼓励科学与文学的創作，从理論上研究这些語言並且給他們編製标准的語法和詞典等办法，來促進各民族語言的發展。“只有在發展各民族文化的条件下才能眞正吸收各落后民族參加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列寧帮助和支持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政策即在於此。〔註二十〕另一方面，这个政策又規定了对待俄語的态度，因为了解俄語就具备了有力的工具去深刻而多方面的掌握社会主义文化。

不難了解，語言之为文化服务以及把人們結合成为民族，这仍然是作为人們交际的工具。作交际工具——这是語言的基本功用。語言是交际工具，它为了这个原因也为了这个目的而形成思想。

除了語言之外能够而事实上也是用作交际工具的还有其他的手段，如手势，表情。然而这些輔助手段不是語言。所以，斯大林論及“手勢語言”时寫道：“其实这不是語言，甚至不是这样或那样能代替有声語言的語言，而是人們有时用來强調自己講話中心某些地方的輔助手段，这个輔助手段在表現方法上是極其有限的。不能把手勢語言和有声語言等量齐覌，正如不能把原始的木鋤与現代最新式的拖拉机等量齐覌一样。”〔註二十一〕这些輔助的交际手段与語言的差别首先在於它們不是作为独立語言而存在的，它們只是和詞所構成的語言一道作为后者的輔助手段而存在的。因此它們不能形成思想，只能表达由語言所形成並且具备語言形式的思想。其次，运用这种“語言”的可能性是極其有限的。

簡言之：語言基本的和首要的功用就是作交际手段。只有在实現这个功用时，語言才能把人們結合成为社会，才能作为斗爭和發展的工具，为民族文化服务。只有在实現这个功用的过程中，語言才是“帮助人們从动物界划分出來，結合成社会，發展自己的思惟，組織社会生產，与自然力量作勝利斗爭並达到我們今天所有的進步的力量之一。”〔註二十二〕

根据斯大林关於語言的社会作用，語言与思惟有着直接而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学說，可以得出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結論：必須經常系統地学習語言，以掌握其規則。远在討論語言学問題以前，斯大林就已經对社会

主义劳动英雄雅可夫列夫說过："假如一个人不能通順和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就意味着他的思想也是雜乱無章的。"〔註二十三〕否則語言就不会是思想的直接現实了。

学習俄語首先应学習列寧斯大林怎样簡單明了而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無怪乎加里寧在对一些青年作家談話时說："假如有人問我，誰最通曉俄罗斯語言，我就会回答——斯大林。应該学習他用詞的簡鍊、明了。不妨試一試看能否把斯大林所曾表达过的任何一个意思叙述得更簡短些！"〔註二十四〕（朱成光譯，原文發表於"Руский Язык Вшиоле" 1952年第二期）

〔註一〕：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譯本，解放社出版，第二十二頁。

〔註二〕：同上書，第十一頁。

〔註三〕：同上書，第四頁。

〔註四〕：同上書，第二十五頁。

〔註五〕：同上書，第八頁。

〔註六〕："馬恩全集"俄文版四卷二十——二十一頁。

〔註七〕："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五頁。

〔註八〕：同上書，第四十頁。

〔註九〕：同上書，第二十二頁。

〔註十〕：同上書，第二十三頁。

〔註十一〕：同上書，第四十頁。

〔註十二〕：同上書，第二十三頁。

〔註十三〕：同上書，第二十三頁。

〔註十四〕：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群益書店出版，第六十四頁。

〔註十五〕："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四十四頁。

〔註十六〕：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民族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十二頁。

〔註十七〕：同上書，第十二頁。

〔註十八〕："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十五頁。

〔註十九〕："馬恩文献"俄文版，第四卷，第九十九頁。

〔註二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一二卷，第三六八頁。

〔註二十一〕："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五十三頁。

〔註二十二〕：同上書，第五十二頁。

〔註二十三〕：雅可夫列夫："生活的故事"俄文版，第九十九頁。

〔註二十四〕：米·依·加里寧：論文学俄文版，第七十四頁。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語言与思惟的关係

A·福斯特利可夫

語言与思惟及其相互关系的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义世界觀中一个極其重要的問題。科学共產主义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注意这个問題。他們第一次創立了語言与思惟之起源和發展的唯物学說，指出了語言思惟的联系以及它們对人們社会歷史活动的依賴关系。他們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的作用"、"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态"等著作中，唯物地論証了語言和思惟的起源，陳述了有关語言和思惟的極其重要的原理，使我們得以正确了解語言与思惟的关系，以及它們对人类社会發展的作用。

列寧和斯大林發展和丰富了馬克思主义創始人的語言与思惟学說。列寧極其注意語言与思惟在認識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問題。他特別指出了語言歷史的重要意义，認为它是"認識論和辯証法藉以形成的"〔註一〕許多知識中的一門知識。

斯大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是对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語言与思惟学說的一个新的傑出貢献。斯大林在这本著作中揭明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关於語言与思惟的联系的原理之实質及意义，並对馬克思列寧主义哲学和馬克思主义語言学中这一極其重要的問題作了新的深刻闡明。斯大林这本关於語言学問題的著作，是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义、与馬克思主义的簡單化者和庸俗化者作不調和的斗爭的典范。斯大林关於語言的發展依賴於人們生產活动以及語言在社会生活和認識發展中的作用等等原理，丰富了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哲学，並根本推翻了馬尔的思惟可以離开語言而存在的唯心論論斷。

一

在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家的語言与思惟学說中，基本的原理就是：語言和思惟乃是社会發展的產物，乃是人們实际劳动的反映。思惟与語言，这是随同人类社会的產生而產生、随同人类社会的發展而發展的社会現象。

恩格斯在强調劳动对人的有声語言和思惟之產生和發展的决定性作用时寫道："我們在某种意义上必須說：劳动創造了人类本身。"〔註二〕从猿到人的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也就是人的語言和意識產生和發展的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是类人猿学会了直立行走。直立行走使人猿的手变得自由了，並能在劳动过程中逐漸趋於完善。斯大林同志說，原始人如果不直立行走，"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声帶，於是就不能利用語言，他的意識的發展也就会根本受到阻碍。"〔註三〕

只有在直立行走之后，猿的不發达的手才在劳动过程中發展成了人的劳动器官。經过数十万年的劳动而趋於完善的人手，与猿的不完善不發达的手有根本的区别。猿的手只帮助猿在樹上築巢或造棚以避風雨，抓住木棍或石塊以防禦敌人，並完成另外一些簡單的动作，人的手則不同，它使人能够制造各种劳动工具，並利用这些劳动工具做出任何一个猿不能做出的各种極为复雜的工作。人的手所以能够达到高度的完善程度，只是因为人進行了劳动，运用了劳动工具，使手適应於愈來愈多、愈來愈复雜的动作。因此，恩格斯指出，人的手不僅是劳动的器官，而且也是劳动的產物。

恩格斯說："手的机能的專門化，意味着有了工具，而工具則意味着人类的特殊活动、人类改造自然的反作用——生產。"〔註四〕

恩格斯指出，动物也运用工具，然而那只是它們身体上的器官而已，如螞蟻、蜜蜂、海狸等等都是这样。劳动並运用在劳动过程中創造出來的工具，这是人类的特点。只有人，由於他在劳动过程中制造工具並运用工具，才能够在自然界打上自己的烙印。馬克思說："劳动手段的使用与創造，虽在其他某一些动物間已見萌芽，但却为人类劳动过程的特征。"〔註五〕

动物沒有眞正的思想和語言。人的祖先所發出的声音，还远不是語言。只是由於在劳动过程中制造工具和运用工具，在形成中的人才有了互相交际的迫切需要，而从这种需要也就是產生了分節即語言。

馬克思說："語言与意識同样是早就有了的……与意識一样，語言僅在人对互相交际有了迫切要求和需要之后才產生。"〔註六〕与动物的声音根本相反，語言首先是人們交流思想和互相了解的工具。因此，人的語言与动物的声音間的根本区别，在於語言按其起源和發展來說是受社会条件制約的，而动物的声音則純粹是在生理上適应周圍环境的結果。因此，如果直接用原始人以前的动物的声音來解釋原始人分節語的起源，是根本錯誤的。

还有一种观点，認为有声的分節語似乎不是作为交际工具，而是作为与原始人的生產相联的感情的工具而產生（魯阿列，馬尔），也是同样錯誤的。实际上，人的語言是在劳动过程的基礎上由於人們有了交际的需要而產生的，並且一开始就是有声的分節語。

恩格斯寫道："……劳动的發展必然使得各个社会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因为劳动一發展，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情形就增多了，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对於每一个社会成員就一目瞭然了。簡單地說，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有了互相說話的需要。这种需要促成了說話器官的形成：猿类不發达的喉管，由於音調的变化，慢慢地然而不断地改造起來了，能够操縱更發达的音調变化了，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連續發出一个个清晰的音節。"〔註七〕

恩格斯这样从劳动过程來解釋語言以及思惟的產生，是唯一正确的；那种解釋与認为語言和思惟純粹是人在生理上適应外界条件的現象、純粹是人的机体的特殊机能的自然主义观点，与認为語言毫不依賴於物質現实而是由精神產生的唯心論学說，都有根本的区别。

与所有关於語言和思惟的反科学观点相反，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經典家敎導我們說，語言与思惟不是自然界或精神的贈品，而是社会發展和人的劳动的產物。在劳动过程中，人的生理变化了，人的腦髓及其工具——感觉器官完善了。"首先是劳动，然后是同劳动一起產生的分節語——这兩者乃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們的影响下，猿的腦髓才逐渐

变成人的腦髓，后者虽与猿的腦髓十分相似，但远較它为大而完善。”〔註八〕

語言作为人們互相交际的工具、作为人們用詞表达和巩固其思想的工具，是与人类社会、意識一起產生的。斯大林同志指出，现代語言的要素还在远古时期就已奠下了基礎。原始人的語言是很有限的和原始的，但終究是有声語言，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有声語言与思惟一样，也是在人的劳动过程中產生和發展的。但是，一旦產生，它就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惟發展的强有力的因素之一。

斯大林同志在强調有声語言在人类社会和思惟的發展史上的重大意义时寫道：“有声語言或字的語言始終是人类社会唯一能作为人們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語言。歷史上任何人类社会，即令是最落后的，都不能沒有自己的有声語言。人种学里面任何落后的部族，即令是，比方說，象十九世紀的澳洲人或火地人一样原始的或更原始的，都不能沒有自己的有声語言。有声語言在人类歷史上是帮助人們从动物界划分出來、結合成社会、發展自己的思惟、組織社会生產、与自然力量作勝利斗爭並达到我們今天已有的進步的力量之一。”〔註九〕

由於斯大林对有声語言在人类社会和思惟的發展史上的作用作了如此深刻的說明，馬尔的主張的全部荒謬性就暴露無遺了。照馬尔看來，似乎所謂手的語言〔註十〕在一个長时期內是人們交际的工具，它使人們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渡过几种物質文化的漫長时期。馬尔断言：“手的語言不僅使人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形象化的概念，与集体中的全体人員交往，而且还作为人們与别的部落及本部落交际的工具，使人有可能發展其概念……”〔註十一〕

斯大林同志在其經典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徹底揭露了馬尔关於手的語言的理論之非科学性，指出了他的下述論断的錯誤，手势語言和字的語言〔註十二〕是同等的东西，人类社会曾長期沒有有声語言而用手的語言解决問題。斯大林同志極其明确地指出，有声語言是人类社会唯一能作为人們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語言。所謂手势語言的意义，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由於它極端貧乏和有限，是微不足道的。

其实这不是語言，甚至不是能这样或那样代替有声語言的語言。手势語言乃是人們有时用來强調自己講話中的某些地方的輔助手段。

与認为語言起源於人們互相交际的需要的馬克思主义唯物理論完全相反，馬尔認为音節的產生决不是由交际的需要引起的，为了滿足交际的需要，当时有日用語言——运动語言，或手的語言，馬尔寫道：“运动語言不論在技術上或思想上都完全適合於人类初期腦力發展的特点和水平。”〔註十三〕

馬尔关於手的語言的牽强附会的非科学觀点，在邏輯上必然使他得出关於有声語言的產生的荒謬透頂、玄妙莫測的反科学觀点。

馬尔声称，有声語言的起源，“必須从那些为生產上獲得成就所必需的，並且伴随着某一集体劳动过程的神奇动作中去尋找。”〔註十四〕馬尔既說有声語言是作为神奇的工具而產生的，因此他断言有声語言的使命也具有神奇的性質。馬尔寫道：“……最初被运用的有声語言不能不具有神奇的性質，它的个别的字不能不被当作玄妙的东西來重視。人們珍視它，並且保守秘密，不讓別人知道，就象人們至今不讓別人知道其玄妙奇特的獵人語言一样。”〔註十五〕

根据馬尔的非馬克思主义觀点，作为神奇工具的有声語言，起初为特权階級、術士所有，他們“把它保守起來”，不讓普通人知道。因此，有声語言不可能是人們間的交际工具。它的唯一的使命就是充当術士与圖騰的交际工具。在馬尔这些关於有声語言的任意臆造、牽强附会的論断中，有声語言后來又怎样成了群众的財產，如果祗有術士享用它，它是否能一般地發展起來，这些問題是完全沒有弄清楚的。其实，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語言的發展如果离开共同生活和互相交談的人，那是同一个人脫离社会單独進行生產一样荒謬的。

馬尔关於手的語言以及有声語言的玄妙莫測的起源的理論，純粹是唯心論。

馬尔断言，原始人的思惟具有神話的性質。“人类当时是用前邏輯的思惟進行思考，沒有抽象的概念，祗有形象化的表象，这种表象的相互联系对於我們的感覺是陌生的。”〔註十六〕

前邏輯的思惟，据馬尔看來，就是当人們“还不能思想”而祗能

“神話式地感知”外界現象时的思惟。人类思惟在其發展的“前邏輯”階段的唯一內容，按馬尔的断言，就是对於神秘莫測的力量和圖騰的一种形象化的表象。原始社会中人們的思惟被馬尔說成是一种虛幻的、脫离現实生活的东西。

与馬尔的唯心論觀点相反，馬克思主义教導我們說，任何时候意識都不外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生活的实际过程。馬克思說，原始人的思惟不是什么脫离他們的物質生活的东西，相反地，它是直接由他們的实踐活动產生的。“觀念、表象、意識的產生一开始就直接与人們的物質活动和物質交际——現实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註十七〕

人的意識乃是有高度組織的物質——腦——的屬性，但这种高級的、新的屬性僅为人腦所有，它是在人積極影响自然界的过程中產生和發展的，人在改变外部自然界的同时，也改变其主觀世界，發展其意識。

馬克思寫道：“……意識一开始就是社会的產物，並且，只要人存在，它就永远是社会的產物。”〔註十八〕可見，离开社会，就沒有也不可能有意識与思惟。

恩格斯在談到人的思惟的發展依賴於人的劳动时寫道：“……人的思惟之最本質的与最密切的基礎，恰恰是人之改变自然界，而非單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慧的發展是和人学会改变自然的程度成正比例的。”〔註十九〕从恩格斯这些話可以知道，人的意識所以能產生和發展，决不象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者所料想的那样，是因为人消極地、直觀地反映了自然界，而祗是因为人能动地改变了自然界。

人的思惟首先是这样的：他意識到最隣近的可感覺的环境和与別人的最親近的关系，意識到与周圍人們來往的必要性，即开始意識到人一般是生活在社会里的。人在影响自然界、改变自然界的时候，愈來愈完全而深刻地在其意識中反映着自然物、这些物的屬性，以及自然界的規律。恩格斯說：“由於手的發展，由於劳动，人开始了对自然的統治；这种对自然的統治一天比一天進步，人的眼界也就一天比一天擴大。他們从自然物中不断地發現新的、已往所不知的各种屬性。”〔註二十〕

馬克思主义經典家的这些原理，完成推翻了馬尔关於原始人的思惟

之神話性的論斷。人在远古时期就已在其意識中基本上正确地反映周圍世界的事物，这使他能够不僅在生理上適应环境，而且能动地影响外界，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外界。隨着对自然規律的認識的增加，人对自然界的影响也擴大了。

在劳动的基礎上，人的腦子也發达起來，"最初人意識到了造成个别实际有益結果的条件，而在这个基礎上……懂得了决定这些有益結果的自然規律。隨着这种对自然規律的認識的突飛猛進，改造自然的方法也就增多了。"〔註二一〕

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家教導我們說，人的意識从它一开始出現起就不是什么消極的东西。它作为人的生產活动、劳动的反映而產生以后，就反过來能动地影响生產活动，影响劳动和語言，增多它們的成就，並不断地推动它們向前發展。

在物質生產的發展过程中，人的意識愈來愈丰富了，他的抽象思惟的能力、最初对周圍世界建立極簡單的概念而后建立較复雜的概念的能力增長了。原始人的思惟的發展，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是从生產开始的，即是在这种情形下开始的：人須要用積極的行动掌握外界对他有最大意义之物，並以此來滿足自己的需要。馬克思說："由於这一过程的反复進行，这些物的'滿足人們需要'的能力遂在人們的腦子中被牢記下來，人們……也就学会'在理論上'区别能够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之物和所有别的物。当往后的發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时，在人們的需要以及人們藉以滿足其需要的活动之种类增加和進一步發展以后，人們就給許多种物取了独立的名称，这些物已被他們在經驗中与其余的外部世界区分开來了。"〔註二二〕

所以人在物質資料的生產过程中，起先学会了从許多复雜的自然現象中抽出个别的物來，給予它們名字、称呼，而后，在生產進一步發展的过程中，在互相比較某些物的时候，人在这些物中間發現了某种共同的东西，創立了一般的概念，以及包括所有这一类物的口头用語。当然，人們最初的概念是非常簡單的，因为它們所概括的还是人們簡單之至的实踐活动和人們以滿足其需要的極有限的一些物。但即使是这些最初的最簡單的概括、概念，如列寧所指出的，也已意味着人認識了外界

事物的客观联系。由此可見，人由於实踐活动而認識了物的客观联系，發現了外界物中共同的、本質的东西，起初產生了表象，而后產生了如因果性、偶然性、必然性、一般、个别之类的概念或范疇。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概念都是从人們的現实生活中抽象出來的，都是人的社会存在其意識中的反映。

如果与外界物的口头用語和名称一致的字的語言沒有產生，最初的概念是不可能產生和繼續發展的。人在其社会劳动过程中影响自然、改变自然，这是人类思惟全在其部歷史时期中發展的基礎。

語言也是这样。斯大林說：“語言是屬於社会現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語言存在。語言是隨着社会的產生而產生，隨着社会的發展而發展的。語言也將是隨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以外，無所謂語言。因此要了解某种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發展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註二三〕

語言在各个階段的發展——从氏族語言到部落語言、从部落語言到族語言、从部族語言到民族語言——决定於社会的發展、生產的發展。語言作为社会現象是經常在發展、洗鍊、丰富的。由於社会制度的改变，由於生產、文化、科学等等的發展，語言也發生不断的变化：个别已經陈旧的詞、語、文法形式消失了，但同时詞彙中也添加了許多新的詞，文法構造也在不断地改進。

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家关於語言与思惟統一的学說，在巴甫洛夫的信号系統学說里具有自然科学上的根据。

第一信号系統和第二信号系統，如巴甫洛夫所發現的，是客观实在藉以反映於我們腦中的机構。

在第一信号系統里，客观实在由於物体直接作用於感覺器官而藉感覺形式反映出來，在第二信号系統里，客观实在是通过第一信号系統，再用詞和概念概括了第一信号系統的無数信号而反映出來的。第一信号系統是形象化的思惟的承担者；第二信号系統則是抽象的、口头的思惟的承担者。巴甫洛夫說，現实的第一信号系統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但由於劳动的發展，人除了第一信号系統外，还有第二信系統，这是另一种性質的、人类專有信号系統，它以發出的、听到的和看到的語言文字为

其形式。〔註二四〕

人腦与猿腦之質的区别，在於人腦有从事語言活动和進行抽象思惟的能力。在人的劳动过程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分節語和思惟組成了第二信号系統，如巴甫洛夫院士所說的，这是人的高級神經活动机構的一种特殊的附加物。

巴甫洛夫之發現第二信号系統，光輝地証实了恩格斯关於人腦与猿腦有質的区别的原理。

巴甫洛夫以其發現推翻了凱勒尔的唯心觀点，后者把高等猿类的思惟萌芽与人的思惟混为一談。巴甫洛夫用高等猿类的实驗確定，猿和其他动物一样，它的高級神經活动的一切表現，从最簡單的一直到較复雜的，即联想，都是由於外界之物直接作用於感覺器官而產生的，並且僅在第一信号系統范圍內实現。巴甫洛夫說：猿的思惟可以用肉眼从它的行动中看到。这就是說，猿的高級神經活动，虽然已是現思惟的萌芽狀态，但还沒有超出形象化或“物象化的”思惟的界限。

巴甫洛夫說，我們人則有“口头的和不具体的思惟”，即抽象的思惟。抽象的思惟具有以詞表現出來的概念的形态，是第二信号系統的机能，为人腦所特有。巴甫洛夫指出，人的“一切复雜关系都已轉入第二信号系統。”人的这些复雜关系就是思惟活动和語言活动。照巴甫洛夫看來，通过詞，“人們互發着信号”。詞是“第一信号的信号”。这就是說，第二信号系統沒有第一信号系統是不存在的。它概括第一信号系統所表現的东西，並且加以校正。

人的第一信号系統給第二信号系統的工作提供了具体的感覺材料，第二信号系統則实現着思想过程、思想体現於語言的过程。人的这兩种信号系統是密切相联並受社会条件制約的，因此，不能把人的第一信号系統完全与高等动物的信号活动混为一談。后者純粹是在生理上適应外界条件的結果。巴甫洛夫說語言的信号或信号的信号，“是現实的抽象，並可藉以概括，这就形成我們人类所独有的特殊的高級思惟，这种高級思惟，首先創造了全人类的一般經驗，最后創造了科学，即人类藉以高級地判明周圍世界和人类本身的工具。”〔註二五〕

第一信号系統与第二信号系統的相互作用，是生动的直觀与抽象的

思惟間的統一和相互联系在生理上的基礎。但同时应該看到，不論第一信号系統与第二信号系統的統一，或与这种統一相联系的感性認識与抽象思惟的統一，都是由人的社会实踐决定的。祗有在实踐的基礎上，这兩个根本不同的認識階段才能統一。抽象的思惟具有以詞表現出來的概念的形态，它依賴於生动的直观，从直观產生出來，而生动的感性的直观是在实踐过程中合乎規律地轉变为抽象思惟的。

語言与思惟一样，其存在和發展，都依賴於人們的生產和社会生活之發展。語言与思惟有同样的物質基礎，因此，它們之間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

二

思惟与語言屬於在社会存在的整个时期、社会發展的各个階段都起作用的社会現象之列。它們的產生和發展与人們社会劳动的發展是密切相联的，与人們的社会生活是不可分割的。

斯大林揭穿了馬尔及其“門徒們”的錯誤的非馬克思主义的公式，即所謂語言有階級性、語言是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論調，並說明了語言与上層建筑的根本区别。斯大林指出，語言是由千百年來社会歷史的全部進程和几百代人的努力產生的，它不是替某一階級服务，而是作为人們的交际工具替全社会服务的。“語言作为交际工具曾經是、現在还是对社会是統一的，对社会的成員是共同的。”〔註二六〕

斯大林关於語言之全民性的原理給我們指出了一条道路去正确地理解思惟这一社会的和全人类的現象之本性。

大家知道，馬尔不僅把語言，並且也把思惟認为是有階級性的現象。他在其“語言与思惟”这一著作中斷言：“……沒有非階級性的語言，因而也沒有非階級性的思惟。”〔註二七〕

馬尔錯誤地把語言与思惟同意識形态混为一談，把全人类的思惟与各階級的世界观視为同一。並根据这点把語言与思惟宣佈为上層建筑的范疇。他寫道：“意識形态的形式如下：一、最簡單的意識形态——語言与思惟；二、最高級的意識形态——宗教、藝術、道德、法律、政治意識形态、科学和哲学。”〔註二八〕把各种社会現象混淆在一起，不

加区别地把它們全部列入上層建築的范疇，这样的做法与馬克思主义毫無共同之点，是把馬克思主义直接庸俗化。事实上，人类思惟按其本性來說，無論如何不能归入上層建築，其原因与語言之不能归入上層建築是一样的。

思惟是人腦受社会条件制約的、反映無窮变化着的客覌世界之特性或能力，是人类認識的工具，它不能象上層建築那样随着某一基礎之消滅而消滅。

人类思惟並不象上層建築那样每次都随着新基礎之產生而重新產生，而是一經在劳动过程中產生，便作为統一的全人类的思惟在人类歷史的整个时期不断地發展着，作为千百億过去、現在和將來人的思惟而存在着。

馬克思寫道："因为思惟过程本身由一定条件產生的，本身是个自然过程，那末真正能理解事物的思惟祇能是同一的东西，它僅僅由於發展的成熟程度，特别是思惟器官發展的成熟程度的不同，而在程度上有所差别。"〔註二九〕思惟是人在其劳动过程中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它为一切人所固有，虽然不同的人由於他們腦子——思惟器官的發展程度和社会实踐（它在人的思惟的發展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水平的不同，因而对現实反映的程度、深度各有不同，但思惟仍是"同一的东西"。

思惟与人类社会的全部歷史，与人在自己一切活动范圍（生產、基礎、上層建築）內的工作，与人的全部社会实踐是密切相联的。思惟的作用范圍与語言一样，是無止境的。

我們不能把人类思惟認为是上層建築的范疇，也不能把它与意識形态混为一談，無容置疑，意識形态是有階級性的。思惟也与語言一样，能被不同的階級当作傳播自己世界覌和意識形态的工具來利用，並实际是在被利用着，但思惟本身按其本性來說是沒有階級性的。人类思惟决不是根据馬尔所捏造的和他的門徒們所宣揚的公式而發展的。馬尔提出了一种反科学的階段論，主張語言与思惟是經过思惟运动中突然的爆發、急剧的革命变动而發展的。語言与思惟經过爆發而更替的階段論，就是馬尔把語言与思惟錯誤地了解为上層建築、把它們与意識形态混为一談的結果。

斯大林揭穿了馬尔对語言發展的非馬克思主义觀点，他强調指出，通过爆發而由旧質过渡到新質的規律，是不適用於語言發展史的。

“爆發”論也完全不適用於人类思惟的發展。思惟的發展有歷史的繼承性，有思惟的各种不同階段間的密切联系。思惟發展过程中每一已經达到的階段是以往發展的新的、高級的成果、但不是極限。这一高級階段本身同时又只是今后無限發展的新的出發点。

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經典家教導我們說，人类思惟按其認識能力、按其职能、按其可能性、按其歷史的最終目的來說，是無限的。在思惟發展的前進过程中沒有不可克服的障碍或界限。“……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之物，而只有現在尚未認識，但將來却会由科学和实踐的力量揭示和認識之物。”〔註三十〕

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經典家深刻地揭露了对語言与思惟作唯心解釋的認識論根源和社会根源。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把思惟与語言同人們的社会生活分离开來，这就必然產生唯心論。

“……不論語言或思惟，自己都不能形成一个特殊的的王國……它們僅僅是現实生活的表現而已。”〔註三一〕馬克思指出，只要語言一脫离实际生活，它“就立刻变成空話”。

思惟的發展是遵循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固有的一般的辯証法規律的。思惟的辯証法只是客觀世界辯証法的反映。列寧說：“自然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必須了解作不是‘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沒有运动的，不是沒有矛盾的，而是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在矛盾的生產和解決的永恒过程中。”〔註三二〕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一書中指出，人們已在初期發展階段就認为人类思惟在自己的生產活动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來，人們習慣於不从自己的需要出發，而从自己的思惟出發來解釋自己的思惟出發來解釋自己的行为；於是随着时間的推移，便產生了唯心論的世界觀，而把思惟看作是某种不依賴於客觀現实的独立东西。

思惟与現实脫節，必然招致語言与社会生活的分离。“思惟的直接現实，就是語言。因为哲学家們（唯心論者——·A福斯特利可夫註）使思惟孤立了起來，那末他們当然也把語言变成了某种独立王國。这就

是哲学語言的秘密，在这种語言中作为詞的思想有其自身的內容。”〔註三三〕

思想孤立化因而語言也孤立化的社会根源，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就在於个人关系和个体联系的孤立化，在於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在於精神活动与物質活动的分离。

如列寧所指出的，哲学唯心論的產生，是誇大抽象思惟在認識过程中之作用的結果，是認識的一个方面轉化为絕对、轉化为脫离現实的独立路線的結果；这条路線通向唯心論，通向僧侶主义，在它們那里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巩固了这条路線。

斯大林在揭穿現代語言学中的唯心論和揭露它的認識論根源时，曾以馬尔学說为例光輝地指出：如果把思惟与它的物質外殼即語言分割开來，那就必然陷入唯心論。虽然馬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关於語言与思惟同劳动的关系也講了很多，但他却不懂得劳动在語言与思惟的產生和發展中的眞正作用，实际上他把語言与思惟同人們的社会劳动分割开來。

例如，馬尔为要表明他始終承認語言与思惟的統一，他故意强調說，思惟与語言是“兄弟姊妹”。甚至他認为自己对語言与思惟之相互关系的观点是辯証的。馬尔宣称，語言的新学說是辯証地來看思惟問題的。他断言：“思惟与語言是不可分离的它与語言一样是易变的……它与語言一样是集体的。”〔註三四〕

而事实上，語言与思惟相互关系的問題在馬尔的著作中並沒有得到馬克思主义的解决，而是得到唯心論的解决。馬尔錯誤地認为：人們的交际，不用語言，而藉助於那种完全擺脫了語言之“自然物質”的思惟也可以办到。正如斯大林所寫的，这就使馬尔陷入了唯心論的泥坑。

馬尔創造了一个牽强附会的和唯心透頂的关於思惟之發展及思惟与語言之相互关系的公式。根据这一公式，最初，沒有有声語言，沒有字的語言，思惟也是存在和發展的。这就是圖騰思惟，其特征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就是关於神秘魔力（圖騰）的象征观念。这一时期的人神話式地（即虛幻地）思惟着，他們的思惟適合於当时手的語言，所以这种思惟就是“手的思惟”。后來思惟的宇宙階段（这一階段是与有声語言之產生和天穹观念之出現相联系的）代替了思惟的圖騰階段，再后又过了很

久；在有声語言發展的第二階段（按照馬尔的說法，即工藝思惟的階段）統治階級似乎創造了形式邏輯的思惟，其中語言与思惟相比較，語言占了上風。最后，作为階級社会財產的形式邏輯思惟，似乎被無產階級的辯証唯物論的思惟所代替了，这里思惟与語言相比較，思惟却占了上風。馬尔預言，再往后，在新的、無階級的社会中將產生一种与有声語言完全不同的統一語言。

因此，在馬尔看來，沒有字的語言，沒有有声語言，思惟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象馬尔所断言的那样，在人类生存的最初階段，在一百五十万年之內，人类沒有字的語言可以發展自己的思惟，那末根据馬尔的說法，在共產主义即人类發展的最高階級，同样也可以無需語言了。

馬尔关於沒有語言的思惟的唯心观点特別明顯地表現在他的著作“語言与思惟”中，他寫道：“語言之所以存在僅僅是因为它以声音表露出來；思惟的活动沒有表露也可以進行。作为發音的語言有表露的中心，思惟活动的中心有大腦的位置限定，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形式的，特別是常与思惟或思惟的產物相配合的發音。語言（有声的）現在已开始把自己的职能讓給那些絕对战勝空間的最新發明了，而思惟則从它未加利用的过去積累的东西和新獲得的东西而上升着，並且能排挤和完全代替語言。未來的語言就是在完全擺脫自然物質的技術中成長起來的思惟。在它面前，任何語言都站不住脚，甚至有声的、仍然与自然規范相联系的語言，莫不如此。”〔註三五〕

从馬尔的这些論断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他把思惟与語言分割开來，認为思惟沒有語言的物質的外殼也是完全可能的。馬尔关於沒有語言的思惟的論断，照斯大林的确切說法，就是施展“魔力”的玄妙莫測的話。

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馬尔高估价語义学〔註三六〕，輕視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实”，把思惟与語言分割开來，这就使馬尔陷入了唯心論。

馬尔关於完全擺脫了語言的自然物質之思惟的观点，关於脫离有声語言、脫离詞和句（思想就是在詞和句的基礎上產生和存在的）的思想的观点，都是極端荒謬和荒誕無稽的，並与杜林当时所提出的荒謬見解相

类似。杜林寫道："誰要是只能用語言來思惟，那末他还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抽象的和眞实的思惟。" 恩格斯在引用杜林的这句話时以譏諷的口吻指出："如果是这样，那末动物是最抽象的和最眞实的思惟者了，因为它們的思惟永不为語言的多事的干涉所混淆。"〔註三七〕

馬尔的观点不僅与杜林的观点相結合，並且也与現代資產階級的極端反动分子的見解，特别是邏輯唯心論之代表的見解相結合；邏輯唯心論的代表証明說，眞理不能用詞和語言來表达，祗有直覺才能达到眞理。

斯大林揭穿了馬尔的唯心論，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义关於語言与思惟辯証統一的学說，深刻地論証了下述的唯物論原理：会講話的人，他的思想总是套上語言的物質的外殼，沒有語言，思想是不存在的。

斯大林說："不論人的头腦中会產生什么样的思想，它只有在語言材料的基礎上、在語言術語和詞句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存在。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实。'（馬克思）思想的眞实性是表現在語言之中。只有唯心論者才能談到与語言的'自然物質'不相联系的思惟，才能談到沒有語言的思惟。"〔註三八〕

这一眞正經典式的原理，非常深刻地表現了关於思惟与語言之关系及其不可分割之統一的馬克思主义学說的基本內容。斯大林强調指出，人們的思想只有在語言材料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存在。这就是說，語言不僅是一种用詞和句來表达和巩固思想的工具，並且也是思想之產生和实現的工具。沒有語言的思想不僅不能用話講出來，並且也不能在人的头腦中產生。

三

語言与思惟是相互联系的，但按其本性來說，它們是兩种特殊的社会現象。作为社会現象的語言之特征是什么呢？斯大林在其关於語言学問題的著作中对这一問題作了經典式的答复。斯大林寫道："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用它來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註三九〕列寧也指出了語言的这一特征，他强調說，語言是人类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因此，作为社会現象的語言之基本職能，就是充当交际工具，

充当交流思想的工具。沒有这一职能，語言就不能存在。人的思想祇在其与别人交际的过程中藉助於語言而產生和实現的。馬克思教導我們說，人的意識首先是与别人相联系的意識。所以，在斯大林的定义中，語言的实質就是充当人們的交际和思惟工具。

而作为社会現象的思惟之实質及其职能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思惟是人腦的一种机能，是人腦反映离开我們而独立存在的客覌世界的一种特性。但我們腦子的这种特性与人腦本身——思惟的承担者——一样，是在人的劳动过程和社会活动中產生和發展的。思惟的基本职能，就是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式来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的規律，因而也就是給人充当認識世界的武器和積極改造世界的工具。思惟正确地反映自然界的規律，在实踐基礎上和通过实踐来保証人对自然界的統治。恩格斯說，我們对自然界的統治就在於：我們不同於其他一切生物，我們会理解和正确运用自然界的規律。

列寧寫道：“在人类实踐中表現出來的对於自然界的統治，是自然現象与自然过程在人的头腦中客覌地和正确地反映的結果，是証明这个反映（在实踐向我們所指明的那种东西的范圍內）是客覌的、絕对的、永恒的眞理。”〔註四十〕

人类思惟在社会实踐的过程中日益深刻地和正确地認識自然界的規律，並在这种知識的基礎上使我們可能有計划地强迫自然界的規律替人們一定的实踐目的服务。因而，思惟的实質及其职能，就是充当反映客覌世界的工具，充当認識客覌世界規律的武器，充当改造客覌世界的一个極重要的武器。

語言与思惟的特征虽有区别，但这毫不破坏它們相互間不可分割的联系，相反地，这种区别却表明語言与思惟是互不可缺的。思惟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的規律，而語言則表达关於这些規律的思想，記載这种思想，使这种思想成为他人可以了解的东西。斯大林指出，語言把人的思惟活动和認識活动的成果用詞和句子記載下來，巩固起來，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

斯大林寫道：“思想交流是經常極端必要的，因为沒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使人們在与自然力的斗爭中，在为生產必需的物質財富的斗爭

中調协其共同活动，便不可能在社会生產活动中獲得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生產本身的存在。”〔註四一〕

人們的思想沒有語言材料就不能產生和存在，可是决不能由此得出下述結論：語言与思惟是同一的，詞按其本質來說就是思想。这样的結論，只有庸俗地解釋馬克思列寧主义关於語言与思惟統一之原理的人才能得出。語言与思惟缺一就不能存在，但同时它們又不是同一的現象。如果把語言与思惟混为一談，以詞來頂替物的概念，那就一定会直接歪曲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反映論。下面这一“理論”就是对馬克思列寧主义反映論的歪曲，它証明：标明某种外界事物的詞是直接由这种事物的本性决定的，並且这一論点似乎是从列寧主义的反映論得出的。

事实上，这种論断是完全不懂得列寧主义反映論的結果，並且顯然是由於不敢直接承認口头标記或物的名称与被标明之物間沒有直接联系和必然联系而得出的。大家知道，列寧主义反映論的本質就是：它把人的表象、概念看作是离开我們和不依賴於我們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的映象，並堅决反对把感覚、知覚、表象和概念归結为符号、象征、象形文字等等。列寧主义的反映論断言，人对於外界事物的概念都有自己的口头用語，沒有这些口头用語这些概念就不能存在；但列寧主义的反映論並沒有把概念和表达概念的詞等量齐觀。概念是人周圍現实界事物之本質的反映，所以概念必然与这些事物相联系，而事物的口头标記則不是由这些事物的本性和特性來决定的，所以它对事物來講是假定的标記。因而馬克思寫道：“物的名称，是和物的性質全然沒有关系的。我虽知此人名哲科布，但依然不知他是怎样的人。同样，在鎊，台斐尔〔註四二〕，佛郎，杜加〔註四三〕这种貨幣名称上，其实沒有价值关系的一点痕跡。”〔註四四〕

詞是音的結合物，它有一定的意义。音的結合物（詞）与它所标明的物之間存在着意义的联系，但它們之間沒有直接的必然的和联系，否則就不能用同一的詞來称呼性質完全不同的物了。例如，俄文“Коса”一字能标明髮辮、淺灘和大鐮等物。由此可見，音的結合物虽然沒有变化，但这一詞的意义联系却随着物而变化。

要是認为标明某种事物的詞是由这种事物的本性和特性來决定的，

那就必然把詞与概念混淆不清，用詞去頂替概念，归根結蒂就必然把語言与思惟混为一談。假如詞真正是直接从物的本性和特性產生的，那末各种語言中物的一切名称和物的一切概念將是同样的了，这样，許多不同語言的存在也就沒有必要了。

歷史事实也証明了物的口头称呼的假定性，当沒有適当的詞时，某一个别物体的名称被推廣於許多在某方面彼此相似的物体。例如，象馬克思所指出的“Содъ”一字古代人最初用來标明食鹽，后來糖及一切能溶於水的和有特别味道的無色固体也都被称作“Содъ”其实化学范疇的“Содъ”並不包括糖及其他等物。問題在於标明这些物（如糖）的詞当时还沒有創造出來，所以人們用标明另一物（它与这些物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点）的詞來称呼它們。

应該强調指出，事物的口头称呼虽是假定的，但它們完全不是任意造出來的。詞一經从人們称呼物的这种需要中產生，随着时間的推移，就逐漸在一定的物上固定下來，獲得固定的意义。因而，任意把一物的名称移於另一物，或沒有必要而任意用其他新的口头称呼來替代一些名称，那就是蠢举。

果然，斯大林說，如果“把‘水’、‘地’、‘山’、‘森林’、‘魚’、‘人’、‘走路’、‘作事’、‘生產’、‘做生意’等等不叫做水、地、山等等，而叫做旁的名称，又有什么必要呢？把語言中的詞的变化、把語句中的詞的組合不按照現存文法而按照另一种文法，又有什么必要呢？这样的語言改革对於革命有什么益处呢？在歷史上，沒有特别必要的时候，决不会作什么重大改革的。”〔註四五〕

当然，不能由此作出結論說，似乎詞是永远不变的。語言，特别是它的詞彙，正如斯大林所教導的，是处在差不多不断改变的狀态中。但这种变化不是任意產生的，而是由生產、文化、技術和科学之不断發展的需要所引起的。正如这种需要而要求語言用人們工作中所必需的新詞和新語來充实它的詞彙。“語言也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詞充实自己的詞彙，並改進自己的文法構造。”〔註四六〕

随着人們社会生活的發展，產生了新的現象和反映这些現象的新概念，而同时在語言中也出現了标明这些現象和表达这些概念的新詞。

因此，从認識論观点看來，詞也与概念一样，对於外界事物是第二性的。人們每天所藉以直接接触外界事物的社会实踐活动，經常使人們需要用詞來称呼和标明外界事物。事物的概念是用詞來記載和巩固下來的，这就使人們可能交流关於某些事物的思想，可能把它們彼此区别开來。

語言与思惟的辯証的統一，它們間的密切联系，以及它們間的区别，都表現在認識过程中，即表現在客观世界在人头腦中反映的过程中。概念是客观世界在人意識中反映的最重要的形式。概念与感覚、知覚、表象有質的区別。如果感覚、知覚和表象是事物的顯著的映象，那末概念是关於事物的思想，或是智力的映象。在概念中反映出事物的一般的、最本質的特征，反映出事物的內部联系和規律。概念是科学的抽象，它綜合对客观現实認識的結果。但概念沒有語言的帮助就不能產生。在認識过程中概念与語言是密切相联的。如果認識的結果是用概念概括起來的，那末概念本身只有藉助於詞和由詞組成的句才能表达出來。因而，詞不僅是物的名称或标記，並且也是物的概念之表現。斯大林关於語言学問題的傑作特別明顯而深刻地說明了語言在認識中的作用和語言与思惟間不可分割的联系。斯大林寫道：“語言是直接与思惟联系的，它把人的思惟活动的結果、認識活动的成果，用詞和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巩固起來，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註四七〕

人用詞所表达的概念來总結經驗材料，总結对事物研究的結果，反映事物主要的、本質的特征，並拋棄个別的、非本質的特征。例如，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物質概念，就是由於用下面的方法概括了关於具体物質形态的自然科学材料而產生的：捨棄僅为某一物質形态所特有的非本質的特征，取出对一切物質形态來講都是本質的和共同的东西。但这种概括工作本身是藉助於表达物質概念的詞而实現的。恩格斯說，“物質”一詞不过是一种簡称，藉着这种簡称我們把各种不同的感覚到的物按其共有的特性予以綜合。这种为一切不同的物質形态所共有的特性，乃是“作为客观实在的特性，离开我們意識而存在的特性。”〔註四八〕

語言、詞具有巨大的概括意义。列寧說，任何一个詞都已經是概括

性的东西。如果感覺所提供的是个别的东西，那末思想与詞所提供的却是一般的东西。

語言是抽象思惟的工具。它不僅是人們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是認識世界的工具。語言給了人們無限可能性，去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反映和概括現实。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不会講話的的人、聾啞的人就沒有思惟的性能。可是，如斯大林所指出的，“聾啞的人的思想之產生和能够存在，只能是根据他們日常生活中由於視覚、触覚、味覚、嗅覚而形成的对於外界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知覚、表象，在这些形象，知覚表象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失去任何內容，就是說，它是不存在的。”〔註四九〕

当然，外界事物对感覺器官之影响所引起的感覚、知覚和表象，不僅是聾啞人思惟过程的基礎，而且是一切人的思惟过程的基礎。沒有感覚、知覚和表象，任何認識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能听会說的人之思惟过程的基礎，比起聾啞人來要寬廣得多，因为他們的思想不僅与感性材料相联系，並且也与語言材料相联系，而聾啞人的思想只能在感性的映象、知覚和表象的基礎上產生和存在。所以，会講話的人所具有的抽象思惟之可能性、用概念來概括感性材料之可能性，比起不会講話的聾啞人要大得多。例如聾啞人不能替自己形成关於有声語言、关於音乐、关於一般声音的正确概念。

因而語言对思惟的發展、对意識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使人在社会实踐过程中能越出对事物的感性和知覚的范圍，而上升到認識的更高階段——抽象思惟的階段。随着語言的發展，抽象思惟也發展起來了。

語言是思惟过程实現的工具。自然界在人头腦中的反映过程，同时也是思想在語言中的体現过程，藉助於詞、句而形成概念的过程如果思惟是物質現实的反映，那末語言是表达、巩固和保存关於这种物質現实的思想之工具。

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关於語言与思惟統一的学說，他确定了語言是思惟的物質外殼。这就是說，以話、詞、文字的形式在語言中表達出來的思想，成了講話者本人及其他人的感覺器官可以觀察到和感覚到的实在了。

因而，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一書中寫道：“‘精神’这个东西，一开始便可憐地为物質所‘膠葛’着，这里所說的物質是被振动着的气層，声音；一句話，便是語言。……語言也恰是实际的意識，对於他人是存在着的，因而对於我自己也是存在着的現实意識。……”〔註五十〕

語言中表現出思想的动态、思想的实在性。所以一个甚至有最抽象智力的人，如果不利用詞，不把自己的思想套上語言的物質外殼，也是不能思惟的。

斯大林在其关於語言学問題的著作中，第一次竭力强調語言文法的重大的認識意义。斯大林指出，語言的文法構造、語言的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礎。如果基本詞彙是新詞形成的基礎，这些新詞为滿足人的需要所必要的，那末語言文法則“規定詞的变化規則及用詞造句的規則，这样就使語言具有一种有条理的可理解的性質。”註〔五一〕

正因为有了文法的帮助，語言才能使人类思想套上語言的物質外殼，因此，語言就成了思惟的工具，沒有这种工具就不能認識世界。但語言的發展和改進也主要是由思惟的發展來决定的，因为思惟日益完全地和深刻地反映着不断發展的人的物質存在。思惟在語言發展中的作用、思惟与語言的关系特别表現於文法中。斯大林說：“文法是人类思惟長期抽象化的成果，是人类思惟所得巨大成功的指标。”〔註五二〕

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在思惟活动的过程中文法把个别的詞和具体的句子加以抽象化，把詞的变化和用詞造句的基本共同之点綜合起來，並用这些共同之点組成文法規則。

思惟由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形成概念，这是一个基本的一般認識規律。

列寧寫道：“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思惟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眞理，而是接近眞理。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鄭重的、不是胡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註五三〕

斯大林关於抽象思惟在語言、語言文法發展中的作用之原理，深刻地揭露了語言与思惟間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

馬克思列寧主义关於語言与思惟之关系的学說，对進一步研究語言的实質及語言的發展規律具有極重要的意义。关於語言与思惟之統一的問題，不僅成了哲学家仔細研究的对象，並且也成了苏联語言学家仔細研究的对象。在斯大林关於語言学問題的著作發表后，苏联的語言学家对語言与思惟的关系問題發生了極大兴趣。在各种科学論文中，除了語言学的其他重要問題外，关於語言与思惟相互关系的問題也得到了闡明，虽然这种闡明还是不够的。这里，应該指出E·加尔基諾——非多盧克發表於一九五一年"莫斯科大学通报"第九期上的一篇論文："从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家的学說來看詞与概念。"其中对理解詞的本性，闡明詞的意义和确定詞与概念的相互关系作了一次有積極意义的嘗試。苏联的語言学家在研究这一問題时，也与研究語言学的其他問題一样，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家所指出的道路前進的。

（吳鍾清、顧錦屏譯自苏联"哲学問題"一九五二年第三期）

〔註一〕：列寧："拉薩尔'爱非斯黑暗之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書摘要"。"哲学筆記"，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二九七頁。

〔註二〕：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解放社版，第一頁。

〔註三〕：斯大林："無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解放社版，第三〇頁。

〔註四〕：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三联書店版，第二〇頁。

〔註五〕：馬克思："資本論"，三联書店版，第一卷，上冊，第一二九頁。

〔註六〕：馬克思、恩格思："德意志意識形态"，群益出版社版，第六四頁。

〔註七〕：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作用"，解放社版，第六頁。

〔註八〕同上，第八——九頁。

〔註九〕：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五二頁。

〔註十〕：手的語言即手势語言或运动語言。手的語言、运动語言都是馬尔的用語。——譯者

〔註十一〕："馬尔选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二〇二頁。

〔註十二〕：字的語言即有聲語言。——譯者

〔註十三〕："馬尔选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一二九頁。

〔註十四〕：同上，第八五頁。

〔註十五〕："馬尔选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二〇四頁。

〔註十六〕：同上，第二卷，第一二九頁。

〔註十七〕：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态"，群益出版社版，第五二頁。

〔註十八〕：同上，第六四頁。

〔註十九〕：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三联書店版，第二六〇頁。

〔註二十〕：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解放社版，第五頁。

〔註二一〕：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三联書店版，第二〇頁。

〔註二二〕：馬克思："对瓦格納的書的意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一五卷，第四六一頁。

〔註二三〕：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二頁。

〔註二四〕："巴甫洛夫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五六八頁。

〔註二五〕：巴甫洛夫："客观研究动物高級神經活动二十年的經驗"，一九五一年俄文版，第三九二頁。

〔註二六〕：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二頁。

論語言在認識中的作用

德·高尔斯基

要闡明‘語言在認識中的作用’这个題目，至少得先解决下列几个問題：

一、闡明斯大林的原理：語言把人的認識活动的成果用詞和由詞所組成的句子巩固起來，这样就使人們的思想交流成爲可能。

二、説明語言在概念形成过程中起什么作用的問題。

三、根据斯大林关於思想“只有在語言的材料的基礎上，在語言的術語和詞句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存在”的原理，來研討作为思想形成工具的語言問題。

四、闡明斯大林的原理：“有声語言在人类歷史上是幫助人們从动物界中划分出來，結合成社会，發展自己的思惟，組織社会生產，与自然力作勝利的斗爭和达到我們今天所有的進步的力量之一。”

五、說明包含一般东西的詞怎样表达特殊的和个別的东西的問題。

六、研討科学術語和語言的輔助工具（例如数学，化学以及其他科学中的公式語言就是語言的这种輔助工具）在科学中的作用問題，並說明普通語言和所謂‘科学語言’之間的相互关系。

研討上述問題無論对辯証唯物主义或对語言学都有重大的意义。例如，要闡明头兩个問題的內容，就得先解决認識論中極重要的問題，即在思想交流过程中使用同一种語言工具，但見解，年齡和知識水平各不相同的人們之間相互了解和思想交流的可能性的問題，以及解决語言在抽象形成的过程中的作用問題，等等。这些問題的解决对語言学也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些問題的解决是和詞的詞彙意义、新詞及其詞彙意义的形成等問題緊密联系着的。

在本文中，我根据斯大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來研討头兩个問題。

根据斯大林的学說，語言是在人类社会整个歷史时期中存在的社会現象。語言是交际的工具，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斯大林在指出語言和其他社会現象相区别的專門特点时寫道：“語言的專門特点是：語言之替社会服务，乃是作为人們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作为使人們相互了解並使人們在其一切活动范圍中調整共同工作的工具，这一切活动范圍包括生產的領域也包括經济关系的領域，包括政治的領域，也包括文化的領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註一〕

在社会發展的整个歷史时期，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为人們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語言就是有声語言。斯大林教導我們說：“歷史上沒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令是最落后的，能够沒有自己的有声語言。”〔註二〕

因此，必須指出，馬尔关於‘手势語言’（視覚語言）似乎先於“有声語言”（听覚語言）的唯心主义学說是建筑在思惟脫离語言的基礎之上的，是徹头徹尾反科学的。斯大林指出：“不能把手势語言和有声語言等量齐觀，正如不能把原始的木鋤和現代最新式的拖拉机等量齐觀一样。”〔註三〕

如果人們在交际过程中使用手势，那不是什么語言，而只不过是表現方法極端有限的輔助工具。这种輔助工具很多。在我們賦予某个动作，运动或符号以一定的含意的場合下，这些动作，运动或符号就开始起輔助工具的作用，帮助人們交际和交流思想。例如，在軍隊里有各种各样的标識符号。在一定时候，一定地点發出的信号彈，旗語，各种手势等等都能起輔助工具的作用，以傳达命令，交流某种思想。但决不能把这些輔助工具和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声語言混为一談。兩者有下列的根本区别：

一、由於上述輔助工具的貧乏及其使用范圍的極端有限，其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它們不能成为全社会的成員間，甚至人数較多的团体的成員間的交际工具，但有声語言的意义却是巨大的，它的活动范圍实际上是沒有限制的。因此斯大林寫道：“在这一方面，所謂手势語言的意义——由於它極端貧乏和有限——是微不足道的。其实这不是語言，甚至不是能这样或那样地代替有声語言的語言代用品……而是表現方法極其

有限的輔助工具。"〔註四〕

二、有声語言是歷史上形成的現象，語言这一社会現象的發展是不以社会成員的意志为轉移的。新的一代开始生活时，就遇到現成的，前代所建立的生產力和生產关系，新的一代在初期应該接受並適应这种生產力和生產关系，这样才能生產物質資料，和这一样，每个人在社会中長大时，就掌握該社会在歷史上形成的語言。因此可以說，語言的發展是自然歷史的过程，其發展法則有客观的性質。上述的輔助交际工具通常是按照人們的意願創造出來的。例如航空信号的含意就是按照需要而变更的。

三、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实。思想是用語言表示出來的；語言和'語言材料'是形成思想的工具。上面所說的輔助交际工具不是思想的直接現实。各种不同的記号和信号的含意是靠有声語言來确定的。例如，交通信号的綠灯表示'可以通行'。这个信号的含意只有依靠歷史上形成的有声語言才能确定下來。可以通行这个意思首先在'可以通行'这个音組〔註五〕中表現出來。然后我們只有靠这个音組才能根据綠灯确定这个思想，並規定交通信号的綠灯表示可以通行。这样，我們就把綠灯当作一定的信号。

由此可見，隨着有声言語產生的表情和手势不可能是独立的語言工具，因为它們只能和言語相联而存在，是用來补充或加强語言的某些部分的。由於上述理由，語言在認識中的作用問題必須而且只有根据有声語言來加以研究。

斯大林在說明語言在認識中的作用时，指出語言和思維是直接統一的。斯大林說：'語言是直接和思維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維活动的結果，認識活动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巩固起來，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註六〕

首先我們研究在什么条件下詞才能保証人們的思想交流和保証人們掌握前代積累的經驗的問題，然后再來說明詞在概念形成过程中起何作用的問題。由於我們提出了第一个問題，就得从本質上說明：我們如何來理解詞的意义和詞在思想交流过程中起何作用。

每个詞对我們的感官都起作用：說出來的詞对听覺器官起作用，寫

出來的詞对視覺器官起作用。不能把某个思想的語音物化和書寫物化混为一談。書寫物化（寫出來的詞）總是通过語音物化（朗誦或默讀出來的詞）的。詞的書寫不是思想的直接現实，而是思想在其物化的某个音組的音的表現。詞的書寫是由每个有一定声音的字母構成的（这里指的是表音文字的語言），而不是由思想構成的。因此，我們談到‘物質外殼’时，指的總是声音的外殼，在声音的外殼中是用直接的必要的方式把每个思想表示出來的。每个詞（指的是实詞）〔註七〕是思想的‘物質的外殼’，同时有一定的涵义：作为詞的音組一定表示某个对象並表达这个对象的概念。詞總是包括一般的东西的。列寧寫道：‘任何詞（言語）都是已經概括了的。’〔註八〕

人們思想交流的过程只有在下列兩种情况下才能实現，即人們善於：一、把所到的音組联系到这个音組所表示的对象上去；二、把一定的音組联系到所看見的那个对象上去。

这兩个过程只有在人了解了一定的詞的意义才能实現。人在知道詞所表达的是哪类对象时，才了解詞的意义。这种認識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每个詞都包含相当的音組所表示的对象的一般的和特殊的特征。那些構成詞句的意义的一般的和特殊的特征究竟是些什么呢？

例如，我們听到的‘鳥’这个詞，只有在我們能把这个音組联系到用歷史上形成的一定語言講話的人們以这个音組來标誌的那类对象时，才能成为語言这个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的一定要素。‘鳥’这个音組能够正确地归到脊椎动物的一定的类中去，只是因为这个音組包含一般的特征，这些特征反映对象本身的一般特征並能使我們把鳥和其他一切动物区別开來。这个一般的和特殊的特征的總和用詞巩固起來，它确定某一音組对相当的对象类的应用范圍，从而構成該詞的詞彙意义〔註九〕

因此，理解詞的意义是傳授並擴大我們知識和我們經驗的必要条件，是实現語言这个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基本職能的必要条件。

詞的含义很多，因此当它脫离上下文孤立地放在我們面前时，我們往往不能确定該音組所指的是哪一类对象。例如，当我們听到‘Оос’这个詞时，我們还不能正确地确定我們所听到的音組所指的是哪一类对象，因为在俄文中这个音組有船头的意思，也有人或动物的嗅覺器官的

意思。但是在我們交談时，我們就不准确定某个音組的应用范圍，因为詞通常是处在一定的上下文中的；是和其他的詞联系着的。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研究單义詞，即标誌一定的和唯一的同类对象的詞。这样虽縮小了研究范圍，但絲毫也不会妨碍对本文所要研究的問題的分析。

概念是思想的形式，它反映对象的一般的和本質的特征。列寧在說明概念时指出：‘概念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普遍性。’〔註十〕在任何一般的和單一的概念中必定反映出一定的一般特征。例如，我們从‘人’这个概念中可以知道这样的特征：‘是脊椎动物’‘能够制造劳动工具’，‘是社会生物’，‘能說話’等等。这些一般的特征每个人都有，而且其中有些特征只为人所有。例如，‘能够制造劳动工具’，‘能說話’等特征只为人所有，为其他任何生物所沒有。这些特征就叫做特殊的特征。‘人’这个概念的其他的一般特征，不單为每个人所有，而且也为其他生物所有（如‘是脊椎动物’这个特征）。

任何概念都反映出特殊的特征，这个特征使我們能把適合於該概念的一类对象和適合於另一概念的一类对象区别开來。

單一的概念（如，莫斯科’‘苏联’‘伏尔加——頓河运河’等等）也和一般的概念一样，在它們所有的特征中有只为某一單独的对象特有的特征（即特殊的特征）。例如，‘莫斯科’这个概念所反映的，除了别的城市共有的特征（‘首都’‘省会’等）外，还有只为莫斯科特有的特征（‘苏联的首都’）。

某个概念反映的特殊的特征确定这个概念的外延，即該概念所指出的那类对象。例如，‘鳥’这个概念的外延是由反映在这个概念中的一般的特殊的特征（如有翅膀、羽毛和鳥嘴）确定的，因此这个概念的外延包括小燕（Ласторка）燕子（Стриж）和鴿子等等，而不包括魚类和爬虫类等等，因为他們沒有上述的特殊特征。

既然‘莫斯科’这个概念就其外延來說是單一的，所以組成‘莫斯科’这个詞的音的組合指的也就是一个單独的对象，即苏联的首都。既然‘省会’这个概念的外延是一类对象，所以構成‘省会’这个詞的音的組合指的是許多对象（我們可以把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庫尔斯克和奧勳尔等城市都叫做省会）。

因而，某个音組有相当的应用范圍，这个范圍是由相当的詞的意义决定的；因此，在我們听到或讀到某个有一定意义的詞以后，我們就知道这个詞所指的那类个别的对象，因为这些对象具有反映在該詞意义中的最一般的和特殊的特征，反之，我們看到某个对象，就用一定的詞來标誌这个对象，因为我們在該詞中知道用这个詞巩固起來的这个对象的特殊特征。

不难相信，某个音組的应用范圍是和这个詞巩固起來的概念的外延相一致的，事实上，我們把个别的河（伏尔加河，頓河，德涅伯河，阿姆河，叶尼塞河等等）都用‘河’这个詞來叫，而这些个别的河都包括在‘河’这个概念的外延中。

懂得詞义，能使人們在思想交流过程中彼此了解，因此它在認識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由此必須着重指出对說明語言在認識中的作用有極重要意义的一点。在思維实踐中，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水平和不同年令的人們是根据不同的特征把这类对象和别的对象区别开來的。例如，‘化学元素’‘原子’‘物种’等詞在十九世紀所包含的內容和我們現在加進这些詞中的內容有所不同。‘物种’这个概念在达尔文以前的生物学中包含物种不变和物种無共同起源的联系的特征。自拉馬克的著作發表以后，特别是在达尔文創立進化論以后，物种的概念包含一种物种是由另一种物种發生和發展而來的特征，同时認为發展只是数量上的增長，沒有由一質态到另一質态的变化。認为物种是顯著的变种，現在根据科学院院士李森科的著作，从‘物种’这个概念的內涵中剔除了物种是顯著的变种和一种物种是純粹通过量变由另一种物种發展而來的論点。相反地，在物种的概念中，包含一种物种是通过原有物种的質变从另一种物种發生而來的特征。

於是就發生了一个問題：为什么物种这个概念的变更並沒有妨碍我們对达尔文前后的学者所寫的文章的理解呢？其实不管和‘物种’这个詞相联系的概念怎样变更，这个詞的意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沒有变更。因为‘物种’这个詞总是标誌着同一类对象的。我們用該音組來标誌同类对象是根据‘物种’这个詞中的什么特征呢？物种的这个特征就是：物种在通常的、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彼此是不交配的，在交配后也不会產生

正常的有繁殖力的后裔。普通小麥（軟粒小麥）、硬粒小麥、一粒小麥等等都能作为这种物种的例子。

在同一个音組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意义的情况下，了解以前的文章就很困难。例如，‘辯証法’这个術語的意义在古代和現在就完全不同。古代人所謂辯証法，就是以揭露对方議論中的矛盾並克服这些矛盾求得眞理的方法，而現在这个術語則标誌認識現实的唯一科学方法，这一方法的基本特征，斯大林在其著作‘辯証唯物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中已作了天才的表述。如果不注意这兩个術語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意义，那么当我們在文章中讀到‘辯証法’这个術語时，就可能引起誤解。

对我們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用不同的術語來标誌同样的事物。大家知道，例如‘邏輯’这个術語我們現在用來表示邏輯学說，但它不是始終用來标誌‘邏輯学說’的。如果認为邏輯学說只有在我們碰到这个術語的地方才存在那就大錯特錯了。大家知道，例如亞里斯多德在他說明自己学說的六篇邏輯論文中，沒有一篇是称为邏輯学的，他的註釋者称它們为‘工具篇’。斯多葛派〔註十一〕把我們現在所称的邏輯列入辯証法內，他們还把內部詞的学說和外部詞的学說，即文法，詩学和乐章列入辯証法內。‘邏輯’这个術語在德讀克利特，西塞祿〔註十二〕等人的著作中已可得到，其意和我們現在所使用的相同，但是这个術語的这个意义只有十七世紀波尔——罗亞尔的邏輯起才最終确定下來。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不致錯誤地使用某些歷史形成的作为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術語，我們得先作一番研究，确定这个術語的意义，即确定某个音的（或書寫的）組合在当时相当於現实的何种事物。

但是，这种或那种語言体系中所使用的大部分詞通常都保存着它的原义，这就使每个諳熟这种語言的人能够掌握前代用語言巩固起來的經驗。

在歷史發展的各个階段上，同一的詞标誌着同一对象，因此我們懂得了現代語言，不必再作特別的研究和經过翻譯，就能了解前代記載下

來的事物。

因此，必須指出：斯大林特别强調語言的基本詞彙和文法構成的永久性，他指出現代俄罗斯語言按其結構來說，和普希金的語言差别很少。

斯大林闡明了語言的这种永久性的原因。斯大林寫道：‘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魚”“人”“走路”“做事”“做生意”等等不叫做水，地、山等等，而叫做旁的，又有什么必要呢？把語言中的詞的变化和語句中的詞的組合，不按照現有文法而按照另一种文法去進行，又有什么必要呢？这样的語言改革对於革命有什么益处呢？在歷史上，沒有特別必要的时候，决不会做出什么重大改革的’〔註十三〕。

这种改革会使語言失去基本的社会职能——人們的交际工具的職能，会使社会生活处於無政府狀态，会造成社会崩潰的威脅。

語言中使用的詞的意义相同，使年令、教育程度的見解等等不同的人們能够利用語言作为基本的交际工具，小孩，成年人，受过教育的和未受过教育的人彼此之間是使同一的詞來互相交际的。

例如，教师和学生都使用‘人’‘数’‘数学’等詞。但这並不是說，教师和学生对‘人’这个詞包含的內容和特殊特征的理解是一样的。当然，教师对这个音組包含的內容的理解比学生要深刻得多。学生能够根据並不揭示人的实質的純外部特征來区别人和其他生物，因此，他把‘人’这个音組正是和这些特征联系起來。教师則根据揭示人的实質的其他特征來区别人和其他生物，他把这些特征和‘人’这个音組联系起來。虽然如此，教师和学生互相达到了了解。

不管跟‘人’这个音組相联系的內容怎样不同，教师和学生畢竟达到了互相了解，这是因为他們以相同的意义使用这个音組，即把这个音組和特征的这样的总和联系起來，这个总和使我們能区别人和其他一切生物並使我們能把这个音組归屬於同一类对象。成年人和基本上已能講話的小孩之間也是用这种方法达到了互相了解的。

由於研究詞义問題產生詞和概念的相互联系問題。本文所指的首先是科学的概念。我們已經說明了詞义和概念都反映对象的一般的和特殊

的特征。我們为什么要区别詞义和該詞所表达的概念呢？

因为概念把我們認識活动的結果确定下來，它是我們对某个对象的認識的总結。因此，某一类的对象的概念反映这些对象的一般的和本質的特征的全部总和以及科学在其一定的發展階段上認識的这些特征的一切复雜的联系和关系。至於適合於这些概念的詞的意义並不包括一般的和本質的特征的全部总和，不包括这些特征的一切复雜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而只包括一般的特殊特征，即我們藉以区别一类对象和別类对象的特征。

可見，詞义只包括一些足以确定適合該詞的概念的外延的特征，同时也說明这个詞的应用范圍，我們只把某一个音組归屬於那些包含在相当的概念的外延內的对象。

概念說明对象的实質並把我們对对象的全部認識确定下來，詞义使我們可以把一些对象和另一些对象区别开來。

从上述可知，通过詞的詞彙意义把人的認識活动巩固下來和在同一意义上使用音組是人們交际的条件，並保証不同年令，不同知識水平。不同見解的人們間的思想交流以及各代人們的經驗交流。这样就使得語言在社会發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已在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著作中着重指出來了。

自然，掌握一种語言的文法構造也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必要条件。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对於这个問題不能詳述。

旣然人們要互相交流思想，就得先懂得一定的詞的意义，所以掌握本族的語言总是先於有系統的教育。应該指出，教小孩学語言的过程重要的是使小孩能够理解相当的詞的意义，教小孩学語言就是要在他的听覺，說話分析器中樞与听覺，触覺等分析器中樞之間建立联系。例如，我們拿苹果給小孩看，同时叫出它的名称並要小孩重复这个詞，这样我們就在視覺分析器的刺激（小孩看到球狀和綠色的結合体）。与听覺分析器的刺激（小孩听到标誌苹果的音組），說話分析器的刺激（小孩开始运用自己的說話器官，試圖自己重复他所听到的那个音組）之間建立了联系，小孩掌握了这个詞，即学会了發出相当的音組並把这个音組正确地归到一定的对象上去，他就領会了这个詞的意义。之后，詞就能砠

信号的信号作用：‘苹果’这个詞就会發出和眞实的苹果所引起的刺激一样的信号。

只有領会了詞义（这必定和說話器官能發出符合於这种意义的一定音節联系着的），詞才能成为第二信号系統的刺激物。詞对动物可以形成某种条件反射，但在这种情况下，由於动物不理解詞义，詞对听覺分析器所起的作用就和第一信号系統的任何其他刺激物（如鈴声）一样。用这样信号所提示的对象並沒有轉入用詞思考的范圍，並不代表这个有声信号所能提示的整类对象。

人一領会詞义，詞对人就成为已經概括了的刺激物。詞則屬於起信号作用的一定对象，它就能抽出这一事物的各个特征，知道这些特征，就会确切的規定一定音組的应用范圍。

伊凡諾夫，斯莫列夫斯基闡述了詞怎样成为一定条件刺激物的信号的信号。如果对鈴声已养成一定的条件反射，那末就可以用‘鈴声’，这个詞來代替鈴声，我們就会得到同样的反应。这是因为我們根据过去的經驗已知道‘鈴声’这个詞的意义，也就是說，我們已知道这个音組是用來标誌包括我們的鈴声这样一类对象的，伊凡諾夫·斯莫列夫斯基寫道：‘这一刺激物所引起的神經兴奋首先是使过去經驗曾在大腦皮質中所記錄的‘鈴声’这个詞和鈴声之間的旧的联想活躍起來也只有在这时，神經兴奋才把这后一个刺激所引起的留在大腦皮質的印象和目前的反应联系起來，实現我們在实驗中所养成的条件联系。’〔註十四〕

在使用言語时，必定發生音組，能重說这个音組的說話器官和視覺、触覺、嗅覺以及对所感知的对象的其他感覺之間的联想联系。能理解，重說並正确使用某个音的（在看書时就是书寫的）組合，这就是說，掌握了一定的詞的意义。詞的意义决定詞对对象应用的范圍。

一定的个别对象的概括是通过归屬於这个对象的詞來進行的，因为这个对象代表整类相同的对象。因之人类的思維的抽象活动的巨大經驗就用語言巩固下來了。

詞是第二信号系統的刺激物，它在人們的經驗的積累上，在人們理解周圍环境和根据对周圍环境法則的認識而使其服从於自己的能力的發揮上，起着巨大的作用。

巴甫洛夫寫道：‘可以認为，在人，特别是在其大小为动物所不及的人的前額中，还有另一种信号系統，第一信号系統的信号——語言，它的基礎或基本組成部分就是說話器官动覺的刺激。这就給人的神經活动帶來了一种新的原則。即把第一信号系統的無数信号加以抽象或概括，把这些概括了的新的信号加以分析和綜合，这种原則使人們能無限制地理解周圍的世界，並創造人的高級適應能力——科学，它即是全人类的实驗，也是科学的專門形式。’〔註十五〕

在說到詞在歷史上形成的語言中的意义时，必須指出下列極为重要的兩点：

一、詞的意义不是人們任意創造的。因为語言的發展是不以用某一种語言說話的人們的意願为轉移的自然歷史过程，所以語言据以發展的一切法則都是客观法則。因此語言学所發現和表述的語言法則也是客觀法則。

斯大林在其天才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中寫道：‘馬克思主义把科学法則——無論是指自然科学法則或政治經济学法則都一样——了解为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們能發現这些法則，認識它們，研究它們，在自动的行动中估計到它們，利用它們來为社会謀福利，但是人們不能改变或廢除这些法則。尤其不能制定或創造新的科学法則’（註十六）

因此，詞的詞彙意义的構成是生產和全部社会生產的發展所确定的客观过程，斯大林指出，語言的詞彙是处在差不多不斷改变的狀态中。‘工業和農業的不斷發展，商業和运輸業的不斷發展，技術和科学的不斷發展，就要求語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詞新的語來充实它的詞彙。語言也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詞充实自己的詞彙，並改進自己的文法構造。’〔註十七〕

二、在生產，社会生活和科学的發展的影响下構成的並由一定的“物質外殼”巩固起來的某个詞的意义並不是事物的标誌、符号，而是客观存在的各种不同的事物的一般的和特殊的屬性的反映。这使我們能够理解並正确使用相当的音組。

在現代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的哲学中，关於詞义問題有許多反动的反

科学的臆断。这里很大一部分作品是語义学者所寫的，他們是以更進一步加强实証論的侵略性和反动性为特征的新实証論这个現階段反动哲学派别的拥护者。其表現如下：从前实証論者千方百計地掩飾自己作品的反动傾向，多半把自己的“探討”范圍限於数学和数学邏輯問題（当然这些都是以唯心主义的覌点歪曲了的）。最近，他們絕大多数都轉到社会学問題方面，公然号召保衛現代美國帝國主义，为現代美國帝國主义的侵略性辯护。

卡尔納在其一九四六年出版的“語义学概論”一書中第一次詳述了語义哲学的基本論点。他寫到：“如果我們分析語言，那末当然要研究語句。但是我們不必研究說語句的人和語句的符号。虽然这些因素都存在，由於我們使用語言，我們可以按照我們打算說的語言，撇开一个甚至兩个因素。据此，我們把語言分成三个研究范圍。如果在研究中明确指出是誰在說話……我們把这种研究归到实用主义的范圍。如果我們不談誰在使用語言而只分析語句及其符号，那我們就在研究語义学。最后，我們如果不談符号而只分析語句本身之間的关系，那我們就在研究（邏輯的）句法。由上述各部分組成的全部語言科学就叫做語言特征学。”〔註十八〕

应該指出：这里指的是所謂科学的輔助工具（“語言”）（化学中的公式語言就是这种“語言”的例子）。用嚴格的演繹法構成的科学的“語言”（如数学邏輯、几何学以及現代数学的其他科别的“語言”）就是語义学研究的專門問題。在語义学者看來，科学中基本術語的意义是隨隨便便地加上的，同时某一門科学的內容似乎全看我們賦予最初的術語以何种意义來决定。在演繹科学中，标誌最初概念的術語是由公理來确定的，而公理在新实証論者來看，是任意选擇出來的。因此卡尔納指出：在構成任何演繹科学科目时，人們可以“任意（着重点是我加的——德·高尔斯基）选擇某种結論的主要語句和規則：从这一选擇中人們就可以知道所碰到的主要邏輯符号有何意义”。〔註十九〕

因此，語义学者認为全部科学及其規律性是主覌的構造，它必須和我們任意賦予的最初術語和結論規則的意义取得一致。語义学者常常把自己的唯心主义的臆断建筑在数学和邏輯的基礎上。这些臆断的反科学

性是十分明顯的。在数学中不能有任何主观意志，数学的定理是客观的法則，不是人們根据自己的意志的意願創造出來的，而是物質現实的对象間的实在的相互关系的反映。数学把对象的質的特征加以抽象，研究对象間在数量上空間上的最一般相互关系。任何公理系統之所以可能有許多解釋（这也是邏輯实証論者所利用的），就是因为数学上的抽象（其中确定的只有对象在数量上的特征）被用於極不相同的对象，而不管它們的質怎样。例如，我們可以把数字“二”用到蘋果、星、國家等等上面去。

不能把标誌一定量，（这个量可以用於不同質的对象）的数学符号和詞混为一談，詞的意义总是嚴格确定下來的它包括受最嚴格限制的在質上一定的对象范圍。也不能根据其他原因把詞和各門科学用作輔助工具的符号混为一談。这在前面已經談到了。

語义学者把在演釋科学的“分析”过程中（不如說在捏造过程中）得到的“結果”用來分析普通語言。目前出現了大批“著作”，其中硬要“証明”：标誌一般概念的基本詞的意义是我們任意确定的。这里所指的首先是極廣泛的概念，如“物質”“質量”“意識”“数量”“力量”“原因”“时間”“空間”等等。

因此，語义学者硬說不能把最初的極廣泛的概念的眞理性在实驗中加以“直接”的檢驗（例如化学家用石蕊試剂來确定某种溶液是鹼性还是酸性的那种檢驗），似乎我們能够賦予这些術語以任何意义，能够“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來确定他們”。例如，根据語义学者的見解，物質的一切定义（唯物主义的，馬赫主义的和黑格尔学派的等等）都是有同样价值的，因为它們都不能加以直接的檢驗。因此，他們認为在構成某一科学科目时，一般以不用这类概念为宜，因为它們是“形而上学的”。語义学者在这方面並沒有别出心裁，他們在重复着貝克萊、馬赫及其他主观唯心主义者关於“物質”这个概念的“形而上学性”的一派胡說，但这种胡說早被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經典著作家揭破了。

在辯証唯物主义者看來，語义学的詭辯論是很明顯的。全部問題在於上述極廣泛的科学概念並不是从其歷史發展意义上說的最初的概念。只有在說明已达到的科学成果的問題，使科学知識系統化問題被提出來

的时候，这些概念才是“最初的”概念。所以，我們歷史地辯証地对待問題，就可以說，極廣泛的科学概念是科学發展的結果。恩格斯指出：“研究世界的总的成果是在这一研究的最后得到的，因此，它們不是原則，不是起点，而是結果，总結。”〔註二十〕

但在說明用一般的概念、公理和法則确定下來的科学發展的結果时，这些一般的概念、公理和法則往往是科学的起点。这里造成了一种錯覺，似乎科学的全部內容都是从这些一般的概念、公理和法則中引伸出來的。馬克思在其数学手稿中分析了这一現象，並把它叫做‘顚倒法’(Rmsehlag inder methode)。

恩格斯也指出了这一点。他寫道：“但和一切其他思維領域中的情形一样，从实在世界抽象出來的法則，在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是和实在世界相脫离的，並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从外面而來的，世界必須与之相適应的法則而和它对立起來。”〔註二十一〕

可見，如果科学的一般概念不是科学的起点，而是科学的結果，那末由此就应得出一个揭破語义学者的詭辯論有極重要意义的結論，即如果一般概念的眞理性不能用直接方法加以檢驗，例如化学家用石蕊試剂确定溶液的性質那样，那末它就会在科学發展和人类实踐的全部進程中得到檢驗，由此得出結論，符合於最初概念的詞的意义是不能隨便确定的。

語义学者妄圖“証明”社会生活。國际关系方面的術語如“資本主义”“社会主义”“侵略”“階級斗爭”等等的意义是由人們任意确定的。这种企圖的反科学性是一目了然的，

現代語义学者力圖把一切政治上外交上的爭論和資本主义社会对抗階級之間的全部政治斗爭归結为純粹詞的爭論。例如，青士寫道：“政治上和經济上無窮尽的困难的發生和發展都是語言不好的緣故。”〔註二十二〕

朗德別尔格在一本关於國际关系問題的反动的反科学的著作中硬說，國际关系中的一切爭吵的產生都是不同派別和不同見解的人們在爭吵过程中使用相同的但含义不同的詞的結果。由此它作出結論說，为了使联合國工作順利進行，必須把联合國会議上应用的一些詞，如“所有

制”“階級斗爭”“剝削群众”“帝國主义”等等加以廢除，这样就容易达成协議。

这种妄想用廢除語言中某些詞的方法來消除帝國主义矛盾的反动階級的用意是昭然若揭的。華尔街和倫敦城区的走狗們正在拼命巩固現代資本主义。

* * *

我們研討了詞在哪些条件下保証人們能交流思想，能掌握前輩積累的經驗的問題。現在我們來分析語言对人形成概念起何作用。我們以分析詞在概念形成中的作用为例，來研討这一問題。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不能談到文法構造在概念中的作用問題。人的認識活动有兩个方面：一方面是掌握和使用人类已經得到的知識，另一方面是認識还沒有被認識的自然界和社会現象的相互联系和規律性。語言在这兩种情况下起着不同的作用。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們是掌握已被認識的眞理，向人們論証和解釋这些眞理。这个目的是在講授，学習和研究課本內容和讀書等过程中达到的。人掌握了一定量的知識，就能参加社会生產和得到新的知識，从而推动科学向前發展。

在第二种情况下，我們和研究过程發生关系，即和現实現象的認識过程發生关系，这一过程使我們超越科学中已知事物的范圍並和科学進一步的發展相联系。

無論在第一种或第二种情况下，我們都是和認識过程，即加深和擴大我們关於世界的知識的过程發生关系。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我們的知識是靠人类已經得到的知識來擴大和深化的，同时我們不能超越这些过去所得到的知識的范圍，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們的知識是靠科学中还不知道的眞理的發現來擴大和深化的。

不論在第一种或第二种情况下，認識过程都是受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著作家所闡明的辯証法則支配的。例如，在科学的認識的过程中，在新眞理的發現过程中，或在和学習相联系的認識过程中，我們总是从現*象到本質，从个別到一般。*

教学总是从研究現实的最簡單的关系和屬性开始的，人只有認識了

这些最简單的关系，才能去認識較为复雜的关系，例如，教师教会了学生算个数，使他們先有自然数的概念，再教学生做初步的演算，然后教他們做愈來愈复雜的演算。在这种情况下，和其他任何情况下一样，認識过程由淺而深。对这一过程，列寧的相对眞理和絕对眞理的学說是完全適用的。

实踐是認識的基礎，認識是同教学和新眞理的發現相联系的。不去实际接觸对象，不去实踐，就不能有基本的、最初的概念，一般演算和常用方法的概念（例如，为了使学生有数的概念，教員就要使他們用具体的东西如小棍子、蘋果等等來做練習）。最后，正如新發現的眞理在实踐中受到檢驗和运用一样，人在学習过程中新得到的知識也是在实踐中受到檢驗和运用。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实踐是我們認識的眞理的标準。

談到实踐在和学習相联系的認識过程中的作用时，我們应当指出一个要点：在学習过程中，人掌握其眞理性已为实踐所檢驗的那些知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就不必每次都去实地檢驗任何已知原理，去重复在科学中發現和檢驗它們时做过的全部实驗。在說明这些或那些原理时，教員总是非常廣泛地使用各种邏輯論証的方法。这些方法就是他用已知原理（其眞理性已在实踐中確定並已向学生証明）來論証学生未知的某个原理的眞理性。而新眞理的認識过程是我們在人类向前發展过程中对周圍环境的認識过程。

必須指出，学習和新眞理的發現这兩个認識过程是極其密切地辯証地联系着的：学習过程是新眞理的發現的必要条件，而新發現的眞理則是別人研究的对象。

認識过程不論在第一种或第二种情况下都是在詞的基礎上進行的，但是詞在学生对概念的領会中和对我們周圍世界的对象的概念的形成中的作用，在每个过程中都是不同的。

教学过程（即積累的知識的傳授过程）是通过說出來的詞或寫出來的詞为中介來实現的。毛澤东同志在其著作“实踐論”中指出間接經驗对人們得到知識的作用时寫道：“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实上多数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識。”〔註二十三〕

人所掌握的大半科学概念主要是在有系統的学習經过中獲得的。要進行有系統的学習，就得通曉本族語言和領会日常生活必須的一定数量的概念。这些概念是人在生活中經驗即合各种事物直接接触的过程中，在学習語言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教学过程中，新說明的概念必定有一定的語言的"物質外殼"。教員通过把已知概念巩固下來的詞的中介，來闡明新概念的內涵，这时，用語言的形式來表述一般的和特殊的特征的內容，來闡明它們的相互关系，並用这种方法來說明这个概念所指的那类对象。

也可用其他方法來闡明某个新概念的內涵。在解說个别对象（其本質的和一般的特征包含在所要闡明的概念之中）时，我們先指出这些对象的一般的和特殊的特征，然后引用标誌这些一般的和特殊的特征的詞。这里我們必須着重指出：教学过程中的認識和新概念的形成是在詞（这些詞的意义学生根据过去的經驗是知道的）的基礎上实現的。

假定說，教員要解釋邏輯学中学生所不知道的归納法这个概念。教員可用兩种方法來進行。首先，教員談一下归納法这个概念的一般的定义，即說明归納法的基本的一般特征和特殊特征，然后举出各种例子來說明他所講的定义的正确性。在这里先用一个未知術語表述該術語标誌的对象的一般特点，然后再用具体的实例來証实这种說法。也可用其他方法向学生闡明这一同样的概念，教員可举出許多例子來闡明这类推論探討的一切場合的一般的和特殊的特征，然后再引用一个術語（詞）來表明經过分析个别例子后抽出來的一般东西。在第一种情况下，闡明概念內涵的过程是以引用一个未知術語（詞）开始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一过程是以引用一个未知術語結束的。但在这兩种情况下，对学生說來概念都是通过詞（这些詞的意义他們根据过去經驗是知道的）的中介形成的。

因此，学習过程总是这样的：在熟悉任何一个复雜的概念之前，先要理解許多其他概念及与其相当的詞，通过它們才能反映出那个所要研究的比較复雜的概念的內涵。各种教科書中对各門科学的說明就是个明顯的例子。例如，要說明几何学的定理，先要使学生認識一定范圍的概念，这些概念並不是在这門科学的系統中确定下來的，而是学生在实踐

中知道的（如“線”“長度”等概念）。科学中的新概念是根据这些概念及与其相当的詞而產生的。新概念反映出对象渦以前不知道的新的屬性和关系。

应当指出，在学習过程中，我們通过已知的詞不僅掌握一定概念的內涵，而且掌握一定判断（在科学中用來表述各种定理和定律）的內容。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光知道个别詞的意义已經不够了，因为这里指的是整个句子的意思，除了詞义外，我們还应当善於理解詞在句子中各种联系的意义，而这就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該語言的文法構造。

現在我們來說明詞在科学認識的过程中，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起什么作用。每一个新的科学研究階段都在擴大科学的范圍，愈來愈使我們接近絕对眞理的認識。

在这里我們談兩个問題。我們先談詞在这种概念形成中的作用，即这里發生一个抽出我們早先知道的即我們在其他已知对象中找到的特征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事先就要知道符合於这个特征的詞的意义。其次，我們談一下当符合这些特征的詞也不知道时，由於抽出早先不知道和尙未被科学認識的事物的屬性而發生的概念的形成問題。

我們來研究第一个問題。假設生物学家研究过去为科学所不知道的植物有机体的一定总和。在分析这些有机体后，在觀察它們的生活方式后，他發現这些有机体的許多一般的特点（特征），这些特点能使他把这类有机体跟其他有机体区别开來，能揭示它們的本質特点。經过这种研究找到了一定的術語（詞），这个術語（詞）就把所作的研究的結果巩固起來。

但这並不是說，研究过程中得到的結果在拟出相当的新術語以前是在詞以外存在着的。在此以前，这个結果是作为思想的一定总和在我們已知道的詞和概念的基礎上存在着的。

語言，詞在所研究的一类有机体的認識过程中，在相当的概念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極重要的作用。抽出一般的特征是以詞为中介來实現的，同时我們根据过去經驗知道，什么样的音組和这些特征相当。例如，我們研究某种植物的繁殖法后，發現这种植物有胞子植物的一般屬性，用胞子繁殖的屬性。至於用胞子繁殖这个概念及与其相当的这些詞，我們在过

去是知道了的。

分析工作的結果是用新的音組巩固起來的，而这一类被研究的对象是这个音組的应用范圍。通过这种方法形成的概念發展着並用新的內容丰富着。我們能够發現这些有机体的生活方式及它們和其他有机体的相互关系的新特征，能确定它們共有的某些特征。所有这些特征同样包含在关於这些植物有机体的形成的概念的內涵中。詞在概念進一步發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發現的特征用相当的詞巩固起來。

現在我們來研究这样一种概念的形成問題，即在这种概念的內涵中反映出來的特征，是我們在其他对象中从未見到过的，因此在語言中沒有相当於这些特征的一定的詞。在这里，我們研究这种最复雜的抽象情况，即抽象的对象是我們憑感覺所不能察知的屬性（例如，这些屬性“是价值”，“是数”等等。对我們有意义的主要是詞在抽象过程中的作用。我們用馬克思分析价值这个概念的例子來說明这一抽象过程。

馬克思为了說明价值这个概念，首先分析商品交換。馬克思指出：商品在相互交換时發生关系，在交換过程中，尽管它們的質不同，但它們彼此是被看成一样的，“价值”这个概念只有研究了商品間的这种关系之后才能抽出來。这里就發生了一个問題：使兩种質上完全不同的商品中間建立相等关系的共同物是什么呢？

馬克思闡明了这个問題，馬克思寫道：“拿兩种商品，例如拿小麥和鉄兩种商品來說。不論它們的交換关系如何，这种关系总可以由一个等式來表示。在这个等式中，已知量小麥和一定量鉄相等，例如一卡德小麥＝a公担鉄。这等式說明了什么呢？它告訴我們，在这兩种不同的物品中，即一卡德小麥和 a 公担鉄中，有某种等量的共同物。可見——馬克思斷定說——这兩种物品必等於某一第三物，而这第三物本身旣不是小麥也不是鉄。”〔註二十四〕

其次，馬克思闡明了，什么是互相交換的不同的使用价值的第三种共同物。这个共同物就是商品的价值。

馬克思寫道：“所以，这个表現在商品交換关系或交換价值上的共同物，*就是它們的价值*。”〔註二十五〕

馬克思研究了用何种方法可以解釋科学中价值这个概念的發生，从

而說明了这个概念在人認識周圍現实的过程中是如何形成的，要抽出新的，我們还不知道的屬性，只有在發現並分析所研究的对象間的一定关系后才有可能。这些关系的特征就是：它們直接和人的实踐相联系，直接和人的实踐活动相交織。因此，要抽出价值的屬性，要形成价值这个概念，只有在人們互相交換商品时才有可能。換句說，要抽出价值的屬性，只有在人实际地实現商品交換的关系时才有可能。

馬克思用許多別的例子指明他的闡述的抽象方法有極廣泛的性質。馬克思在揭露了各种互相交換的使用价值間有作为这些商品价值的某种共同物后，解釋了这个共同物的本性即价值的本質。馬克思指出，价值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劳动量是“由劳动时間即工作时間來衡量的”〔註二十六〕

可見，我們在認識过程中先發現所研究的对象之間的某种共同物，然后揭露出这个共同物的本性即本質，並“从現象到本質和从比較不深的本質到比較深的本質”。〔註二十七〕

詞在这样的抽象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

起初我們抽出所研究的对象的一般特征。这个共同物（一般特征）是我們在考察被研究的对象間的关系和相互联系后發現的。和前面所考察的抽象方法不同，前面是說我們从过去的經驗中知道被抽象的屬性及相当的詞，在这里，被抽象的屬性在科学上是新的，並且我們还不知道和这些屬性相当的詞。在这种情况下，人就要找尋相当的術語，名称，或“物質外殼”來标誌这个一般的特征。

虽然在語言中沒有相当於新發現的，以往我們在其他对象中沒有看到过的特征的特殊術語或特殊名称，但是我們能靠已有的詞拟定这个術語，这个名称。例如，“無理数”这个概念是在語言中过去早就有的詞的基礎上得到自己的名称的。“数”和“無理”这兩个概念，以及和它們相当的詞还在用有理小数不能表現出來的那些数發現以前就存在了，在科学中，詞的这些“物質外殼”“数”和“無理”都曾用來标誌新的对象，表示新的概念——無尽非循环小数的数的概念。如在我們的时代，“步行挖土机”这个用來标誌一个過去不知的，新的对象的術語是在已知的詞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

在某些情况下，在各种語言中，为了标誌新發現的或新創造的对象，采用能表示这个对象的各种不同特征的詞。例如，在俄文中以做衣服为职業的人（裁縫——譯者）这个概念用“Портой”这个詞來表示，而在德文中則用“Schneider”这个詞來表示（这个例子引自前面加尔基諾依——費道魯克教授的“从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著作家学說來看詞和概念”一文）。这里用不同的術語來表示同一个概念“портной”这个詞是从“порты”（衣服）一詞來的，而表示同一概念的“Schneide”这个詞是从“Schneiden”（剪裁）一詞來的。虽然“衣服”和“剪裁”的意义完全不同，但这兩个詞也不是任意选出來的。在俄文中“裁縫”一詞來自“порты”这个詞，正因为这个詞所标誌的人是縫衣服（пор—ты）的。在德文中“裁縫”一詞來自“Sche,den”这个詞 i 正因为这个詞所标誌的人必須多多剪裁。在任何情况下，为了标誌新的对象，總是选用能包括新的对象的某些特性和相互关系等等的術語（音組）的。

在精确科学中，總是用一定的象征性的标誌來命名某些对象，表示某些概念。大家知道，例如，在物理学中以拉丁字母“m”來表示“Macca”（質量），在数学中以符号＝來表示相等等等。科学上引用这些書寫上的标誌，不光是为了書寫簡便，不光是为了使術語包罗万象，而且是为了避免科学中術語的多义性。我們在語言中时常遇到同音異义，同义異音等現象。同一个音組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以表示不同的对象。例如“масса”这个詞即表示“множество”（多数），“огрсмнсек-оличество”（大量），又表示“труда”（多数），“громада”（巨大），也表示意大利南北部的城市，也表示說明物体动力和引力的量以及其他等等。又如“равенство”这个詞旣可以表示法律上的平等，也可以表示数学上的相等，等等。

因此，在精确科学中，对任何对象的某个新概念的形成，不但常常使用和这个概念相当的一定的音組，而且也使用以書寫表示这个对象的一定的符号。

最后必須着重指出：新概念及和其相当的新詞不僅在科学發展的進程中產生，也在人的生產活动和其他活动过程中產生。辯証唯物主义教

導我們說：实踐是認識的基礎。人們根据对客觀規律性的認識改造現实，並在日常劳动及日常生活过程中發現周圍現实事物中的新东西，人們是巩固这个新东西的新詞的創造者。

（傅子荣、馮如馥譯自苏联‘哲学問題’雜誌一九五三年第二期）

〔註一〕、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十五頁。

〔註二〕、同上，第四十六頁。

〔註三〕同上。

〔註四〕、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十六頁。

〔註五〕、俄文是 Звуковой комплекс，是音的組合的意思，我們譯为音組。——譯者

〔註六〕、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頁。着着点我是加的。——高尔斯基

〔註七〕、实詞是文法上的術語，指名詞、形容詞、动詞和副詞而言。——譯者

〔註八〕、列寧：“哲学筆記”，俄文版第二五六頁。

〔註九〕、在加尔基諾依——費道魯克教授的“从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著作家学說來看詞和概念”一文中也給詞的意义下了一个类似的定义。在这篇文章中寫道：“詞的組合的联系和其对表示的对象的关系也就是詞的詞彙意义，詞的詞彙意义是从集体中承受下來的，而不是由个別的人每次重新創造的。”，（‘莫斯科大学通报’，社会科学叢刊第四卷，一九五一年第九期第一一二頁）。

〔註十〕列寧：“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一九四九年解放社版第一三六頁。

〔註十一〕斯多葛派是哲学派別，發生於紀元前三世紀到六世紀的古代希臘——譯者

〔註十二〕西塞祿（紀元前一〇六——四三年）是罗馬共和國末期和“蒲林斯”时期的雄辯家。——譯者

〔註十三〕、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一七頁。

〔註十四〕、伊凡諾夫·斯莫列夫斯基：“关於第一、第二信号系統共同活动的研究”。“巴甫洛夫高級神經系統”雜誌第一卷，一九五一年第一期，第五九頁。

〔註十五〕、"巴甫洛夫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四七六頁。

〔註十六〕、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二頁。

〔註十七〕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八頁。

〔註十八〕、卡尔納："語义学概論"，哈佛大学出版社版第九頁。

〔註十九〕、卡尔納："語言的邏輯句法"序言，一九三四年維也納版第三頁。

〔註二十〕恩格斯："反杜林論"，一九五〇年俄文版第三七頁。（这段引文。譯者）

〔註二一〕、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联書店版第三十五頁。

〔註二二〕、吉士，："詞的威力"，一九四三年倫敦版第十四頁。

〔註二三〕、毛澤东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刷版第一卷第二八七頁。

〔註二四〕、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八頁。

〔註二五〕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十頁。

〔註二六〕同上。

〔註二七〕列寧："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一九四九年解放社版第一八六——一八七頁。

关於概念形成和發展的問題

德·高尔斯基

馬克思在闡明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时寫道："以往的一切唯物主义，連費尔巴哈的在內，其主要的缺点就在於：对象、現实、感性只是在客体的形式上或是在直观的形式上把握的，而不是看做人的感性的活动，看做实踐，不是主观地把握的。"〔註一〕这个基本缺点是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共有的，也是馬克思主义以前一切先進的唯物主义抽象論共有的。至於一般概念形成的唯心理論从來就是根本反科学的。

* * *

洛克和法國唯物主义者的在当时是先進的抽象論，是以形而上学的認識方法为依据的，而且完全沒有估計到社会实踐和語言在認識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当然是有極大的局限性的。

一切从感覺論出發的唯物的抽象論，甚至沒有提出怎样从許許多多个别事物中分出共性。即怎样抽象出共同标誌的問題，例如洛克，其在这个問題上的追隨者也一样，把抽象过程理解成这样：假定对象是X^1 X^2X^3等等，其中每一个对象都有許多标誌。假如x_1有标誌abca，X^2有标誌$a_1b_1c_1d_1$，X^3有标誌$a_3b_3c_3d_3$等等。我們在分析这些标誌时，拋棄不是一切被考察对象共有的标誌，而分出只是每一被考察对象都有的标誌。在这种情况下，各对象$X^1X^2X^3$的共同标誌就是a这个标誌或列入关於这对象的一般概念的內涵中。因此，洛克寫道："从彼得、雅柯夫、瑪丽婭、安娜的复雜的观念中剔除每个人的特殊性"只留下"他們的共性"，我們就得到了人的观念。其次，"如果从"人"和"馬"的复雜观念中，剔除它們間藉以区别的特点，只留下它們間的相同点，由此形成一个新的、特殊的、复雜的观念，名之为"动物"，那末就得到更为一般的、包括人和其他各种生物的術語了。"〔註二〕

从洛克的这段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我們解决了哪些屬性是某一类对象中的一切对象共有的，哪些屬性只是某一类对象中的某些对象特有的这个問題，才能够‘留下共性’和‘拋棄特殊性’。可見，洛克的抽象論廻避了怎样分出反映在概念中的共同屬性的問題。这一理論只認定：只有在認識过程中分出共同屬性后，我們才能把共同屬性和非共同屬性区別开來，我們才能把一切屬性分成兩类：共同屬性类（被研究的一类对象中每个对象都有的），非共同屬性类（只是被研究的一类对象中某些对象特有的），然后，把共同屬性列入被研究的一类对象的概念內涵的構成中，而非共同屬性就从概念的內涵的構成中剔除出去了。

換句話說，洛克的抽象論，正如形式邏輯教科書中所敘述的抽象（不管是孤立的抽象或概括的抽象）的过程一样，实質上归結为从非共同屬性中分出共同屬性中的过程，这种抽象論的出發点是：我們分出和列入相当概念的內涵的構成中的屬性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我們能够从对象的其他屬性中分出这个屬性，知道它的名称（标明它的詞），也知道適合这个名称的內容。

但是馬克思主义以前的無論哪一种抽象論，甚至不能解决怎样分出（抽象出）我們还未認識的、不知道的、因而还沒有名称的对象的屬性这个問題。

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包括最先進的）抽象論，也不能解决感覚和知覚与思惟的复雜的相互关系問題。馬克思主义以前的、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觀察現象的唯物主义者，不是把感覚和思惟分割开來，把感性和理性分割开來（如霍布士），就是在本質上把它們混淆起來（如法國的唯物主义者把思惟看做特殊的‘包罗万象的感覚’）。例如爱尔法修寫道：‘人的知識永远不会多於感覚。一切感覚不到的东西，智慧也得不到。’〔註三〕这种論断顯然跟事实相矛盾。在科学中，往往必須証实不是靠我們知覚直接得來的原理。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不懂得，感性的知覚和思惟是相互密切联系着的，同时在本質上彼此又各不相同。換句話說，他們不懂得，这兩个認識階段是处在不可分割的辯証的統一中的。只有辯証唯物主义才能解釋以感覚和知覚为基礎的思惟怎样才能够

超越感覺和知覺，超越直接的材料，深入对象的本質，發現我們周圍的現实法則。

馬克思主义以前的概念形成理論所持的出發点是：抽象过程中所相互比較的屬性应当帶有感性（看得見、摸得到等等）。这些理論是以‘是白的’‘是大声的’‘是有味的’‘是大的’‘是綠叶的’等等屬性为例來研究抽象过程的。洛克本人也感到自己的抽象論的局限性。他提出了怎样从紅色和白色的比較中得到一般的色的观念問題，但得不到解决。根据他的抽象論，只有用捨棄不同屬性和保留共同屬性的办法，才能从所比較的对象中分出共同屬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感知到的也只是不同的色（紅色和白色）。捨棄了这种不同的屬性(紅的和白的)，我們永远也見不到‘一般的色’，因而也就不能形成‘色’这个概念，因为根据洛克的学說，列入概念的內涵的，只是一切所比較的物体的共性，而共性是我們在排除了不是所分析的一类对象中每个对象都有的屬性之后發現的。在排除兩种或几种不同色中的不同屬性以后，我們就永远發現不了它們一般的同类的屬性——‘色’的屬性。这个屬性和‘是白的’“是紅的”等等屬性不同，它是不可能直接感知到的。

無論是洛克，無論是晚近的唯物主义感覺論者，甚至不能提出抽出“抽象的屬性的問題，即抽出不能直接感知到的屬性”，如“是数”“有色”“有价值”等屬性的問題。他們通过是竭力迴避这个問題。正是由於不能解釋这个抽象概念的形成，洛克就背离了他的“感覺里沒有的东西，腦子里也不会有”这个出發原理。其实，象实体的观念、力的观念等等是不可能用經驗來直接解釋的，因为經驗所給予的只是力的表現，实体的表現等等。在这一点上，洛克的形而上学的思維方式表現得特別明顯，而且是洛克的唯物主义不徹底性的原因之一。

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抽象論都局限於研究抽出一般的感知到的屬性的問題，甚至沒有提出抽象出一般关系、一般依存关系、法則的問題。

上述理論的缺点被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用來反对唯物主义。例如，康德派（卡西萊尔〔四〕、胡薩尔〔五〕等人），批評並反对唯物主义的抽象論，他們說，抽象的过程，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

到抽象的过程，没有先於經驗的一般概念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他們認为，为了有可能相互比較單个对象，在做任何比較前就应当知道，什么是"相似的"和"相異的"；也就是説，在腦子里要有相似和相異的觀念。又如要按照某个共同标誌綜合一类对象，就应当預先在腦子里有單一和多数觀念等等。卡西萊尔在考察标誌間必然联系的关系的作用和許多其他关系时，得出下面的結論。他寫道："……因此，"概念"不是抽出來的，而是預先想好的；須知我們把概念的因素的程序和联系加在某些多样性上面时，就可假定概念已經存在，即使不是它的最后形式，那末也是它的基本职能。"〔註六〕

唯心主义者胡薩尔在其'新的'抽象論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結論。他説，必須确切地把思想的內容和每一个別情况下許多心理上的感受区別开來。这个內容是統一的，它把意識中的許多东西結成某个思想上的統一，它無非是一个一般的概念。按照胡薩尔的見解，这个一般概念的存在是經驗和科学的統一的必要条件。

类似的和抽象論有关的唯心臆造，我們常常会碰到，一切唯心的抽象論都曲解人認識周圍世界的实在过程。这些抽象論形而上学地把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具体的东西和抽象的东西、單一的东西和一般的东西对立起來，完全忽略了上述因素的統一藉以实現的实踐和語言在認識过程中的作用。根据辯証唯物主义这門唯一科学的哲学，就不难揭明这些理論的毫無科学根据和反动性質。

在帝國主义时代，資產階級力圖曲解科学的成就，唯心主义哲学家妄想复活老早被科学和实踐的發展的全部進程否定了的关於認識中共性的產生和性質的理論（如中世紀的唯实論和唯名論）。他們为了証实自己的"理論"，竟恬不知恥地捏造科学材料，利用蓬勃發展的和还研究不够的科学領域（如相对力学、量子力学、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数学証明論等等）來論証自己的反动臆造。

例如，馬赫派的唯心主义者和極端反动主义者罗素关於共相的問題还在其早期作品中就公开宣称，'現在我們維护的理論大体上就是柏拉圖理論的再版……'。〔註七〕他進而説道，'……因此，共相的世界可以描寫成不变的、嚴密的、精确的存在世界，可以描寫成使数学家、

邏輯学家、形而上学体系的創造者、一切热望生活改善的人向往的存在世界。’〔註八〕

帝國主义思想体系的特点就是一貫力圖唯心地歪曲这門或那門具体科学的內容，來为剝削階級服务。現时，英美帝國主义露骨地表現出强盜的、侵略的性質，这种傾向已有極廣泛的發展。另一特点是用从中世紀煩瑣哲学的武庫中剽竊來的哲学理論來武裝帝國主义的反动派。

辯証唯物主义第一次在哲学史上提供了关於概念形成和發展的科学的、徹底的理論。这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在哲学上第一次开始用唯一科学的認識方法——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观点來解決所有关於認識过程的問題，即周圍現实在人的头腦中的反映过程的問題。馬克思主义第一次指出，人的社会——歷史的实踐是全部認識过程的基礎，也是概念的形成和發展过程的基礎。馬克思主义还第一次揭示出語言和思維的眞正的相互关系，闡明了語言在認識过程中、在我們概念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馬克思主义教導我們說，我們認識的基礎是人們为了改变周圍現实而進行的实踐活动。恩格斯寫道：‘……人的思維的最本質和最密切的基礎，恰恰是人的改变自然界，而非單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慧的發展是和人学会改变自然的程度成正比例的。’〔註九〕

馬克思批判了空論家華格納認为人和自然的关系首先是理論的关系的見解。馬克思寫道：‘……人們決不是一开始就“与外界之物处於这种理論关系中的”。和所有动物一样，人們开始时只知道吃、喝等等，即还沒有“处於”任何关系之中，只是積極地行动，用行动來掌握某些外界对象，並以此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們是从生產开始的）由於这一过程的反复進行，这些对象“滿足人們需要”的能力便在人的头腦中被牢記下來，人們和野獸也就学会“在理論上”区别能够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对象和一切其他的对象。’〔註十〕

馬克思在这段話里面强調指出，人認識周圍現实的过程是在人們的社会——歷史的实踐的条件下進行的。这就是說，不能把实踐——我們認識的泉源和基礎——的作用归結为推动我們关於現实的知識發展的最初刺激物的作用，即簡單推动力的作用。人在实踐过程中發現他所利用

的物体的新方面，找出它們的本質的和共同的特点，形成关於它們的概念。

实踐是我們認識的标准。馬克思寫道：‘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对象的（即客观的——譯者）眞理性这个問題，决不是一个理論問題，而是一个实踐問題。人应該在实踐中証明自己思維的眞理性，即眞实性和威力，現实性。’〔註十一〕实踐是眞理的标准，它使我們終究能够区别眞理和慌言，能够与一切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的变种進行無情的斗爭。

列寧寫道：‘生活、实踐的观点应該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基本观点。它必然要到达唯物主义，而把大学教授的煩瑣哲学的無限妄想拋在一边’。〔十二〕

在抽象形成的过程中，和在人的全部思維形成和發展的过程中一样，語言起着巨大的作用。

馬克思主义教導我們說，語言是在人的劳动过程中和思維一起產生的，它对人的思維的發展有重大的意义。它帮助人类从动物界划分出來。斯大林在其天才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揭露馬尔語言学說的反科学性时寫道：‘有声語言在人类歷史上是帮助人們从动物界划分出來、結合成社会、發展自己的思維、組織社会生產、和自然力量作勝利斗爭並达到我們今天所有的進步的力量之一。’〔註十三〕

語言是人們交际的極其重要的工具。斯大林指出：‘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註十四〕語言的基本交际職能还直接确定了語言的其他許多对於人类社会極其重要的屬性：語言是構成思想和表达思想的工具，是巩固人們的經驗的工具。斯大林寫道：‘語言是直接和思維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維活动的結果，認識活动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巩固起來，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註十五〕

語言和思維之間存在着有机的統一：任何思想如果沒有相应的‘物質外殼’都不可能產生。

斯大林就这一点寫道：‘不論人的头腦中会產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產生，它們只有在語言的材料的基礎上，在語言的術語和詞句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存在。’〔十六〕这就是說，思維这一

反映現实的事物中一般和本質的东西的过程，間接認識現实的过程，只能随同語言的產生而產生。所以，語言的存在始終都証明語言所表达的思想中的一般的东西的存在。

我們在本文中只涉及所有和抽象論有关的問題中的一个問題，即根据对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的分析，我們來說明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家是怎样解决从个别物体中分出、抽出我們不能靠知覚直接得到的屬性的問題的。和所有馬克思主义以前的理論不同，我們將要考察的是：怎么抽象出（分出）我們还不知道的、沒有一定名称的、沒有物質外殼的屬性，这些屬性的發現和抽出对於对象的科学概念的形成極为重要。

*　　*　　*

概念是关於对象的思想，它反映对象的共同的和本質的屬性。分出（抽象出）我們研究的一类对象中每个对象都有的共同屬性，是概念形成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关鍵。例如，‘人’这个概念反映如下几个共同屬性：是哺乳动物，能制造劳动工具，能說話等等。‘人’这个概念是一般的概念。一般概念反映我們研究的一类对象中每个对象都有的共同屬性，而对形成單一的概念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分出那些僅为某一个别对象特有的而不是任何其他对象所有的屬性。例如，在‘苏联’这些个單一概念的內涵中反映如下几个屬性：是一个工農的國家，是一个勝利了的社会主义國家，國土占大陸面積六分之一，首都是莫斯科市等等，也就是說，这个概念首先反映所有那些能把我們所思考的对象（‘苏联’）和一切其他的对象区别开來的屬性。在‘白’这个抽象概念中，我們是把从个别的物質的对象中分出來的（抽象出來的）白的屬性当作独立的对象來思考的。因而，在任何概念形成时，我們总要和分出、抽象出物体的屬性發生关系。这些屬性有多有少，它們間的关系有繁有簡，但在任何場合下，要形成概念，就必須把屬性从体現这种屬性的具体东西中分出（抽象出），把一个屬性从其他一切屬性中分出（抽象出）。从具体东西中抽象出的屬性反映在这个或那个概念中。

共性的抽象过程，比起在上面提到的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抽象論中要复雜得多。我們就以馬克思主义对价值概念所作的分析为例來

說明共性的抽象过程的全部复雜性。首先我們研究概念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是和分出我們所研究的一类对象中每个对象都有的共同屬性相联系的。这些共同屬性是以一般概念的形式反映在我們的头腦中的。然后我們再研究已經形成的概念的發展过程，並說明起初和詞的意义实質上相符合的概念如何在后來变成科学的概念。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中說明了价値这个概念是怎样出現的。为了弄清楚这个問題，他首先分析商品交換。馬克思指出，‘成为价値’的屬性和‘价値’这个概念，只有在研究商品相互交換时所發生的那些关系的基礎上才能分出。大家知道，尽管各种商品的性質不同，但它們在交換过程中是彼此相等的。这里就產生了一个問題：使兩种性質上根本不同的商品建立起相等关系、比較关系的共同物是什么呢？

馬克思詳細地研究了这个問題。他寫道：‘拿兩种商品，例如拿小麥和鉄兩种商品來說。不論它們的交換关系如何，这种关系总可以由一个等式來表示。在这个等式中，已知量小麥和一定量鉄相等，例如一卡德小麥＝a公担鉄。这个等式說明了什么呢？它告訴我們，在这兩种不同的物品中，即一卡德小麥和a公担鉄中，有某种等量的共同物。可見，——馬克思做出了一个結論——这兩种物品必等於某一第三物，而这第三物本身既不是小麥也不是鉄。’〔註十七〕

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济学批判’一書中寫道：‘普罗培休士的一卷哀歌和八盎斯鼻菸可以成为同等的交換价値，尽管鼻菸和哀歌的使用价値各不相同。作为交換价値來說，前一种使用价値和后一种使用价値是能够相等的，只要兩者間有正確的比例。一座宮殿的交換价値可以用若干箱的鞋油來表示。反过來說，倫敦的鞋油工場主也可以用宮殿來表示若干箱鞋油的价値。’〔註十八〕

其次，馬克思說明了这种第三者即各种不同的相互交換的使用价値的共同物是什么。这种共同物就是商品的价値。

馬克思寫道：‘所以，这个表現在商品交換关系或交換价値上的共同物，就是它們的价値。’〔註十九〕

馬克思研究了怎样才能解釋科学中价値这个概念的產生問題，从而

也說明了如何分出共同屬性、形成概念以及在人認識周圍現实的过程中形成概念的条件是什么等問題。

要分出新的、我們还不知道的屬性，只有去發現和分析存在於我們所研究的对象間的一定关系。这些关系的特点就是：它們和人的实踐直接相联系，直接参与人的实踐活动。例如，要分出价値的屬性和形成价値这个概念，只有当人們开始互相交換商品时，換句話說，当人們开始在实踐中实現商品間的交換关系时，才有可能。当交換極其普遍时，当人們知道任何商品都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和其他任何商品進行交換时，我們才能發現在按照一定数量的比例相互交換的一切商品中存在着某种共同物。在总和的或擴大的价値形态的条件下（当z量商品A＝u量商品B，或＝v量商品C，或＝w量商品D，或＝x量商品E，或＝其他等等时），还不能作出一切商品能按照一定的比例相互交換的結論，因而也就不能作出在一切商品間有某一种共同物的結論，那末在簡單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値形态的条件下（当若干量的种商品和若干量的另外一种商品偶然交換时），就更不必說了。要做出这样的結論只有当一般价値形态占統治地位时，也就是說，当一定量商品在交換时表現为若干量其他一切商品的等价物时，才有可能，例如：

一件上衣＝
十磅茶＝
四十磅咖啡＝
一卡德小麦＝　二十碼麻布
二盎斯黄金＝
其他＝

由此可見，以二十碼麻布作为等价物的一切商品都能相互交換（如果一件上衣能和二十碼麻布交換，十磅茶也能和二十碼麻布交換，那末这就是說，一件上衣就能和十磅茶交換，余此类推）。

因此，抽象出一定屬性的过程，分出共同物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实踐而实現的，人在实踐过程中实現着我們所研究的物体之間的某些**关系**。

这就是說，在說明某一个反映感知不到的屬性的概念怎样形成时，

我們首先必須分析这种概念由之抽象出來的那些对象之間的关系，並善於分出那些在人的直接实踐活动中实現的关系。

这就是說，为了形成关於某些对象的概念而去研究这些对象时，我們就必須从它們和其他对象間的一切相互联系（这些联系是在人类实踐过程中实現的）方面去考察这些对象。

馬克思又用另外一个例子來說明一般概念的形成过程。假定我們要确定塊糖的重量，也就是說，我們要分出塊糖重的屬性，同时要捨棄塊糖除了重的屬性以外的其他一切屬性。究竟怎样抽象出这种屬性呢？馬克思寫道：‘塊糖是物体，所以是重的，有一定重量的，但我們不能目視也不能手触塊糖的重量。於是，我們就采用几塊重量已經預先确定的鉄塊。鉄的物体形式，如果單独地加以考察，和塊糖一样，也不是重的表現形式。不过，要把塊糖表現为重，我們可以使它和鉄發生重量关系。在这种关系上，鉄这种物体只表示重，不表示别的东西。鉄的量因而是塊糖重量的尺度，对塊糖这种物体來講，鉄的量只是重的具体表現或重的表現形式。鉄所起的这种作用僅僅限於鉄和塊糖或其他等待計算重量的物品間所發生的关系的范圍之內。如果不是兩个物品都有重，那末它們就不能發生这种关系，並且其中一个物品就不能表現另一物品的重。’〔註二十〕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發現重的屬性，为了分出（抽象出）这种屬性，我們也必須确定糖和鉄塊之間的某种关系，即平衡关系。这种关系在分出重量的屬性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形成‘重量’这个概念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是和人的实踐活动直接相联的（正象价值概念形成时商品相互交換的关系一样），通常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实現的。同时馬克思又指出，屬性是客观地存在於我們所比較的对象本身中的，屬性不是由对象相互間的关系產生的，也不是因为人开始去研究这些对象而在对象中產生的。馬克思寫道：‘……一物的屬性不是由該物对他物間的关系產生出來的，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顯露出來的。’〔註二十一〕

馬克思所談的关於分出共同屬性、形成概念的方法，是有極普遍的性質的。比方說，每一个人也就是用这种方法得到人的概念的。

馬克思寫道：‘在某种意义上，人是和商品一样的。人到世間來，沒有携帶鏡子，也不象菲希特派的哲学家一样，說“我是我”。人最先是以别一个人反映他自身。彼得这个人所以認識自己是人，最先是因为他認識保罗这个人和自己相同。同时，体膚完整的保罗，对彼得來講，便成了“人”这种物种的表現形式了。’〔二十二〕

可見，人通过自己和别人的比較形成人这个概念，同时和别人發生一定关系，这种关系是由实踐的需要引起並在这一实踐的过程中实現的。用这种方法分出來的以前不知道的屬性用一定的‘物質外殼’即名字巩固下來。这样產生的意思，如果沒有詞的外形，便不能存在。因此列寧从費尔巴哈論布萊尼兹一書中摘出的一段話是意味深長的：‘感覺提供对象，理性提供对象的称謂……称謂是什么呢？区别的記号，即某个惹人注目的标誌，我把这个标誌当作說明对象的对象代表物，以便完整地思考对象。’列寧把費尔巴哈的这种說法标上这样的字句：‘說得好（Biendit）。’〔註二三〕

上述的未知共同屬性的抽象方法和某个屬性由之抽出的对象的概念的形成过程，不單是政治經济学特有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运用的方法是辯証方法在一定的个别場合中的运用。辯証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为辯証法的法則（运动、变化、發展、对立的斗爭等）到处都存在。

我們举一个数学上的例子。假如我們來說明‘成为五这个数’的屬性是怎样分出來的，数字‘五’这个概念是怎样形成的。

假定我們有由五个对象構成的A这个数。要抽出說明这个数的数量方面的屬性，同时要形成‘五’这个数，就要象在前面考察的情况下那样，使这个数和其他的数發生一定的关系。必須把和A这个数相等的其他数分出來。这是不难做到的，即使不会計算也做得到。这是用建立数之間相符合的关系达到的，而这种符合是在人的直接实踐活动中实現的。

我們可以举出兩个相符合的数做例子。假設我們知道室內每把椅子上都坐着人，空椅子一把也沒有，那末这就是說，在这个室內，椅子数和人数是相符合的。总之，如果在各个数之間有相符合的关系，这就是

說，它們是相等的。譬如，若我們知道电影院內所有的座位都坐着观众，沒有坐不到位子的觀众，那末，即使不知道电影院內觀众和座位的数目，我們也能断定，这兩个数（电影院內觀众的数目和座位的数目）是相等的。

要确定A这个数的成員数目，要分出这个数的数量的屬性，必須用建立相符合的办法把和A这个数相等的其他数取出來。如A这个数等於一雙手的手指数目，等於‘число’一字的字母数目，等於一个五角形的边的数目等等。顯然，在所有性質上不同而在数量上彼此相等的数中存在的共同的东西，也是A这个数和每一个在数量上与其相等的数的数量上的特征。用这种方法分出的A这个数在数量上的特征（屬性）便取得一定的名字，一定的‘物質外殼’；在这种場合下，这个特征便用数字五來标明。

数目的歷史概念（計算的邏輯基礎）就是靠实踐中各个不同的数之間相符合的建立而產生的。和别的一切数相比較的起初的数往往是人的手指和足指。不难表明，数学上的其他概念，比如‘圖形’‘方位’‘体積’等概念也是这样形成的。〔二四〕

恩格斯在說明数目和圖形的概念时寫道：‘数目和圖形的概念完全是从現实世界中得來的。人們最初用十个指头学計算，就是說，作第一次的算術演算，这十个指头無論如何总不是理性自由創造出來的產品。要作計算，不但要有被計算的对象，而且要有在考察这些对象时撇开其数目以外的一切其他屬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長久的歷史發展和經驗的產物。不論是数的概念或圖形的概念同是得自外面世界的，而不是在头腦中从純粹的思維產生出來的。’〔二五〕

可是，未知的、沒有被認識的屬性的抽象过程和相当的概念的形成过程是按下面方法產生的。要分出我們所研究对象的新的、未知的屬性，我們就要实际地剖析这些对象，分出我們实踐过程中实現的这些对象和其他对象的关系。这些关系总是一种相等的关系（互換性、相符合等）。發生这种关系的对象之間所存在的共性，是我們探尋和抽象的內容（共同屬性）。这种共同屬性反映在相当的概念中並用一定的‘物質外殼’即詞巩固下來。我們会看出，客观存在的对象的性質决定它們可

能發生的那些关系。我們所抽象的共性，不是在抽象过程中產生的，而是在我們周圍世界的个别物体中存在着的。

总之，概念的形成过程，經过我們思考分出共性的过程，都要我們从事於滿足我們需要的实踐活动，在这一活动的过程中，我們就在我們認識的对象即客观世界的事物之間建立一定的关系。人只有靠实踐才会知道，在个别的、單个的对象中存在着某种共性。这种共性就为人所分出、認識並列入对象的相当的概念的內涵中。

因此，馬克思在闡明价值概念的形成时，先从分析只是人的实踐活动过程即生產过程中才实現的关系开始，从商品交換关系开始，这決不是偶然的。

从所研究的对象中發現和分出共性是这些对象的概念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关鍵。概念是用詞巩固下來的。某个人能使用‘貓’‘馬’等等这些詞，就証明他有了关於这些动物的相当的概念，証明他能够把这些动物和一切別的动物区別开來。但有些人只憑純粹外部的共同特征（顏色、形狀等等）來区分人和动物，另一些人則憑說明这些动物在生物学分类中的地位的本質特征來区分人和动物。在前一种場合下，我們还沒有和科学的概念發生关系，实質上这只是和詞义相同的概念；在后一种場合下，我們就会得到科学的概念。分出（抽象出）共同屬性並用一定的詞即一定的‘物質外殼’把它們巩固下來，只是一般概念形成中的最初的、开始的階段。接着就开始了科学概念形成的第二个階段，揭示內容、揭示我們所要抽象出的共同屬性的本性和本質的階段。在这个階段上，对我們重要的是从共同屬性中分出本質的、决定性的屬性。如果概念形成的第一个階段和第二个階段不是同时發生，那末在第一个階段上所獲得的結果在許多場合下就会失去任何意义。

在概念形成的第一个階段上，概念的內涵还很貧乏，我們只知道，这个概念屬於哪一类对象，在什么条件下它才出現，它和所研究的对象之間的哪些关系有直接的联系等等。但这个概念还远未揭示出我們所研究的对象的本質。只有在概念形成和發展的第二个階段上才產生加深其內涵的过程。在研究的進程中，思想不是一下子就能發現对象的全部內容，而是‘从現象到本質、从比較不深的本質到比較深的本質’。〔二

六〕

馬克思就是在分出一切彼此交換的商品都有的共同內容之后，才揭示这个內容，丰富和發展了价値的概念。馬克思作了上述分析之后下了一个結論：这个共同內容（价値）就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劳动量是‘由劳动时間即工作时間来衡量的’。〔二七〕

上述概念的發展的兩个階段是互相極其密切地联系着的。由於用上述方法形成的概念的正确發展，由於这个概念內涵的積累，概念最后就能反映出对象的本質特点，成为科学的概念。

亞里斯多德原先認为在相互交換的对象之間存在着某种共同物，但后来不得不放棄这个思想。这是由於亞里斯多德不能从概念形成的第一个階段，抽出共同屬性的階段，進到第二个階段，揭示这个屬性的內容、本性的階段。亞里斯多德不能揭示那个存在於相互交換的商品中的相等东西的內容（这是有純歷史原因的），他根本不去看在性質不同的、相互交換的商品（例如，五張床和一間屋相交換）中有任何同一的东西。馬克思摘出亞里斯多德寫的这一段話：‘“这实際上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同种的物品是不能公約的”，即不能在質的方面相等。这种均等只能是和物的眞性質不同的东西，僅僅是“滿足实際需要的人为的手段”。

这样，——馬克思繼續寫道——亞里斯多德自己告訴我們，是什么使他不能進一步去分析（即分析交換。——作者）：那便是沒有价値这个概念。是什么等一物或共同实体使屋能在床的价値表現中表現床呢？亞里斯多德說，这是“实際上不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必須屋代表二物（床和屋）內現实的等一物，它才对於床是代表一个等一物。並且，这就是人类劳动。’〔二八〕

亞里斯多德只实現了价値概念形成中的第一个階段，他只从相互交換的商品中分出共同物，但亞里斯多德不能揭示这个共同物的本性，它的本質特征，因此，他得出結論說，共同物是不存在的。馬克思对亞里斯多德的关於相互交換的商品中存在着共同物的最初假定給予了極高的評价。他寫道：‘亞里斯多德能在商品的价値表現中發現一种均等关系，这是他的天才的閃耀。’〔二九〕

必須指出，有时从概念形成的第一个階段進到第二个階段需要很長的时間，只有經过一段長时間之后，概念才达到科学的概念的成熟程度，这取决於社会生產实踐的發展水平，取决於科学的發展和其他的歷史原因。例如，重量（一切对象在平衡关系中都具有的共同物）这个概念在奴隸社会里就有了。但是只有在十七世紀才出現了重量这个科学概念，因为那时資本主义关系發展了，貿易、航海、手工工場隨着發展了，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及其他科学也隨着繁荣起來了。牛頓和伽利略的研究在自然科学的这一長足發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牛頓的功績在於他揭示出重量这一引力結果的本性。正是从这时起才談得上產生了重量的科学的概念，但这决不是說，重量的本質就已被徹底揭示出來並被完全認識了。相反地，重量概念的內涵在后來被不斷地充实起來。

上面我們用具体的例子考察了抽象的形成过程，确立了这个構成列寧反映論的重要部分的过程的若干有規律的和特殊的特征。作为認識基礎的实踐的作用不僅僅限於：人的实踐活动、人的实际需要是我們知識增長的强大和有决定性的刺激物。实踐在概念形成的过程中，在我們的知識从感性發展到理性的过程中起着特別重大的作用。研究了这些問題，我們就会明白，我們的認識过程是多么的辯証，把辯証法运用於我們認識的过程以闡明这一过程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階段是如何的重要。从被研究对象的相互依賴和制約中、从它們的相互关系中來考察它們，是抽出共性的必要条件。

斯大林在闡明辯証法的第一个特征时寫道：‘……辯証法認为自然界中任何一种現象，如果把它孤独拿來看，把它看做是和其周圍現象沒有联系的現象，那它就会是不可了解的东西，因为自然界任何部分中任何一种現象，如果把它看做是和周圍条件沒有联系的現象，看做是和它們隔离的現象，那它就会是毫無意义的东西；反之，任何一种現象，如果把它看做是和周圍現象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离的現象，把它看做是受周圍現象制約的現象，那它就是可以了解、可以論証的东西了。’〔三十〕

在人的实踐活动中实現的、共同屬性分出前的那种相等的关系中，我們能够揭示辯証法的各种要素：同一和差別的辯証法、必然性和偶然

性的辯証法、个別和一般的辯証法。只要提起馬克思以偶然的、擴大的和一般的价値形态为例对商品的交換关系所做的極深刻極全面的分析，就足以說明这一点。概念的發展服从辯証法的所有法則，服从我們認識發展的全部規律性，我們認識發展的过程是从現象到本質、从比較不深的本質到比較深的本質的。概念發展的过程和我們整个認識过程一样，也是这样复雜矛盾的过程。概念經常变化、發展，並更深入地反映我們周圍世界的相当的对象，从而反映这些对象發展的辯証法、它們的运动、变化、从旧質到新質的过渡和內部对抗的力量和趨勢的斗爭和統一。同时概念形成的可能性、概念轉化为科学的概念的可能性这件事实本身，只有依靠辯証法、根据对人的社会生產实踐的条件的具体歷史的研究才能得到說明。因此馬克思对价值形态的分析有極大的意义。这个分析表明，在商品生產但还不是資本主义生產的条件下，在相互交換的商品中还只能分出共同物（如亚里斯多德所做的那样）。至於价値的科学的概念，只有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义生產的条件下才能產生。

总之，只有根据辯証唯物主义的觀念、辯証法的觀点，才能正确地闡明和理解分出共同屬性的过程、科学的概念的形成和發展的过程。

（周亮勳、顧錦屏譯自苏联‘哲学問題’雜誌一九五二年第四期）

〔註一〕、馬克思 ‘費尔巴哈論綱’（見恩格斯著‘費尔巴哈与德國古典哲学的終結’，解放社版第九十九頁）。

〔註二〕、洛克：‘人类悟性論’，一八九八年俄文版第四〇六——四〇七頁。

〔註三〕、爱尔法修：‘关於人、人的智力和人的教育’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四四一頁。

〔註四〕、卡西萊尔（一八七四——一九四五），德國新康德主义馬堡学派哲学家。—— 譯者。

〔註五〕、胡蕯尔（一八五九——一九三八），德國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譯者

〔註六〕、卡西萊尔：‘認識与現实’，一九一二年俄文版第二十九頁

〔註七〕、罗素‘哲学問題’，一九一四年俄文版第六十七頁。

〔註八〕、同上，第七十四頁。

〔註九〕、恩格斯：‘辯証法与自然科学’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十九頁。

〔註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五卷四六一頁。

〔十一〕、馬克思：‘費尔巴哈論綱’（見恩格斯著，費尔巴哈与德國古典哲学的終結’，解放社版第一〇〇頁）。

〔十二〕、列寧：：‘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人民出版社第一七版頁。

〔註十三〕、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十六頁。

〔註十四〕、同上，第二十頁。

〔註十五〕、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 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頁。

〔註十六〕、同上，第三十八頁

〔註十七〕、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九頁。（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註十八〕、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一九四九年俄文版第十二——十三頁。

〔註十九〕、同十七第十頁。

〔註二十〕、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三十四頁。

〔註二一〕、同上。

〔註二二〕、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二十九頁。

〔註二三〕、列寧：‘哲学筆記’，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三二〇頁。

〔註二四〕、見雅諾夫斯基‘論所謂“通过抽象”的定义’一文，一九三六年俄文版数学哲学論文集。

〔註二五〕、恩格斯：‘反杜林論’一九五一年三联書店版第三十四——三十五頁。

〔註二六〕、列寧‘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一九四九年解放社版第一八六——一八七頁。

〔註二七〕、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十頁。

〔註二八〕馬克思：‘資本論’版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三十七——三十八頁。

〔註二九〕、同上，第三十八頁。

〔註三十〕斯大林：，‘列寧主义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七〇五頁。

論概念的灵活性和确定性

伏·斯捷普科夫斯卡婭

概念的形成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問題經常引起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注意。它始終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兩个哲学上对立派别激烈斗爭的焦点。馬克思列寧主义哲学在歷史上第一次眞正科学地解决了这个問題。

唯心主义不能正确地解决概念本質的問題，因为它从自己的精神和思維是第一性的原理出發，便会否認概念反映的是現实世界事物的实在的联系和关系、屬性和性質。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認为，决定概念的內涵的不是單純的、脫离現实世界的思維的活动：概念不是思考的人們的主观随意活动的結果，而是現实在人的思維中反映的結果。但是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甚至其最优秀的代表——我國哲学古典著作家，也不能科学地解决概念的問題。要眞正科学地解决概念本質的問題，單是承認概念是对象及其联系的映象，概念有客观的实在內容是不够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著作家指出，認識是現实的复雜而矛盾的反映过程，不是現实的簡單的鏡子般的反映。因此，要解决概念的本質和作用問題，就不僅应当考慮到概念內涵的客观性，而且应当知道反映事物的客观的联系和关系、屬性和性質的某个概念的內涵是怎样形成，以后怎样变化和發展的。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不能解决的正是这个問題。正如列寧所指出的，要解决这个問題，就必須把辯証法运用到認識論上去。只是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著作家才第一次指出，認識是一个从活的直观到抽象思維、再从抽象思維到实踐的过程，人在鄭重的正确的抽象中可以深刻地認識現实的客观規律性。

馬克思主义哲学闡明了，从感覺到思想的过渡是辯証的，是通过飛躍進行的。从感覺到思想即从活的直观到抽象思維的飛躍是从反映現象

到反映現象本質的过渡。和思維密切联系的感官只能認識事物的个别的屬性和性質。概括靠感官得來的材料的抽象思維才能認識事物的本質。

人任何时候也不能詳尽無遺地、完全地、一下子認識永远發展着的現实中的事物的本質。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結論，如不可知論者所說的那样，世界是不可知的。这种論断是有階級背景的。輕視理智的作用就会否認社会、發展法則的可知性，而这只对剝削者有利。

和唯心主义相反，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根据科学的材料，承認世界及其規律性的可知性，認为我們关於自然法則的那些已由实踐檢驗过的知識是有客覌眞理意义的确实知識。

从活的直覌到抽象、从感覚和表象到反映本質的概念的認識运动，是我們知識深化的过程，是从不認識到認識、从对客覌世界的比較不准确的反映到比較准确的反映的过程。任何一个从現象到本質的过渡都是复雜的、有矛盾的、列寧說：‘認識是思維对客体的永远的、無終止的接近。自然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必須了解为不是“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沒有运动的，不是沒有矛盾的，而是在运动的永久过程中，在矛盾的產生和解决的永久过程中。’〔一〕这些矛盾之所以發生，是因为人的思維不能一下子抓住並在概念中完全反映出不断發展的現实中的对象的本質。在認識过程中，思維从一个抽象轉到另一些抽象，愈來愈接近眞理。

大家知道，原子这个概念在古代就已形成。至十九世紀中叶，原子被看成是物質的絕对不可分割的和不变的質点。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物理学家的最新的科学研究和發現与原子的上述定义發生了矛盾，因此，必須重新審定这个原有的定义，並另下一个適合最新的科学發現的定义。新的科学材料断定：原子只是在化学方面是不可分的。这就是說，沒有比原子更小的化学元素了。但原子是复雜的物質体系，它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改变自己的屬性是由物理条件及其列入何种体系來决定的。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認識現象的本質是从揭示其不深的本質到揭示其比較深的本質，从揭示其比較深的本質到揭示其更深的本質，等等。对原子的研究过程在每一認識上並不終止，而是繼續下去，

更深刻地揭示現象的新的、更新的方面。

概念是反映現实的一种形式。关於对象的眞正概念包含許多特征，这些特征是对象的一定的实在的屬性和性質在人的思維中的反映。馬克思寫道：‘観念現象不过是被移置於人类头腦中並在人类头腦中改造过的物質現象而巳。’〔註二〕

列寧强調概念內涵的客観性，同时指出概念的內涵和概念所反映的客観世界是不完全一致的。概念是客観事物的主観映象，但它們不是絕对的，不是和对象形而上学地一样的，而是和对象有区别的。

概念是在概括感性材料的基礎上形成的。在概念形成的过程中，人撇开对象中非本質的屬性，概括对象中本質的、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屬性。

从感性材料轉到抽象的过程中，思維不僅不离开事物的本質，相反地，而是愈來愈深入事物的本質。列寧寫道：‘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思維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眞理，而是接近眞理。物質的抽象、自然法則的抽象，价値的抽象等等，一句話，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註三〕

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經济学批判”導言’中指出，人的思維从具体东西出發而归至最初只包含表現在最簡單定义中的一般东西的抽象。但是思維不能停留在最簡單的定义上，它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具体的現实和实在的对象上去，以便揭示对象的更深刻的特点，揭示其多种多样的特征、方面和关系。只有在这种思想活动的过程中，‘关於整体的雜乱的表象’才能为‘含有許多定义和关系的丰富的总和’所代替。

斯大林在其天才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全面地指出，文法是思維長期抽象化活动的成果，是思維所獲得的巨大成功的指标。

概念同样是思維長期抽象化活动的成果，是人类思維獲得的巨大成功的指标。大家知道，科学共產主义这个概念是經过几百年之后形成的。斯大林說：‘人类的思維只是在經歷許多磨难、痛苦和变化之后，才科学地研究出和論証了社会主义。’〔註四〕

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論在馬克思主义以前統治了一段很長的时期。空

想社会主义者不竭力去認識歷史發展的法則。他們脫离现实生活，幻想在沒有現实可能性的情况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者，如罗柏特·欧文、路易·勃朗、傅立叶及俄國的‘土地与自由党’、‘民意党’的代表人物，期望統治階級相信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性並願意去了解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空想社会主义者想用制定法律和發表各种宣言的办法創造人間的幸福生活。他們看不見日益高漲的工人运动，不了解無產階級这个唯一徹底的革命階級的歷史作用。由此，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論是得不到效果的。

唯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正确估計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並作出下列結論：工人階級的解放只是工人階級自身的事業。

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了共產主义的科学概念。列寧和斯大林發展並丰富了这个概念——科学共產主义的理論。

現时，社会主义已从幻想变成了現实，苏联劳动者正在不屈不撓地建設共產主义社会，在偉大共產主义的建筑工程上進行忘我的劳动。这就在实际上証实了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科学共產主义概念的正确性。

* * *

对認識說來，最重要的是揭示事物中特殊的、本質的、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屬性和性質。要深刻而正确地認識对象，这就是說，首先要揭示对象的本質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馬克思主义反对‘一般’議論，反对空洞的一般定义，而要求在确定科学的概念时从事实、从实在的本質联系出發，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事物才能作为許多客观的屬性和关系的丰富总和反映在概念中。只有反映出客观的屬性和規律性，才能揭示事物的發展的趋势。具体地分析客观現实，就能揭示事物的發展的趋势，不从具体分析客观現实出發，就会做出不正确的、不科学的和荒誕的抽象。考茨基的‘超帝國主义’論就是这种抽象的例子。

列寧在反对这种理論时指出，帝國主义發展中的这样的階段即超帝國主义是抽象地想出的。实际上这是脫离社会的現实發展的，因为，資本主义朝着一个全世界的托拉斯的方向發展，但‘在其未达到一个全世界托拉斯以前……帝國主义必然会崩潰，資本主义就会变成和自身相反

的东西’。〔註五〕

可見，列寧非但不以看出抽象的一般的趨勢而了事，並且進一步地具体分析資本主义發展的本質和前途、資本主义的錯綜复雜的关系的具体表現，並指出这个一般的趨势实际上是不能实現的。

正确反映現实的眞正科学的概念是以事物的具体的实在屬性为基礎的。这些概念的內涵，或者由对象固有的本質的屬性和性質决定，或者由对象的發展过程中实际上会必然地、有規律地產生的屬性决定。对現象的具体分析不僅能揭示出現象的这样的特征，即能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表明現象的特征，而且能揭示出可以帮助我們看出現象發展的趨势和預見事变的以后進程的特征。因此，只有对現象的具体分析才能成为人的科学預見和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礎，才能成为反映事物的这些或那些本質方面的眞正科学的概念的形成的基礎。

列寧要求包含确定不移的必然性的概念具有灵活性，这个要求是以唯物辯証法关於抽象的眞理是不存在的，眞理永远是具体的这个極重要的原理为出發点的。

概念的內涵能隨着条件而变更，因此思維中就能正确地反映出永远变化、發展和更新着的世界。

列寧教導我們說，只有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發展着的物質世界的全面性和矛盾的統一的灵活性，才能正确地反映物質世界。主观地运用的概念灵活性，即不反映物質世界在其实在的运动和發展中的全面性和統一的灵活性，就必然淪为折衷主义和詭辯論。

盧森堡关於民族战爭轉变为帝國主义战爭的議論就是主观地运用概念灵活性的例証。盧森堡認为，在帝國主义时代，任何民族战爭都必然要轉变为和自身相反的东西，轉变为帝國主义战爭。因而‘民族战爭’这个概念和‘帝國主义战爭’这个概念就被混淆了，从一个轉到另一个了。

列寧在其名著‘論尤尼烏斯的小冊子’中批評盧森堡时指出，这样的‘概念灵活性’是主观的灵活性，是不反映現象的客观發展的灵活性。

列寧說，民族战爭当然可以轉变为帝國主义战爭，反之，帝國主义

战爭也可以轉变为民族战爭，如法國資產階級的革命战爭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只有詭辯論者才会以一种战爭可以轉变为另一种战爭为理由，來抹殺帝國主义战爭和民族战爭之間的差別。

抹殺有轉化趋势的各現象之間的界限，是走向詭辯的桥梁。列寧說：‘但我們始終是辯証論者，我們和詭辯論作斗爭的手段，不是一般地否認任何轉变的可能，而是对某个事物就其环境及發展作具体分析。’〔註六〕

在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著作家的不朽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概念的眞正灵活性的范例。

列寧在解决‘革命’和‘改良’这兩个概念的相互关系問題时寫道，毫無疑問，改良这个概念是和革命这个概念相对立的，忘掉这一点，忽視把这兩个概念划分开來的界限，就一定会犯嚴重的錯誤。但列寧隨着又强調指出：‘这个对立不是絕对的，这个界限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可动的，必須善於在每个具体的場合中判定这个界限。’〔註七〕这里列寧卓越地运用后來在‘再論職工会’的著作中所表述的原理，即决不能以那些最平常的判断为限，而应当向前推進。的确，列寧在指出了改良和革命的一般的对立以后，立刻加以進一步的發揮，指出不僅須要具体考察問題，而且在考察时要断定这种对立可以轉化並正在相互轉化。

斯大林在其‘論列寧主义基礎’这一著作中天才地从理論上論証了並創造性地發展了列寧主义，繼續了列寧的分析，並且指出，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必然变为巩固資產階級政权的手段，瓦解革命的手段。而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权存在的同一条件下就要‘变为瓦解資產階級政权的手段，巩固革命的手段，向前發展革命运动的支撑点’〔註八〕

斯大林着重指出了在改良主义策略下和在革命策略下改良这个概念的內涵和意义是不同的，並表明了在帝國主义条件下革命地利用改良和妥协的实質，揭穿了改良主义策略的实質。

斯大林还指出，在帝國主义推翻之后，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改良和革命的相互关系問題就有些改变。在某种条件下，在一定环境中，無產

階級政权也許不得不暫时放棄用革命手段改造現存制度的道路，而采取改良和向非無產階級讓步的道路，但这样做只是为了給革命以暫息时間，为了养精蓄銳，准备新的進攻。斯大林說：‘不可否認，这种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說來是“改良主义”的道路。不过应当記住，这里有一个根本特点，即在这种情形下的改良，是从無產階級政权方面出發的，它巩固無產階級政权，它給無產階級政权以必要的暫息时間，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無產者階級。

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改良就变成和改良相反的东西。’〔九〕

列寧和斯大林的上述說法給我們提供了应如何考察对立的概念間的关系，应如何估計实际活动、社会發展的結果和認識的結果的范例。

全面估計具体环境的特点是正确运用概念的首要的基本条件。真正科学的概念的灵活性表現在：科学的概念的原有內涵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在一切实际生活情况下都是一样的，科学概念的內涵是根据新的科学材料和新的具体歷史現实而改变和丰富的。改良和革命这兩个概念不是一般地对立的，而只是在一定的具体歷史条件下才是对立的。旣然自然和社会中現象的界限是有条件的、可动的，因此反映这些現象的概念也是灵活的。

如果概念不是象其所反映的客观現象那样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約的，如果概念在人类实践的向前發展進程中不会改变和發展，那末人的認識就無法向前推進。辯証法‘对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主要是从它們相互联系中、錯綜中、运动中、生滅过程中去理解的……’〔註十〕，这不是偶然的。

关於对象的概念所以改变，是因为对象本身随着条件的变更和按照發展的自身規律性在根本改变着，是因为我們关於对象的知識在人类社会歷史实踐过程中在擴大、深化着。內涵上凝固不化的概念是不能把握客觀的發展过程的。

列寧对‘群众’这个概念的分析樹立了辯証地对待概念的光輝榜样，这一分析具体表明，群众是什么，群众在不同的社会歷史条件下，在不同时期內要解决的任务是什么。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列寧在共維护共產國际的策略的演說中指出

了‘群众’这个概念怎样随着革命斗爭的性質和規模的改变而改变。当革命运动發生和增長时，‘群众’这个概念是这样的，但当革命已有了充分准备时，这个概念就是另一样了。如果在革命运动开始时，几千革命工人是群众的話，那末，当進行革命的条件已經造成时，即当問題是在於解决革命的基本問題，解决國家政权問題时，几千革命工人就不是群众了。〔十一〕列寧說：在这些条件下‘群众这个概念的改变，是从把它理解为多数，而且还不僅是平常的工人的多数，而是全体被剝削者的多数这个意义上說的；如果作另外一种理解，对革命者說來是不容許的，这个詞的任何其他意义都是不可理解的’。〔十二〕

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群众’这个概念的改变不是說，这个概念是模稜兩可的，不确定的。相反的，它对於每一个斗爭階段都是嚴格的确定了的。

列寧反对把一种具体歷史环境下必需的和充分的‘群众’这个概念的本質特征形而上学地搬到和前一种不同的另一种环境中去。

因此，照列寧的說法，概念的灵活性不是意味着模稜兩可和不确定性。概念的灵活性是以概念內涵在發展着的現实的每一具体环境中的明确性和确定性为前提的。

列寧对概念灵活性的要求一方面用以反对教条主义，另方面用以反对相对主义。

在列寧和斯大林看來，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定特征的簡單的總和。这样的概念不可能完全地、詳尽無遺地反映事物和物質現实的联系的实質，因而也就不能成为認識和改造外部世界的工具。馬克思列寧主义認为正确地、全面地反映各現象的联系的概念才是科学的概念，‘这些概念也应当加以切磋琢磨，应当是灵活的、可动的、相对的，应当是互相联系的，应当是在对立中統一的’。〔註十三〕

* * *

概念的确定性是唯物辯証法的基本要求之一。当必須解决某个具体的政治問題，捍衛一定的観点，为貫徹一定的政治路綫而斗爭时，概念的确定性就有重大的意义。列寧和斯大林在其著作中所下的經典定义，就是徹底遵守这种要求的光輝范例，就是对具体現象作深刻的理論和政

治的分析的光輝范例。

列寧表明，概念的定义的不明确性，由此產生任意混淆不同概念的可能性，概念的混淆，都成了工人階級的敌人掩飾他們的階級利益、欺騙劳动群众的幌子。例如立憲民主党人力圖把自己的党說成是一般民主的代表者。列寧揭穿立憲民主党人时警告說，‘資產階級民主’这个概念的定义中的任何不明确性都是有利於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

反革命政党利用內涵不确定的概念來抹殺最迫切的政治問題的实質。列寧反对孟什維克在和立憲民主党人的关系問題上所采取的妥协主义，他指出，孟什維克在其决議中容許和一般‘民主反对派’政党取得协議，而布尔什維克只是和那些为共和國而斗爭並承認必須举行武裝起义的政党取得协議，也就是，‘布尔什維克用鮮明的政治性的标誌來确定革命資產階級这个概念，而孟什維克却用一个技術性議会的字眼來代替政治性的定义’。〔註十四〕列寧接着解釋道，共和國和武裝起义是完全确定了的政治范疇，而反对派只是一个毫不明顯的議会術語，因为这个術語既可表示联合十月党人，又可表示联合和平革新党人，即联合所有一般的不满政府的分子。企圖用‘民主’字眼把政治內容列入‘反对派’这个概念，只会引向捏造和撒謊，难道欺騙人民的君主立憲民主党有民主的气味嗎？

列寧要求的是精确的、确定的概念，他坚决反对‘強下定义’、‘硬下定义’列寧在‘再一次消滅社会主义’一文中致命地批評了司徒盧威采用毫無內容的新概念的‘壯举’。列寧說：‘司徒盧威先生的“科学的”定义和区别簡直是胡說八道。’〔十五〕列寧指出，司徒盧威把‘一系列有价值的經济总和’之类毫無內容的概念列入科学中的企圖是‘一种愚蠢的、庸俗的把戲，是对邏輯和歷史的愚弄’。

列寧教導我們說，人的概念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这是一个長期的、在好几代人們的劳动活动中經过千万次的檢驗的过程；反映事物和現实規律性的实質的已形成的概念，是經过好几百年充实起來的。相反地，臆造的概念和內涵模糊的概念却为生活所摈棄。正如大家知道的，列寧曾認为‘生產的民主’、‘生產的气氛’等概念是屬於此类概念之列的。

列寧坚决反对由任何‘一般概念’中得出定义，並特別强調概念是

从对生活和歷史經济条件的科学的考察中產生的。例如，列寧在回答应当怎样了解民族自决和从哪里去找这个問題的答案这个問題时說：‘……我們要想了解民族自决的意义，不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不去“發明”抽象的定义，而去研究民族运动的歷史經济的条件，就必然会得出結論說：所謂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脫离外族集体的國家分立，就是組織独立民族國家。’〔註十六〕

列寧在批評民族自决的反对者时指出，他們在解决民族自决問題时，用死的抽象掩盖自己錯誤的、和活生生的現实生活的具体事实相脫离的观点。

列寧和斯大林認为只有概括全人类实踐的發展的具体材料的定义才是科学的；只有这种概念对科学的向前發展才有重要的意义。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列入科学中的資本主义、帝國主义、民族、馬克思主义、階級的經典定义及其他定义，是眞正科学的定义的典范，是巨大科学研究的結果。

我們考察一下列寧給‘階級’这个概念所下的定义。列寧在其‘偉大的創举’一文中对这个定义是这样表述的：‘所謂各个階級，就是在歷史上一定社会生產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產資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都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財富的方式和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集团。所謂各階級，就是由於彼此在一定社会經济結構中所处地位不同，而有某一集团能占得另一集团劳动的各个集团。’〔註十七〕

总之，各階級就是几个巨大的集团。但是，这些集团首先是按照他們在歷史上一定的社会生產体系中的地位來区分的。按照这些或那些集团在歷史上一定的社会生產体系中的地位來加以区分是‘階級’这个概念的本質特征之一。但有了这个特征还不能給‘階級’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因为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產体系的內部，各个階級的不同还由於：第一、各个階級对生產資料的关系不同；第二、各个階級在社会劳动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在奴隸制度下，奴隸主是生產資料和奴隸的占有者，奴隸主不僅可

以買賣奴隸，甚至可以屠殺他們。在封建制度下，封建主占有生產資料和不完全占有生產工作者——農奴，封建主虽已不能屠殺他們，但仍可以買賣。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資本家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但不是生產工作者的占有者。資本家使用的是僱傭工人的劳动，而僱傭工人是資本家既不能屠殺也不能出賣的。

由此可見，在上述每个社会經济形态內部都有生產資料的集团和喪失生產資料而只靠出賣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集团。前者不參加生產劳动，而后者創造一切物質財富。但是，由於生產資料集中在剝削階級手里，而被剝削階級除了自己的双手之外一無所有，所以社会財富是这样進行分配的：統治階級占有一切，而被压迫的工作者只能得到为了恢复他們在生產中所耗費的劳动力所必需的那一小部分。

由此可見，列寧給‘階級’这个概念所下的定义的本質特征是：这个或那个集团在歷史上一定的社会生產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这个集团对生產資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关系）；这个集团在社会劳动組織中的作用。

对有剝削的社会里的各階級所下的这种定义，是对一切对抗的社会經济形态進行深刻分析的結果。上述本質特征所說明的‘階級’这个概念的定义，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的一切階級來說是一般的定义。

馬尔及其門徒所提供的階級这个概念是对馬克思列寧主义学說的極大的歪曲。斯大林在其‘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書中嚴厉地批判了馬尔分子想給‘階級’这个概念下一个自己的定义的企圖。斯大林寫道：‘有人反对說，任何人类的集团包括原始公社集团在內，都应当了解为階級，这种說法算不得什么反对，而只是玩弄字句，不值一駁的。’〔十八〕

讓我們來考察一下一九一三年斯大林在其‘馬克思主义和民族問題’一文中第一个表述的民族这个定义。斯大林在这部著作中分析了大量的具体材料，确切地論証了民族的每一个本質特点，然后根据所得到的結果給‘民族’这个概念下了一个唯一科学的定义。

斯大林寫道，民族首先是由人們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斯大林举出意大利民族和法蘭西民族作

例子。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馬人、日耳曼人、伊特刺斯坎人 希臘人、阿拉伯人等等組成的。法蘭西民族是由高盧人、罗馬人、不列顛人、日耳曼人等等組成的。其他許多民族也是这样組成的。斯大林做出結論說：‘总之’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歷史上形成的人們的共同体。’〔十九〕

然后，斯大林举出居魯士帝國和亞歷山大帝國，說明它們的存在是由某一征服者的勝敗决定的，並指出不是任何一个歷史上形成的人們的共同体都能組成民族。民族还应有穩定性这样的本質特征。斯大林說：‘总之’民族不是偶然的、曇花一現的混合物，而是由人們組成的穩定的共同体。，〔二十〕

斯大林繼續分析並指出，有了上面的特征还不能給‘民族’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的确，奥國和俄國是由人們組成的穩定的共同体，但它們是國家，不是民族。民族的共同体非有共同的語言不可，國家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語言。‘总之’共同的語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二一〕

斯大林進而指出，每个民族必須有共同的語言，但这不是說，不同的民族应当有不同的語言。例如，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操着同一語言，但他們不是一个民族。这就是說，有了，共同的語言，这个特征，还不能給，民族，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

經过人們長期不断的交往，經过長期的共同生活，民族才形成起來，而長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因此，如果由人們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沒有共同的地域，那它就不能組成一个民族。从前，英吉利人和美利坚人居住在一个地域上，即居住在英國，他們是一个民族。后來一部分英吉利人迁移到新的地域，迁移到美洲，於是形成了新的民族，却北美利坚民族。斯大林說：，总之，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註二二〕

但有了这个特征还不能給，民族，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民族这个在歷史上形成的人們的穩定的共同体，不但要有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語言的特征，民族还要有內部的經济联系來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結合为一个整体这个特征。例如，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不是一个民族，因为在他們之間沒有內部的經济联系。如果單独地考察英吉利和北美利坚，那末

居住在这兩个國家之中的每一个國家的民族之間都存在着經济联系。斯大林說：‘总之，共同的經济生活、經济上的联系是民族的特征之一。’〔二三〕

斯大林在進一步分析的过程中指出，除了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和經济联系之外，結合成一个民族的人們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也是民族这个在歷史上形成的人們的穩定的共同体的特征。各个民族的不同也在於表現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

同时，斯大林强調指出，人們的精神形态和心理素質是歷代所形成的。这种心理素質或‘民族性格’是随着生活条件变化的，但它既然存在於每个一定的时期內，那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斯大林說：‘总之，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的特征之一。’〔二四〕

最后，斯大林强調指出，上述特征就把‘民族’这个概念的一切特征都包括無遺了。

斯大林經过这一極其深刻的分析之后給民族下了一个經典的定义：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济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体。’〔二五〕

斯大林致命地駁斥了石普林格尔和鮑威尔当时給‘民族’这个概念所下的定义。斯大林無情地揭穿了奧國馬克思主义者关於民族問題学說的基本原則，指出这种学說的基本原則实質上是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領域中的政綱。

从斯大林給‘民族’这个概念所下的定义看來，資產階級社会学者給这一概念所下的定义就顯得貧乏和可憐。資產階級社会学家和著作家照例从‘精神’、‘覌念’中引出‘民族’这个概念。例如，著作家列南在其‘什么是民族？’一書中寫道：‘民族是精神’是抽象的原則，。法國資產階級社会学家罗蘭企圖‘証明’，‘民族的形成有上帝的因素’，‘民族的因素是由上帝結合起來的’，‘这是人类意志的作用所达不到的創造’。意大利蒙奇尼武断地說：‘民族的物質因素是惰性的物質，应当灌入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应当‘灌入堅硬的物質中去，只

有这样，民族才能形成’。

資產階級社会学家对‘民族’这个概念所下的一切定义都是为帝國主义压迫和掠夺各國人民的目的服务的。資產階級的走狗学者把帝國主义的掠夺美其名为‘把精神生活灌入惰性物質’。这样一来，帝國主义就是精神生活的体現者，而殖民地和附屬國的人民就是惰性物質了。資本主义的辯护士把殘酷剝削和对最后一滴脂膏的榨取描繪成是一切‘高貴的’品質的灌入。

列寧在其‘再論职工会’一文中考察了概念的定义問題。列寧在这篇文章中說，形式邏輯‘采用形式的定义，而以最普通的、眼睛最常見的东西为指導，而且以此为限’。〔二六〕如果拿不同的定义，把它們完全偶然地加在一起，那末所得到的就是一个只指出对象各方面的折衷的定义。列寧並不否認反映对象的最普通的、司空見慣的、外部的屬性的定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些定义是必要的，但只有这些定义是不够的。要闡明对象的內容，就应当深入一步，应当全面地考察对象，研究对象的一切方面和一切‘媒介’。列寧說，我們始終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可是，全面地考察的要求能預防錯誤和僵化。列寧指出一切的定义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因为任何定义都不能完全地把握住發展中的現象的各个方面。

列寧强調指出，列入对象的定义中的应当是反映事物和規律性的根本屬性的本質的、基本的或主要的特征。

認識对象的本質是在实踐过程中达到的，因而‘完全的定义’应当包括全部的人类实踐——‘不管作为眞理的标准也好，作为对象和人所需要的东西的联系的实际規定者也好’。〔二七〕

列寧認为一切个別的特征和个別的‘因素’不能在对象的定义中都一一列举出來，任何这种做法都是折衷的荒謬的企圖。这种企圖証明它对什么是科学这个問題一竅不通。

科学的定义总是和当代的科学知識水平相適应的，因此，应当根据具体的歷史条件來研究科学的定义。

只有嚴格地确定了的、闡明了概念的各个方面的灵活性的概念，才能为發展科学和改造世界以造福先進人类的目的服务。

〔註一〕：列寧：'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一九四九年解放社版第一五六頁。

〔註二〕、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十七頁。

〔註三〕、列寧：'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一九四九年解放社版第一三〇頁。

〔註四〕、'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九頁。

〔註五〕、'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九十五頁。

〔註六〕、'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二九五頁。

〔註七〕、同上，第十七卷第八十九——九十頁。

〔註八〕、斯大林：，列寧主义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一〇〇頁。

〔註九〕、斯大林：'列寧主义問題'，莫斯科中文版一〇一頁。

〔註十〕、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联書店版第十二頁。

〔註十一〕、'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五二頁。

〔註十二〕同上。

〔註十三〕、列寧：'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一九四九年解放社版第一〇〇頁。

〔註十四〕、列寧全集，俄文第十一卷第二七七頁。

〔註十五〕、'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一七九頁。

〔註十六〕、'列寧选'文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八二三頁。

〔註十七〕、'列寧文选'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五九二頁。

〔註十八〕、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九頁。

〔註十九〕、'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二九一頁。

〔註二十〕、同上，第二九二頁。

〔註二十一〕、同上。

〔註二二〕、'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二九三頁。

〔註二三〕、同上，第二九四頁。

〔註二四〕、同上。

〔註二五〕、'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二九四頁。

〔註二六〕、'列寧选集'新華書店版第十六卷第八十五頁。

〔註二七〕、'列寧选集'，新華書店版第十六卷第八十六頁。

（于遐生、湯景禧譯自苏联，哲学問題，雜誌一九五二年第五期）

論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

Б. А. 謝列布达尼柯夫
M.M. 古　赫　曼

斯大林的天才著作奠定了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体系。語言發展內部規律的研究在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研究范疇中是占着主導地位。这个問題斯大林是把它当作語言学的主要任务提出的。

斯大林所闡明的語言發展內部規律的概念，对語言学是完全新鮮的，因此，在馬克思主义語言学体系中，首先必須創造性地把这个概念的意义規定下來。所以苏維埃語言学家在这个部門的首要工作就是針对着闡釋語言發展內部規律这个概念和确定这个問題本身的范圍去做的。

这方面的重要而必需的开端工作是在1951年的整个年度內做过的在这一年內举行了一連串关於語言發展內部規律的报告。新概念的确定，它的含义的闡釋，这类初步嘗試应用在具体語言上固然不一定全是滿意的。不过，許多發表的文章，尤其是，維諾格拉多夫院士的著作，在那时已經确定了若干要点，它的不可爭辯性可以說是公認的了。1952年2月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所組織的关於語言發展內部規律的廣泛討論是特别有助於这个問題的探討的。討論中听取了並研討了六个报告，这些报告都談到了和語言發展內部規律問題相关联的各种問題。例如：語言發展的一般內部規律和个别語言發展的特殊內部規律之間的相互关系，語言發展內部規律和語言結構之間的相互关系，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和語言在它存在的某一一定期間內起着作用的規則之間的相互关系，同系屬語言發展內部規律的特殊情况等等。在廣泛自由討論的过度中，得到了一些十分确定的結論，並沒有从語言学家方面受到原則性的反駁，現在这些結論在進一步探討这个最重要的語言学問題上，就可以作为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礎了。

語言和它的歷史运动的規律性虽然完全依附於社会發展，但作为特殊社会現象來看，語言自有其本身的內部發展規律。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的特征决定於語言是交际工具这个特性，这就把它和一切別的社会現象区别开來。斯大林闡明了作为社会現象的語言的特征，指出正是这些特征使語言成为一种独立的科学——語言学的研究对象。

地球上的每一种語言，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管使用的人怎么样，都是履行着人与人之間交际的任务。可見，作为特殊社会現象來看，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是一切語言都有的。哪样的規律可以叫做語言發展的一般內部規律呢？語言發展的一般的內部規律可以認为是：語言結構的个别方面發展不均衡的規律。斯大林同志教導說，語言的詞彙处在几乎經常不断的变化中，不过它的基本詞彙却十分穩固，經歷許多世紀不变，語言的文法結構变化得更慢。还有，象語言的質的改变的形式，只要是一切語言所共有的，表現为新質的逐漸積累而旧質的逐漸消亡的，諸如此类，都可以認为是語言發展的一般內部規律。

至於象俄語、漢語、法語，德語等等，每个具体語言的內部規律是該語言所特有的，並且使它区别於其他語言，这种內部規律就得和作为特殊社会現象的語言的發展的一般內部規律划分开來。

同时，每个語言發展的規律也是和語言發展的一般內部規律分不开的，前者是后者在各种不同語言結構內的特殊的和个别的表現。也就是說，一般性不能和特殊性、个别性分开，个别性里顯露一般性。

具体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就是它的动态的規律，它的量变和質变的規律，它从一个質轉变为另一个質的規律（B. B. 維諾格拉多夫院士）。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表現在个别的变化里，組成这些变化的本質。它們表現在語言的歷史發展的趨勢和規律性的概括的定則中。

一个具体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决定这个具体語言歷史的民族性，因为每个語言的改進都是按照它發展的內部規律实現的。例如，在俄語里，它的詞彙的發展是采取構造新复合詞的办法，象，“КРаснййуголок”，（紅的角，就是“紅角”），“Ломотдыха”（休养的房子，就是“休养所”）等等，而在德語里則添造新字是起着主要的作用。由此可見，語言在它自己的全部歷史中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質。

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包括語言的一切成份：它的語音、詞彙和文法、因此可以說，語言系統、文法構造、詞彙各有其發展的內部規律。不過，語言又有它的完整性，它的各部分彼此之間都还是有相互的作用：坚决傾向於保留不同位置的重音是俄語音系發展的內部規律之一；但是这个規律却又被那用重音作为区别不同意义的方法的傾向所支持。

每个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是歷史地变化的。內部規律發生並作用於用相当長久的时期內，然后可丧失它自己的作用：例如，名詞語尾变化类型的統一無疑地曾經是俄語文法結構發展的內部規律。現在这个規律已經不起作用了。因此，在每个語言結構中都可以看到某些現象表現旧有的內部規律作用的結果，也可以看到正在作用着的規律和現象，表現語言發展中新生的內部規律。

斯大林教導說，語言的發展是用擴大和改進現存語言的要素的方法。因此一个具体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的性質以及这些內部規律的特色，大都是由語言結構的性質所决定的。同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也确定語言結構变化的一般趋势，限制語言結構中建造起來的新东西的形式和性質。但它們本身並不就是語言發展的原因。

語言發展的基礎是它自己的結構，是它这个結構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这些特殊的矛盾才是語言結構本身所以变化的內在因素。

同时，語言作为社会現象來看是跟使用和創造語言的人民的歷史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斯大林教導說："要了解某种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發展的歷史，密切联系創造这种語言、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本20頁。）

辯証唯物主义关於現象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理論，在語言發展和人民歷史相联系的問題解决上，獲得了特殊的形式。不能輕視社会發展和文化發展的作用，不能輕視社会交际本身范圍的擴大及交际日趋复雜的要求所發生的作用。但是每个語言，当它从各方面用新詞补充自己的詞彙，从各方面改進自己的文法構造，來反映社会的这些需要的时候，是受語言結構的特性所產生的語言內部發展規律的特性所制約的。

苏維埃語言学家也非常注意去研究同系屬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的特

点，这种研究又联系到考查親族支派的关系怎样影响到同一系或同一支語言的發展的內部規律的特性。

跟斯大林的語言發展內部規律学說相关联的还有許多問題尙未得到应有的闡發，目前正在加緊進行集体工作來研究这些問題，例如在各种語言的發展的內部規律上加以精細的、全面的研究就具有特殊意义。沒有这，就不可能把这些語言的歷史在斯大林語言学說的光輝里建立起來。

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的問題，是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系統中的基本問題之一。不單是对語言本質更深刻的了解要靠着这个問題的解决，就是对为具体語言建立歷史的眞正馬克思主义原則的認識，以及屬於長期和逐漸發展的產物的現代語言的規范和規則的研究也要靠着这个問題的解决。

〔科学通报特稿·邢栄蓀譯〕

見科学通报1953年7月号

关于單一的民族語言

——在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学術会議上的發言——

格拉烏尔

（罗馬尼亞科学院院士）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民族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的語言。光从外部的記号看來人們往往不能認識一个人是从哪个地区來的，更無从知道他的經济利益或思想方法，但是只要他一开口說話，人們就能知道他是哪一个民族的。同时，語言也許是民族的最穩定的特征，人們很少能够隨意决定把它改变。可是在1950年以前，人們对於民族語言和它与方言的关系的問題却很少注意。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里第一个很清楚地提出了这个問題。他强調地指出："馬克思承認必須有統一的民族語言作为最高形式，而把低級形式的方言服从於自己"❶。

根据斯大林的見解，苏联的語言学家曾廣泛地討論了对整个民族社会是統一的和共同的民族語言和地域方言間的关系。他們用不同的具体事例表明了怎样產生方言的集中和作为民族語言基礎的方言是根据什么条件选出的；比方說，在法國和英國为什么民族語言是以首都的方言为基礎的，而在意大利和保家利亞却选了另一个地区的方言做基礎。由於某种理由基礎方言还不能确定的时候，苏联的語言学家就决定态度，推荐那最有机会变成普通使用的方言。

这也是众所共知的事实：在人类史中曾經有过統一的时期和分化的时期。在原始公社时期民族語言有分裂成为几种不同語言的傾向；在奴

❶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12頁。

隸制度时期有过方言的集中，某些語言擴展到了寬廣的地域；在封建制度时期方言又再起分化；在資本主义时期語言的統一占优势。但只有在社会主义时期才有眞正的語言的統一，古代方言的差異只留下了一些模糊的遺迹。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不可能有完全的統一，因为資產階級用來分离劳动群众的措施之一就正是要增剧各地区間的紛爭。比方多少次我曾听見他們說，在法國，眞正的法語不是在巴黎說的，而是奥尔雷安或波哇济野的；又多少次我曾听見他們說，在罗馬尼亞，眞正的罗馬尼亞語是在边远的地区說的。这种想法对於某些作家对民族語言的态度不是沒有影响的。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另一个对於語言統一的更嚴重的阻力就是農村群众的文化落后。这有利於土語的保存，甚至增强了各地域間的語言的差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鄉間的矛盾一步一步地減少，最后只剩下了一些較不重要的差別，大大有利於語言的統一。

民族語言和文学語言間的关系怎样呢？为了回答这个問題，我們要把不同时期区别开來。当然，在民族感情沒有出現以前，我們談不上有什么民族語言。可是就在古代，就有了一种全社会共同的、統一的語言，所有方言都服从於它，作为这种統一的語言的支派。古代希臘可以給我們最明顯的例子。在那里，每个城市都有它的帶有文学形式的土語。在法國，直到十四世紀，文学中采用的还有几种方言。在别的地方，类似的情形也不是沒有的。在某一个时間，由於一些比較容易看出的理由，一种方言占了其他方言的上風，用途开始比較廣泛，它虽然也受了其他方言的或深或淺的影响，結果却甚至成了唯一的文学語言。比方希臘的阿狄克方言和法國的法蘭西島方言都是这样。随着时代的進展，共同的語言成了民族語言，一步一步更与文学語言相类似。

这意味着共同的語言起初只是一种抽象：共同的希臘語之所以存在，只因为希臘的各种不同方言都是出於一个共同的來源的，只因为它們有着非常重要的共同的特征，甚至有着頗为相同的發展規律。所以在这个时候，共同的語言只是親屬方言的总和，只以这些方言的形式而存在。反过來，在我們这个时代，共同的語言，民族語言，通常即是一个具体的事实，因为它一步一步与文学語言相类似。这文学語言是很容易

識別的，因为它不与任何地域方言完全相同。隨着社会的發展，民族集体統一的文学語言代替了其他土語的書寫形式，就逐漸擴展到全國去；另一方面，廣大的劳动群众，从前还只是一些文盲，現在很快受到了教育，堅决地由使用土語轉移到使用文学語言，这就構成了統一的民族語言的一个顯著的進步。

無論是为了加强民族的团結还是为了文化的發展，这都是一个極端重要的進展。就这个观点看，語言学家的責任怎样呢？当然，語言是一种客观的現象，人們不能按照任何个人的意志而把它改变。有时候有人想試做一下，但一切嘗試都可悲地失敗了。但是这並不意味着我們就应該無动於中地看着語言發生变化。認識到了它的發展的方向，認識到了这个發展方向的重要性，語言学家就有可能並且应該作出貢献，加速这些有用的發展的進程。在这样的場合下，看到了語言的某种形式一步一步地擴展，在最近的將來会变成全國語言統一的和一般的形式，語言学家就应該負起責任帮助語言很快地走完它的中間的階段，完成它的統一。这不只是一件業务上的工作，並且是一种爱國的責任。

就我对於材料的非常淺薄的認識看，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在这时候完全有理由把这个問題交付給中國的語言学家。民族語言的問題在中國是極端重要的。有些西方的語言学家認为有几种漢語，因为漢語的不同方言間的差别相当大，以致使用这些方言的人不能互相了解。这种錯誤的主張就政治的观点看是非常危險的。誰說有几种語言，就是在原則上說有几个民族。有几种漢語存在就是为把中國分裂成几个國家辯护。以为能不能互相了解可以給我們用來做区别一种語言的兩种方言和兩种不同的語言的标准是不正确的：在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我們很容易找到一些使用某种方言的人不能为他們同民族而使用另一种方言的人所了解。可是人們从來沒有說过有兩种法語，兩种德語等等。反过來，一个保加利亞人和一个俄罗斯人虽然各自使用着自己的語言，却相当容易达到互相了解；可是沒要人能够主張俄罗斯語和保加利亞語構成一种語言。

区别方言和語言的主要特征，那是同一种語言的兩种方言承認共同語是最高的單位，而这兩种方言構成它的从屬的單位，至於兩种親屬語

言却不服从於任何更高的語言的單位。一方面，譬如法語等的方言，它們都是法語等的支派；另一方面，譬如俄罗斯語和保加利亞語，它們在目前不能承認有任何更高的單位。法語的方言現时朝着語言的單一形式集中，而俄罗斯語和保加利亞語却各有它們的不同的發展方式。当人們脫离一种語言，采用另一种語言的时候，哪怕是有親屬关系的，也一定要中断那延續性，就是要完全脫离那第一种語言，完全采用那新的語言；可是脫离一种方言，采用同一种語言的另一种方言（或者采用民族語言），人們通常却只分階段，采取連續过渡的方式來進行：起初采用一个特点，其后又采用另一个特点，如此等等。因此我相信我們可以定下这样的一个定义：假如說話的人可以由一种方言过渡到另一种方言，或者由兩种方言过渡到民族語言，不致有什么驟然的中断，而只有一些連續的小適应，那末我們所有的就只是同一种語言的兩种方言。如果大家同意这个觀点，那末，我想人們就再也不能怀疑漢語的不同方言是屬於一个漢語的，这就是單一的漢民族的語言，这种語言有可能並且有必要很快地統一起來。

可是語言学家能够用怎样的一些方法來帮助这种統一呢？关於这一点，我敢向大家說一說在我們的國家里所做的，不过在那里，我要附帶声明，工作比在中國的要容易得多。

我們首先仔細地研究了各种方言事实的实际情況，确定了它們將來發展的可能的方向，大体上能够說出其中哪些是与語言發展的規律相符合的，哪些是不相符合的。然后我們編印了一本关於正字法的手册，这个手册不但就理論的觀点和实用的觀点討論了正字法的事实，並且討論了正音法的事实。我們現在还剛編好了一本关於正音法的手册。这些手册的作者在越來越廣泛的范圍內充分討論了区域性的發音問題之后，遇到每一个特殊的事实都注意到哪一个發音可以說是最好的，然后在这發音的基礎上确定了那書寫的形式。这个形式於是在教育事業中和出版事業中成了强制的規范，很快就擴展到全國去。我們其后还編印了一本規范語法，把可以認为正确的形态学形式和造句法格式确定下來，同时指出那些大家認为不大好的应該避免的形式和格式。最后我們还正在編印現代文学語言的詞典，同样是有規范性的，因为它对每一个詞都註明

它的修辞的特点，例如方言的、古語的、俗語的、書本上的等等，这样可以使讀者把那些可以視为文学語言的詞和其他应該在某种情况下使用的詞区别开來。

一般人对於这种進行方法的抵抗是相当微弱的。坚决要維护某一地区的說法的人並不很多。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苦心作成各种规范的語言学家全國各地的都有，在他們当中，大家也不需要常常撤回一些有鄉土觀念的例子。他們很快就明白为了民族的利益必須与目光短小的劣根性作斗爭，放棄某些沒有任何机会强加於全國的習慣。有兩三个作家誤以为新的規范將禁止他們不能使用区域性的方言詞曾提出抗議。关於这个問題，下边再作解釋。

我首先要說明，問題不在於依照它的嚴密的形式采用任何一种方言。那被采用为基礎，並且已經把大批材料供給了民族語言的方言可能有些过分誇張的特点，有些比起其他方言还不如的公式。这样一來，我們有时候就应該撇开这些基礎方言的特点而求助於其他方言的材料。有一个事情我覺得特別有趣的，应該在这里說一說，那就是当一种方言被采用为文学語言的基礎，並且其他地区的居民开始在書面上和口头上使用它的时候，这种方言，就它原有的而不是文学的形式來說，会比其他方言更快地走上退化的道路，並且更快地被看作是可笑的，比方英國的倫敦东部土音（cockney），法國的巴黎周边的發音，罗馬尼亞的哇拉西土語等都是这样。一本小說的正面人物如果是屬於一个离开主要的文化中心很远的地区的，那末他的說話中可以容許有些区域性的特点，但是假如他使用一些屬於作为文学語言基礎的方言的土語化的形式，那末他就很容易变成可笑的，作家將不能达到他的目的。理由如下：在周边的地区，在某一个期間，不管是知識分子还是農民，每一个人的說話里都或多或少帶有一些方言的特点，所以使用一些屬於这些地方土語的区域性的形式就不足以把一个人归屬於缺乏文化的人物。反过來，假如那地方土語被采用为民族的文学語言的基礎，那末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很快达到了脫离那文学語言沒有采用的少数的区域性的特点，使用这些特点就足以标誌那說話的人是一个沒有文化的人物。这使我們回憶起叶斯丕森給文学語言所下的定义（我只就所能記憶的引用）：在一个人的說話

中，假如大家就他的發音辨别不出他是从哪一个地区來的，那末他所說的就是文学語言。由此可以証明文学語言和它用來做基礎的方言是不相同的。

我現在要說到作家們对於民族語言的使用問題了。一方面，任何藝術家对於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表达的方式。另一方面，任何藝術家的目的都应該是要創造出一些为全民族所能了解的作品。这就是語言材料里面兩个可能的極端的界限：不能光是抄襲每一个人都看做模范的陈辞濫調以致庸俗不堪，也不能每一句說話都独出心裁以致除了自己之外誰也不能了解。所以在这里面也要找出那正确的中庸之道。为了要能够表达自己的人生經驗，为了要能够把那些由現实中抽取出來的人物安排在適当的环境里，为了要能够創造地方色彩，人們有时候需要复制出一些区域性的特点。为了要能够为全民族所了解，人們就不能用土語寫作，用任何方言寫作，而必須用民族語言寫作。

我所說的这些关於区域性的形式的話，我覺得也同样適用於古代的特点和行業的專門術語。为了描繪一个十六世紀的農民起义，絕不需要采用誰也不容易了解的十六世紀的語言。为了描寫礦工的生活，沒有必要摹拟他們的語言。我們解放后不久，在戲院里演出了一个戲劇，劇情是在一个工厂里發生的。那作家采用了一些技術上的專門名辞，这对於工人是熟識的，可是对於廣大的观众却是一無所知的，結果大家就很不容易了解那劇情。

为了要創造地方色彩，通常有很少的一些特異的特点也就够了。我們的最偉大的傳記作家米海尔·沙德窩奴，他出版了許多歷史小說，只用現代的文学語言寫作，已經常常能够在使人回憶起古代这方面做得很成功。当然，他有时候也采用了一些古代的詞語，但那是在一些大家还能够認識的古語中經过一番很仔細的挑选的，或者只从上下文就可以了解它們的意义的。可是使他的故事帶上所需要的古代色彩的，主要並不是这个；那毋寧說是因为在里面我們找不到任何罗馬尼亞語新近的外來借詞，这些新的外來借詞他都完全規避了，而只用了那語言的一些其他各种材料。对於区域性的色彩也是一样。罗馬尼亞的偉大作家克蘭加並沒有象那些比較次等的作家所做的那样，把他的故鄉土語的一个照象給我

們：这些土語沒有一本詞典的帮助就讀不下去，而这些与其說是作家的工作不如說是方言学家的工作。一个优良的作家是知道怎样去选擇他感覚兴趣的土語的主要特点的，这已經足够使他創造地方色彩。他采用了这些形式不只是要容易为讀者所了解，有时候並且可以把它們介紹到通用的文学語言里面去，从而丰富了文学語言。

罕用的表現法，不管是不是区域性的，运用得適当，可以吸引讀者的注意力，產生很大的效果。反过來，假如濫用了它，就不会產生藝術的效果，而只能使人討厭。关於詞彙，特別提出來，我还要多說一些：偉大的詩人通常甚至連那些不大通用的文学語言的詞也要規避不用，他們要把那些最常用的詞加以巧妙的安排，从而求取最好的效果，正如拉丁詩人何拉斯所曾經推荐过的；当然，我們不应該光从形式方面去判断一篇文学作品的好坏，假如它的內容是毫無价值的，那末無論把它安排得怎样好，也不能使它成为有价值的作品。可是在这里，我們只能討論关於語言的問題，关於內容的問題我們假定那是已經解決了的。

一篇作品缺乏价值，有时大家把它解釋为是由於詞彙貧乏，並且以为一个作家的詞彙越是丰富多彩，那末他的作品就越有价值。結果，我們讀到一些文章，常常覚得那作家竭力要避免常用的字眼，而代以另一个我們所料想不到的。这样所得到的效果一定会跟所要达到的相反。凱撒是一个很偉大的作家，他曾經提醒我們要防止这种心理。他告訴我們：作家要避开罕用的字眼正如水手要避开水底的暗礁一样。

我想用一些具体的文藝作品來証明我在上边所說的这个断言。我曾經就几个偉大的罗馬尼亞作家的文章作过一些統計，所得結果我覚得是完全有決定性的。他們所使用的詞彙絕大多数是由基本詞彙構成或者顯然是由这些基本詞彙派生出來的。比方米海尔·厄米涅斯古，誰也不能否認他是我們的最偉大的詩人（他於前一世紀末叶寫作）。他所使用的詞，不屬於基本詞彙的通常沒有超过百分之四、五，並且这些詞的本身还不是那通用的語言中最罕用的。

由此可見，一个作家把那些古語的、区域性的、各种行業的專門名詞儘可能減縮到最低限度將更能够創造出一些为全民族所接受的作品。同时，这样他將能为語言的統一作出他的貢献，使这种語言能够成功地

發揮它作为全社会所有組成員的交际工具的作用。加强基本詞彙，把它常常应用在文藝作品里面，可以使詞彙，从而使整个語言更为穩固。一种坚固地構成的統一的語言將是全國团結的宝貴的要素。

（岑麒祥譯）

略論語言史和社会史之間的关系

罗馬尼亚　格拉烏尔

斯大林在他的經典著作《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教導我們“……要了解某种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發展的歷史，密切联系創造这种語言、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註一〕但怎样把这个馬克思主义的論断应用到每一种語言的研究上去，对我們來說，还不充分明确。本文即是为了闡明我所認为特別复雜的一个問題而作的。

在某一时期，即是当馬尔的“語言新学說”占統治地位的时候，人們竟認为当社会中產生革命性的变革时，語言就一定有实質的改变，从而每一个掌握政权的新階級就帶來和其他各階級不同的語言。斯大林指出一切社会和一切已知的語言的歷史都証明事实適得其反，从而使这把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观点摧毀無遺。

是的，語言的确發生不断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中的一部分和社会結構引起的变化直接有关。隨着我們革命事件的發生，諸如封建殘余的消滅，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社会主义建設等，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詞彙方面变化的实例；有些新詞在出現，有些旧詞在消失，在保留下來的旧詞中，有些詞的意义和構造改变了。然而这些改变純粹只和詞彙有关，它們並不構成語言的根本改变。如果一个公民对我國自1944年以來所發生的事件完全無知，他对現在所看到的事物就將絲毫不能瞭解。在我們的民主軍隊和民主学校中，他將絲毫也看不到他所習慣的旧軍隊和旧学校的遺蹟；如果他向法庭提出訴訟，他將很难明瞭今日進行辯論的方式；至於如人民委員会的措施和工作方法，他也將絲毫不能理解。然而他用來表示驚訝或者請求解釋所說的話却和我們日常用語几乎毫無差異。不但是句法，甚至是他所用的詞彙，对我們都不会產生任何的困难。

斯大林所举的事例更有力地証明了这一点。他說:

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个时期中，在俄國曾消滅了封建制度、資本主义制度，並產生了第三个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說，已經消滅了兩个基礎及其上層建筑，並產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礎及其新的上層建筑，然而，如果拿俄罗斯語言來看，那末它在这个長时期中，並沒有遭到什么破坏，並且現代俄罗斯語言按照它的結構來說，是与普希金的語言很少差别的。〔註二〕

当然，这並不是說在語言中就不產生那些重要的变化，在这些变化出現之前的說話方式，与在这些变化出現之后的說話方式因而有实質的差異。一般說來，在有些时期中，語言变化的速度比通常要快得多。但是当我們考察在最近数年中各种不同的語言中所出現的变化时，我們可以說，語言中出現深刻变化的时期在任何地方都是和社会出現重要变革的时期不相符合的。

17世紀的法國古典主义作家是在封建社会中生活和寫作的，但是他們的語言和今天的法語相差很少，今日的任何法國人都可以不經任何准备即能理解。与此相反，在11世紀，因此也就是在封建社会中寫出的《罗蘭之歌》，却不易为同是封建社会的17世紀的法國人瞭解。在其他各國，情况也大致相同。馬丁·路德在16世紀翻譯的《聖經》，今日能說文学語言的德國人都能看懂，而18世紀的封建詩人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的詩篇却不易被18世紀的封建的德國人讀懂。

我們是否可以从而得出結論，認为語言中的变化和社会的演变沒有关系呢？当然不能。只是这些关系比馬尔所說的复雜得多罢了。語言是为社会各階級服务的客觀存在的現象，新掌握政权的階級是不能对它進行革命的。此外，在同一集体中同时生活的各階層人物都必須能够互相瞭解，因此，語言無論如何也不能隨着一代的衰亡而有根本的变化；要有重要的变化，总得經过好几百年。人的意識在改变，他們的思想內容逐漸变得不同，但是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却差不多保持原样，“形式落后於內容”。斯大林教導我們：“至於新的东西也不是簡單地消滅旧的东西，而是滲到旧的东西里面去，改变旧东西的本性和机能，並不破坏

它的形式，而且利用它的形式來發展新的东西。”〔註三〕人們是在旧形式中注入新的內容的。

我們却不能否認社会結構的改变对語言所產生的影响。当然，社会結構的各种改变並不是引起語言变化的唯一原因，但是它們是屬於最重要的原因之列。在本文下面，我將特别涉及詞彙問題，因为有关語法結構改变的問題特别棘手。当然，語法生來就不是跟社会毫無关系的，因为社会中任何事物都不能跟社会毫無关系。

既然社会影响語言的演变，那末語言中的巨大变革为什么不和社会革命在同一时期出現呢？难道在社会中飛躍的实現与語言的重要变革之間总得有一个或長或短的間隔嗎？对所有各个时期來說，答案是不能一致的。和人們所期待的相反，我們看到，語言的变革有时先於一个掌握政权的階級的被推翻。当資產階級掌握政权的时候，它的思想意識早就在公众之間傳播开了，資產階級的思想方式已經有了一段在語言中反映出來的时間，当然首先是直接在詞彙中獲得反映；語言中的改变被廣大人民群众接受了。

那末是否可說在这里是形式先於內容呢？如果这样說，那就將是一个重大的錯誤。“新的生產力以及与其相適合的生產关系產生的过程並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單独發生，也不是在旧制度消滅以后發生，而是在旧制度內部發生。”〔註四〕資產階級的生產关系替代封建主义的生產关系，这就使資產階級的思想方式和詞彙得以傳播，而这一替代大致說來是在封建資產階級还掌握政权时实現的。但是，由於資產階級早已掌握了經济权力，我們可以說，語言的变化並不是在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前，而是在以后很久才產生的，在这一情况下，也是形式后於內容而改的变。

語言是与人的生產行为直接联系着，也象它与人的工作的一切范圍中的其他一切行为直接联系着一样。因此語言的詞彙对於各种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几乎处在經常变动中。在这一点上語言与上層建筑不同，它不等待基礎的消滅，它在基礎消滅以前，且不管基礎的狀态怎样，就在自己的詞彙中加以变化。〔註五〕

在封建主义为資本主义替代的过程中，不僅是在生產中，而且也在

基礎中出現了变化，因为在資本主义时期，生產关系一天比一天地占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上層建筑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变。大家都知道，上升階級的上層建筑中的某些成分在这个階級还沒有掌握政权时就出現了。

資產階級的掌握政权和旧統治机器的被替代也对語言起某些影响，然而主要的东西，也就是由經济的变化而起的基本的变化，則早就在此以前產生了。法國資產階級特别是在16、17和18世紀中，使法語染上資產階級的色彩（加强了一些新詞和資產階級的特殊詞义），在此以后，它在語言中只引起了一些比較不重要的改变。这一点也可以由資產階級在掌握政权后就变成反动階級这一事实得到解釋。用同样的道理，現在我可以說明为什么在1939年，当有人要我寫一篇关於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对法語發生影响的文章时，我沒有想到有多少話可說。

可是，为什么無產階級在夺取政权以前，即在19、20世紀时对語言沒有明顯的影响呢？我想在这一点上也应該对不同的階級加以区别。

（1）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資本主义經济較为現成的形式已經具备时开始發生的，这种形式还在公开革命發生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內部生長和成熟了，而無產階級革命却是在社会主义經济底現成形式尙未具备，或几乎尙未具备时开始發生的。

（2）資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务就是夺取政权，並使这政权適合於現有的資產階級的經济，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务，却是要在夺取政权以后來建設新的社会主义經济。

（3）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來完成的，而对於無產階級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开始，並且要把政权利用为改造旧經济和組織新經济的槓桿。［註六］

階級相互替換的方式在每个时代是各有不同的。在封建制度的初期，奴隸並沒有起而替代掌握政权的奴隸主。不僅新生的力量在旧制度里成長，而且还有一部分旧人也依然掌权。貴族階級为了發展資本主义的生產关系，曾在一定的程度上和資產階級合作。这种現象不僅發生在那些資產階級已經叛变本階級的革命的國家，而且还發生在英國，很小程度地也發生在德國。因此我們可以說奴隸主進入封建主义，封建主進

入資本主义，可是資本家進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很明顯，不論怎么样，在上面所提的那些國家里，新的生產力和生產关系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权以前就出現了。

可是对無產階級來說，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如果說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在生產关系方面已經出現了社会主义組織的前提，那么应該承認，这种前提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是沒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的。在这个社会里，階級斗爭比过去激烈得多，它把各基本階級鮮明地对立起來了。在这以前，有些封建貴族曾自願地采用資本主义生產关系（这件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沒有一个資本家願意在他們的企業中采用社会主义的生產关系。狄德罗和他的朋友們还能比較自由地傳播他們的思想，而今天，資產階級在大多数的國家里已經或者正在把敢於閱讀社会主义讀物的人关進監牢。应該認識到，資產階級不是被剝削階級，因此在它奪取政权以前能够完全自由地大力教育它的青年一代，而無產階級就不一样［註七］。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只有在取得政权以后才能進而完成它的革命事業，而其他的階級在取得政权以后就不再是革命的了。因此，只有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权以后，詞彙上才發生重要的变化，这一点是沒有什么奇怪的。

根据上面所說的，我們可以看出，要想在語言史上划分階段的話，就应該把資產階級奪取政权以前划为一个階段（那时的語言帶有資產階級意义的色彩）和另外一个階段，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权以后的階段（那时的語言帶有無產階級意义的色彩）。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在主要的欧洲國家里，資產階級奪取政权的时期和語言逐漸現代化的时期，我們就看到差不多在每个國家，后者总是在前者以前。即使說，資產階級的上升階段並不是促使欧洲語言从中古期進化到現代期的唯一因素，我相信也沒有人会怀疑資產階級的活动曾經大大促進了这一变化的事实。語言立即反映了資產階級奪取政权所引起的在生產和基礎上的变化，还有資產階級影响下的人們思想中的变化。这些变化在語言的進化中是不可能看不見的。

先來看看我國的情況吧。現代罗馬尼亞語言是从 1800 年左右开始的。当时資產階級正在組織起來，只在几十年以后就开始了資產階級和

貴族地主爭夺政权的斗爭。有人也許認为在这时期以前寫的文章，今天讀起來是很难懂的，並不能代表当时眞正的語言，因为它大部分都是非常拘泥的翻譯文章，而当时的口語和今天的口語接近得多。关於这个問題，留到下面再談。是的，即使在原著的作品中，当时的語言和今天的語言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我們特别感兴趣的是詞彙，而詞彙是不会受翻譯很大的影响的。如果我們看一篇文章，即使是18世紀的原著，也时常会碰到难懂的地方，因为它大部分的詞对於現代的罗馬尼亞人是陌生的；相反，在19世紀初的文章里，我們就很少碰到生詞，这証明在將近1800年的时候，古罗馬尼亞文就已經進化为現代罗馬尼亞文了。有人經常提出1800年以前的大部分文章是宗教性質的，1800年以后的文章是非宗教性質的，它們在內容上是有所不同的。是的，我們所称为現代語的是和現代文学同一时期的。如果說这种文学的新內容影响了当时的語言，那么同样地，这种文学內容也只能通过当时的語言才能正确地表达出來。在現代的文章里所引用的口語比旧时的文章要多得多。同时，現代文章对於口語也發生了影响。因此，肯定地說，我們所談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上升的資產階級的表現。換一种說法，我在語言方面想証明的这一点，至少部分地也適合於文学方面，那就是說：資產階級在夺取政权以前就把文学改变了。資產階級的代表Eliade以口語为基礎建立了語法，同时也就奠定了我們現代語的語法基礎，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不同的階級曾經連續參加創立文学語言的各种規范的工作，这一点反映在語言發展的过程中。”〔註八〕

我想現代俄罗斯語言和文学的情况也跟我們差不多，只不过他們开始的时期比我們要早，而这是因为俄國的資產階級比罗馬尼亞的資產階級發展得早些。法國語言学家認为現代法語是从1610年开始的(当然，这种精确的数字是太武断了，)而資產階級夺取政权的革命是从1789年开始的。英國的語言学家認为中古时期英語在是1600年过渡到現代英語的。这是符合下面这个事实的：英國資產階級比法國資產階級發展得更早，而且它是在1649年夺取政权的。現代意大利語比其他的現代欧洲語言开始得更早些——意大利語是十四世紀开始的，最初是但丁、彼得拉克(Petrarque)和薄伽丘(Boccaccio)的作品。这是件公認的事实：

資產階級最先在意大利成为一种經济势力。

上面所講的理論好象和斯大林关於所詞“階級語言”的理論相矛盾；不同的社会階級所特有的語言“僅能代表全部語言材料的百分之一”，因此我剛才所講到的語言在某一个社会階級的影响下發生变化的这种說法可能被認为是不对的。可是，如果只能緊密联系社会歷史才能学語言史的話，而另一方面，从上古至今日的社会歷史就是階級斗爭史，〔註九〕那么社会的影响自然首先就是統治階級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我們把《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的有关章節全部讀完，如果我們倘象我所認为的那样正确地了解的話，那么我們就会看出，我这篇演說中的观点並不和下面这段話矛盾，而相反地正是符合的：

> 語言不是一个社会內部这一种或那一种旧的或新的基礎所產生，而是千百年來社会歷史全部進程和基礎歷史全部進程所產生的。語言不是某一个階級所創造的，而是全社会，社会所有各个階級、几百代的努力所創造的。語言的創造不是为了滿足某一个階級的需要，而是为了滿足全社会的需要，滿足社会所有各个階級的需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創造出來的語言是全民的語言，对於社会是統一的，对於社会所有組成員是共同的。因此，語言作为人們交际工具的服务作用，不是替一个階級服务而損害另一些階級，而是一視同仁地替全社会服务、替社会所有各个階級服务。这也就是为什么語言可以一視同仁地替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替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可以替旧基礎服务，也可以替新基礎服务；可以替剝削者服务，也可以替被剝削者服务。〔註一〇〕

因此語言不是資產階級所創造的，而是全社会，社会所有各个階級，在社会進化过程中所創造的。它們对数百代的努力所創造的語言都同时地、相繼地作出貢献。語言的創造不是为了滿足某一掌握政权的階級的需要，而是为使所有各个階級的組成員之間的了解成为可能。語言的演变，从一个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社会制度的时候進行得不会太快，因为它旣很好地为正在消滅的制度服务，也很好地为正被建立的制度服务。但是，並不排斥語言在一較長的間隔之中，在若干世代的延續之中，染上某一社会階級的色彩，因为該階級能够帶动大多数的人民群

众。关於这一点，《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的另一節中談到：

階級影响到語言，把自己專門的詞和語加進語言中去，有时把同一的詞和語理解得各不相同。这是不用怀疑的。

然而，不能由此就得出結論說：專門的詞和語，如同語义上的差别一样，对於統一的全民語言的發展能有嚴重的意义，它們能够削弱全民語言底意义或改变它的性質。

第一，这种專門的詞和語，如同語义上的差别一样，在語言中是如此之少，未必能占全部語言材料底百分之一。因此，所剩下的占压倒多数的詞和語，如同它們的涵义一样，是社会一切階級共同的东西。

第二，在說話中应用具有階級色彩的專門的詞和語时，並不是按照某种"階級"文法的規則（这种文法在天地間是不存在的），而是按照現存的全民語言底文法規則。

所以，專門的詞和語底存在以及語言在語义上的差别，並不是否定統一的全民語言底存在和必要性，相反地而是証实全民語言底存在和必要性。〔註一一〕

这段引文明白地証明着一切階級是按照自己的意識影响並改变着語言的。毫無疑义地，一切階級並不是同时对語言發生同样的影响，而那些在上升中的剝削階級，却比那些处於衰亡中的剝削階級在更大的程度上給語言打上階級的烙印，至於無產階級只有在取得政权之后才有充分可能这样做。斯大林在下文中讓我們注意到馬尔和其他人所犯的嚴重錯誤，这种錯誤在於把一定时間在同一集体中的社会階級之間存在的語言的差别作了过高的估价。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强調發展全民的統一的語言，强調这样一个事实，那占压倒多数的詞和語如同它們的涵义一样，在各个时期中，是社会一切階級共同的东西，这个百分比的估計（百分之一）对於某一階級專有的而其他階級感到陌生的語言成分是同样有效的。

但是，除开这类成分而外，还有許多被某一社会階級所創造或改变出來的詞（就涵义或形式而言）而这些詞帶着一定的涵义和形式为其他階級所采用。社会的改变，並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在階級的影响之下

形成的；就是这些变化，反过來影响着語言。同样，階級通过它們予某些詞以涵义而对人或物表示它們的态度。比方說：genereux（慷慨）这个詞，当初的涵义是“貴族出身的”；其后，由於貴族自視本身体現了一切美德而予这个詞以“高尚的”“寬大的”、“善良的”这类涵义。Noble 这个詞，按詞源說，原义是“孚众望的”；但是在貴族的理解之中，只有他們自己是“孚众望的”，因此，这个詞就有了“道德高尚”的涵义。Ordinaire 这个詞原來的涵义是“通常的”、“正常的”但是剝削階級認为对於他們通常的事沒有一件是够好的，因此，ordinaire 这个詞就有了“坏的”、“劣等的”的涵义。罗馬尼亚語言中 prost 这个詞当初有“簡單的”的涵义，后來由於針对noble这个詞，就有了“農民”的涵义，因为对貴族階級來說，農民是不具有任何品質的，这詞从“農民”的涵义就轉到“缺少才智的”和“劣等”的涵义。所有这类具有貴族色彩的詞，具有新的涵义而被其他階級所接受。这类的詞由於來源和旧的涵义的消失而不再表現貴族階級的意識，而且失去符合某一階級的那种特点。因此我們認为無產階級慷慨而貴族階級相反；我們說一个工人或農民有高尚举动，高尚的举止，可是我們不承認貴族階級有高尚的情感；我們說某人說粗話，就是“髒”話，正是因为我們不習惯听那类的話。总之，我們不承認農民的才智不如貴族。

因此，虽然这类詞就其涵义而言具有某一社会階級的色彩，但是今天並不構成階級之間的差別，而且也不列入斯大林所証实的百分比，因为它們屬於全民的統一的語言。就在这个意义上講，我認为我們应該正确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7953，德文版235頁）說过的一段話，其中証明了語言反映資產階級的意識約一面，因为許多詞具有兩种涵义，一个旧的，从階級來看是中立的；另一个是新的；帶有資產階級烙印，然而这二者変成合於不同於資產階級的階級。因此，只用一个例子來說明，例如法語commerce一詞，涵义是“貿易”后來具有一般“关系”的涵义 ilest d'un commerce agréable（跟他交往是愉快的事）这句話也通用在一个人身上，意思是說这个人从來不与任何人交往。顯然，只有做生意的資產階級才給这个詞加上这个用法。

一个上升的階級是更容易把自己許多專門的熟語加給其他階級，因

此也更容易給語言塗上符合它本階級意識的色彩，这一点是不用說的。因此，从封建社会沒有崩潰的时候起直到無產階級掌握政权之后的时期，語言儘管具有資產階級色彩，还是为社会一切階級服务的。至於工人階級对語言產生深刻影响，只有在他帶动劳动農民階級和進步知識階級，就是說帶动絕大多数人民群众而掌握政权的时候。

在上述國家里面，已經提供了階級影响詞彙的例子，如果我們注視語言在廣濶的时間中的演变，我們即取得証据，証明社会的改变不会影响到語言总的方面，証明語言受到社会階級廣泛的影响。資產階級民族形成的地方，無往而不同样出現民族語言，而資產階級对民族語言的形成是首先有貢献的，这一点是沒有人怀疑的，但是，値得注意的是，民族語言在資產階級獲得政权之前就已經發展了（顯然，不經过資產階級階段的社会主义民族的情况是不同的）。而当無產階級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政权，結果他的政策影响着語言的时候，各民族語言一定融合为各个区域的國际語言，隨即也就融合为單一的世界語言。这首先是擺脫了剝削的工人階級的事業，也是沒有階級的社会的全社会的事業。

---

*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講演。

〔註一〕中文版，20頁。

〔註二〕同上，6頁

〔註三〕《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中文版，48頁。

〔註四〕《苏联共產党（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167頁

〔註五〕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22—23頁。

〔註六〕斯大林：《列寧主义問題》，莫斯科中文版，166頁。

〔註七〕參看《斯大林全集》，罗馬尼亞版，第1卷 104頁。

〔註八〕弗·依·Томашевский：《文学和語言》，收集在《根据斯大林的語言理論來处理苏維埃文藝科学的問題》里。

〔註九〕恩格斯：《反杜林論》，罗馬尼亞版，33頁；馬克思恩格斯《共產党宣言》罗馬尼亞版，32頁。

〔註十〕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中文版，3—4頁。

〔註十一〕同上，40頁，

（北京大学西語系法語教研組譯）

布 拉 格 学 派

——批判特魯别茨科依的音位学說——

謝 尔 久 琴 柯

在西欧和美國資產階級語言学里現在廣泛地傳播着所謂結構的語言学学派，或簡單些說，就是結構派（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这个学派的中心，目前在欧洲是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和瑞士的日內瓦，在美國就是紐約。这个学派主要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和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發展起來的。結構派的代表人物是特魯别茨科依(Трубецкой)和雅柯布遜(Якобсон)。他們在这兩个城市工作了很長时間。

1926年秋天，在布拉格成立了所謂“布拉格学派”。这个学派很快就开展了它的活动。它不僅影响了欧洲一些國家（波蘭、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馬尼亞和法國）的許多科学家，同时也影响了日本和美國的許多科学家。在个别的苏联科学家的作品中也曾表現出这种影响。正是因此，在苏联科学家当中，对結構派这个語言学界的唯心主义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学派曾進行了嚴厉的批判，在結構派分子当中，現在也可以找到那些反对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頑固的敌人，如雅柯布遜以及在方法学上和他站在一起的勃良达尔(Брёндаль)和其他一些人。

“布拉格学派”研究过語言学上的各种各样的問題，特别是普通語言学上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他們基本上是遵循着法國-瑞士学者索緒耳的理論。他們談到語音学和語法的問題、修辞的問題以及文学語言和詩的語言的問題。他們很少注意詞彙学，特别注重音位学（Фонология）。因此，布拉格学派也常称为“布拉格音位学派”。特魯别茨科依在布拉格寫成並發表了他的≪音位学原理≫（Grundzge der phonologie）和一些其他有关音位学的作品。

当然，我不准备講述布拉格音位学派活动的所有的各个方面。因为这会占去非常多的时間。有人問我对布拉格这一派音位学者們的基本观点抱什么态度，現在我就來談談和批判一下这些观点。

我在以前講課里已經講述过俄國科学家們在創制音位理論上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最偉大的功績是屬於博杜恩·德·庫尔特內（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和謝尔巴（Щерба）这样一些俄國科学家。

我們苏联語言学家在对語音学和音位学理論的看法上，目前仍是堅持着謝尔巴院士的原理的。謝尔巴在他晚年的著作（象《法語語音学》等等）里，对語音学和音位理論的基本問題作了唯物主义的闡明。特魯別茨科依和雅柯布遜一度曾是謝尔巴和謝尔巴的老师博杜恩·德·庫尔特內学生。

博杜恩·德·庫尔特內在發展他对語音学和語言問題的看法上曾經歷了一段复雜的路程。他不止一次地考訂和修改过自己的看法。他在他的个别的著作〔註一〕里，描述了功能原則是語言学的基本原則，也就是：所有的語言材料要从它們所执行的功能，換句話說，从它們所执行的任务的观点上來探討和研究。音位的概念与这一功能的原則相联系並在这个原則的基礎上确立下來。音位在語言里执行着区别詞义和区别詞形的功能。

Л. В. 謝尔巴院士剝掉了音位学說上的心理学派和唯心主义的外殼，最后建立了正确的唯物主义的音位学說。他在他的《法語語音学》一書中寫道：“在活的口語里發出來的声音比通常我們所想象的声音的数目要多得多。这些不同的声音在各該語言里結合成数量較少能够分辨詞和詞形的語音类型（звуковой тип），來为人类交际的目的服务。人們在談論个别語音时，正是提的这样的語音类型。我們就把它們叫做音位”〔註二〕（重点是我加的——謝尔久季柯）。

应該注意的是謝尔巴院士談到音位也就是談到固定的語音，也就是談到了实际存在着的物理上的現象在一种語言里結合成为数量較少的語音类型，也就是結合成为一定的語音系統，能够分辨詞和詞形的音位系統。

法語的 ɛ 和 e 是兩个不同的音位：et（和）est（是，存在）。俄語中同样的声音：этот（这个），эти（这些）（开的 э 和閉的 э）不

过是一个音位的不同变体（вариант）。这样看來，每一种語言中歷史地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区别詞义和詞形的音位；在这种語言里它們是这些，而在另一种語言里則是另外一些。在这种語言里可以算作独立音位的語音，到另外一种語言里，也許就僅僅是一个音位的一种变体。

任何語言的任何音位虽然是用來区別意义的，但它同时具有一定的音質（звуковое качество），它是一定的物理上的語音，而这种物理上的語音起着一定的区别意义的，即社会的功能。

謝尔巴院士認为把功能和產生这种功能的东西割裂开來，把每一語言的音位和它的物理生理的特性，也就是和音响發音的特性割裂开來，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他坚决反对把語音学和音位理論分裂开來，反对把音位学划分为能够脫离語音学而独立存在的一个語言学部門。

按照謝尔巴說，音位永远是有語音物理基礎的。但是音位並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現在存在着一些不同的音位变体，这些不同变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發这个音的时候可以有一些物理生理的变体。但是，音位永远还是統一的，这种統一决定於意义。

謝尔巴寫道：“事实上，發問的小品詞“a？”用大声或小声唸，用低音或高音唸，当然会發出在物理学上和生物学上有区别的声音。但是，从語言学的或社会的眼光來看，这是同一个小品詞，同一个語音。因此，在这种場合里，在个别的現象里，不管这些物理学上、生物学上發音不同的“a？”是什么样兒，我們看到的是一种一般的东西，我們用來作为交际使用的正是这种一般的东西。

这种一般的东西决定於什么呢？很明顯的，就是决定於作为語言的基本任务的交际（作用），也就是說，归根結底就是决定於意义：統一的意义使我們甚至於能在多多少少不同的語音里認出同一的东西。〔註三〕

語言的交际功能，做人們的交际工具——这就是人类社会中語言的基本功用。列寧說过：“語言是人类交际極重要的工具”〔註四〕。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也給語言下了同样的定义。斯大林寫道：“有声語言或字底語言始終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为人們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語言”〔註五〕。

这就是苏联語言学家对音位問題的看法。特魯别茨科依和雅柯布遜是兩个白俄。他們抓住了博杜恩·德·庫尔特內和謝尔巴早期的一些体系、索緒耳唯心主义观点把这些体系加以改造，因而將音位学說領進了死胡同。

特魯别茨科依和其他的結構派学者的学說都是依据着索緒耳下面这些論点的：（1）必須把作为超乎个人系統的語言(langue)和作为这一系統具体应用的言語(parole)区别开；（2）語言是建立在对立（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е）上的。索緒耳說：整个語言的机構（механизм）……是奠定在……对立上的，奠定在由对立而產生的語音和观念的差别（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ое различие）上的。按照索緒耳講，“語言学系統中只存在着关系（отношение）”〔註六〕。索緒耳的門徒們，以各种不同的腔調重述索緒耳的說法，把語言了解为結構公式(структурная схема)，完全忘記了語言最重要的作用——人們交际的工具、交流思想的工具、人类社会斗爭和發展的武器。

結構学派“权威”叶尔姆斯列夫（Л. Ельмслев）在其《語言学的結構分析法》一文中明目張胆地說：“必須把語言了解为关系之間的純結構，了解为公式，了解为跟它的那种偶然（語音的、語义的等等）实現相对立的东西”。按照叶尔姆斯列夫來與，“以声音或符号和意义为代表的对比关系中的成分是現实的語言單位”〔註七〕。

特魯别茨科依根據着索緒耳的观点在其《音位学原理》一書中一开头就說，必須把語言和言語区别开，隨后就把在这之前統一的語言学分为兩門“科学”，那就是語音学，或者叫言語語音学，和音位学、或者叫語言語音学。照特魯别茨科依來看，語音学只应該研究声音的音响和發音方面，而音位学只应研究功能方面。特魯别茨科依並且还說：語言学的特点在於：“它徹底地排斥了被研究的語音組合（комплекс）跟語义之間的任何联系”〔註八〕，而音位学应該研究，在一个語言里怎样的声音差別是跟区别意义有关的，这些区分因素（或特征）是怎样相互对待並且是按什么規則配合在詞（或句）里的”〔註九〕。

按照索緒耳講，“語言之中除去差别，沒有别的”〔註十〕。特魯别茨科依完全信仰了这一套，並且把音位学的任务也看作是确立由於語

音对立而出現的那些語音差别。特魯别茨科依說：語音学家“应該注意排斥一切照顧到意义的可能性（即符号的功能）”，而音位学家“只应該注意語音中那种有一定功能的东西”（即区别意义的）〔註十一〕。

特魯别茨科依确定語音差别是由於对立而產生的，因而，他在規定音位实質时，也是从音位对立出發。他寫道：“語言中一切能区别意义的語音对立，就是我們所說的音位对立”〔註十二〕。下面他又下了一个音位單位的定义：“每一个这样对立的成分，我們称为音位（区分的）單位”〔註十三〕。最后他就給音位下了以下的定义．“語言中不能再分解为更短的、一个接續一个的單位的語音單位，叫做音位。这样一來，音位就是語言中最小的語音單位”〔註十四〕。

这样看來，按照特魯别茨科依的說法，音位只是对立中的一个成分，至於音位現实的音質是什么以及它的音响發音的特征是什么，这些就毫未引起結構派音位学者們的注意。他們在研究功能时，是把功能和產生这种功能的东西割裂开來的；他們在研究人类語音的区别意义的功用时，是把这种功用当作非物質的、跟人类实际語音的本身脫离的东西來处理的，是把这种功用当作是可以不管語言的基本功能——作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而能独立研究的东西來处理的。語言似乎变成了一个空的死公式，变成了跟它的基本功能毫無关系的一些对立物的体系。

結構学派关於所謂的“原型音位”（архифонема，或протофонема）的理論也是徹头徹尾的唯心的。这种“原型音位”，个别作者还称之为“混合音位”。

因为音位，按照結構派的算法，只是对立中的一个成分，所以它只能在把它和另一个成分对比时才顯露出來，只能在它們存在於相同的語音环境的條件下顯露出來。但是語言里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在語音不对立时也是不同音位。例如，俄語詞尾的清輔音和濁輔音（луг 草原，лук 弓、葱，都唸成лук；мод样式，мода 的多数第二格，мот 敗家子）；輕讀的 о 和 а（нагой 裸体的，ногой 脚，нога 的單数第五格）。按照謝尔巴院士的看法，这里是音位的條件变化（позиционное чередование）г/к；д/т；о/а 等等。按照結構派看，因为对立在这些情况下消失了，中立了，因此应該把發出來的这个音看作是“原型音位”。特

魯别茨科依認为：应該把原型音位看作是兩个音位的共同的区分特征的总合，例如 г+к，д+т，о+а，等等。但是結果得出“原型音位”沒有实际的語音特点，因为 мод 和 мот 中的 т 或 лут 和 лик 中的 к，这些“处於末尾的原型音位(特魯别茨科依語)可以得到的定义只是舌尖破裂音 д/т，或者是舌后破裂音 г/к，不表示清濁。但是要知道，这样的音位在人世間是沒有的——俄語中每一个輔音不是濁的便是清的。如果这个音不是濁的，也不是清的，那么它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是僅只依据对立，僅只是确立差别和对立的关系，那么就完全不能在沒有这对立的地方确立音位。例如俄語 где（在那里），здоровье（健康）兩詞的第一个音 г 和 з。这里又是唯心主义的死胡同，布拉格音位学家及其門徒們造成的死胡同！他們輕視語言的物理本性，把語音的功能和它的音响發音特性分裂开來，承襲索緒耳的那些在方法学上極端惡劣的觀点，因而入窮途末路。玩弄对立，企圖把語言看作是毫無实体的公式，輕視人类言語的物質、語音的本性，形而上学地把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的觀念对立起來，以及形而上学地把語音学和所謂的音位学割裂开來——这就使布拉格音位学派、結構派音位学者陷入唯心主义的迷宮。

布拉格学派以及其他結構派分子的主要毛病就是：他們企圖把語言和它的“自然物質”，和它的物質的实質分裂开來。特魯别茨科依是布拉格学派以及其他結構派分子中的“权威”。他在他那本《音位学原理》書中敍述了結構派音位学的所有的基本論点。因此，我就專講了特魯别茨科依的学說。他从俄罗斯老师那兒抄襲了音位有区别意义的功能这一論点，后來由於依据着索緒耳的唯心主义觀念，把这一論点加以改造，从而就歪曲了它。

对这一問題有兴趣的，想对布拉格学派有更多了解的，可以看一看列施卡（Лешка）的《論結構派》（《語言学問題》1953年第5期）以及1952年和1953年結合音位問題的討論在《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和語言部分》上發表的那些文章。（刘涌泉、陈鹏譯）

---

* 这是謝尔久琴柯教授对中國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語文系干部講稿中回答問題的一節。

〔註一〕博杜恩·德·庫尔特內的碩士論文《論十四世紀以前的古波蘭語》是他用新观点处理語音問題的第一部著作。"Фонема（音位）"这个名称是博杜恩·德·庫尔特內的学生克魯舍夫斯基（Н.В.Крушевский）創造出來的。克魯舍夫斯基第一次应用这个術語是在《印洲語元音方面的最新發現》这篇論文中（見《俄罗斯語言学报》36頁，1880年出版）。博杜恩·德·庫尔特內專門談音位的著作是他發表在勃罗高兹（Брокгауз）和葉伏龍（Ефрон）的《百科辞典》中《音位》一文（見該辞典1902年版，36卷，240頁）。关於音位这个問題，他在他那本印刷过好几版（最后一版是1917年出的）並且能反映他后來的观点的《語言学導論》里也談了很多。

〔註二〕謝尔巴：《法語語音学》，1939年，2版，16—17頁。

〔註三〕《法語語音学》18頁。

〔註四〕《列寧全集》，20卷，368頁，《論民族自決权》。

〔註五〕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46頁；人民出版社版。

〔註六〕F. de Saus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索緒耳：《普通語言学教程》）1922年巴黎出版。引文見1933年莫斯科俄文翻譯版（Ф.de Соссюр，《Курс обще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譯名同上〕），120頁。

〔註七〕叶尔姆斯列夫：《語言学中的結構分析法》，見歌本哈根出的《語言学报》（Acta Linguistica），1950—51年，6卷2，3兩期，61頁。

〔註八〕特魯別茨科依：《音位学原理》，13頁。

〔註九〕同上書，14頁。

〔註十〕《普通語言学教程》，（俄文翻譯版），199頁。

〔註十一〕《音位学原理》一書，14頁。

〔註十二〕同上書，32頁。

〔註十三〕同上書，32—33頁。

〔註十四〕《音位学原理》34頁。

研 究 方 言 的 方 法

C. C. 維诺特斯基著

我們的科学从所謂語言"新学說"的橫暴势力下解放出来以后，在出版的語言科学文献当中，有不少的著作專門研究全民語言和方言在它們存在的不同階段上的相互关系問題，研究語言的發展跟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和社会的歷史之間的相互联系問題。这些著作很重視全民語言在一种地方方言的基礎上，在該方言已經具备了被提升和發展的那些歷史条件下形成的过程。闡明已經形成的民族語言的基礎的那些著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們叫人能够更加了解这些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認識它們变化的活生生的趋势以及苏联各民族文学語言的發展前途。这些文学語言总是跟它們的民間基礎即各个地域方言緊密地联系着的。

* * *

虽然如此，苏联各語言的方言学研究还是進行得極不平衡的。其中有的还只有零星的研究，不一定深入，也不是有計划的。还有个别一些語言，方言学方面的研究还沒有开始。必須指出，在若干共和國里，民族方言学問題的研究不久以前还受着反科学的馬尔的方法学的阻碍。

只有俄罗斯語、烏克蘭語和白俄罗斯語的方言学有了已經建立起來的傳統：这些語言的方言学研究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开始了。在这个时期里積累了丰富的方言学材料，这些材料当中有的是專門的大綱問題集（программы-вопросники）的"答案"，有的是方言短文（диалектные тексты）的記錄。在这个时期里还出了大量的科学著作和教学著作，寫了許多綜合性的專題論文，編纂了一些方言詞典，其中包括一些不朽的著作，象前世紀中叶科学院出版的≪大俄罗斯方言詞典稿≫和达里（В. Даль）的詞典；1915年出版了≪欧洲部分俄罗斯方言地圖稿≫，

这是所有东部斯拉夫語言的語言地理学方面的一个初步的概覽性的著作。

可是，俄語、烏克蘭語和白俄罗斯語方言*的有計划的研究只是在苏維埃时代才特别加緊开展起來的，这个时候开始了方言地圖集的編纂工作。在这个时期，基本上也开始了对苏联其他語言的方言研究，如塔塔尔語、烏兹别克語，卡累利亞芬蘭語、科米語、莫尔达維亞語等。

我國各民族語言的方言学研究是必須的：这对於民族文化建設事業有直接的关系，它將可以用作展开語言史和社会主义时代語言發展問題的綜合研究的基礎。

在估計到各語言的民族特点的条件下，方言学研究的一般組織办法可以在俄語、烏克蘭語和白俄罗斯語以及部分地根据卡累利亞芬蘭語、科米語、塔塔尔語和莫尔达維亞語的方言研究的丰富科学經驗的基礎上拟定。

虽然方言学工作的种类很多，而擴大和加深研究的領域也有無窮的可能性，可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可以明白地指出來，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在不同語言的領域中工作的方言学家們統一起來，这就是从人民群众的活語言里，从反映在文学遺物和現代文献的語言里收集材料，从理論上綜合这些材料，並且在最后总結的时候把跟社会的歷史發展，跟这种方言和語言的使用者的歷史处在复雜的相互关系中的語言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揭露出來。

为了順利地开展方言学工作，上述工作必須在高度的科学水平和巨大的規模上進行，这就是說，要包括很廣的地区，各个方言的研究要深入，而且要在保量緊縮的期限內完成。最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民族發展的条件下地方方言一年比一年快地失掉它們自己独有的特点，接近於民族語言的文学加工形式。

方言的科学研究的集体性是必要的，这只有各共和國的科学領導机構才做得到。按照地方的条件，这可以是：师范学院或者大学的語言学教研室，科学研究机关和科学院分院的語言学部，等等。

这些机構保証方言学干部的培养，拟定計划，組織收集材料的調査隊和个人，以及撥給經費。这些机構为在应有的水平上把收集的材料加

工和概括創造条件，还要把它出版。

方言学研究也可以由个别的人按照个别的方式進行。在所有集体的以及个别研究者的工作進程中，应当有担負“方言学中心”的責任的机構，它应当协調他們的工作提綱，定期召集各地区和各共和國的方言学家來交流經驗，商量問題，並且应当召开方言学会議。

在方言学方面研究得很少（或者根本沒有研究过）的語言領域內的工作特别复雜。我撇开民族文学語言發展的問題不談，实际上这些問題是不能不跟方言学問題接触的。在决定作为全民語言基礎的主導方言和确定文学語言的規則的时候，这些問題当时已經由各族的語言学家、文学家和文化工作者在各地提出來了。

开始工作的时候，首先要收集关於語言的个别要素（詞、形式、語音等）的任何地域性变体的一切資料並且加以系統化，哪怕这些資料是片段的和孤單的。

必須首先考慮到人民自己都知道並且指出來的那些方言差别，也就是实际上許多人都知道，而不只是受过專門教育的人才知道的那些現象，这些差别常常伴隨着某些顯著的民族学上的（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特点。比方，在烏拉基米尔省的边緣，о化和а化的俄語方言之間的界限相当於以前妇女的特种服裝的分布界限，特别是，象当地老住戶直接指出的，北方穿 сарафан（農村妇女的一种沒有袖子的有帶子的長衫）而南方穿понёва（農村妇女穿的一种有褶襞的短裙）。

从楚瓦什的北方到南方，从 Вирьял 大方言区到 Анатри 大方言区（其間的差别之一是北方讀 о 的地方南方讀 у），我們在1948年經过那里的調查隊观察到了楚瓦什人民服裝类型的平行的更替——北方穿白衣服黑裹腿，南方穿花衣服白長襪子。

有时候大家知道的方言差别也反映在民間創作（фольклор）上——反映在个别民族学的、方言的集团的民間綽号上，反映在諺語、歌謠和軼事里——往往帶有褒貶的成分，或多或少地是善意的对别人的語言特征的嘲笑（例如，大家都知道的“ягуны”这一个俄罗斯居民集团的綽号就是由於他們的發音用 я б,адна ɣ б,бéль ɣ a代替 евó等而來的）。

人民平常都看得出大约語言区的基本特征，例如，北部俄語大方言的 о 化和 ц 化等。应当說科学上采用的一些俄語方言学術語——例如 о 化，ц化，дз化——是來自民間的。

在初步調查中，業余地方志学者（краеведы любители）能有很大的帮助。这种人集体農庄庄員和農村知識分子当中就有不少。（尤其应当傾听本地老住戶的意見）。

文献的研究是預备工作的独立部分。在一些著作（書籍、論文、文件）里可以遇到对於某些方言特征的直接指示，对於这些方言特征的地理分布也或多或少地有精确的規定。为了这个目的，要收集用本民族語言或者其他語言寫的語言学著作和有关歷史、地理、民族学和藝術学方面的著作（例如，关於楚瓦什語和布里亞特語方言学的材料可以在謝里曉夫〔А. М. Селищев〕的著作中涉及伏尔加流域和西伯利亞的俄語方言的地方遇到）。

另外一部分文献可以用作直接取得方言材料本身的來源。研究文学的遺物和古代文件（其中包括用俄語寫的）就是这个目的。大家都知道，从保存在中央、各共和國和各州的档案里的古文牘里的地方性文書（人口調查表、关於疆界和經济的書籍、所謂戶籍調查簿等等）可以見到許多地名、人名以及在民族方言学上饒有趣味的个别的詞和短語。此外，还要研究古老的印刷品，例如人民閱讀的小册子，初等学校教科書以及（主要是为研究伏尔加流域、烏拉尔附近和西伯利亞的語言）傳教士的各种出版物。这类書籍是在有些民族文学語言形成之前很久出現的，因而自然可以自發地反映出方言成分（диалектизмы）來。

現代文献，尤其是藝術文献的方言学分析需要特别的处理办法。在这里，在作者的語言里可以遇到他自己家鄉話的方言成分。必須把这种方言成分和作者为了創造藝術形象当作修辞手段來使用的方言成分区别开來。

民間創作的文献需要愼重地处理。因为，大家知道，民間創作的語言並不是方言学家首先应該处理的嚴格地地方化了的現象。民間創作里所見的方言形式有时候是記錄这一作品的人的方言里絕对沒有，而是屬於另一种方言的。这些特征在这里只能按照傳統來用，而且决定於作品

的風格（例如，詞里重音位置的变动）。民間創作里所見的語言特点有时候是古語成分（архаизм），对現代口語來說是非常典型的特征。所以，有些方言学家对於民間創作有时采取跟对於有充分价值的方言学材料同样的态度就会造成科学結論上的嚴重的錯誤。这並不是說民間創作根本不適合於方言学分析之用，不过应当記住民間創作材料的特殊复雜性，因为忽視这种复雜性对所研究的方言結構就会產生錯誤的观念。所以，研究者在描寫一种方言的时候应当首先而且主要依靠的不是从民間創作中得來的資料（这只能作为輔助的材料來利用），而是活的口語材料。

在工作的初步階段的总結中積累了一定数量的材料，这就已經为初步定方向打下了一些基礎。这样就可以在一般的特征上拟定各个地方方言的主要分区以及跟它們相应的有顯著特征的地域。

俄罗斯科学史上有过这样一种被証明是完全正确的方言学資料的初步概括工作，因为它刺激了俄罗斯方言学進一步發展。在前世紀中叶，《現代大俄罗斯語詳解詞典》的編者达里根据一些極其一般性的資料就能繪出俄語主要大方言分布的相当正确的地圖。

許多方言学家的著作把这張地圖進一步精确化了。在基本特征上这張地圖是正确的，这是現在可以由方言地圖集的各地圖來証实的。

这样，由地圖上确定的方向把关於各种方言的各种知識加以初步归納就可以拟定（虽然是近似地）所研究的語言的各个主要方言地帶的分布情况。

也暴露出一些弱点來，这就是地圖上的“空白点”，也就是方言学家还完全不熟悉的地方，或者是关於这些地方只是極不明确的、片断的、不完全的知識，不足以規定方言的最一般的特征。

所有这些空白点是要進一步由大規模的專門規划的方言調查來消除的，这就是組織有計划的民間方言研究的第二步。

这种調查的一般計划应当在相应的方言学中心制訂出來。

結合关於民間方言分布的初步知識去利用人民的歷史資料和地方的歷史地理学和經济地理学的資料，就可以确定在部族、國家和全民語言的形成歷史中十分重要的各个地帶，而且可以把它們当作特别深入的專

題研究的对象。

比方，俄罗斯語的方言学家注意的中心落在俄罗斯部族語言形成所在地的古代东部斯拉夫人居住地区的方言和俄罗斯民族語言的基礎形成所在地区的方言（这就是烏拉基米尔、莫斯科、奥勒尔、庫尔斯克等省）巴什基里亞語的方言学家則顯然是把作为巴什基里亞民族語言基礎的东南部各方言当作首要的研究对象，正好象烏克蘭語的方言学家以同样的理由特別廣泛地展开波尔塔發和基輔各方言的研究一样。

在民間方言科学發展的一切階段上对於处在各方言地帶的一定的点上的方言進行專題研究是一項迫切的任务，尤其是在可能利用一些反映地方方言过去狀态的文獻的条件下，研究工作具有歷史的深度的时候。这样就表現出方言变化的一系列的漸進階段，由此可以更明顯地闡明它發展的規律性。

在宣傳方言的專題研究法（这对於民族方言学發展的最初几个階段是迫切的）的时候，必須提出在研究的任务和范圍上可能有的差別。

可以成为研究对象的有：个别的語言特征（例如，在語音方面，俄語方言的 ц 化或者塔塔尔語方言里的类似現象），或者是構成方言結構的一部分的一群語言特征（例如，在形态学方面的动詞变位），或者是作为一个完整語言結構的整个方言的全貌，甚至是組成更大的語言單位——大方言——的一群相近的方言。

一种語言現象如果用歷史比較法就其在各个时代的逐漸演变加以探討，那末这种研究就可以成为深刻的歷史的研究。如果某一个現象在文学遺物里有記載，研究过程中就会容易些。有时候可以發現一个現象（形态学的或者語音的）的發展所經歷的各階段作为殘余巩固在詞彙里，巩固在它的某一部分里（例如，在加里寧省虽然 ц 化一般已經衰退，但是在地名上还有保存 ц 化形式的情况，比方 Теблеш 区的 Киверицы 村的名字就是一个例子，它的官方名称叫 киверичи）。

不能把觀察語言事实的現狀和歷史的研究截然划分开來，因为对於發展中的語言的一切現象作必要的考察，总不得不考慮到它們的已經衰亡的或者正在衰亡的形式，並且划分出有進一步發展傾向的形式。

在这兩种情况下——就其現狀研究一种語言現象或者追溯它在各个

时代的發展階段——都不应当孤立地提出某一个現象，而是应当联系这个方言的整个結構來提出。这一点是从現代語言学的方法学的原則得出來的。

可是，我們要重复一遍：在建立方言学的最初几个階段中，更有价值的是对个别方言的結構的全面描寫和說明，因为一群方言的概括描寫不能够在必需的全面性和深度上揭露出作为整体的一个方言的特征性系統——这系統具体地表現在它自己的各个基本标志上——，而个別問題的研究在沒有其他方言（这些方言还沒有相应地加以研究）的比較資料的条件下总会是片面的、表面的。

对一个方言的系統作出完整說明的要求是相对的。在說明了作为方言結構上不多的然而却是基本的特征的系統以后，任务就可以接近於解决了；也可以更細致地來做这一項工作，按比例地擴大並且加深語言結構的所有組成部分的揭示，最后，可以就現代科学水平所允許的，最細致地來做这个工作。語言分析的所有这些类型就象同心圓似地彼此关联着；其中每一个都应当是自身完全的、完整的。

从歷史發展上闡明方言的語言結構的一般任务在原則上不能跟对全民語言作語法和詞彙的描寫的任务分开來。不过这里也有一定的区别，这些区别只是决定於方言的專門特点本身——方言是語言的地域性的变体，它服从於更高的形式，即全民語言。

由於初步知識的積累和关於个別方言（它們彼此有一定距离，处在所研究的語言地帶的不同部分）寫了一系列“据点”專題研究，就可以得出关於各主要方言的語言構造狀況的观念。同时也就需要更詳細地闡明和确定个別語言特征的地理分布。

这是在建立民族方言学的后一个階段上用語言地理学的方法，通过方言地圖的編纂來实現的。方言地圖可以用來說明某些方言的特征和各方言之間以及它們各群之間的地域界限。

不难理解，方言的專題研究决不隨語言制圖方法的应用而停止，而只是專題研究在進行歷史比較的概括时得到了新的支援。

方言在專題描寫中的反映和它在方言地圖集中的反映，其間并沒有原則性的区别。差別只在於：在專題研究里方言的結構得到更充分更完

整的描寫，而在地圖集里方言的結構的表示只是限於几个基本特征的枚举。

对於古老的聚居地区，使用語言地理学的方法來研究方言是完全正确的，在这里是一大片方言，其中沒有較晚的移民——这种移民会帶來特有的方言交錯現象，会造成各地出身的居民雜居的現象（例如，新建的工人村就是）。由於雜居区沒有統一的典型的方言，这样的点是不能够制圖的。

所以，在各种居民雜居的地方，由於沒有密集的方言地域，制圖学的方法不能够揭露对方言学有价値的那些明确的語言界限——等語綫（изоглосс），因为这里根本就沒有等語綫。在这种情形下，各个居民点的方言的專題研究是比較合適的。

因此，將來的莫尔多瓦語方言地圖集顯然將代表尔嘉人（Эрзя）、莫克沙人（Мокша）和紹克沙（Шокшинский）莫尔多瓦人的諸方言（最后一种大概是向中世紀消失了的 Мещера 方言过渡的环節）的原來分布地域，但是將不包括伏尔加河左岸（Заволжье）和西伯利亚西部的各种莫尔多瓦居民的散居点在內。

为地圖集收集材料的机構一定要由共和國的統一的方言学中心來調整，因为这个工作帶有大众科学的性質，需要有廣泛的准备，嚴格的計划以及收集材料和随后对材料加工的方法的一致性。

为編纂方言地圖集制定收集情况的“大綱”是方言学中心的首要任务之一。

“大綱”的科学水平应該指靠方言調查参加者的基本干部，即是說，指靠受过專門語言学訓練的人材。

“大綱”的形式是帶有例子的問題集，这些例子涉及方言中語言結構各部分（語音、形态学、句法、詞彙）的基本的和專門的特征。

“大綱”里不应当有关於該語言的所有方言都相同的一些現象的問題，应当只包括能够揭示某些方言差別和独有的方言特点的問題。

問題的选擇和表述要做得正确就得具有关於所有方言的一个总观念；从初步收集关於这个語言的各个方言的知識的經驗中，从一系列的方言專題研究的資料中就可以知道这些方言的存在情况。

为了“大綱”的实际应用，必須按照邏輯並且依照嚴整的次序來安排各个問題，不要过分擴大“大綱”的一般范圍。

給予方言研究者一定的独立性（当然是在他具有充分科学訓練的条件下）可以使他以更大的責任心对語言事实作評价，使他的注意力敏銳，並且發揮他在“布置实驗”时的主动精神。当他用指点問題的方法跟地方方言的代表談話的时候必須听到活用中的語言結構的每一个要素。

編“大綱”的时候必須考慮到跟研究其他在結構上相近的語言的方言的类似大綱有可能的协調，特別是当后者在地域上相鄰的时候。这种方法使我們能够更容易地揭示几种語言的相似的特征，並且在地圖集的地圖上更能明顯地把它們指示出來。这些特征当中有的可以追溯到这种語言在古代的共同性，有的則反映發生得較晚的語言間的联系。

俄罗斯語和白俄罗斯語的方言学大綱就是方言学大綱协調一致的例子。很可能其他的大綱，比方說，巴什基里亞語、塔塔尔語等的大綱也能够照这个样子做。

平常在“大綱”里都附上一系列的講方法的論文，在这些論文里有下列各种說明：地圖集的任务，收集材料的統一化的方法，統一的标音法，对得到的資料的初步加工。

編好的“大綱”要經过廣泛的科学討論，但在改訂以后就要肯定为現时唯一的必需采用的“大綱”，用來收集編制某一語言的方言地圖集的材料。

在展开進一步的工作的时候就要估計到可能参加方言調查隊的各个机構（师范学院、地方教师專修学院等）。方言学中心要預先把确定下來的“大綱”和补充的指導材料分送給他們，分配他們調查的地区，确定調查“網”，也就是拟定具体的居民点（通常是均匀地分布在一定地区的点，彼此相去10至15公里），这些居民点的方言应当按照采用的“大綱”加以研究。方言学中心还要規定完成工作的期限。

方言調查隊照例是在暑假進行工作，因为調查隊的参加者除了科学机关的合作者以外，就是大学，师范学院和教师專修学院的学生。

收集來的資料要就地整理，調查时期一結束之后就直接提交方言学

中心。

随着不同聚居程度的調查地区的材料的積累，方言学中心的工作就進到了下一个階段——編制方言地圖集的地圖和附注。

在应有的科学水平上進行这样群众性的方言調查的保証是有計划地培养將來为方言地圖集和方言的專題描寫收集材料的干部。

各学院里培养調查隊参加者的方言学小組和專門研究班的課程平常是正規地在学年中進行的。

在这些課上，研究"大綱"的內容，進行活語言的記音实習，随后將这样得來的語言材料加以分析。这一切可以使未來的方言学家熟悉科学研究的技術並引導他們从理論上和实踐上掌握方言系統的概念，引導他們了解有关問題的全部环節；确定方言里典型的东西，闡明方言的不同断層（слой），以及选擇發音人（他們是我們所研究的方言的代表，他們的話是我們所要观察的）。

方言学家在他的实踐中常常碰到龐雜的語言环境。本質上統一的方言好象分成了几个断層，代表着这个方言接近於民族文学語言的不同階段（在我們的歷史条件下，方言是应当随着时間的推移溶入到民族文学語言里的）。

把方言分成先進的、中間的和傳統的（有时叫做古老的"）断層的办法已經是死板的分法了。这种分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在分析这种复雜現象（作为处在歷史發展中的完整結構的方言）时，不如說他帶有技術方法的性質。

但是在决定方言的断層的时候不能从說这种方言的人当中有不同的社会集团出發。这种不同的确存在於現代苏維埃農村中。在斯大林关於語言学的著作發表以前許多方言学家所主張的一个原則是絕对錯誤的，这就是認为仿佛集体農庄庄員的社会覺悟水平跟他的方言水平之間有直接的絕对的依存关系，仿佛農村積極分子、工作隊長、農庄先進生產者必定是方言的先進断層的担当者，而其余的集体農庄庄員則使用方言的古型。把語言当作上層建筑來了解的庸俗社会学的这些原則在方言学家的实踐中和現实一接触就被粉碎了。

問題在於集体農庄庄員的社会主义覺悟和文化的發展比他們活的方

言特征的消失快得多，語言結構固有的穩定性就表現在这里头。積極分子在社会上的先進地位推动着他們的教育的提高——他閱讀得多，上專門的課，在大会上發言，为了交流經驗和提高技術到其他農庄去，到城市去——这一点無疑是正确的。所有这一切都为迅速地改变他的言語創造了条件，但是这全是第二性的、从屬性質的因素；言語的方言标志的消失是时間問題。要知道，就是在苏維埃知識分子中間也遇得到說話帶着一些方言成分的人（这方言成分往往是語音性質的，这有它深厚的原因）。

过去有些方言学家曾經帶着关於農村語言分化的絕对社会制約性的偏見來研究方言（甚至於得出这样荒謬的論断，說什么20年代的方言学家可以觀察到当时農村里的富農分子加緊抱定古老的方言，仿佛是在努力使它穩定，而先進的社会分子——貧農、雇農——則很快地按照什么“無產階級的”語言規范來改造自己的話，而“無產階級的”語言归根到底又跟文学語言等同起來），我們这个时代的方言学家在反对上述方言学家所宣布的原則时，应当每次都以充分的責任感來解决困难的任务——从語言学本身的資料出發，在本質上統一的方言中区别出它的古老的和其他的断層，而这是只有具备了語言及其方言的歷史事实的知識並且对該語言的环境加以深入研究之后才做得出來的。

这並不是說，方言学家应当机械地选出語言里起源上最古老的要素並把它們列入方言的傳統断層。大家都知道，在方言里遇到的不僅有古詞語而且有新詞語，例如，南俄方言里有不定式 братцыть 和第三人称形式 несутцуть——这都是新造的詞。

不難了解，除此以外还必須从民族学方面（姑且这样說）說明現象，也就是确定現在当地居民中什么样的文化·年齡集团代表着这个或那个地方話类型，因为只有联系着方言生存所在的社会的歷史才能够了解这个方言的現狀及其歷史。語言材料本身常常顯示：社会主义農村所特有的居民的積極參加社会生活能够促進方言更快的、虽然是逐漸的接近全民語言。

說方言学注意的中心应当是發展中的方言是一点也不錯的，追随馬尔的方言学家曾經惡意地歪曲这个原理並且以他們对語言歷史的虛無主

义指引研究者只去注意全民語言的要素（主要是它的詞彙和句法，因为他們对語言学的这些部門估計过高）如何被方言吸收的过程。

“新学說”的追隨者不是考慮到方言結構的全部复雜性，在这些方言結構里新的語言特征和古老的語言特征处在相互作用中，他們故意忽略古老的特征。他們对待古老的特征就象对待討厭的殘余一样，仿佛是以前存在过的史前語言多样性的零星殘余一样。

他們用这种方法取消了对馬尔派不利的歷史方言学的問題，这些問題的闡明必然会指明組成一个語言的各个方言在起源上的共同性和本來的親屬关系。他們掩藏了对社会变革沒有直接依賴关系的語言內部規律的存在；模糊了方言界限的存在，这最后就引導到对於作为語言的地域性变体的現代方言的否定。〔註一〕

他們竭力鼓励人們不要考慮个別方言的專門特点和不同的方言基礎的作用，鼓励人們去研究仿佛对一切語言都是普遍的方言接近文学語言的唯一巨流。下面說的这一点可以作为他們的特征。在馬尔派典型的过分注意詞彙学的情况下，他們不能正确地評定語言变化的各个暫时階段、臨时適应的个別事实、文学形式的歪曲（象благадир мытыхве, eхтанабиль之类），並且把这种“發育病”看成是進入方言詞彙的某种語言結構的所有物，然而事实上这类暫时現象毋寧是屬於个別的人說話范圍內的事，它們很快就会消失或者被糾正过來，在方言結構上一点痕迹也不留下。也有人作过天真的尝試，要将MTC（机器拖拉机站）、трактор（拖拉机）、бригада（工作隊）这类詞制圖，好象苏联还有社会主义文化不曾滲入的角落似的，在那些角落里沒有这些詞彙單位（лексема）或者存在着某种詞彙变体代替了它們似的。

同时必須堅决地指責向來存在於許多方言学家中間的一种傾向，这就是在方言中主要是努力去搜索它的古老要素，竭力暴露方言的异邦情調（экзотика），並在自己的描寫中强調这一点。这样一來，方言結構的客观圖画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歪曲了，因为在描寫中把这一点提到首要地位和“濃化”方言中衰亡着的要素就造成了对它們在方言結構中的作用的誇大。五六个ц化的例子被記錄下來，而几百个沒有ц化的例子却給放过了！这样，方言的真实情况，它的正常的和新出現的特征就

被蒙蔽，方言發展的远景就被歪曲了。

为了揭示方言的活的結構所固有的基本規律性，在描寫中必須在現代典型的方言結構的背景上找出它的衰亡了的和正在產生的要素的正确对比关系。不这样就不可能按照現代語言学的要求研究运动中的方言。

在跟方言研究法有关系的許多問題当中还应当指出一个对方言学家極其重要的問題。

实踐表明，必須尽量提高觀察活語言——方言学家研究的基本來源和对象——的技術和文化水平。

問題涉及記錄語流（поток речи），作出能正确反映方言結構及其發展的活的規律性的有充分价値的原文。取得联貫文句（связанный текст）——个别的句子，語叢（синтагма）——的較大片段总是需要的，因为其中更充分地反映着語言系統的專門特点。不过，不管怎样努力去作出丰富的联貫文句（特别是在初搞方言学的人）也难免有記錄不够精确或者格式化（стилизация）的毛病，以及造出一些会減低全部工作价値的人工"梳理过的"例子。

即使記錄得很完善（指記得迅速而又精确），消極的記載还是不能揭露方言的語法構造、詞彙和物質外壳（語音系統）的一切細節，这首先是因为方言学家通常不可能在所研究的方言环境里多逗留，以便充分認識在自然談話中表現出來的方言的結構。問題在於：如果說方言里有的要素（例如語音的几个基本标志，象俄語方言的 a 化）可以在最初听到的語句中逐字發現，並在随后的觀察中确定它們的規律性的話，那末方言里还有一些要素（例如，在它的形态学系統中，在詞彙中），由於种种原因在活的語流中是極少碰到的。大家都知道，很可能在農村中过了一年多却一次也沒有听到某几个詞，如果沒有發生过使用它們的动机的話（这特别跟詞彙的古老断層有关，一般說來，它对方言的基礎和方言歷史的表述会有重大的意义）。方言学家都知道，在跟地方方言的代表談話的时候語言的許多要素（特别是語音和形态学方面的）是不能直接去問的，更不能在直接的問題中暗示它們，这样做会引起回答中对方言学家自己所讀的形式的机械的重复，对它或多或少地有意識的摸仿。为了發現方言結構的許多本質的要素，方言学家通常使用指点問題的方

法，这个方法的一切微妙处是不能預料的；由於研究实踐的結果它可以达到完善的地步。

方言学家在和当地居民接觸的时候总找得到有語言学天分的操該种方言的人，他們对語言的各种問題有兴趣並且懂得方言学研究的任务。

可是利用这些人的觀察力，直接問他們某个詞的發音或者某个很少碰到的形式的用法的时候应当十分小心，而且在这种場合得到的資料必須在自然談話的条件下加以核对。如果地方方言的代表能講出某个詞的意义、叫出物件的名称、說明它們在日常生活里的运用等等的話，一般說來，“直接”詢問法在研究詞彙的时候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

所有这些注釋的記錄在任何場合都一定要遵守統一标音法的規則。这种記錄可以为闡明語言的其他部分（語法、語音等）的問題提供大量的材料。大量記錄的積累以及必須的就地加工整理（以便立刻弥补偶然造成的缺陷）使我們能够十分完全地揭示方言的各要素在使用上的規律性，使我們能够理解方言的在發展中的結構。

（張永言譯自《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报告和消息》，第6集，1954年。这是1953年5月作者在全苏描寫語法学、詞典編纂法和詞彙学会議上宣讀的一篇报告。）

---

* говор 譯“方言”，наречие 譯“大方言”。——譯者

〔註一〕关於这一切可以看費林（Ф. П. Филин）自我批評的文章，載《反对語言学中对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曲解》論文集（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局出版，1951）。

就苏联經驗談方言研究方法

——在中央民族学院蒙語調查隊所作的报告（節要）——

苏联專家　布·哈·托达叶娃

准　备　工　作

1．收集文献中已有的全部方言材料並使之系統化

在着手研究某些方言之前，首先应該收集語言各要素在各地区呈現的某些变体的材料（包括形、音、义等）並使之系統化。这里首先要注意人民群众自己覺察到的那些方言差别。这些差别常常是和顯著的人文学方面的特点有关的。

研究文献也是准备工作之一，在文献中可以發現比較正确地肯定了的方言特点及其地理分布情况。这指的是語言学、歷史、人文学、地理等方面的文献。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也要注意到文字的古蹟、古老的文件等。但是对待民間創作的原文要特别愼重。著名的俄語方言学家，如：П.С.庫玆湼佐夫教授，Р.И.阿瓦湼索夫教授，С.С.維索特斯基教授等在其著作里向青年方言研究者預先指出了这一点。С.С.維索特斯基說：“一个方言研究者首先应該依靠的不是民間創作原文中所吸取的材料（这种材料僅能用來作为輔助材料），而是活的口头語言的材料。”〔一〕

在俄語方言学的文献里对根据民間創作的記錄來研究人民方言特点的問題有着另一种略为不同的观点。А.П.叶符根叶娃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这可由其研究作品中提到的下面一点得到証实：“口头作品的藝術語言和詩篇的創造者、使用者的活的語言之間有着有机的联系，恰恰是活的語言才是藝術語言的基礎，藝術上的表达手段不僅和活的語言一起形成而且和活的語言一起生存和变化，因为藝術上的表达手段和活的

語言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二〕Г.П.谢尔久孝柯的看法同样也应該認为是正确的，他認为：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地方方言基礎上創造了許多民間口头創作的藝術作品。因而很自然地，在研究反映拥有許多歷史事件的人民生活的口头藝術創作时，我們不能忽略研究活的人民語言，因为它是極偉大的文化宝藏，是交际工具，是發展和斗爭的工具。許多世紀以來人民在其生活中使用了它。

因此，我們在研究任何一种文藝作品的語言，研究民間口头創作的語言特点时，应該：（1）分析某一人民方言在語法、詞彙、語音方面的特点。因为現在正在研究的民間口头詩歌正是以这一方言为基礎而生存着和記載下來的。（2）研究藝術表达手段的整个系統，因为这种手段是用來描述作品的，並且是在一个一定的地方方言的基礎上形成的。

可見，在工作的最初階段是要積累一定数量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可能对各方言即使有一基本的了解也好，並根据这些材料了解各地方言的主要划分情况及从地域上來識別这些方言。对各地方言的各种材料進行初步綜合並应該根据地圖指出所研究語言的各主要方言区的所在地，即使指出一个大概的情况也好。

2.建立一个統一的方言研究中心

在一个一定的方言研究中心制定調查人民方言的总的計划。蘇俄語方言学家特別注重研究古代东斯拉夫人居住过的和形成俄罗斯部族語言一帶的各个方言，並且也注重研究構成俄罗斯民族語言基礎地区的各方言（这一帶是弗拉吉米尔州、莫斯科州、庫尔斯克州、奥遼尔州等）。

收集材料的組織工作一定要由統一的方言研究中心來主持，因为这一工作应該具有群众性的科学的性質，它要求進行大規模的准备工作，制訂了嚴密的計划，統一收集材料的方法及其以后整理材料的方法。研究方言的工作在進行时应該具有高度的科学水平，同时在進行时的范圍应該是龐大的——要包括很多地区，深入地調查各方言。俄語方言学家强調指出：最主要的一点是該工作進行的期限要“尽可能地短些，因为在社会主义民族發展的条件下各地方言每年越來越快地失去自己独特的

特征，並逐漸接近民族語言經过加工的形式。”〔一〕

3．培养干部——未來的方言研究者

在采取这样大規模措施的时候，要求培养將來收集材料的干部，培养寫方言專題論文的有高度業务水准的干部，这些干部——方言調查的参加者——首先是那些具有專門的語言学知識的人。这一工作要靠每年去各地調查的科学工作者和大学生去做。在組成某一方言研究中心的高等学校里把参加調查的人組成各方言研究小組，在整个学年中为他們安排好經常的課程，組織專題課堂討論。在这些課程里要研究大綱內容，練習記錄活的口头語言，当然对这样得到的材料可再作分析，这一工作的目的：是使未來的方言研究者能了解到科学地研究方言的方法和技術。

4．制訂收集材料的大綱

制訂收集方言材料的大綱是方言研究中心的首要任务。大綱的科学水准应該估計到参加調查的主要干部，即：要估計到那些具有專門的語言学知識的人，而同时也要估計農村的教員及一般的農村知識分子。例如，在研究俄語各方言的实踐过程中就曾有过几个大綱。其中有一类大綱帶有一般的性質，包括了語言的各个方面。而其中的另一类大綱具有專門的性質，它們是为收集某一部分的材料而准备的，例如詞彙或者是根据詞彙中的一部分的材料（如“收集动物名称的大綱”）。或者某些大綱是为了收集俄語中任何一种方言的材料而制訂的，而另一些大綱只是为某一个州或边区而制訂的。

以帶有例子的問題彙集作为大綱的組成形式。这些例子应說明方言結構的一切主要的和能作为特征的要素，也应該說明語言結構的各个部分：語音、詞法、句法、詞彙。大綱中的每一部分的实际材料都应尽可能地使它完整和丰富，不但要考慮到語音現象和語法現象的主要規律，而且还要考慮到許多有关个別詞的發音或个別詞的構成形式的个別細小部分。但是，基本上在大綱中应該反映出那些說明最重要的方言差別的

現象。

方言研究者在調查方言的語音时，其主要任务是，确定某一个方言的音位系統，这里音位指的是所研究的方言里那些用來区别詞义和詞形的基本語音。各种方言的語音結構可能是不完全一致的。在某一个方言会有其他方言里所沒有的音位。因此，在記語音材料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确定某一方言的語音系統这一問題上。卓越的俄罗斯学者 Л.Б. 謝尔巴院士曾指出过："在研究方言的时候最困难的（几乎也是最重要的）是：不要記各种細致的差别，而是要从意义的観点來断定該語言中哪些特点是重要的，而哪些是不重要的……。"〔二〕

研究方言的方法

1．选擇調查对象

調查对象的选擇必須依据方言研究者提出的目的。如果方言研究者提出的是歷史任务，也就是收集語言歷史的材料，那么他首先必須注意講那些在最大的程度上保留了旧成分的方言的当地居民。但是俄語方言学家預先說到：即使是收集語言歷史材料，也需要对先進居民講的語言進行調查，以便对該方言体系在目前存在的形式有个客观的概念。

如果方言研究者提出的任务是：描寫在發展中的語言，說明整个語言結構的客观情况，那么研究时就会在所选定進行調查的居民点里尽可能和不同类型的居民多多接触——先進的和落后的；年老的和年青的；男的和女的；以及有不同的职業和專長的人。

方言研究者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和不同的語言环境接触。苏联方言学家指出：如果認为好象集体農庄庄員們的社会發展水平和方言水平之間有着一种直接的联系，好象農業積極分子，如工作隊長、農業先進分子一定是講这个方言的先進階層的人物，而其余的庄員一定是講旧成分多些的方言的人物，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这样的見解是不对的？一位苏联方言学家維索特斯基这样解釋：

問題是在農庄庄員們的社会主义覺悟和文化的發展比較口語的

方言特征的消失要快得多。这說明了語言結構固有的穩固性。是的，積極分子在社会上的先進地位促使其們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因为他們書讀得多些，常上專門訓練班学習，常在会議上發言，常到其他的農庄、城里去交流經驗及提高技術水平。所有这一切都为他們造成了更快地改变口头語言的条件。但是这是第二屬性的因素，因为口語中方言成分的消失那是时間的事情。〔三〕

無疑地，方言研究者必須調查清楚和估計到：在某一个居民点根据文化程度和年令的特点來說，講本地話的人有哪些类型？他們各講哪一种类型的本地話？因为只有通过操这个方言的社会的歷史才能了解方言的現在情况和它的歷史。因此，在选定調查对象之先，必須注意屬於不同类型的本地居民在口語方面的差別。

2. 方言調查者的工作条件，对方言調查者的要求

方言研究者在農村的工作是非常重要並且困难的。在对当地居民的关系上要求方言研究者很机智和謹愼，到达地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使人家对自己信任並和当地居民建立起友誼关系。根据俄語方言学家的經驗，最好是当方言研究者到达農村时，就和当地的一些机关建立联系，和学校教师以及当地的積極分子建立联系，通过当地的積極分子然后和当地居民接触。以后就应从这些居民中选出調查对象。

如果由当地一定的机关介紹方言研究者和居民認識，那么这將促進到达当地的方言研究者和当地的居民建立必要的联系。然而，俄語方言学家認为这样还不能和当地居民建立起充分的联系。認为：方言研究者本身必須花不少力量來擴大和鞏固这种联系。P. И. 阿瓦涅索夫教授寫道：“首先他們不应該和農村、集体農庄的社会生活和生產隔絕。要讀当天的报紙；解釋党和政府当前的决議；召开政治問題的座談会，例如國际政治問題座談会；指点当地教师的工作；參加調查的青年有时要參加集体農庄的劳动，即使是几次，但是要親身參加；給老太太寫信或者是告訴她关於領取养老金的手續等等——这都是方言研究者參加当地生活的一些可能的方式。”〔一〕

自然，也不应該認为每一个方言研究者对各种工作方式都应采用，对方言研究者的要求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参加当地的生活，要对当地發生兴趣。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並在当地居民中建立威信。当然方言研究者参加当地經济和社会生活的程度可以各有不同，这要看他們在某一居民点逗留的季節和期限來決定。

3．告知当地居民到來的目的

俄語方言学家認为这个問題有着重大的意义，当然很多情况下在解決这个問題的时候要看工作的具体条件，方言研究者自己可以在地方上解決这个問題。很多俄語方言学家的經驗証明：方言研究者如果說自己到此地來是为了研究当地的歷史，研究这个農村的歷史，是为了收集旧的風俗習慣及傳說的材料，是为了研究生活，農業生產，各种副業生產，以及語言等等。这样講法使当地的居民最容易明白。不能認为当地居民一定知道我們來此地的眞正的目的，以及他們的語言就是我們調查的对象。因此最好是以地方情况以及有关生產和生活的事情作为談話內容，以便進行調查，这里可以介紹一下談話的內容，如：这个農村的歷史，对本地区的描述；周圍的村子，区中心，城市，交通綫；農業生產工具，田里的劳动，畜牧業和目前農村里一般的生產情况；捕魚及打獵；对建筑的描寫（房子，農事建筑），傢俱和器皿，烹飪（飯菜），古老的仪式（例如婚喪等事）以及其他等等。俄語方言学家的实踐也証明了：其中一些項目和男人談合適，而另一些項目找妇女談合適。有些項目要多和老人談，而另一些項目則要和青年人談。当然，还要会从这些題目中选出对当地、当时及具体的人最有意思的題目作为生动的談話內容。

4．收集关於農村的一般材料

收集農村及其居民的一般材料对於方言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些一般材料会有助於更好地去認淸和理解方言研究者所收集的語言事实及闡明这一方言的發展道路。

首先，应該記下居民点的正确的名称，它屬於哪一区，哪一省，指出这个村和最近的火車站、碼头、城市、区中心的距离，並指出其方向（如：往南去，往西北去等）也是有用的。要指出該区有哪些文化机关，建立多久。俄語方言学家一再强調：从这些材料中可能得到該村歷史及其居民歷史的所有材料（如：这个居民点存在多久，这些居民从何地來的，当地居民屬於哪些社会階層）。必須了解当地居民是否有其他的名称，还应該注意該居民点是否有本地档案材料，如果有，那就应該了解这些材料的內容。

5．对方言進行实地的初步研究

应向多少本地人進行語言調查。需要多少方言研究者進行方言研究工作及如何更好地來進行方言研究工作？

俄語方言学家在这些問題方面的經驗說明了以下几点：

（1）到达地方之后，方言研究者首先应該用一些时間來仔細地听听方言。对方言必須有一般的概念，在一定的程度上要"滲入"到这个方言里去，体会这个方言的体系，然后便可以为調查选擇一典型对象。这种預备階段的長短根据方言研究者目的來决定。如通过实踐对方言有一初步了解后，是会有助於更全面地來研究方言系統的。其次在和調查对象的交往过程中即使能部分地使用当地的方言也好，因为这有利於方言研究者和調查对象間的联系，如果方言研究者已掌握了当地的方言，那么在談話中应多多地使用这种方言來收集材料。

（2）应向多少本地人進行語言調查？对这一問題的回答可根据方言研究者的目的而有所不同，如果必須詳細地描述方言的整个系統，那么，当然要求对講这个方言的許多人進行調查，而且这些人必須是屬於当地各个不同类型的人。例如：如果要根据俄語研究所的大綱收集材料來制定方言地圖，那就要求去描寫旧成分保留得比較多的本地話，大半是老一輩人講这种話。当然在这里还需要从当地居民其他类型的人物中去收集补充材料。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調查对象及提供材料的人数不应該太少，关於这一点俄語方言学家預先指出过，在記方言材料时不

应只根据一个人來進行調查。因此，关於这个問題阿瓦湼索夫教授指出了以下这一点："在某个村子里記方言材料时，甚至是根据大綱也不能只向兩个人來進行調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确信所收集的材料是否眞正地包括了該村方言的特征，也不能确信这不是某一个人講話时的个别特点。"〔一〕

調查对象的数量应由居民点的大小來决定。如果在一个居民点中有一千多戶（如在苏联的南方），那么，为了証实該居民点的語言是划一的以及所选擇的对象是典型的，当然必須向很多人進行語言調查。俄語方言学家指出：就是在居民点不大的地方調查对象也不应少於三、四个。

还应該估計到有时候在一个人口很多的居民点里的方言特点可能是不相同的，即不同的方言特点可能分布在一个村子的兩头，如俄語方言学家就指出：在莫斯科州、梁贊州、平茲州等地方就有这种情况。

（3）根据很多俄語方言学家的經驗，可以認为：几个調查者在同一时間一起進行方言調查工作是最方便的方法。主要由一个人來和别人談話，而由另外一个人來記。有时在進行調查时需要多一些人一起參加，在每一个組里最低限度应該有一个有經驗的調查者，这是很重要的。

同时，当進行方言調查时，調查者本身应尽量少說話，他的責任只是主持这样一个談話，向别人提問題，使这个談話能符合需要。如果到了沒有話可談的时候，要及时改一下談話的內容。方言研究者在談話时最好記連貫的話，但記的材料仍要正确。一般地說，方言研究者听和記应該比自己說要多。我們还应創造一些更好的条件，如果方言研究者不參加談話，只是調查，这便是最好的条件了。調查者可以在当地居民彼此交談时，在当地一些組織的会議上，在集体農庄的会議上來听别人講話。如果調查者在当地的某一家住下來，这一家的人就可以作为他的語言調查的对象，在他們交談时便記錄，这是特别好和特别方便的办法調查者与他們相处在一起，和他們交往，每天都听他們之間的談話以及听他們和自己隣居之間的談話，这样他就可以得到特别可靠的材料。

6．記寫連貫語

在最自然的生活或劳动的环境里記活的、連貫的口头語言是收集材料的主要方法。同时不單应該記單独的句子和詞組，而且也要記一些單个的詞。俄語方言学家指出：最好經常記一些一大段一大段的連貫短文，因为在这些材料中比較完整地反映着方言的特征。但要記这样一些短文，尤其是对初次从事方言研究的人來說会使得所記的材料不太正确，因而得到的会是一些“千篇一律的材料”，也会得到一些有时候是不正确的材料，这样的材料会使方言研究者的全部工作失去价值。

如果方言研究者要得到最完整的、最典型的方言材料，他就不应該提出自己想要的形式或是詞，而是应該从調查对象的口語中直接听取自己所需要的材料。由此可得出結論：收集基本材料时，不应該用訊問的方法，不应該用直接提問題並由調查对象直接回答問題的方法，而应該用考察当地居民在很自然地講口語的方法。应該尽可能地避免直接提問題，如：“你們那兒是这样發音嗎？”“你們那兒用这样的詞或者这样的形式嗎？”等等。当然类似的問題可以用一个字來回答，如“是”或“不是”，“說”或“不說”。这种直接提的問題所得到的回答不会永远是正确的，因为特别是在被調查者和方言研究者作了長时間的談話之后，由於疲倦，經常是所答非所問，或者說一些在他們認为是方言研究者所希望的回答，或者是使他們的回答符合在他們認为是“受过教育的”人講的城市語言。

一般來講，方言学家都知道：在和講本地話的人交談的时候对於語言很多的要素（尤其是語音和詞法部分）不要直接地提問題，而更不要以直接的問題來提示要怎样回答，因为这会使得回答只是机械地重复方言研究者本身的發音，使得回答只是或多或少有意識地在模仿方言研究者本身的發音。

在对方言各單独方面——語音、詞法、句法——進行調查时，一般不应采取直接提問題的方法來收集主要材料。但这不是說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完全不能使用这种方法。俄語方言学家認为：方言研究者的机智，

善於掌握分寸的能力，和調查对象進行談話的能力以及提啓發性問題的才干，都决定着工作的好坏。

有时对当地居民日常的活的口語的記錄，只是对当地居民的口語進行一种消極的登記而已，这並不能揭露出所研究的某一个方言的語音、詞法、句法方面的全部詳細特征。

方言的某一类要素（如語音方面）在开头的几句話里便可听到，而方言中还有另一类要素（如詞法、詞彙），由於各种不同的原因，在活的口語里，在連貫語里極少遇到，甚至有时根本就遇不到，因为在講話的时候並沒有什么理由非要去运用这些要素不可。

因而，在工作的最后階段，那时基本材料已經收集完畢，方言研究者已經和当地居民、指定作为調查对象的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了解在記連貫口語的过程中由於某种原因而沒有發現的方言結構的一些重要因素，一般是采用專題的談話方式和采用提啓發性問題的方式，自然，在提啓發性問題的时候，方言研究者必須选擇問題，使得他所提的問題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即：在他提的問題的回答里一定要有所需要的詞和所需要的詞的形式。在提啓發性問題时的困难是：方言研究者自己不能使用他所需要的形式，以免影响調查对象在回答这个問題时所說的話。

俄語方言学家指出：在進行調查的地区，常常遇到这样的人，甚至是年老的、沒有文化的人，但是他們对語言出奇地敏感，虽然他們沒有語法概念，但能很快就猜到对他們問的是什么和对我們的要求是什么，並且会很好地“变格”和“变位”，把需要的詞放在句子里。

在利用講該方言的、对語言生來就是敏感的人的觀察力的时候，在較直接地对他們提出某一个詞的發音問題及在方言中很少遇到的某种語法形式問題的时候应該謹愼些。从他們那里收集來的材料必須在很自然的談話中加以檢驗。

阿瓦涅索夫教授指出：“如果您要从пеку（我烤）这一詞知道不定式和其他許多形式是怎样形成的，那么您就把話題引到烤面包这一問題上來。这个动詞的某些形式很容易遇到，而另一些形式总是不出現，这时可適当地提一些啓發性的問題。当看到妇女在烤面包时您就問她：

'老太太，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烤面包啊！大叔''奥李娜大婶现在在做什么呢？''誰知道啊，大叔''那她是不是在買面包啊？''不，大叔，我們这兒沒有烤好的面包，是她烤的。'"〔一〕（烤这动詞在这句話里是第三人称——譯者按）阿瓦涅索夫進一步指出：如果方言研究者必須了解动詞"запрягу"（我駕〔馬於車〕）的一些形式，那么他可以和当地居民談談馬，以及使用馬的一些情況。这样，方言研究者就能听到他所需要的"запрягу"这个动詞的一些形式。

然而，俄語方言学家預先談到：專題談話方式以及提啓發性問題的方式不可能一定会达到我們所想的目的。因为这些方法的細致地方是不能預測的。

有时达不到目的是因为調查对象总是有权利把他自己所需要的詞选在句子里，这样就可能和方言研究者所需要的形式不相符合；有时調查对象可能使用代詞來代替方言研究者所需要的詞的形式。为了达到目的，方言研究者必須想出这样的問題，使得在回答这个問題的时候必須使用方言研究者所需要的詞和形式。

因此，当需要采用專題談話和提啓發性問題的方式來收集所缺乏的材料的时候，方言研究者不应該講自己所需要的詞或形式，而是使用調查对象以前講过的並为方言研究者記下來的那些詞。

但是上面所講的並不是說詢問的方法和直接提問題的方法在工作中絕对不能使用。

問題是在於語法的各个不同部分有时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來收集材料。

收集語音和詞法材料的时候可以根据一个題目隨便地無拘束地和当地居民交談，在这样談話的过程中把話記下來，同时为語音部分所收集的材料对詞法也会有用。因为語音的材料也需要記一些短句子或者短語。在为研究句法而收集的材料中也可以选出一些詞法所需要的材料。但是这並不是意味着詞法部分不須要作專門的調查。这里还应該提出，在为語法各个部分收集材料时不应該只記單詞。

在研究詞彙方面，如果需要了解在農村地区所遇到的各式各样的物体的名称，在親身接触到这些物体的时候，"直接"提問題一般是有效

果的。在这种情况下，提些問題是完全合適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如“这是什么？”“这叫什么？”但不应該認为直接提問的方法对於整个詞彙的研究是完全合適的。毫無疑問，在暢談时收集到的材料应該是很宝貴的，因为在这些材料里所需要的詞是出現在上下文里，出現在自然交談的环境里，如当地居民相互之間的談話，在会議上的發言等等。对沒有实义的詞彙並不能使用“直接”詢問的方法（例如：“很”这个詞）。

因此，詞彙的部分材料可以通过直接詢問的方法來收集，而詞彙部分中相当多的材料可以采用为語音和詞法所收集的材料。

如已談过的那样，可以用直接向調查对象提問題的方法來收集一部分材料。同时最好簡要地記一下和某一些詞有关的各物体或生產过程。当講本地話的人談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当他們在解釋在生活和生產中如何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最好把他們在談这个东西的时候所作的解釋都記下來。这些解釋詞彙的材料，会給闡明語法中其他部分——語音、詞法、句法——提供大量的材料。同时还希望在記材料的时候画圖和照象，例如：傢俱、衣物、各种的建筑、農業生產工具等。甚至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画院子的平面圖、屋子里房間划分的平面圖、傢俱的安置圖及其他等等。

俄語方言学家認为調查中最感困难的一部分就是句法。他們得出这个結論的根据是：句法方面的調查要求方言研究者記一些連貫的短文或者記一些完整的句子也好。要得到所需要的、能作为某一方言特征的短語及句子結構的材料，自然要假可能地多記一些上下連貫的短文。

只有根据所記的大量材料才可以闡明某一个方言的句法構造。在研究方言的句法特点及詞法特点方面，記下來的民間口头創作——歷史傳說、民間童話、各种故事、諺語、俗語等——可提供很多材料。希望再記一些关於和帝國主义、日本侵略者斗爭的故事，記人民解放軍的功績，記參加为解放祖國的斗爭的故事，記新生活，等等。

总之，在最自然的环境里記活的口头語言是收集材料的主要方法。因此，要事先告訴下去收集蒙語方言材料的同志們不要去犯可能犯的一个錯誤。問題在於，同志們正是要在被調查人發音时在同志們听到这一

發音时來記材料，而不是过一些时候憑記憶，憑对方言的总的印象來記所听过的东西，这是不能允許的。記材料的过程中，在記一篇短文时至少同时要由兩个人記或是二、三个人記，这是特別重要的。

語 音 符 号

使用語音符号是为了正确地表达語言的音位結構，而有时是表达音位的色彩。各个別的方言和土語的音位系統与标准語的音位系統，与其他方言的音位系統是有差別的，所以必須要有这样一套符号來記語音、詞法、詞彙及句法的材料。

然而应該指出：要从語音的观点來記寫对於句法特別需要的連貫的短文，这甚至对有經驗的方言学家來講也是一件困难的事。

如果一套語音符号可用來記一切的方言材料，那么一般認为这是合乎理想的。

实 行 登 記 制

在記錄方言材料时，無論何时都应該指出，这些記錄是从誰那里記來的，他叫什么名字，父名是什么以及姓什么。关於調查对象我們应有以下的材料：年令、姓別、文化程度、工作性質、职業或者是專業；頂好还能了解这个人是否到过其他的地区或城市，在那里住了多久，从事於什么工作。

每一份記錄的前面都必須标出，这份記錄是从誰那里記來的。俄語方言学家指出：在進一步整理材料的过程中，这些材料要按照調查人員向每一个人所記的材料而單独整理。他們並指出：这样來区分从各个不同的人所收集的材料將帮助研究人員把这个方言里的典型的、特有的材料和那些偶然的材料区別开來。如果从不同的人那里收集來的材料中不存在差異时，才可以在以后描述方言时把这些材料合在一起。

不实行精确的登記制，方言研究者就不能确定方言的系統，不能确定哪些成分是不在該系統的范圍之內的。

整理方言材料

必須在当地整理材料，把材料分別地列入語音、語法、詞彙等部分。这一工作要每天根據所收集的材料來進行。这种对材料的初步整理工作使方言研究者有可能及时知道大綱中的哪些問題、哪些部分已有足够的材料，而哪些部分的材料还不够或是完全沒有。方言研究者要很注意收集得不够的材料。方言研究者收集材料这一工作应該一直到一切主要的語音、語法和詞彙現象都得到闡明为止，直到大綱所有的問題獲得解答为止。

如果在地方上对所記錄的材料不作初步的整理，或者是对这些材料的整理工作是在進行調查之后一个較長的时間后進行的，那么等調查回來之后往往發現記的某些材料是沒法讀出來的。有时这会造成所收集的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無法使用的后果。

如果在調查回來以后才着手整理材料，那就往往会發現：材料收集得不平衡，有些問題的材料收集得非常多，而另一些問題的材料是什么也沒有收集，或者是收集得很少。

毫無疑問，如果在地方上早發現这一点的話，那就可以及时進行补充調查和收集一些必需的材料，补充一些材料和回答大綱的一些問題。

回來后整理材料时不可能增补我們所缺乏的材料，因为要得到这样的材料，便要再一次地到地方上去收集。

俄語方言学家为了想整理回答大綱問題的材料，做了許多的卡片，在卡片的右上角指出居民点的名称，卡片的左边是大綱問題的編号。

可以把調查者針对大綱中某一問題所記的例子轉抄在这些卡片上。从某一个人那兒記來的一些例子下面在括弧里註下一个号碼，根据号碼可以尋找寫在名單里的关於該調查对象的材料，如果不知道例子是从誰那兒記來的，那么在括弧里就必須以 X（未知数）代替号碼。而且，如果我們調查某一个人講的方言时，發現他对某一个語言事实（詞、詞組或者是句子）重复了好几次，那么我們要把这些次数寫下來。在把材料整理到卡片上时要把他所重复的次数記下來。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有时發出声音的語言事实虽然被几个調查者記下來，但是在整理材料时必

須只指出一次就够了，不要造成以为該詞用的次数很多的印象。

調查者应按照这些卡片所收集的材料范圍進行檢查，以便指出有些問題的材料还不够，或者是沒有。然后根据这些問題進行补查，一直到不必再收集必需的材料为止。

卡片必須是同一个格式。果如一个問題的材料很多，而一張卡片又寫不完，那么应該用第二張或是第三張卡片。这些卡片要寫上大綱里同一个問題的編号，並註上“第二”或是“第三”。在这些卡片的左边要留出約二公分左右的空白地方，以便在工作結束时，按照每一个居民点把材料訂成一个一个本子。

以上所說的一切說明了方言研究者肩上有着何等特殊的責任。方言研究者的工作是不可能檢查的，也不可能監督的。因为口头語言的調查僅僅是在听發音的时候才能進行，因此，方言材料的記錄不能由其他的人來檢查。經过一定的时間以后，在另一个时間和另一个环境里進行复查时有一些和第一次不同的發音，和以前記錄不符合的發音，因此，方言研究者在自己記錄时必須非常謹愼和准确，以免迷惑不清和在科学上引起不正确的結論。

（中央民族学院語言翻譯組譯）

〔註一〕見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报告通訊集》，1954年第6期，128頁。

〔註二〕見A.П.中符叶椒娃著《18——19世紀俄罗斯口头詩篇的語言概論》，列寧格勒，195?年，4—5頁。

〔註三〕見苏联科学院言語研究所《报告通訊集》，1954年第6期，125頁。

〔註四〕見Л.В.謝尔巴著《俄語元音》19頁。

〔註五〕見維索特斯基著《研究方言的方法》，發表於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出版的《报告通訊集》，1954年，第6期，134頁。

〔註六〕見阿瓦涅索夫《俄語方言学概論》第1部分，1949年版，249頁。

〔註七〕參看阿瓦涅索夫《俄語方言学》252頁。

〔註八〕見阿瓦涅索夫著《俄語方言学》，257頁。

語言学問題講話*

第一講

語言　語言的社会实質　語言和思惟

提綱：

一、語言学是研究語言的科学；

二、一九五〇年关於語言学問題所進行的討論以及進行討論的原因；

三、斯大林同志关於語言学問題的著作；

四、語言是一种社会現象而不是階級現象；它与上層建築的区别；

五、語言和思惟的联系。

什么是語言学呢？語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讓我們先來簡要地回答这个問題：語言学是論述語言，研究語言的科学。〔註一〕

不应当把語言学这門論述語言的科学与实际掌握語言混淆起來。例如，每个漢族人都实际地掌握着漢語，就是說他們都能够自由地用漢語講話，互相交际，交流思想。但是这不等於說他們都从理論上了解自己本民族的語言。想來还有不少的人，他們既沒有漢語語音体系的概念，也不能回答下面这些問題，如：簡單句的結構怎样？漢語中詞是怎样構成的？漢語中有哪些詞类？等。可見会講漢語並不等於从理論上了解漢語。只有研究和探討漢語的語言事实，把它們加以概括並找出漢語中的某些規律性，这样，对漢語的研究才成为一門科学。

* 本講話是北京俄專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度第二学期所开設的語言学基礎知識課的講义，現整理發表，供各校語言学引論課及学習語言学引論的讀者們參考。

一个人也可以实际掌握数种語言，如漢語、俄語、英語、日語等，即所謂“語言通”（能講多种語言的人），但他可以不知道組成各种語言的基礎是什么，語言从旧質到新質的这个發展过程是怎样的，“詞义”的概念是什么以及什么是語法范疇等等。由此看來，語言学是研究語言的科学理論知識，而不是指实际掌握語言。

在某一种語言的范圍內，如在俄語或漢語的范圍內進行科学研究，叫做俄語語言学或漢語語言学；如果在科学地研究个別語言的基礎上而建立起对一切語言都同样適用的一般的理論原理，那么就叫做普通語言学。

普通語言学的任务是解决語言的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如：語言的实質和語言的發展規律問題；語言的起源問題；研究語言所采用的方法問題；語言学包括哪些部門和它們互相关系問題以及語言学各个最基本概念的內容和性質問題等等；最后，普通語言学还研究語言学在科学体系中所占的地位。

在上述的許多問題之中有一些在古代的时候哲学家們和語文学家就对它發生了兴趣，特別是他們想說明：語言是什么；語言是怎样在人类社会中出現的；語言和思惟有什么联系等。然而那时由於人类知識有限，特別是对語言这一社会現象的实質了解得不正确，所以学者們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些問題。

文藝复兴时期，人們开始对某些部族的語言發生了兴趣，於是就有了对某些个別的具体語言的語法結構的描述，就是說某些个別語言的語言学开始萌芽了。然而就科学这个詞的完整意义來說，它还不能称为科学，只有找出某些規律性才能算是科学。但是，只有在歷史地研究語言事实和語言現象，也就是說在發展中來研究語言的現象和事实的条件下才能够找出它的規律性。比如說，为什么在現代俄語中动詞过去时不用綜合形式來表示人称范疇？要回答这个問題，就必須知道語言史。〔註二〕

只有到十九世紀初叶学生們根据对同一起源的同族語的比較才科学地論証了現代語言和死語中一系列的語音、詞彙和語法現象，並指出它們在这些語言中是怎样歷史地發展了的。

例如一八一八年丹麥学者拉斯木斯·拉斯克出版了他的著作："古北方語言——冰（冰）島語的起源研究"。一八一九年出現了德國学者弗朗茨·葆朴的作品："論希臘、拉丁、波斯、日尔曼諸語言的动詞变化体系"。一八二〇年俄國学者沃斯多柯夫（А.Б.остоков）在比較斯拉夫諸語言的基礎上寫了"論斯拉夫語言（斯拉夫語語法引論）"这样一部著作。

这样，在用歷史比較法來研究同族語言的基礎上就產生了語言学这門科学。

由於利用了歷史比較法这樣一个專門研究語言現象的方法，因此語言学在許多問題的研究方面獲得了很大的成就。恩格斯也曾談到語言学上的这些成就，他說："顯然地，我們所遇到的这位語文学家（指杜林）从來沒有听过近六十年來这样巨大的、这样成功地發展着的歷史語言学。"（恩格斯："反杜林論"，苏联國家政治出版局一九五〇年版，俄文版三〇四頁）

很管在解決語言学許多問題方面獲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語言学这門科学正象一切沒有自覺地站在辯証唯物主义立場上的其他科学一样是有局限性的，因此語言学还不能解决一系列的問題，如：語言的起源、語言發展的一般規律、語言与思惟的联系問題。

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自然，苏联的語言学家們要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觀点來开始重新審查語言学的基本原理，馬尔院士也是这些語言学家中的一个，他曾希望成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語言学上的馬克思主义者，並且也曾努力这样做过。馬尔想成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但他拒絕了語言学上的一切好的成就而提出了自己对語言的看法，自己的語言学說，並且为了与旧的語言学相对立而把这种語言学說称之为語言的"新学說"。馬尔毫無根据地套用馬克思主义关於基礎与上層建築的学說而得出了他的关於語言的重要原理，把語言列入上層建築之列。同时，馬尔和他的門徒們在語言学界造成一种情况，不允許对馬尔的語言觀点進行任何批評。誰要是不同意馬尔及其門徒們的觀点，誰要是不同意所謂"新学說"，就給誰扣上一个反馬克思主义的帽子。

由於馬尔的原則性錯誤的語言的原理以及語言学中缺乏自由的批

評，苏联語言学当然就不能够有效地解决擺在它面前的一些極其重要的問題，所以語言学曾处在停滯狀态和危机之中。

为了克服在苏联語言学中存在着的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按照联共（布）党中央的指示於一九五〇年五月在“真理报”上展开了对語言学問題的自由討論。

斯大林同志也親自參加了这个討論，於一九五〇年六、七月間先后發表了三篇文章：“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論語言学的几个問題”“給同志們的回答”。

这三篇文章收集在一起总称为“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在这三篇文章中斯大林同志論証了並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义对語言的見解，揭示了作为社会現象的語言的特点，叙述了有关語言各个方面的基本的、主要的原理，並論証了語言由旧質到新質的过渡、發展的特点和特性。

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不僅給了苏联語言学家以極大的帮助，並且也給了人民民主國家的語言学家以極大的帮助，使他們知道如何正确地运用辯証唯物主义的原理來对待語言学。

苏联的語言学家們依靠着斯大林同志关於語言学問題的著作在很短的时間內就克服了存在於語言中的停滯現象並在最近四年过程中大大地向前推進了苏联的語言科学。

語言学应当解决的第一个問題，也是最基本的問題，就是說明語言是什么，也就是給語言学研究的对象下一个定义。

語言是什么呢？

首先应当确定語言屬於自然現象还是屬於社会現象。

假如語言屬於自然現象与社会無关，也就是說，語言是人这种动物的自然屬性，那么就必須承認一点：人之具有講話的能力就好象会吃飯、喝水一样。換句話說，如果肯定了这种說法，就必須承認：就象人一生下來一切器官（胃、肝臟、腎臟等）就开始在人体中执行它們的功能一样，人一生下來就会講話。但是，我們知道，譬如一个越南孩子从一生下來就在一个講中國話的家庭里長大，那么他定將講中國話。这就是說，这个孩子的言語是由他所处的社会条件來决定的。再如把一个孩

子特地放在一个听不到人講話的环境里，那么他將來就不会講話，虽然他的其他一切器官的功能和普通人的一样。从这一点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不能把人的語言認为是自然現象。

斯大林同志說，語言随着社会的產生、發展而產生、發展，社会之外無所謂語言。由此可見，語言是屬於社会現象之列的。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許多社会現象不是屬於上層建筑之列就是屬於基礎之列，因此產生了一个問題：語言是否象馬尔所說的那样是屬於上層建筑之列的呢？

斯大林同志駁斥了馬尔的那种武断的說法，並指出了語言与上層建筑不同的四个特征，这些特征就不允許我們把語言列入上層建筑之列。其特征如下：

一、每一个基礎都有適合於自己的上層建筑，基礎改变了，上層建筑也就随之而改变。如果把語言列入上層建筑之列，那么就必須承認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基礎改变过多少次，也就有过多少种語言。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例如，俄罗斯在最近三十五年中社会主义的基礎代替了資本主义的基礎，然而語言仍和从前一样，並沒有任何重大的改变。

二、上層建筑是为一定的基礎服务的，是为產生該基礎的階級服务的，而語言在这一方面对所有的階級都是一視同仁的，同样为一切階級服务，对該社会的成員說來它是統一的，不管該社会的成員屬於哪个階級，都來利用它。語言不是某一階級所產生的，而是整个社会几百代的努力所產生的。俄語或漢語过去和現在都同样地为社会上的一切階級利用着。

三、上層建筑是一个时代的產物，只有在某一經济基礎生存和活动着的时候它才生存和活动着。然而語言是許多时代的產物，它的生命非常長久，同时它不断地發展着，丰富着自己的詞彙，改進着自己的語法結構。我們只要举下面这一个例子，就能說明这一点。

俄國在最近一百五十年中改換了三个基礎和三个上層建筑（封建主义、資本主义、社会主义），然而語言仍然还是一个，現代俄語和普式庚时代的俄語是差别很少的。經过了一百五十年我們也象普式庚同时代的人一样能够很好地理解他的作品。

四、上層建筑不是直接和生產及人們的生產活动联系着的。就是說，生產过程本身（如在工厂里生產机器或紡織品）並不需要生產者的美学、哲学或宗教观点的直接参与。然而語言却与生產直接联系着，因为要共同工作就必須交际，交換思想，彼此了解，这些只能借助於語言才能实現。

根据上述語言与上層建筑的这四点区别，应当承認語言不屬於於上層建筑之列。

但也不能把語言列入基礎这一社会現象之列，因为基礎的專門特点是在經济上替社会服务，然而每个人都知道經济与語言之間毫無共同之点。

馬尔院士既然把語言列入上層建筑这一社会現象之列，就必然要繼續加深其錯誤，就是承認語言是階級的現象。照馬尔的观点，一个部落、部族或民族沒有社会一切成員統一的語言，而是有数种語言，每个階級有它自己的語言，这样說來，譬如在資本主义的俄國至少要存在三种語言：資產階級的語言、無產階級的語言和農民的語言。这是完全錯誤的，生活本身就完全駁倒了这种說法。大家知道，工人和資本家，農民和封建主並不是用各不相同的語言談話，而是用同一种語言談話。如果他們用各不相同的語言談話，那么就要有各不相同的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事实不是这样的，每个部落、每个部族、每个民族只有一种具有統一的基本詞彙和語語法結構的語言。

这里有个問題，就是馬尔怎么会确定了語言有階級性这样一条件荒謬的原理呢？他又用什么來論証語言的階級性呢？

馬尔关於語言有階級性的全部論証是基於：（一）不正确地理解"階級"这个術語；（二）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一些話作了不正确的、歪曲的解釋。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著作"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一文中証明說，馬尔及其門徒們引用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家們的話來断定語言有階級性是沒有任何根据的；相反，如果是正确而不是歪曲地去解釋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引用的那些話，那么这些話恰恰是肯定了語言在社会之中对社会一切成員說來永远是統一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員服务，而不管他們是屬於

哪个階級的。的確在語言中可以形成階級習慣語同行語，特别是統治階級的上層，除了全民的詞彙之外他們还喜欢用自己的特别的字眼兒、成語和術語，因此就造成了階級習慣語或称同行語。但不能把階級習慣語即同行語認为是特别的、独立的語言，因为階級習慣語沒有它自己的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它們是利用全民的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的。

如果語言不屬於上層建筑，也不屬於基礎，又沒有階級性，那么只有一种理論是正确的，就是語言僅僅是一种社会現象。事实上並不是一切社会現象都不一定要屬於上層建筑或基礎之列的，也有一些社会現象是全人类的，它們的產生与發展与社会的階級区分無关，与某种社会制度無关。如生產工具、思惟、文字和对自然界的事物和現象的經驗（知識）等都是社会現象，因为它們的存在是以社会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它們僅僅随着社会的產生而產生，沒有社会，它們便不能存在。这些社会現象正象語言一样不能認为是有階級性的，因为它們的出現和發展不受某一階級利益所制約，它們同样地为社会上的一切階級服务。沒有它們，社会就不能存在和發展，不管是有階級的社会还是沒有階級的社会都是一样。（对文字來說，应当是"在社会發展的一定階段"。）

斯大林同志强調了語言的社会实質，他指出："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發展的歷史，密切联系創造这种語言，这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〇頁）

这样看來，語言是既不屬於基礎也不屬於上層建筑的社会現象。

語言在其他許多社会現象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它和其他社会現象有什么区别呢？換句話說，語言这一社会現象的特征是什么呢？

語言和其他社会現象相同之点是它也替社会服务；語言与其他社会現象不同之点，即語言的特征在於它替社会服务"乃是作为人們交际的手段，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手段，作为使人們互相了解並使人們在其一切活动范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手段。这一切活动范圍包括生產的領域，也包括經济关系的領域，包括政治的領域，也包括文化的領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同上書，三五頁）

斯大林同志从語言的特征出發，發展了列寧給語言的定义，而給語

言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語言是工具、手段，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同上書，第二〇頁）

如果語言这一社会現象的特征是作为人們的交际手段，那么，語言的基礎，語言特征的实質就是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語言結構。

为了要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需要什么呢？首先就需要詞以及賦予語言一种可理解性質的語法結構。

語言这一社会現象同另一种社会現象——思惟，緊密不可分地联系着。这可以从語言的定义本身看出來，这个定义就指出了人們借助於語言來交換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强調語言和思惟的这种緊密的联系說："脫离了語言，思想便不存在。""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实。"斯大林同志也强調指出这条原理，他說："不論人的头腦中会產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產生，它們只有在語言的基礎上，在語言的詞和句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存在，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同上書，三八頁）

思惟和語言是社会發展的產物（社会發展的結果），是人們劳动的產物。在人类的祖先类人猿还沒有利用自己制造的工具來为生存而斗爭以前，沒有人类社会，也沒有思惟，也沒有語言。当然，动物也有动物的"思惟"，这种思惟可以表現在它們的行为上。但是动物的"思惟"和人的思惟比起來，它只是初級的，原始的。巴甫洛夫院士確定动物的"思惟"是表現在行动中的"思惟"。这种思惟是：动物由於外界的作用而从周圍的条件中区分个別事物，"認知"它們，由此而正確地判別周圍的条件：看見水时就要去喝，看見草时就要去吃。高級动物具有的这种初級形式的"思惟"是在外部环境的一定条件中生物学上的發展的產物。

人的思惟是社会發展的產物，是在人类的社会劳动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人的思惟是現实的概括反映，这种反映是与詞和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詞和概念本身又是腦子的抽象和概括活动的產物。

如此看來，人的思惟和动物的初級"思惟"有本質上的不同。

劳动对於語言和思惟的產生和發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寫

道："我們在某种意义上必須說：劳动創造了人类本身。"（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用"，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頁）思惟和語言不僅在劳动的影响上同时發生，而且以后永远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中發展。沒有思惟就沒有語言；沒有語言也沒有思惟。它們处在永恆的統一之中。沒有詞，人就不能思想。

初看來，在我們的意識中似乎有現成的沒有語言、沒有詞的思想存在着。的确，我們經常在思考，而並不把我們的思想用語言構出來。然而我們常常忘記思惟过程就是在詞的基礎上進行的，我們可以在声覺、动覺和視覺形象的結合中感覺到这些詞。在沒有找到它的語言表达之前，現成的、确定好了的、划分好了的思想是不存在的，思想本身是依賴詞並在詞中形成的。詞体現思想並划分思想的內容。現在我們举这样一个例去：当我們看到一叢开着花的白丁香樹的时候，这叢开着花的白丁香樹的形象就留在了我們的意識之中。但这还不是思想。如果我們把这一知覺加以划分，就是單独地分出花、花的顏色、樹叢，並在这些划分出來的个別概念之間确定某种关系，例如"樹叢开着花"（我們把"樹叢"看成是物体，把"开着花"看成是物体的狀态）或"白的丁香"（我們把"丁香"看成是物体，把"白的"看成是物体的屬性），这才是思想。但是，这种划分和建立互相的关系沒有詞是不可能的。

当然，思惟过程对我們說來是非常習慣的，並且它進行得又非常快，我們甚致於沒有考慮到这些，所以我們覺得語言似乎並未參与思惟过程。

这种思惟过程，即指藉助於詞來划分知覺以及藉助於詞和語言的語法手段來确定个別概念之間的联系，我們称之为內部言語，也就是沒有說出声音來的言語。

但是，为了用詞和詞的語法形式來進行思考，那么詞和語法形式就必須真实存在，就是要具有声音。

"語言是直接与思惟联系的，他把人的思惟活动的結果，認識活动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巩固起來，这样就使人类在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同上書，二〇頁）

但是根据語言直接与思惟联系这一事实，完全不能作出这样的結論

說，語言和思惟是同一的东西。（常有人說思想是不出声的語言；語言是出声的思想。这种說法是不对的。）

語言和思惟是相互依存的，但同时不能把它們混淆起來，它們不是同一个現象。

思惟是客观現实的反映，反映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進行的；語言，一方面是把思惟活动的成果巩固下来，一方面它又是交际的手段，把思想傳达給别人的手段。

〔註一〕：可参看罗常培先生所寫“語言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載“中國語文”雜誌一九五二年八月号，的十二頁。——編者

〔註二〕在古代俄語中有一种特殊形式的复合动詞，称为完成式（перфект）。它漸漸排挤了其他一切过去时的形式而成了現代形式的过去动詞的基礎。

在古代俄語中完成式是一种复合的形式：由动詞 быт 的現在时而來的助动詞（Я есмь，ты еси，он есть）加上以 л 結尾的过去时形动詞。如：Я есмь пошел. Ты еси пошел. Он есть пошел. 到后來，在完成式中助动詞越來越少用了。終於被簡化掉了。所以，現在俄語中过去时动詞的形式不是别的，而正是从前以 л 結尾的形动詞，这种形动詞是只有性和數的变化而沒有人称的变化的。——編者

第　二　講

語言的詞彙和語法構造（一）

提綱：

一、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礎，語言特点的本質；

二、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詞彙。

正象我們前面所說的，在那些与社会生活即人类集体的生活相联系着、並在某一方面为社会服务的多种多样的社会現象之中，語言占着一个獨立地位，这是因为它在社会中起着特殊的、独立的作用的緣故。这种作用除了語言以外，是任何其他的社会現象所沒有的。斯大林同志明确地指出了語言的这种作用：“語言是工具、手段，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

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二〇頁）

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來，語言既是交际的手段，也是表达思想的手段。

人們藉助什么來交流思想呢？就是說，为了交际，交流思想需要用什么呢？很顯然，第一，需要表示現实（正确一点說是“現实的一部分”）的詞；第二，需要詞形变化和用詞造句的規則和定律，也就是構成語言的語法的东西。

由此可知，語言的特点既然在於它是交际的工具，那么这一特点的实質即語言的基礎就是基本詞彙（以后再講为什么是基本詞彙而不是整个詞彙）和語言的語法構造。

研究語言的时候，正如我們所常見的，是把語言分为几个不同的方面的：語音、語义、修辞、詞源和語法構造等。所有这些方面在語言中都有地位，因而都应当是語言学研究的对象。但是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乃是决定語言的一切方面的主要的、起主導作用的兩个方面，因为正是它們構成了語言的基礎。不研究不了解語言的基本方面——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就不可能了解語言的其他方面，以至整个語言。正因为这样，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才成了需要特别加以研究的对象。

語言中所有的詞組成該語言的詞彙。从最詳尽的大詞典里可以得到語言詞彙的一些輪廓，这种大詞典不僅要包括一般常用的詞，並且也要包括文学作品中常碰到的專門的詞（術語和行業詞語）、方言詞、古詞語、歷史詞語。但是，即使是这种詳尽大詞典也包括不了該語言中所有的一切詞。如果我們把那些事实上存在但並沒有包括到大詞典中去的大量的派生詞、方言詞和行業詞也算在內，那么，每一种現代語言中的詞事实上比詞典里的詞是要多得多哩。

語言的詞彙中的詞是各色各样的。正象我們上面所說过的，有普通常用詞、專門詞、方言詞、行業詞以及有特殊修辞色彩的詞和不同歷史來源的詞。然而这不是詞彙中詞的主要区别；詞彙中詞的主要区别是在於有一些詞屬於基本詞彙，而另一些詞則屬於詞彙。斯大林同志說：“語言詞彙中最主要的东西是基本詞彙，其中包括所有的根詞，成为基本詞彙的核心。基本詞彙比語言的詞彙是窄小得多的，可是它的生命却

長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長时期中生存着並給語言構成新詞的基礎。”（同上書，二一頁）

現在我們來比較詳細地談一談基本詞彙的特征。从基本詞彙的定义中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它窄小得多。这就是說，基本詞彙只不过是詞彙中比較不大的一部分，虽然从对語言的意义方面來看，它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第二，基本詞彙的生命長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長时期中生存着。这就是說，象 вода（水），землял（土地），гора（山），лес（樹林），рыба（魚），человек（人），ходить（行走），делать（做），производить（生產），торговать（做生意）（斯大林同志曾把这些詞引來作例去，說明它們是为許多代都服务得很好的）等詞，从古代起在語言中就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了。这里產生了一个問題：为什么有一些詞很快地就不用了，而另外一些詞，象上面所举的那些，却生存許多世紀呢？

其基本原因在於基本詞彙中的詞是全民的，一切講該种語言的人都利用它們，不管社会的階級划分，也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基本詞彙中的詞的詞彙意义是这样的：如果沒有这些詞就不能進行交际，因为它們表达的是最重要的概念。事实上，任何人，不管他屬於哪个階級，也不管他生活在哪个时期，离了象 вода（水），чедовек（人），ходить（行走），делать（做）这些詞是不行的。我們中間無論是誰，他可以不知道象 меморандум（备忘錄）рефлекс（反射），блюминг（輾压机）等詞；不用他們，在交际过程中也不会遇到什么特別的困难，假如要沒有象 земля（土地），хлеб（粮食、面包）этот（这个），я（我），есть（吃），спат（睡覺）等这些詞就要感到困难。由於这个緣故，基本詞彙中的詞要比詞彙中的詞穩固得多。基本詞彙中的詞的穩固性是由於它是全民的这一点所規定的。並且按照基本詞彙的詞义說來，它表达的是最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不管是对於那些生活在人类社会發展的最初階段的人們还是对於譬如說生活在現今的社会主义的人們說來都是必需的。

然而，如果从这一事实出發而作出結論說，一切民族的基本詞彙都是一样的，基本詞彙的数量对於各時期、各語言說來都是一成不变的，

这就不对了。恰恰相反，尽管基本詞彙具有穩固性，但它还是在变动着的，虽然与整个詞彙比較起來要慢得多。在这一种歷史条件下，这些詞是最需要的；在另外的歷史条件下，則另外的一些詞又是最需要的了。例如：在苏維埃时期 выборы（选举），председатель（主席）партия（党），коммунизм（共產主义）等詞成了全民的了它們所表达的概念是現在任何一个苏联人都离不了的，它們开始在語言中和 делать，работать，лес，гора，ты，等类型的詞占同样的地位。

即使把那些在經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發展大致处於同一水平的各民族語言的基本詞彙拿來比較，那么这些語言的基本詞彙也有着極大的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各民族的民族特性不能不表現在基本詞彙之中，另一方面是因为基本詞彙中的詞的構詞方法和詞义的發展过程也各有不同。例如在漢語中某些詞可以列入基本詞彙之內，而在俄語中可能根本沒有这些詞。再如漢語中“菜”这个詞也可作“肴饌”的总称解，而俄語中 овощи（菜——專指蔬菜）就沒有这个意义。

最后，从斯大林同志下的那个定义之中所得出來的基本詞彙的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基本詞彙給語言以構成新詞的基礎。

由於不断產生对於代表現实中新現象的新詞的需要，就要在語言中構成新詞。然而，某一个詞（只要它不是借用來的）之所以被称为新詞，是从具有这种詞彙意义的詞过去在語言中沒有过这一点來講的，至於谈到新詞的詞法成分和語法意义，則它們对語言說來並不是新的，因为新詞是要利用在語言中大家所熟知的基本詞彙中的詞根或詞身再加上語言中的構詞要素來組成的。如苏維埃时期在俄語中出現了 скоростник 这个詞，它表示用快速的方法來工作的斯达哈諾夫式的工人。但是这个新詞的成分对語言說來並不是新的，скорость（速度）这个詞和后綴 ник（参考 работ-ник（工作人員），удар-ник（突击隊員））在組成 скоростник 以前在俄語中早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了。所以 скоростник 这个詞本身是很容易为所有的俄罗斯人所理解的。

新詞是在語言中已有的基本詞彙中的詞的基礎上構成的。正是由於語言中有穩固的、全民的基本詞彙存在，新詞的發展才成为可能。詞的構成方法在不同語言中是各不相同的。例如漢語的構詞基本上是靠詞根

复合，而在俄語中則是藉助於構詞要素（前綴、后綴）。

在語言發展的不同时期藉助於基本詞彙中的詞構成新詞的結果，便在基本詞的周圍形成了許多詞族（семи слов 或 пучки слов 或 гнёзда слов），它們各自起源於基本詞彙中的一个詞。例如 дерево（樹）这个詞構成：деревце（小樹），деревяшка（小塊木头），деревянный）木料的），деревенеть —— одеревенеть（麻木）；трава（草）可構成 травка（小草），травянистый（多草的）；пустой（空的）这个詞構成了 пустыня（沙漠），пустошь（荒野），пустота(空虛)，пустырь（空地），пустынный（荒無人煙的），пустяк（小事），пустеть(空)，запустеть（荒涼）；расти（生長）这个詞構成了 вырасти（成長），отрасти（長出），зарасти（長滿），растение（植物），росток（幼芽），отрасль（部門），прирост（增加）等；дело（事）这个詞構成了 делать（做），дельный（能干的），разделка（修飾），отделка（裝飾，裝飾品），поделка（制造品)бездельник（二流去），безлушка（玩具，玩物）等等。

同时，許多派生詞可以轉入基本詞彙，而自己也構成新詞。例如：скорость 这个詞是由 скорый（快的）而來的，这里的詞根是 скор；而 скоростник 却又是从 скорость 这个詞來的。плот（木筏），плотина（堤壩），плотный（緊密的），плотник（木匠）等詞現在也屬於基本詞彙，它們都是由 плот 一詞來的。以后，它們之中的每一个詞又成为一个詞又成为一个起点而構成一連串的詞。如：плот——плотовой（木筏的)——плотовщик（筏夫）；плотный——плотность（密度）плотнеть（变緊密）——плотнить（使緊密)——уплотнять（增加緊密性）——уплотнённость（緊密性）；плотник—— плотничать（作粗木工）——плотницкий（木匠用的）плотничество ——（木匠業）——плотничный（木匠的）——плотничий（木匠的）。

这样，可以从兩个角度，兩个方面來看基本詞彙中的詞：一方面，它們本身在語言中就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們所代表的是最重要、最必需的概念；另一方面，它們中的每一个詞直接地，或通过派生詞而構成新詞的，因之，它們在語义上与几十个有时甚至是几百个其他的詞相联

系着。

这就是斯大林同志之所以把基本詞彙划为語言基礎的实質之一，並同时强調構成基本詞彙的核心的根詞在基本詞彙中的特殊地位的原因。

要确定一个詞是否屬於基本詞彙，有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上述可知，这里必須估計到一系列的因素：这个詞的全民性（廣泛通用的詞）；它是否代表最重要的概念；它在語言中存在的久暫（詞的穩固性）；它是否構成新詞的基礎。同时还可以看出，有的詞虽然出現在語言中为时不太久，但是按照它的其他特征看來，它仍应列入基本詞彙之內，如 коммунист（共產党員），трудодень（劳动日），колхоз（集体農庄）等。

詞的多义性也应算是基本詞彙的特征之一。的确，如果一个詞是通用的，如果它表达的是最重要的概念，如果它長期存在於語言之中，那么从中發展出各种意义乃是很自然的。請參看，дом，хлеб，идти 等詞的多义性。

一般說，基本詞彙可以包括：

(1) 外界事物和現象的名称（вода（水），гора（山），лес（樹林），солнче（太陽），небо（天空），огонь（火）等）；

(2) 生物的名称（человек（人），конь（馬），птица（鳥），рыба（魚）等）；

(3) 身体各部分的名称（рука（手），нога（脚），голова（头）等；

(4) 親屬術語（мать（母親），отец（父親），брат（兄弟）等；

(5) 劳动和防禦所用的工具的名称（топор（斧子），нож（刀），молот（錘），стрела（箭）等）；

(6) 許多行为的名称（ходить（走），делать（做），производить（生產），торговать（做生意）等）；

(7) 某些抽象的概念（правда（眞理），добро（善良），низко（低），высохо（高）等）；

(8) 人称代詞（я（我），ты（你），он（他）等）；

(9) 数詞（дви（二），три（三），десять（十）等；

（10）虛詞в，на，бы，к，и，но，а 等等）。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当然不能完全包括基本詞彙的范疇，只能作为例子，为的是在着手确定一个根据。

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詞彙有着緊密的联系和相互依賴性，它們是彼此不能隔离的。这种相互依賴性之產生，不僅由於詞彙中的詞彙的基礎上構成的，而且也是由於基本詞彙和詞彙中的詞的互相轉变：詞彙中的詞轉变为基本詞彙的詞，或者相反。当基本詞彙中的詞丧失了基本詞彙的特征以后，可以轉入語言的詞彙。如：уезд（縣），управа（署），волость（鄉），соха（犁），оброк（租稅），барщина（劳役）。反之，过去屬於詞彙的詞，如 социализм（社会主义），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國际），милиция（民警），планировать（計划），экономика（經济）等現在已轉入基本詞彙。一般說來，应当注意到詞彙的發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基本詞彙。

我們已經詳細地說明了基本詞彙的概念及其对於整个語言的意义。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可以輕視詞彙在語言中的作用，認为只应当学習基本詞彙，詞彙中的詞在学習俄語詞彙时应占次要地位。

斯大林同志說：“詞彙反映着語言發展的狀况，詞彙越丰富、越紛繁那么語言也就越丰富，越發展。”（同上書二一頁）由此可見，詞彙反映着語言的丰富狀况。語言中表示現实及人們心理活动的各方面的詞越多，則我們的思想就越能表达的确切，因之，語言也就能更好地为交际这个目的服务。相反，語言的貧乏能妨碍表达現实中的細致的差異和現实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許多同志大概也曾多次体会到，如果沒有一定数量的適当的俄語詞彙，就沒有可能用俄語表达某种复雜的思想，不能較确切地回答别人提出來的問題。

比如說，一个外國人在中國居住，如果知道一千个左右的最必需、最重要的漢語詞就可以在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上進行交际）如：買东西；在完成某种不复雜的任务时能理解命令和指示），但是为了作或听一个通俗科学报告或國际形势的报告，讀文藝作品或研究某种科学，那么一千个詞就非常不够了。可見整个詞彙規定了語言在現代社会活动的各个部門中为交际服务的这一目的的能力。

大体上确定了什么詞包括在基本詞彙中以后，就可以說，除去基本詞彙中的詞以外，語言中所有的其余的詞都归入詞彙之中。它包括絕大多数的派生詞，絕大多数的抽象詞（如：感覺、派生性、抽象）、許多借用詞、行業詞、科学術語、轉义詞、方言詞語、古詞語、歷史詞語、同行語（階級習慣語）、新詞語等。

第 三 講

語言的詞彙和語法構造（二）

提綱：

一、語法及其特点；

二、語言的詞彙和語法構造的相互关系。

儘管詞彙，特別是基本詞彙，对語言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詞本身还不成为語言，因为僅僅有詞还不能保証人們彼此之間進行交际。下面这个淺近的例子就可以使我們完全相信这一点。比方說，我們知道六个漢語詞："同志們""今天""我們""將""研究""語言学"，如果上課时对学生們說："將研究今天語言学我們同志們"，学生就听不懂是在講些什么。再如对俄罗斯学生这样說：сегодня мы,тов арищи, пойти в город за библиотека книта，那么他們也是听不懂的。

为什么在这兩种情况下我們所举出的这些詞本身不能表达思想，因而也就不能为交际这一目的服务呢？

这是因为造句时就必須知道如何把詞連成句子，应当知道造句的規則，应当知道按什么順序來安排詞。拿俄語來說，还应当知道 пойти（去），город（城市），библиотека（圖書館），кнblock（書）这些詞的變化規則。沒有这些詞就是一堆死的东西，我們就不能利用它們來進行交际。

斯大林同志形象地把詞彙本身比做建筑材料，就象水泥、磚、瓦、砂、釘子等还不是房屋一样，詞沒有語法也不成为語言。只有詞接受了

語言的語法支配的时候，它們才能够为交际这一目的服务，因为“語法規定詞的变化規則及用詞造句的規則，这样就使語言具有一种有条有理的、可理解的性質。”（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二一頁）

斯大林同志給語法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語法（詞法、句法）是詞的变化規則及用詞造句的規則的綜合。”（同上書，二一至二二頁）語法規則和語法定律的体系構成了語言的語法構造。

語法規則和語法定律是怎样產生的呢？它們是在語言自身之中形成起來的。斯大林同志指出：“現代語言的要素还在奴隸时代以前的古时期就已奠下了基礎了。那时的語言是不复雜的，詞彙基礎（словарный фонд）〔註〕是很貧乏的，但是它有它的語法構造，虽然这种構造是很原始的，但总算是語法構造。”（同上書，二四頁。着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

远古时期，在語言發展的最初階段，在某些語言中，語法規則想來不过是句中詞序的一些簡單規則；在另一些語言中只是簡單地指出某些詞应屬於哪一类；而在第三类語言中为了要造極簡單的句子可能有一些專門的詞，用來指出句子中各詞間的关系。其后，随着詞彙的擴大和人們語言实踐的日益复雜，新出現的詞也按照那些旧詞的运用規則在語言中运用起來了。如現代俄語中新出現的 стахановец（斯达哈諾夫工作者），ударник（突击隊員）等詞都归入陽性名詞，並按照第一变格法变化，就象 отец（父親）这个名詞一样。由於詞彙的發展，言語內容的复雜化，就要求改進和改善語法規則，因为原有的語法規則开始使交际过程發生困难。

語法的特点在於：它的規則和定律永远是表达某种普遍的东西，受它支配的不是个別的詞和句子，而是整組整組的詞和一定类型的詞組，語法把它加以抽象，而不管它們的具体內容。例如：земля（土地），вода（水），дом（房屋），лошадь（馬），человек（人），рука（手），молоток（鍾子），день（一天），книга（書），чтение（閱讀），возраст（年紀），собрание（会議）等这些詞，語法把它們都归成一类，而不管它們的詞彙意义上的差別。因为語法不是管这些詞的具体意义，而

管的是它們中間所共同的东西，就是：它們都表达事物，都屬於語法上三种性别中的一种，都有格的变化。正是根据这些共同之点，語法把所有这些意义不同的詞归一个詞类——名詞。

同样，Человек идёт.（人走。）Солнче светит.（太陽照耀着。）Трава растёт.（草在生長。）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процветает.（工業兴盛。）这些句子之間就內容說來俘管是毫無共同之点，但从語法觀点來看它們却是一样的句子。語法是从这些句子的具体內容中抽象出來的，它只是指这些句子的第一詞是第一詞是第一格名詞，作主語；第二个詞是現在时單数第三人称动詞，与主語的人称、数一致，作謂語。

斯大林同志在說明法則和定律的特点时寫道：“語法的特点就在於它給以詞的变化的規則，不是指具体的詞，而是指沒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的詞；它給以造句的規則，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句子，例如具体的主語、具体的謂語等等，而是指一般的句子，是与某个句子的具体形式無关的。語法把詞的变化和用詞造句的基本共同之点綜合起來，並用这些共同之点組成語法規律、語法定律。語法是人类思惟長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是人类思惟所獲得的巨大成功的指标。”（同上書，二二頁）

这样一來，虽然詞的詞彙意义多种多样的，具体詞組更是多种多样的，句子則具有更大的多样性，可是語法不管这些，而把这些多样性归結为数目不多的典型的規則和定律。例如，把俄語中無数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的詞間关系归納为詞在句中的关系的三种基本类型：一致关系，支配关系，附加关系；把俄語中的千百万个詞归納为十大詞类；把数百万种可能有的句子归納为：簡單句（非擴展句和擴展句），复合句，完全句，不完全句，人称句，無人称句，主格句，不定人称句，泛指人称句，帶有兩个主要成分的句子和帶有一个主要成分的句子。名詞与别的詞在句子中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具体关系只用六个格就表达出來了。

因此，我們的語言就成为有条不紊的語言，它具有一种有条理的可理解的性質。

無論在語言中出現一个什么新詞，也無論这个新詞运用於什么样的具体条件之下，由於有了語法，这个詞不管它是單个的还是在句子中都

獲得了一种确定性：белый（白的），белизна（白顏色），белеть（發白），набело（清清楚楚地）等詞的詞根虽然相同，並且具有相同的实在意义，但是依据着語法，它們則表达不同的概念：белый 一詞具有屬性的意义；белизна 具有物体的意义；белеть 一詞則具有处於表現过程中的一种狀态的意义。这就是說，正是語法賦予那个包含在詞根中的共同概念以确定性，給予这些詞以联詞成句的可能性。沒有語法，詞根 бел（这里不是指形容詞 белый 的短尾形式）本身不能表达甚么确定的概念，因而也不成为一个詞。

由此可知，語法構造把詞組織起來了，也就是說，一方面把它們归入某个普遍性的語言范疇（概念），而給予詞一种确定性，另一方面把句中詞組归入在語言中形成的某一詞組类型，使得用詞造成連貫的言語，造成句子成为可能，从而在語言中各獲得一定的意义。

由於語言逐漸地、歷史地發展的結果，在語言中形成了不同的專門的語言概念（范疇）。例如：表达物件的范疇（名詞），表达屬性的范疇（形容詞），表达行为或狀态表現过程的范疇（动詞），表示名詞与句中其他成分的关系的范疇（格）等等。这些概念都是純屬語言上的，例如从語言的觀点上來看，凡是具有独立的格的特征及变格能力的都算是物件，所以从語法的觀点上看來 абстракция（抽象），волнение(不安）也是物件，虽然照一般的理解，我們並不把它們叫做物件，而最好是把它們叫做抽象概念。

語言有其自己的規則、自己的規律性。因此，譬如說在俄語中 топор（斧子），шар（球），сон（夢）这些意义不同的詞从語法上看是沒有区别的，对於語言說來，这都是第一变格法的陽性名詞；然而 штык（刺刀）和 солдат（士兵）这兩个詞从語法上看來則是有区别的，因为第一个詞有一种詞尾变化的体系（它屬於非动物名詞）而第二个詞 солдат（士兵）則有另一种詞尾变化的体系（它屬於动物名詞）。拿漢語來說，“画兒”（картина）和“腿”（нога）这兩个詞在語法上是有区别的，因为“画兒”是以“張”來計算的，“腿”是以“条”來計算的，但对俄語說來，这兩个詞从語法上來看是一样的，都是第二变格法的陰性非动物名詞。

由於詞和詞、詞組和詞組是用某一种方式（詞尾、后綴、詞的結構性質、詞序等）來互相区别的，因此就形成了一些共同的語言概念、抽象（例如，动物和非动物的概念），这些語言概念、抽象就是建立語法規則和定律的基礎。某一組詞或某一些詞組所特有的这种特殊的、不同的东西就成了各种語法范疇的基礎。

在各种不同語言中形成各种不同的范疇，而且在各种不同語言中有一些語言范疇可能是一样的，有一些則是不一样的。例如，在漢語和俄語中都有称人的名詞这个范疇，但它們在語法上却是各不相同的。漢語中称人的范疇首先表現在疑問代詞的体系中。（称人的用“誰”，非称人的用“什么”。除此之外，漢語中称人名詞与非称人名詞的特点是在組成詞的后綴的那个字上來区别的。例如，表示称人的有：“人”“匠”“家”；多数有“們”。）在俄語中称人的这一范疇則首先表現在人物的構詞后綴（-тель，-ник，-чик 等等）上；кто 这个疑問代詞既可指人而言，也可以指其他动物而言。所以說，每一种語言的特征就是它特有的語法范疇的体系以及語法范疇的表达方法。

語法范疇就是語法上普遍的概念，它規定語言的語法構造的性質，它表現在詞形变化和联詞成句之中。作为詞形变化和联詞成句的基礎的那个一般的东西，就是語法范疇的本源。

語法范疇的普遍性有大有小。例如俄語中凡是名詞都必須屬於三种性屬的一种，因此名詞在語法上都要表示性別；並不是所有的名詞都表示人物、动物或物質。所以性的范疇对名詞說來普遍性最大，而人物或物質的范疇对名詞說來普遍性較小，因为后者是表現在前者的范圍之內的。

語法范疇从詞的具体的詞彙意义中抽象化的程度也可能是不同的。例如俄語中名詞的性的范疇或动物的范疇在極大程度上是受詞的詞义所規定的，我們可以在詞义的基礎上來确定下面这些詞的性：отец（父親），сын（兒子），шофёр（汽車司机），конь（公馬），бык（公牛），женщина（妇女），мать（母親），дочь（女兒），няня（保姆），прачка（洗衣妇），корова（母牛），курица（母鷄）。可見这些詞以及类似的詞內，性这一語法范疇是直接依靠着它們的詞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

下这一范疇的抽象程度較小。相反，名詞的格的应用則不依賴於它們的詞义，而是由这些詞与句中其他的詞的关系所确定的。因此，这里不是詞义的抽象，而是詞間关系的抽象。所以我們說，格的范疇要比性的范疇或动物的范疇的抽象程度大。

这样看來，我們可以說，語法范疇就是把詞和句子中的个別的和具体的东西加以不同程度的抽象的結果。

从上面講的可以看出：語言的語法構造普及到並貫穿着語言的整个詞彙。在語言中沒有在語法上固定起來的詞（無論用什么形式）是沒有的。也就是說，每个詞都归入一定的語法范疇。語言中出現的新詞一定要归入某一語法范疇，否則它就不成其为詞。这样看來，語法構造是与詞彙互相联系着的，語法構造只有表現在詞和詞間关系之中。从另一方面說，語法構造本身，它的規則和定律之產生、改善和發展是用把詞和詞間的关系加以抽象的办法來实現的，正象我們已經講过的，它不是从外部加添到語言中去的，而是在詞和句中創立起來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語言的語法構造和語言的詞彙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約的。

〔註〕：斯大林同志在这里用了 словарный фонд 这个術語大概是想强調在远古时期还不可能把語言的詞分成“基本詞彙”（основной словарный фонд）和“詞彙”（словарный состав），因为在社会發展的那个階段上，从而在語言發展的那个階段上，語言中詞很少；“基本詞彙” 这兩个概念差不多是相等的。因此，我們暫时把 словарный фонд 这个術語譯为“詞彙基礎”，以表示与 основной словарный фонд 和 словарный состав 这兩个術語有区別。編者

第　四　講

語言的穩固性。詞彙、基本詞彙、語法構造变化速度的不同　語言从旧質道新質的过渡　語言發展的基本过程

語言区别於許多其他社会現象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穩固性，也就是說，作为交际手段的語言可以为許多世代服务。在同一个时期內，其他的社会現象，尤其是屬於基礎和上層建筑之列的社会現象，有重大的变

化，而語言却沒有什么顯著的变化。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这篇文章中屡次强調指出語言的这种穩固性。例如，斯大林同志在講到語言和上層建筑的区别时用現代現代俄語作例子來說明語言的穩固性：从普式庚逝世一百多年以來俄語沒有遭到什么破坏，按它的語法結構來說，和普式庚时候的語言很少差別，虽然在同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發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現在任何一个俄罗斯人都能很好地了解普式庚的作品，就象了解現代苏联作家的作品一样。

語言的这种穩固性不僅在文学作品中很容易發現，就是在每个人的实际生活中也很容易發現。例如每个人都能够同自己的祖父、祖母的談話，交際；小孙子和老祖母談話沒有任何困难，虽然他們之間要相差七、八十年。还有，老祖母也可以和她自己的老祖母自由地談話。那么很明顯，不僅是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在活的口語中，在一百二十年至一百五十年間語言沒有什么变化，这一点是無可爭論的。

我們把較古的書面文献材料拿來看一看，如果这些文献不是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年以前寫成的，而是在二百年至三百年以前寫成的，特别是用当时活的口語寫成的，那么可以發現，除去不多的一些詞以外，我們仍然可以了解这些作品，而不会遇到什么特殊的困难。語言，特别是把它和其他的社会現象比較，为什么具有这样大的穩固性呢？

“語言的穩固性是由於它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的穩固性所造成的。”（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二四頁）

在前一講中我們已經講到，語言的語法構造乃是許多規則和定律，这些規則和定律是把个别的和具体的东西加以不同程度的抽象的結果。这就是說，这些規則的內容所包含的那个一般的东西，只能在詞和句子的基礎上產生出來。也就是說，要產生一条新的語法規則，就必須先要在詞和句子之中出現一种可以加以概括的特殊的东西。

但是，在詞形变化和用詞造句之中未曾有过的这种特殊的东西，不可能是那么簡單、那么容易地就產生的。为什么呢？因为語法規則和定律好象是一个沒有口的圓圈，任何一个新產生的詞或者任何一个新的句

子都要納入已經存在的語法規則和定律之中。

因此，語言的詞彙不能直接作用和影响語法構造的改变，因为詞本身是依照已存在的語法的規則形成起來的。这就是說，即使在語言的語法構造中有什么改变，那么这些改变也是在語法構造的內部实現的。(即按照語言的內部發展規律來改变的，“語言学的主要任务是要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斯大林）。)

語法的內部改变是按照什么方向進行的呢？很顯然，只有按照比現有的語法構造的抽象性更大的抽象性的方向發生变化。例如，在古俄罗斯語言中語法上数的范疇曾經有过三种，就是單数、双数和复数。往后，由於單数和复数更抽象的形式發展了，双数就在語言中漸漸消失了。再如，古俄罗斯語言中曾有四种过去时的形式，由於抽象性的繼續發展，它們漸漸消失，而为一种过去时的形式所代替；而同时，体的范疇也發展起來了。但是，語法構造發生这种变化要經歷很長的时間，直到語法構造中的新現象破坏了相应的旧現象为止。斯大林同志强調指出語法的这个特点，他寫道：“語法是人类思惟長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是人类思惟所獲得的巨大成功的指标。”（同上書，二二頁）

基本詞彙对語言的穩固性也有不小的作用。基本詞彙包括語言中最穩定的詞，表达最重要的概念的詞，世世代代各階層的人都同样地利用它們。

在語言中出現的新詞不是隨意和偶然造成的，而是在語言中已有的基本詞彙中的詞和語言的構詞要素的基礎上造成的。所以新詞是旧詞要素的体現者。新詞的出現不是削弱这些要素（產生新詞的基礎）的作用，恰恰相反，而是巩固和擴大基本詞彙的影响范圍。現在我們举个例子來說明一下。比如在俄語中有一个帶詞根 дел 的詞—дело，就在这个詞的基礎上出現了 делать（做），дельный（能干的），дельно（有条理地），бездельник（二流子）等詞。这时可以發現，包含在詞根 дел 中的这个意思現在不僅僅存在於一个詞中，而是存在於五个詞中了。因此，詞彙的發展不是削弱基本詞彙中的詞，不是使它們晦暗不明，而是在語言中加强了它們，使它們更富有生命力。

如此看來，基本詞彙的这种穩固性不僅是因为基本詞彙中的詞所表

达的是穩固的、是必需的概念，而且也是因为在基本詞彙中的詞的基礎上所組成的新詞巩固和擴大了包括在这些詞的詞根中的那个共同的意思。

斯大林同志指出："現代語言的要素还在奴隸时代以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奠下基礎了。那时語言是不复雜的，詞彙基礎是很貧乏的，但是有它的語法構造，虽然这种構造是很原始的，但总算是語法構造。"（同上書，二四頁）

如果很好地考慮斯大林同志这几句話，那么这几句話正好是証明了上面所說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的穩固性，也就是說，語法構造一面在發展着，改進和改正着自己的規則，同时並不改变自己的基本特点，而保存着自己的基礎。但詞彙最初是非常貧乏的，那时"詞彙"这个概念和"基本詞彙"这个概念几乎相等，但它在發展着，終於达到了語言的現今的狀況，同时在許多时期的歷程中保存着自己的基礎——詞彙基礎中最初的詞。

从上面所說的可以作出結論：既然語言的基礎，語言特点的实質（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穩固的。那末整个語言也是穩固的。

但是不能从語言是穩固的一点出發而作出結論說，語言是不变化的。自然界和社会中沒有不变的事物和現象。認为語言是不变化的說法是和辯証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則相矛盾的，因为辯証唯物主义的原則認为一切都在运动着、变化着，永恒不变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当然，語言也在变化着，但是語言中所發生的变化与其他的社会現象不同，它按照自己的方式变化着，而且变化得非常慢。同时，語言的各个方面变化的速度也不一样。

語言的詞彙变化得最快，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那样，它是几乎处在經常的变动之中。也就是說，在它中間經常出現一些新詞或新的詞义，同时，由於某些詞所表示那些事物或現象的消失，这些陈日了的詞也就从詞彙中消失了。

詞彙之所以具有这种易变性，是因为在社会中不断發生的社会生活的改变直接地影响着它。但是，詞彙的这种經常的易变性改变不了整个語言，因为語言的基礎本身（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仍然是穩固的，甚

至詞彙愈發展，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則愈加巩固並擴充着自己的基础。

基本詞彙也在变化着，但是它变化的速度異常緩慢。基本詞彙一方面把自己基本上保存下來，同时用新詞补充着自己，这些新詞是从詞彙中滲透过來的。

如果一个詞要滲透到基本詞彙中來，就必須：第一，这个詞首先要在詞彙中出現；第二，这个詞彙中的时候就要成为全民的，它开始表达对於一切講該种語言的人說來都是最重要的概念；第三，它本身必須成为構成新詞的基礎。例如 партия（党）这个詞首先進入語言的詞彙之中，其后，由於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發展使得这个詞流行起來了。在几乎是苏維埃國家的所有公民都参加的國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离不了这个詞所表达的概念。最后，这个詞成了構成新詞的基礎，如：партиец(党員)，партийный（党的），партийность（党性），внепартийний（党外的），внутрипартийый（党內的），беспартийный（非党的），беспартийность（無党性）等。一个詞要經过这样的过程是要很長时間的。

語言的語法構造比基本詞彙变化得还要慢〔註〕。社会生活中的現象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变化不能直接影响語言的語法構造。語法構造之所以不受外部的影响，是因为它是由各种“語言抽象”綜合起來構成的，这些語言抽象是專門的“語言的抽象”，与社会生活的他們各个范圍沒有直接的联系。在这里，正象我們所見到的，抽象是在語言中已經有了的抽象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例如，过去保加利亞語言中各种格詞尾在保加利亞語中漸漸地消失了，而現在名詞在句中和別的詞关系是用另外的手段表达出來的，即藉助於前置詞表达出來的，也就是用分析的形式表达出來的。

既然不同程度的語言抽象（各种語法范疇）組成了語言的語法，而这些語言抽象表达的是詞和用詞造句所特有的那个最一般的东西。那末，十分明顯，語法構造的改变是通过表达語法概念的方法的改变以及愈益深入的概括，也就是把語言中已有的概念再加以抽象的途徑進行的。然而这是一个極其長的过程，要經过一个漫長的时間，要經过好几

个世紀。这就是为什么在語言的一切方面之中語法構造要算是最穩固的了。

由於語言的各个方面的不平衡發展（詞彙改变得快，基本詞彙較慢，語法構造更慢），整个語言的改变过程是長久的。因此，語言从一种質态过渡到另一种質态是以它特有的方式進行的，不是用代替的方式一下子就消滅語言的旧質並建立語言的新質，而是以新質要素和語言的新的結構的要素漸漸地、長期地積累以及旧質要素的逐漸衰亡的方式進行的。

因此，在語言中經常存在有新產生的現象和古旧的、殘余的旧現象。如果我們把語法这个語言的最穩固的部分拿來研究一下，那么我們可以在它中間分出如代詞一类的最古的現象和正在產生着的狀态詞一类的新現象。

当語言中積累了相当多的新要素以致完全成了另外的一种語言結構的时候，新的質才在語言中出現。但是在組成新質的时候，語言的基本要素仍然保存着，因为語言中新的东西通常是在旧的形式發生的。俄語中名詞变格的体系就是这样發生了改变的：过去有五种变格类型，而現在只剩下了三种。尽管發生了变化，但是表达格的关系的原則本身仍然沒有改变。名詞的复数范疇現在表示的复数概念既包括許多物体和現象，也包括兩个物体和現象，这在現代的名詞复数范疇中是新的东西，但是旧的复数的形式並沒有改变。

* * *

在各种語言的發展中間可以發現兩个基本过程，就是分化过程和統一过程。

分化过程在語言中是这样的一个改变过程，就是同一起源的各語言或方言之間的区別愈來愈增大。这个过程和統一过程一样，是直接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着的。

大家都知道，在人类社会發展的最早階段，人們是一小群一小群地即一个氏族一个氏族地住在一起的。它們是由親屬关系緊密的人結合起來的一些小集体。当氏族發展起了並且氏族中的人数也相当多了的时候，在那种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的條件下，氏族就不能够獲得足够的生

活資料來維持这个人数众多的龐大的集体生活。於是氏族中的一部分就分出來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組織，轉移到隣近的其他地区去从事独立的經济和社会生活。最初，在一定的时間內，这些分开了的氏族的語言之間沒有什么差别。后來由於这些氏族之間的联系减弱了了，於是每一个氏族的語言中在語音方面、詞彙方面、語法方面出現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愈來愈發展，而形成了各种方言，氏族經过这样的几次分化，結果便成了某一語言的各种方言。氏族間的联系愈少，它們的方言差别也愈大。一种基礎語言（язык-основа）就是这样分成几种方言。然而無論这些氏族之間的联系多么少，它們的共同性由於血緣关系、語言的親屬关系以及地区接近而保持下來了。这些相近的氏族就組成了部落。部落內部在經济和軍事的基礎上（由於向新的地区迁移的緣故）保持了各种关系。

部落也分裂成为几个親屬的部落。这时漸漸出現了一些新的部落方言，最初的部落語言对於这些新的部落方言說來就成了基礎語言。如果各親屬部落之間失去了联系（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每一个部落占据着一个遼闊区域），各个部落方言差别愈來愈大，那么方言就漸漸地变成了独立的語言。

当然，在这里我們对於处在發展的最初階段的原始社会中的这些过程敘述得非常概括、非常簡單，所以不能完全反映出真实的情况。但是对我們說來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指出基礎語言分裂成方言的这个过程，到最后，个别的方言在一定的条件下变成了独立的語言。

“經常的分化趋势根源於氏族組織的要素。由於它們的……社会狀况以及居住地域的遼闊，在語言中產生差别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这使得分化趋势加强起來，地域上的分离（空間的）使得語言中漸漸出現了差别。这就導致了利害的不同以及完全的独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九卷，七九頁）

如果我們要举一个歷史上得到証明的例子，那么可以举东斯拉夫人的古俄語的分化过程來作例子。在东斯拉夫人中間發生过分裂，而使得后來形成了俄罗斯、烏克蘭、白俄罗斯等語言。現代拉丁語系的各語言也是如此，它們是由於罗馬帝國的崩潰而在人民大众的拉丁語的基礎上

組成的。

由同一个基礎語言而構成的各方言或語言就是同族的方言或語言。这种親屬关系的特征是在这些語言的詞彙中間，在它們的語法構造中間，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現象。語言的親屬关系有近有远。語言的親屬关系是分化过程的結果。

統一过程，按其結果來說，是与分化过程相反的一个过程。統一过程是統一成为一个整体。統一过程是緊密接触的結果。例如几个同族的部落在一定的条件下起初可以結成臨时性的联盟，后來就成为永久性的联盟。由於在同族部落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联系，就減弱了它們的方言或語言之中的差别，而在語言中間建立起了極大的共同性。当同族部落联盟定居在某一永久区域並开始变为國家的时候，統一过程就开始更为發展了。例如，古俄罗斯語言的形成是由於东斯拉夫人的十三个大的部落在俄罗斯地区定居下來了，並統一成为基輔王國。这个統一的基輔王國就給組成統一的古俄罗斯語言創造了基礎。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部落方言的各种特点並未完全消失，但是东斯拉夫人一切部落的語言的繼續發展是在共同的基礎上按照統一的道路進行的。

当民族形成的时候，一般是各方言中的一种方言成了共同語言的基礎。斯大林同志在其"給同志們的回答"一文中寫道："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語言底基礎並發展为独立的民族語言。例如，对於成为了俄罗斯語言基礎的俄罗斯語言中的庫尔斯克——奥勒尔方言（庫尔斯克——奥勒尔"話"），情形就是如此。对於成为了烏克蘭民族語言基礎的烏克蘭民族語言基礎的烏克蘭語言中的玻尔塔發——基輔方言，也必須这样說。至於說到这些語言中的其他方言，那么它們丧失了自己的独特性，溶入这些語言中，並在这些語言中消滅了。"）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四三——四四頁）

在社会發展的不同歷史时期有时分化过程占优势，有时統一过程占优势。例如在社会發展的最初階段，在奴隸时代以前基本上是分化过程占优势，当然，这时統一过程也是有的。例如，由於战爭的結果，一个部落战勝了另一个部落，把它吞併过來，如果这个战敗的部落講的是另

一种語言，那么战勝的部落就强迫这个战败的部落接受自己的語言。由於一种語言战勝另一种語言的結果而在語言中發生的这种变化叫做融合。如此看來，融合是統一的一种个别情形。

在其他时期，当部族國家开始建立，及以后民族开始發展起來的时候，統一过程就开始占优势。此时，統一过程所采取的可能是把一些个别的方言或親屬关系較近的語言合併为一种共同語言的結合形式或者采取融合的形式，即一种語言战勝了另一种語言。“……剝削階級是世界上統治的力量，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仍然很厉害，民族的孤立和互不信任被國家的区别所巩固着，民族底平等还不存在，語言底融合是在爭取一种語言底統治地位的斗爭中進行着；各民族和各个語言底和平与友誼的合作条件还未具备，擺在日程上面的問題不是各种語言底合作和互相丰富，而是一些語言的被同化和另一些語言的勝利。”（同上書，五三頁）

在社会主义时期对語言說來分化过程是它特点，因为社会主义使得以前被压迫的民族獲得了解放，他們在一切方面，無論是經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其中也包括語言）等方面，能獲得了自己的充分的發展。

所以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語言的数目增加起來了，因为过去各被压迫的部族都有了充分的可能來利用它自己本族的語言並把它提高到文学語言的水平。

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圍內澈底勝利以后，統一过程就开始占优势，即把各种語言統一起來而最終形成一种統一的共同的世界語。非常明顯，这种統一的过程是采取各民族語言自願地滙合为一种共同語的方式進行的。

斯大林同志非常清楚地指出那时是什么样的时代，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圍勝利以后这个統一的世界語的形成过程是怎样：“……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圍內勝利以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世界帝國主义將不复存在，剝削階級將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將被消滅，民族的孤立和互不信任將被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权利底平等將被实現，压制和同化語言的政策將被取消，各民族間的合作將被建立，而各民族底語言將有在合作方式下互相丰富起來的可能。不用說，在这些条

件下根本就談不到一些語言底被压制和失敗与另一些語言底勝利。在这里我們將遇到的不是兩种語言——其中一种遭受失敗而另一种成为斗爭中的勝利者，而是好几百种民族語言——这些語言由於各个民族在經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長期合作便首先分出最丰富的單一的区域性的語言，然后区域性的語言才溶合为一个共同的國际語言，这种語言当然既不会是德語，也不会是俄語，更不会是英語，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語言和区域語言底精華的新語言。”（同上書，五三——五四頁）

〔註〕：語言的基本詞彙变化非常慢，語法構造的变化更慢，他們都非常穩固，同时基本詞彙具有相当大的不可滲透性（所謂不可滲透性就是一种語言的成分不能滲透到另一种語言中去），語言的語法構造則不可滲透。关於这一点，本刊一九五三年第四期第六頁註解第三項說：“語法結構，特別是基本詞彙具有不可滲透性……”是有錯誤的，特此更正，希望讀者們注意。——編者

第　五　講

語言的起源（一）

語言学中語言的起源这个問題，可以是指个別的語言，如俄語、英語、漢語、朝鮮語、烏克蘭語、法語等等語言的起源，也可以不指哪种具体語言，而泛指人类語言的起源。

从上一講中我們知道了，在远古的各部族的語言分化、分裂过程中出現了一些个別的方言，它們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發展成为独立的語言。

与其他的親屬語言作比較來具体研究某些个別的現代語言的歷史，以及某一民族的歷史材料和書面的文獻材料，在許多場合下都使我們比較确切地确定許多現代的民族語言或部族語言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產生和形成的。例如，我們現在就知道俄語、英語、烏克蘭語、法語、西班牙語等是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之下形成的。

但是，解决了上述这些現代語是怎样形成的这个問題並不等於說我們知道了語言一般地是怎样產生的，也就是說不等於我們知道了人們一

般地在什么条件下以及怎样开始講起話來的，因为在这些現代語言形成以前人們就已經有了語言，他們已經是藉助於語言彼此交际的。

所以，某些个別的具体語言的起源問題和一般語言的起源問題是兩个事情。第一个問題一般說是在某一語言史課程中由研究該种具体語言的科学來研究和解决的（例如，在俄語史这門課程中就研究俄語的起源問題），而第二个問題，就是一般語言的起源問題，也就是說在人类社会之中人們是怎样破天荒第一次講起話來的，这个問題就要由普通語言学來研究。

語言的起源　是普通語言学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这是十分明顯的，因为要正确的了解所研究的对象（这里指的是語言）以及它所特有的規律，就必須在發生和發展中來研究这个对象。譬如說要了解电的各种現象，就必須知道电是怎样發生的。再譬如說，要了解封建主义这个形态以及在这个社会中起作用的那些規律，就必須知道封建主义是怎样產生的。那么要了解語言的实質以及在它中間進行着的那些一般的过程，就必須知道：語言是怎样發生的；哪些原因使得它在社会中出現；語言与哪些其他的現象直接联系着等等。

語言的起源这个問題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第一，現代的歷史科学和語言科学对於語言產生的那个时期沒有占有具体的材料，因为任何一种現代語言，它產生的时候既沒有文字也沒有其他的形式使我們能够較正确的判断在人类社会發展的最初階段語言是什么样子，特别是在他產生的階級是什么样子的。

从另一方面講，現在地球上也沒有那样一个人类集体是处在語言產生的階段。所以、語言学沒有可能直接地观察語言在人类集体之中產生的过程。

語言学与其他科学不同，它也不可能用做实驗的方法來解决語言的起源問題。也就是說，不可能創造一些人为的条件來观察人們是怎样学会講話的。（引証幼童的講話也不能做为解决这个問題的材料，因为幼童是他父母生的，他的父母的身体机構在过去几百代的条件下就已經適合於講淸晰的語言了。）

如此看來，在我們現在对人类社会形成的階段人們生活的具体条件

的知識还很缺乏的条件下，語言起源这个問題只能得到最一般的解決。我們只能够談談促使語言在社会之中出現的那些原因，談談語言在社会繼續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語言和其他社会現象特别是和思惟的关系。

想解決語言具体的起源問題，也就是想确定具体的詞最初是怎样形成的，以及这些詞的內容，語法形式，和發音是怎样的，或者在最初开始講話的人們的語言里有什么样的具体語法規則等的任何企圖，只能是沒有根据的乱講，或者是“無意义的推敲猜想而已”（斯大斯語）。这样的企圖使得馬尔院士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尽管他也想从馬克思主义的立場上來解決語言的起源問題。

即使按照最古老的文献來仔細的研究我們所知道的語言，这些研究的材料仍將是距离語言在人类社会產生的时期很远，因为一切最古老的文化史料比人类語言出現的时期还要迟几十年。

現代的科学沒有占有材料來具体解決人类社会中最初的語言在形成和產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然而不能从这个事实出發而說馬克思語言学拒絕提出这个問題和解決这个問題，甚至是一般的解決。相反，我們的科学，根据語言可能在社会中產生的条件的深刻和全面地考慮和分析，並且利用一系列的有关的科学的材料，特别是心理学、生理学、人种学、考古学和其他科学的發展过程中，語言的起源問題將要得到更深刻、更全面的解决，並同时將使我們更接近於关於这个問題的更完全、更深刻的結論。

在远古时期就有人企圖解釋語言的起源这个秘密，因此產生了关於語言起源的各种各样的神話。这些神話一般都認为語言是上帝賜給的，或者是某个最聰明的人造的。

在古代关於語言起源問題的哲学中出現了兩个相反的观点：一些哲学家認为語言是用自然的方法，从自然中產生的；另一哲学家認为語言是由於人們的議定而行的。第一种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認为在事物及表示这些事物的詞之間存在着自然的关系，並認为人本能地从事物之中來猜測它們的名称，第二种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認为人是隨意地給了某种事物一个名称，並認为語言是人發明的。这兩种观点，以各种不同的表

現形式，为哲学家們所支持，一直到十九世紀。

同样，对於决定語言在人类社会中出現的各种原因的解釋也各有不同。並且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解釋最終地归結为兩个相反的观点：一些人認为語言是由人們交际的需要而產生的（社会論）；另一些人認为語言是个人單純地为了自己表达思想，結果也就是为了別人的这种要求中產生的（个人論）。

也出現了各种各样的理論來企圖具体地解釋語言產生过程本身。

一种理論是感嘆論。这种理論的出發点是語言出現以前人們就特具了用声音表达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精神狀况的能力，就好象現代的人由於心理上或肉体上的感受而不由自主的發出了各种声音（啊！噢！哎呀！嗚！等等）。按照感嘆論的說法，后來这些叫声逐漸發展成了第一批詞，而在这些詞的基礎上又形成了其他的詞。

另一种理論就是摹声論。認为最初的一些詞的出現是由於人摹仿周圍物体所發的声音的結果。人听到了某一物体所發的声音，就摹仿着这个声音創造了一个詞來表示这个物体。

第三种理論就是所謂工作論或劳动論。这种理論，認为人們在共同劳动的过程中不由地要重复着某些声音來作为激励情緒的手段，第一批詞就是从这些声音中產生的。

除了上述的理論以外还有浪漫論、歌唱論、身势論等等。

因为篇幅的关系，我們不來对这些理論一一加以批判，我們就來講一講这一些关於語言的起源的各种观点和理論的基本錯誤。

第一，所有上述这些理論都是把語言的起源从語言產生的具体歷史条件中孤立起來看待。他們把語言看成是某种独立的、与社会發展歷史、与原始人的社会劳动無关的东西。

第二，所有上述这些理論都是把語言的起源与思惟的產生隔离开來看待。他們从語言是在人們的已經發展了的思惟的基礎上出現的这一点出發而默認实公开承認人們有無語言的思惟的存在。

第三，所有这些理論一方面都沒有考慮到和动物一样的人的祖先与人之間的本質上的区别，另一方面沒有考慮到动物和人所具有的共同之点，也就是忽視了在动物变成人的过程中的繼承性这个事实，沒有考慮

到一切生物学上的前提，这些前提在一定条件下，在劳动过程中發展成了真正的思惟和語言。

第　六　講

語言的起源（二）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这兩位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著作中，第一次对語言的社会实質作了科学的解釋。馬克思和恩格斯事業的偉大繼承者列寧和斯大林，在他們的著作中根据現代科学的材料，用新的結論和原理發展了和丰富了对这个問題的解釋。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对於語言起源这个問題，是把它与人类社会產生的歷史直接联系起來解决的。关於这个問題的經典著作，就是恩格斯所寫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的作用”这本書。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全面地研究了动物——人的祖先由於社会劳动的結果而漸漸發展成人的条件，並且專門地研究了語言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

藉助於制造成的劳动工具進行有目的的劳动以及語言的存在就構成了人的特征，这些特征使人和其他的动物区别了出來。誠然，在高級动物那里也可以發現利用劳动工具來進行劳动活动的萌芽狀态，如猴子有时用木棒或石头來獲取食物或抵抗猛獸的侵犯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它們的劳动活动和人的劳动活动的根本区别就在於：（一）动物之利用劳动工具乃是偶然的或一时的情形；（二）动物不能制造劳动工具，而人能制造劳动工具，又能自覺地利用劳动工具。因此，說动物藉助劳动工具來進行劳动活动是沒有任何根据的。

所以說，人与动物不同之点在於人能制造劳动工具並有目的地利用动劳工具來獲取生活資料。这是人和动物的第一个，也是根本的区别。由此得出結論：只有当人开始制造劳动工具的时候，他才从动物界中区别出來。

“运用和制造劳动工具是人的劳动过程的專門特点，虽然某些动物也具有萌芽狀态的类似情形。”（馬克思語）因此，我們可以說，劳动

創造了人。

制造劳动工具以及利用劳动工具作为主要的手段來同自然界作斗爭，对於人本身也發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人在制造劳动工具的时候就更加深刻地認識了外界的事物，而在同自然力作斗爭中运用劳动工具就給了人進一步感知自然的可能性。人們从消極地適应周圍环境过渡到了積極地影响周圍环境；自己成了積極的因素，而把自然变成了行为的对象，变成了消極的因素。

劳动活动要求更确切地理解事物的屬性和事物之間的关系，要求更确切地估計事物的特性，它使得人与現实的关系变得更复雜、更多方面了。所有这些，对於人的意識和人們之間的关系的發展不可能不發生决定性的影响。从另方面說，劳动活动使原始人的手和脚分了工。如果說，从前，四肢中的前肢和后肢一樣基本上也是用來支持身体的，那末隨着劳动的產生，前肢开始用來更多地从事劳动活动，而脚就更多地用來支持身体。这樣一來，人的祖先就直立行走起來，这同样給清晰的言語和腦子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如果猿猴总是用四只脚行走，如果它沒有直起身子，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声帶，因此也就不能說話，而这种情形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識的發展。”（見“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八八頁）

当人的祖先尙未利用劳动工具而是消極地適应自然界的时候，他們除了純生物的交际以外就不可能有交际的要求，而这种純生物的交际是不需要語言的。相反的，消極地適应自然界，消極地獲取生活資料，更排除了交际的必要性，因为每个个体的动物在为自己獲取食物的过程中是竭力想独处並独自享用他在自然界所覓得的东西的。因为如果其他动物在場，只会減少他的虏獲物，而陷於飢餓。这樣看來，在自覺地劳动活动出現以前，就沒有建立言語的条件，也沒有什么可談的。当人們开始制造劳动工具並藉助於劳动工具用更完善的方法來獲得生活必需資料的时候，他們就有了交际的迫切要求，有了講話的迫切要求。应当指出，制造劳动工具和利用劳动工具來獲取生活資料是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的，这是一个人所不能办到的。所以劳动一开始就是集体的——人們共

同制造工具，共同藉助劳动工具來影响外界。

集体的劳动迫切地要求交际，在集体劳动过程中人們有必要彼此講点什么。因此，在人們之中就產生的語言。至於那是什么样的語言，它有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但無論如何，它与現代的語言，甚至是最落后的語言也是迥然不同的。大概是在这种最初的語言中，象我們所了解的詞，即表邁个别概念的詞，是不存在的。可能一連串声音（即詞）的內容就等於一个句子，也可能等於好几个句子，來表达一个复雜的思想。可以假定，当时一个詞同时也代表一个句子，一整句話。这些等於句子的詞的音的構成，在語言產生之初可以想見也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人的發音器官那时还不大適合於講清晰的言語。

恩格斯用下面一段話說明了人的祖先变成人的这个过程：“更重要得多的是手的發展对机体的其他部分的直接的和可証明的影响。如我們已經說过的，我們的类似猿的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这种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顯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發展而來。由於手的發展，由於劳动，人开始了对自然的統治，这种統治隨着每一个新的進展而擴大了人的眼界。他們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發現新的、已往所不知道的各种屬性。另一方面，劳动的發展必然使得各个社会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因为劳动一發展，互相幫助和共同活动的場合就增多了，而且每一个社会成員都清楚地意識到了这种共同活动的好处。簡單地說，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有了互相說些什么的需要，需要創造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發达的喉管，藉助於音調的变化，同时也是为了更加促進音調的变化，慢慢地然而不断地改造起來了，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漸学会了連續發出一个个清晰的音節。”（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的作用”，参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五——六頁）

从上面所說，十分明顯，只有隨着把人們联合起來了的劳动的出現，人类社会才形成起來，而人的祖先也才变成了人。同时，在集体劳动的影响之下，隨着人的形成，人的語言和思惟就發展起來了。

語言是作为在集体劳动，社会劳动的条件下必不可少的东西而產生的，沒有語言，旣不能制造劳动工具，也不能利用劳动工具來生產物質

財富。就是說，劳动産生了語言。

从另一方面講，由於同样的原因，人們的意識、思惟也發展起来了。只要人的祖先还过着动物式的生活，只要它們的活动还僅限於消極地適应周圍現实，那末它們的思惟也是原始的，不能超出純生物地認知外界个别事物的这个范圍。（如認知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吃了会有生命危險等。）

当人类开始生産劳动工具並有目的地利用劳动工具的时候，思惟的發展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就开始更深刻地認識事物和現象。

举例說，如果从前分辨不出什么是石头，石头不被动物所注意，那末現在当給石头加工的时候（当然是非常粗糙的），經过很長的时間就認識到了石头的坚固性，認識到了它能够击碎其他的东西（如骨头、木头、果实等），並且使用石头容易从土里掘取植物的根和幼虫等等諸如此类的事情。这样一来，不僅認識到了石头的特性，並且在使用經过加工的石头去作用於其他物体的时候，也認識到了其他物体的特性。这就助長了腦子对於各种物体的比較，發現了它們之間的共同特性並概括地反映現实。

如果說，从前飢餓驅使动物出去到周圍自然界中尋找食物，那末現在，当社会中出現了劳动的时候，同样在飢餓驅使之下去獲得生活資料的这个过程就变得复雜了：人們的思想必須首先集中在劳动工具上，集中在劳动工具的运用上，然后再轉到那些可以充飢的自然界的客觀物体上去。

最后，如果从前飢餓立刻驅使着动物去到自然界尋找食物，那末現在，劳动工具使獲得食物的过程本身复雜化了，人們的思想集中在集体的各个成員上，在他們的直接参加和幇助下，自己才能得到食物充飢。

这一些就使人們的意識發展起来，就要求腦的概括活动，就促進最簡單的抽象思惟的發展。如果說，从前是直覺的飢餓驅使动物去自然界尋找食物的話，那末現在，同样的原因首先就要求思考，要求在充飢的可能性和劳动工具之間確立某种联系，利用劳动工具与其他的人的一起劳动才能充飢。

由此可見，在社会劳动的影响下就産生了对語言与思惟的迫切要

求。劳动既是語言的創造者，也是思惟的創造者。但是，如我們前面所講过的，語言和思惟是互相依存的，它們是密切联系着的。任何一种最簡單的抽象思惟，从它最初產生的时候就只能在有声的語言中得到真实的表达，反过来說，在集体劳动过程中交际的要求就需要一些詞和最簡单的語法規則，藉助这些詞和語法規則把人們思惟的成果巩固下來。

人的祖先和自然界“交际”，是通过外界（包括与它同类的动物群）对动物机体的直接影响以及动物机体对外界影响所起的反映（采取無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的形式）進行的。而在劳动过程中，人不是直接与自然界打交道的，在人們和自然界之間还有劳动工具。在这些条件下，人們在集体使用劳动工具的过程中所進行的直接交际是藉助於第二信号系統，即藉助於詞來進行的。“詞構成了我們（指人）所特有的反映現实界的第二信号系統，它是第一信号的信号。”（巴甫洛夫語）

自然，在人类社会中要構成語言与思惟，人的祖先必須具有語言和思惟賴以發展的某些生物上的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就是：一方面，高級动物具有原始的思惟，高級动物具有第一信号系統；另一方面，它們的器官在某些適合的条件下能够發展成語音器官。

人类社会一开始，人們就藉助於有声語言來互相交际。在这方面必須要談一談某些語言学家，特别是馬尔院士的不正确的反科学的观点，他們認为在有声語言以前存在过所謂手势語言。

馬尔認为，在制造劳动工具以前（如果正确地了解“劳动”这个詞的話，当然是在“劳动”出現以前），人們就已經有了語言，但不是有声的，而是手势和表情的語言。按馬尔院士的推断，这种語言人們用了一百万年到一百五十万年。在这一个漫長的时期，手势語言是人們交际的唯一的工具，到后來有声語言才代替了手势語言。

需要指出，这种不正确的反科学的說法在一个时期里曾在語言学者（包括苏联的語言学者）中間得到廣泛的傳播。

承認手势語言是第一性的，这与馬克思列寧主义的語言观点相違背的，也与科学材料相違背。

实际上，如果同意了馬尔这种反科学的論断，那末就必須承認，人們还在变成人以前就开始交际了（要知道，人类社会只是在劳动过程

中，在人們創造了劳动工具的条件下才形成的）。这样，照馬尔的观点看來，顯然，他們不是用手，而是用前肢或后肢來交际了，因为只有劳动才使手進化，使它成为真正的手而不同於后肢——脚。隨着劳动的出現，藉助手势的交际也是不可能实現的，因为人的手要用來工作，而人們在那个發展的階段上如果沒有工作，沒有集体的劳动，也就沒有交际的基礎。

最后，馬尔忽略了在產生有声語言这一問題上人的祖先和人之間的繼承性的事实。有声語言不是在手势的基礎上，而是在人的祖先能發出各种不清晰的声音的生理能力的基礎上構成的，这些不清晰的声音在人类社会中，在語言的出現和發展过程中逐漸变得清晰了，經过分化和發展而达到了現今的狀況。

所以說，馬尔关於手势語的第一性的論点是与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著作中对語言起源的观点相違背的。斯大林同志在他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著作中用下面一段話駁斥了馬尔这种不科学的論斷：

“有声語言或詞的語言始終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为人們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語言。歷史上沒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令是最落后的，能够沒有自己的有声語言。人种学不知道有任何一个落后的部族，即令是，比方說，象十九世紀的澳洲人或火地人一样原始的或更原始的，能够沒有自己的有声語言。”（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十六頁。）

第　七　講

語言的譜系分类法和形态分类法（一）

經过長期而复雜的發展过程，在人类社会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民族語言和部族語言。現今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語言，还沒有确定。有一些語言学家計算大約有兩千五百种到三千种，另外一些語言学家却認为比这个数字要少得多，說世界上的語言总共不过几百种。

因为每一种語言都是交际的工具，都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所以

它們都是彼此平等的。不能說哪些語言好，哪些語言不好。这样來比較是不正确的。一种語言旣然能服务於人們的某一集体，作为他們交际的工具，那就是說，它能滿足这一个民族或部落交际的要求，因而这种言語就是好的。

可以說，語言在發展上是有差别的，斯大林同志說过：“詞彙越丰富、越紛繁，那末語言也就越丰富、越發展。”

語言在这方面的差别，在从一种語言翻譯成另一种語言的时候，表現得特别明顯。有些时候把一种語言譯成另一种語言並不感到困难，因为具有細緻差别的任何概念以及任何最复雜的抽象的意思都可以容易地翻譯出來，譯者在另一种語言中不难找到确切的、相当的詞、詞組和短語。相反的，从一种比較丰富的、發展的語言翻譯到一种比較不丰富的、不發展的語言，就往往会感到困难。因为在要譯成的語言中找不到相当的詞，所以，一种語言所表达的思想用另一种語言表达出來时，就顯得貧乏、不确切。

語言的另一个差别就是有些語言用的人比較少，譬如：用馬里語講話的有四十万人，用拉克語講話的約有六万人，用拉脫維亞語講話的約有一百五十万人；然而用另外一些語言講話的人却很多，使用的范圍很廣，所以它們在人类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也特别大。

現今应用最廣泛的語言就是：俄語（应用这种語言的人約有一億以上），漢語（应用这种語言的人有五億多），印度語（应用这种語言的約有兩億三千万人），英語（应用这种語言的約有兩億人），西班牙語（应用这种語言的約有八千万人）。

然而，語言学在比較各种語言和把各种語言划分成某些类别时並不是以語言的發展程度和使用的廣泛程度为根据的，虽然这样的分类也未嘗不可。

因为任何一种語言的基礎是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所以把語言划分成各种类别（或称語言的分类）就应該以語言的基本詞彙和語法構造的各种異同点为根据。因此，在語言学中最普遍采用的分类方法有兩种：形态分类法（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和譜系分类法（генеалоги́ческ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形态分类法是按照所比較的語言中詞的構造的特征来划分的。譜系分类法是按照語言起源的共同性，即按照語言的親屬关系的特征划分的。

象我們上面所講的，形态分类法是在詞的構造的基礎上比較、对比語言而把語言划分成各种类别的，確切点說，就是根据詞的構造中能不能分出附加部分（áффиксы），附加部分和詞根詞身之間具有何种性質的联系而划分成各种类别的。因此，所有的語言按形态分类法可划分为兩种基本类型：

1．詞中沒有附加部分而只有一个詞根的語言称为根詞語（корневые языки）；

2．詞中除詞根外还有附加部分的語言称为含附語（аффигúрующие языки）。

在根詞語中，因为沒有附加部分，詞是不变化的。因此在根詞語中，把一个詞与句子中的其他詞隔离开来，就不能按其外部特征来确定这个詞在句中起什么作用，它在句中是什么成分。譬如，如果拿побеждáет这个俄語詞来說，即使不和句中其他詞联系起来，但我們仍可以說，第一，这是一个动詞；第二，这种形式的詞在句中作謂語用。因为人称詞尾 ет 表明了这一点。假若以接近根詞語的漢語来說，則有許多詞离开句子的其他詞孤立地按外部特征来看，就不能确定这个詞是屬於哪个詞类，在句中作什么成分。如“勝利”这个詞，在“獲得勝利”这个詞組中是补語，而在“我們勝利了”这个詞組中就是謂語。由此可見，在根詞語中另中詞的相互关系是靠着詞序（如：好人，修好，病好了）和用其他手段（如虛詞）来确定的。划分詞类的原則，在根詞語中也是另一个样子。譬如，漢語詞类不是按照詞的構造和附加部分（漢語中沒有附加部分），而是按照一个詞与其他詞的結合能力这一特征来划分的。例如，有一些詞和否定詞“不”結合，能不帶系詞“是”而作謂語，而另一些詞就不能直接和否定詞“不”結合，只能藉助系詞“是”作謂語。

按照形态分类法屬於根詞語的有漢語、泰語、越南語以及其他一些語言。

含附語这种語言，在詞的構造中除了具有实在意义的詞素（即詞

根）外，还可以分出詞的構詞部分和構形部分（前綴、后綴、詞尾），这些部分統称为附加部分。在这种語言中，詞的本身的形式能够表示出它們是屬於哪个詞类，在句中起怎样的作用。如俄語中 стéну 这个詞，由於詞尾 у 我們确定它是名詞。（因为在示格詞尾系統中，名詞 стенá 有詞尾 у。）並且根据这个詞尾，我們还可以說，它在句中是补語或狀語。同样，погуляю 这个詞的語法形式表明它屬於动詞，在句中作謂語。韃靼語 адамларның（人們）一詞，由於后綴 -ның，我們認出它是名詞，並能确定它在句中起补詞或定語的作用；而韃靼語барамыз一詞，按其后綴-мыз我們就認出它是动詞，並确定它在句中是謂語（-мыз是动詞現在时复数第一人称的后綴）。

含附語又分为黏着語（агглютинатúвные языкú 或称 агглютинúрующие языкú）和屈折語（флектúвные языкú）。这种划分，是以附加部分和詞身或詞根之間联系的性質为根据的。

在黏着語中詞身和附加部分的联系並不是必然的，因而这种联系是微弱的。在这种構造的語言里，詞身不帶表示格（名詞等）或人称（动詞）的后綴而本身就已經是詞了。如韃靼語詞 балта（斧子）純粹是一个詞身，就象俄語中 стекл 是 стеклó（玻璃）的詞身一样。但韃靼語 балта 这个詞由於在詞彙意义和語法意义上都已确定，不帶上表示格的后綴（韃靼語中沒有詞尾）就可以起表名称的作用，而俄語 стекл 这个詞身本身还不是詞（它只是詞素），只有当它有了某种示格詞尾，如 стеклó，стёклами 等，才能成为一个詞。可見，对於黏着語來說，詞身这个術語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的，因为每一个詞同时就是詞身，可以直接加上構詞和構形的附加部分。因此，在这种語言中后綴（附加部分）能和詞的其他部分分开，而不会破坏詞义的完整性。如 балталарга（斧子——复数与格），балталар（斧子——复数），балта（斧子——單数）。这里我們不妨依次先把与格后綴 -га 分出，然后分出复数后綴 лар，最后就剩下了一个詞身，这个沒有后綴的詞身本身仍是一个詞。这种情形我們在漢語的人称代詞中（我們，我）和表示人的名詞中（同志們，同志）同样可以看到。

其次，可作为黏着語一种特征的，就是可把一些附加部分按一定順

序結合起來，表示一个詞的各种語法意义。如韃靼語詞адам（人），адамлар（人們，-лар是复数的后綴），адамларны（人們，-ны是生格的后綴）。

因此，与屈折語（如俄語）比較起來，黏着語中的附加部分是單义的。屈折語中的附加部分不僅和詞身緊密地融合在一起（沒有附加部分的詞身本身就不成为詞），而且还表示許多意义。如动詞 гуля́ем，附加部分 -ем 既表示第一人称、复数、現在时，还表示叙述式。

屬於黏着語的有突厥語（或称突厥——韃靼語）、日本語、朝鮮語、愛沙尼亞語和許多其他語言。

从上面的比較可以看出，屈折語的特征就是附加部分和詞身的有机統一。譬如：在俄語中，一个詞之所以能成为名詞必須和詞尾結合起來（陽性名詞第一格和第三变格法的陰性名詞的第一格是禿尾），沒有詞尾就不能算作詞，而詞身既不能表达詞彙意义，也不能表达語法意义，因而就不能成为一种詞彙單位。例如 стен（如果不考慮这是стена́一詞帶有禿尾的复数第二格的話）就不能算作一个詞。

在詞形变化时詞身中產生音变的情况下，詞的詞身和附加部分的有机統一表現得特別明顯。如：друг—друзья́（朋友），ви́жу—ви́бишь（看到），пеку́—печёшь（烘，烤）。这里由於音变的結果，詞身有些模糊，不經过專門的語言学分析就难以分辨詞身和附加部分，就不能把 дру́гом—друзья́м 諸形式看作一个整体。

詞身因詞的形式改变而發生的变化叫作內部变形（вну́тренняя флéксия）。

在有些語言中某些詞的詞形变化时，不僅附加部分發生变化，而且詞身也要变化（內部变形）。有时詞形变化时只有內部变形，詞尾不变。如德語中Bruder（兄弟——單数）—Brüder（兄弟——复数），英語中 foot（脚——單数）—feet（脚——复数）。但是有一些語言，象阿拉伯語，其中內部变形乃是表达同一个詞各种形式的語法意义的基本方法，如阿拉伯語詞катала（他殺人）—кутила（他被殺），катаба（他寫完了）—кутиба（它被寫完了）。

屬於屈折語的有印歐語系的語言和閃米特語系的語言。

形态分类法把所有的屈折語分为綜合語（синтетические языки́）和分析語（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е языки́）兩种。

屬於綜合語的語言，其語法意义基本上用附加部分表示，而屬於分析語的語言，詞的語法意义不是由詞本身表示，而在这个詞以外用一些詞（一般用虛詞）表示。如俄語中完成体动詞的將來时用綜合式表示（如 сде́лаю），而未完成体动詞的將來时就用分析式表示（如 бу́ду де́лать）。

綜合的語言結構，可以作为俄語和其他許多語言的特征，而分析的結構可作为英語和法語的特征。

把某种語言归屬到根詞語、黏着語或屈折語以及把語言划分为綜合語或分析語，应該注意：沒有一种語言是純粹屬於某一类的。在每种語言中都可以找到各种不同形态構造的要素。如俄語是屬於屈折語和綜合語的，但我們可以遇到不少其他类型的成分。譬如，俄語动詞命令式复数形式是黏着式：чита́й— чита́й + те，动詞过去时复数也是黏着式：чита́л—чита́л + и；где，туда́，отку́да，вперёд，наза́д 等詞沒有附加成分，也不变化，就有些象根詞語——漢語的詞；俄語形容詞比較級的構成可以是綜合式，也可以是分析式（如сильне́е—бо́лее си́льный），假定式是用分析式構成的，动詞过去时的形式加上語气詞бы表示假定式（如 чита́лбы）。

漢語虽然按照它的構造应算作根詞語，但代詞的复数却用黏着式構成，如：他——他們。

因此，把某一种語言归屬到某一种形态类型，要根据該語言中詞的主要結構或語法意义的主要表示法。

形态分类法对於語言学來說，其作用不大。第一，它不能把語言的各种不同構造都包括進去，因而这种分类法是不全面的；第二，如我們所看到的，語言的形态类型有时很难区分；第三，形态分类法对於解決語言学的主要任务——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來說，毫無作用。

形态分类法的价値主要在於它对語言的語法結構提供了一些共同的概念，在建設一种語言的描寫語法时，它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由此可以确定重心应該放在語法的哪一部分上。譬如，在建設根詞語的語法

时，重心自然要放在句法上，而建設黏着語和屈折語的語法时，重心就应放在詞法上。

此外，在研究語言的語法構造的發展时形态分类法可以指出一些方向。譬如，在漢語的根詞語構造的基礎上研究其中某些黏着的現象，可以得出有关漢語語法構造某些方面發展性質的若干結論。

第　八　講

語言的譜系分类法和形态分类法（二）

現在我們來研究一下語言的譜系分类法。

譜系分类法是把語言按起源的共同性，也就是按語言的親屬关系來划分的（親屬語言ро́дственные языки́这个術語就是由此得來的）。

根据这种分类法，所有的親屬語言就組成了一个語系（семья́ языко́в或 систе́ма языко́в）。譬如印歐語系、烏戈尔—芬蘭語系汗藏語系等等。

親屬語言是經过長时期的分化过程形成的。这种分化过程在人类社会發展的最初階段，在奴隸时代以前特别剧烈，許多現代語言的基礎就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可以推想現代語言的要素还在奴隸时代的远古时期就已奠下基礎了。"（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十四頁）基礎語言分裂成各种方言許多方言变成了独立的語言，以后这些語言又分裂成一些方言。这些分裂出來的方言在一定条件下又能成为構成新的独立的語言的基礎：就这样形成了親屬語言。在語言学中把它們合在一起称为一个語系。

基礎語言分裂成各种有親屬关系的方言这一过程和这些方言發展成为独立的語言，並不能認为是很簡單的、直綫式的。分化过程和親屬方言与語言（有时並不是親屬的）的統一过程、綜合过程是彼此交錯着的。兩种或兩种以上的方言或語言又会形成一种方言，一种語言。斯大林同志着重地指出了語言發展的这一复雜过程，他寫道："在这个时期中許多部落和部族分开了和分散了，聚合了和融合了。往后，出現了民

族語言和國家，發生了革命，發生了旧社会制度的变替。”（同上書，第二十五頁）

在組成一个語系的各个親屬語言之間，由於歷史發展的不同，在基本詞彙方面和在語法構造方面的共同性有大有小。因此，譜系分类按这种物質上的親屬关系在語系內部把相近的語言划分成語支（語群），在語支內部又把最相近的語言合成分語支（分語群）。譬如，印歐語系可以分成斯拉夫語支，波罗的語支、日耳曼語支、罗馬語支等等。斯拉夫語支由於各个斯拉夫語言的共同性大小不同可分为西斯拉夫諸語言，南斯拉夫諸語言和东斯拉夫諸語言，而在东斯拉夫分語支中又分成俄罗斯語、烏克蘭語和白俄罗斯語。

一般說來，語言的親屬关系与部落和民族在人种上的親疏是相关联的。然而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語言起源的共同性和种族的共同性是一致的（种族páca）一詞，按奥日果夫辞典解釋，它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群人，它具有相同的某些次要的外部生理上的特征，如皮膚和头髮的顏色、头形等等）。不妨举出下面一件事实作証明，操烏戈尔—芬蘭語系和印歐語系語言的人，雖然都同屬於高加索种，但却構成了完全不同的兩个語系。

語言的共同性，語言的親屬关系是用歷史比較法确定下來的。

早在十八世紀末叶就已被人察覺到，有些語言俱管使用的地区彼此相距甚远，但有許多詞（而且屬於基本詞彙的詞）在讀音上和意义上却几乎是相似的。譬如，拉丁語матетер〔註 〕（母親），希臘語为метер，德語为муттер俄語为мать（試比較：матери）；拉丁語новус（新的），希臘語为нэос，古印度語为нава，俄語为новый；拉丁語ту（你），德語为ду，阿尔明尼亞語为ду，保加利亞語为ти，俄語为ты。

不同的語言不但在詞彙方面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在語法構造方面也有許多相似的地方。譬如，动詞复数第三人称詞尾中有这样一种相似的情況：古斯拉夫語несм（他們拿），現代波斯語нираванб（他們走），拉丁語лауданм（他們誇奬），布列頓語леннонм（他們讀）。

語言在物質上的親屬关系的这一些事实（詞根和附加部分就是它們共同的东西）不可能是偶然的，它們只能是語言起源共同性的結果。但

这还需要証明。要証明，譬如为什么俄語 мать一詞的詞根中是-а-，而德語муттер詞根中是-у-。

要証明这一点，必須从歷史方面来比較親屬語言。因此，研究語言和确定語言的親屬关系的方法就叫做歷史比較法。

歷史比較法是以下面这一無可爭辯的事实为根据的，就是事物或現象和它們在語言中的名称之間沒有任何的联系，也举不出理由足以証明有什么联系；因为假如有这种联系，那末所有語言把同一个东西都叫做一样的了。因此，如果在不同語言中称謂某一些事物的一些詞是一样的話，那末，这只能解釋为这些詞起源的共同性。

在用歷史比較法确定語言的親屬关系时，应注意到以下三个基本要求：

1．語言材料上完全不同的事实不能比較。譬如，不能把俄語詞труд（劳动）和表示同一現象的烏克蘭語詞праця相比較。虽然这兩个詞指的是一个东西，但它們在声音上沒有任何共同之点。

2．在讀音和意义上完全相同的詞也不能比較。譬如，俄語和烏克蘭語中的рука́（手），день（日），де́рево（樹），слух（听覺），траво（草）等詞，因为比較这些詞什么也得不到，只能說，这些詞在俄語和烏克蘭語中是完全一样的。

3．应該比較讀音相近、詞义相同的那些詞或詞的形式。譬如，俄語說ДОМ（房子）烏克蘭語說ДИМ；俄語說ТЫ（你），德語說ДУ等等。这样就可以确定是否有这种規律：在其他詞中同样的語音地位，俄語的О与烏克蘭語的И相应，俄語的Т与德語的Д相应。

如果在数种互相比較的語言中有这种規律，那末可以設想，或者是其中有一种語言保存了与基礎語言中讀音一样的詞或語法形式，而在其他語言中，这些詞或語法形式的讀音起了变化；或者是在基礎語言中完全是另外的音，与所比較的語言由於分化过程而發展了的那些音不相同，与所比較語言中的任何一个音也都不相同。这样根据推想确定了的基礎語言中的事实通常用星号标出，以表示这种現象的假定性。

这些語言事实積累的結果就可以推想出基礎語言的語音系統、語法構造和許多詞的意义。

可以說，語言学中的歷史比較法是为了确定語言的親屬关系而產生的。然而从現代苏联語言学的觀点來看，用歷史比較法研究語言基本上不是追求語言的親屬关系，而是闡明語言的規律，基礎語言分化过程的規律和所比較語言發展过程的規律。歷史比較法的价值就在於此，因为語言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确定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

斯大林同志在指出歷史比較法的嚴重缺点的同时，指出它的价值在於使語言学家努力深入研究語言事实。“……应当說，歷史比較法虽然有其嚴重的缺点，还是比馬尔的真正唯心主义的四种要素的分析法要好些，因为前者还推动着研究語言的工作，后者只是要人躺着，环繞着鼎鼎大名的四种要素去作無意义的推敲猜想而已。”（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十二頁）

譜系分类法比照形态分类法來，其优点也就在此。按形态分类法，只是研究某种語言詞的構造就能够把这种語言归屬到某一类去，而按譜系分类法去，則必須研究語言的歷史，确定語言發展过程的規律，才能够把語言归屬到某一語系中去。

現代語言学还沒有对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都研究到应有的深度。研究得最多的是印歐語系、突厥—韃靼語系、烏戈尔—芬蘭語系和閃米特語系的語言。

許多語言，特別是非洲、亞洲各族人民的語言是在資產階級語言学家的視野以外的。这是因为在資本主义國家的帝國主义政策下，資產階級的語言学認为这些民族的語言（还不僅僅是語言，甚至这些民族）是沒有价值的，因而从科学方面看來是不值得注意的。

只有現代苏联的語言学，根据各民族平等，各民族的語言平等和各种語言对語言科学有同等意义的原則，才深入地研究了世界上各种語言，对它們進行全面的分析，以求科学地确定这些語言的發展規律。

大多数的現代語言組成下列諸語系：

1．印歐語系；

2．閃米特和哈米特語系；

3．烏戈尔—芬蘭語系；

4．阿尔泰或吐蘭-蒙古語系（傳統称为突厥-韃靼語系）；

5．伊伯利亞高加索語系；

6．漢藏語系；

7．达罗維荼語系；

8．印度尼西亞語系。

在这八种語系中，我們現在比較詳細地談談印欧語系和漢藏語系。

印欧語系中包括有：1．印度諸語言；2．伊蘭諸語言，或称印欧語系伊蘭語支；3．斯拉夫諸語言或称印欧語系斯拉夫語支；4．波罗的諸語言，或称印欧語系波罗的語支；5．意大利諸語言（傳統称为罗馬諸語言），或称印欧語系意大利語支；6．日耳曼諸語言；或称印欧語系日尔曼語支 7．凱尔特諸語言，或称印欧語系凱尔特語支；8．希臘語；9．阿尔巴尼亞語；10．阿尔明尼亞語；11．遑希特語(死語)；12．吐火罗語（死語）。

斯拉夫語支分为三个分語群：东斯拉夫語群、西斯拉夫語群和南斯拉夫語群。

东斯拉夫語群中包括：俄罗斯語、烏克蘭語和白俄罗斯語。

俄罗斯語是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國的國語，俄罗斯語是苏联各民族的兄長——俄罗斯民族的民族語言。俄罗斯語是苏联各民族間交际的語言。俄罗斯語不僅在东斯拉夫諸語言中是最大的，就是在整个斯拉夫語支中也要算最大的。俄罗斯語是“最有力、最丰富的活的語言之一”（馬克思、恩格斯語）。以俄罗斯語作为本族語講話的有一億人以上。

用烏克蘭語（烏克蘭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的國語）講話約有三千八百万人。

用白俄罗斯語（白俄罗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的國語）講話的差不多有九百万人。

西斯拉夫語群由下列語言組成：波蘭語、卡輸普語、波拉卜語、捷克語、斯洛伐克語和盧支語。

構成南斯拉夫語群的有：保加利亞語、塞尔維亞語、霍尔瓦特語和斯罗文語。

在九世紀曾經把一些聖經譯成一种保加利亞語的一种方言。这些譯

著所用的語言就叫做古斯拉夫語。

漢藏語系分为兩支：漢泰語支和藏緬語支。

漢泰語支由漢語、泰語（暹羅語）和越南語〔註一〕組成。

1．漢語是通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語言。这是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下擺脫帝國主义的束縛开始过着自由生活的偉大的漢族人民的語言。用漢語講話的人有五億以上，这是世界上使用最廣的一种語言。漢語是有最丰富和最悠久的文化的語言。〔註二〕

記載漢語的文字至少已有四千年的歷史，漢語史上的材料对普通語言学具有極大的价值。

2．泰語（或称暹邏語；用它講話的約有七百万人），它有許多方言。

3．卡連語（在緬甸），講这种話的約有一百三十余万人。

4．和泰語、漢語相近的还有越南語，講这种話的約有一千四百万人（有些語言学家把越南語列入猛吉蔑語中）。

藏緬語支基本上由兩个分語群組成：藏語和緬甸語（用这些語言的一共約有兩千万人）。

藏語群包括：

1．藏語及与其相近的諸方言（約有十三种方言）。用它講話的約有三百万人。

2．西藏喜馬拉亞語和一些地方話（有八种語言和地方話，如顧隆克語、穆尔里語、連查語等）。

3．北阿薩姆語（有六种語言和地方話：阿卡語、阿保尔—密里語、达發拉語等）。

用藏語寫的有許多佛經，这些佛經是从七世紀起由印度語譯成藏語的。

著名的用漢藏兩种語言訂的条約在八二二年刻在拉薩的石碑——唐蕃会盟碑上。

緬甸語群中有：

1．緬甸語（約有一千万人），有許多方言，其中比較著名的有五种。

2．庫啓欽語，方言有二十五种之多。

緬甸語是从十一世紀有文字的（最古的四种文字的石碑題詞，寫於一〇八四年）。藏語和緬甸語都是采用印度字母。

除了上面說的，屬於藏緬分語群的还有保都語—那迦語—喀欽語（有三十五种方言）以及倮倮語、傈僳語、西夏語等語言。（全文完）

〔註一〕本講中引用的非俄語語詞都是用俄語字母标音的。——編者

〔註二〕下面談到的这兩种語系的分类，是根据契科巴娃著“語言学概論”一書編寫的。——編者

〔註一〕有一些語言学家認为越南語在漢藏語系中独立成为一个語支。——編者

〔註二〕漢語的方言一般公認分成四大群：1）北方方言，即所謂官話；2）吳語方言；3）閩語方言；4）粵語方言；在这四大群之外，后來又加上第五群——湖南省方言，E.龍果夫和A.龍果夫曾在 Диалекты Сянсян и Сянтань провинции Хунань（ИОГН АН，1932，239——269頁）一文里加以描寫。这一群重要方言后來在參考書和教科書里也都提到，称为湘語方言。（龍果夫：“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見“中國語文”一九五五年一月号，第十四頁註七）

契科巴娃在“語言学概論”一書中把漢語的方言分为兩大方言群：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編者